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IMPERIAL EYES

帝国之眼

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Mary Louise Pratt

[美国]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著 方杰 方宸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帝国之眼

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Mary Louise Pratt

[美国]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著 方杰 方宸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 (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著；方杰，方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4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ISBN 978-7-5447-6833-7

I. ①帝… II. ①玛… ②方… ③方…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448 号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2nd ed. by Mary Louise Pratt
Copyright © 1992, 2008 Mary Louise Pratt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537 号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美国]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 著 方杰 方宸 / 译

责任编辑 陶泽慧
特约编辑 刘 静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Routledge, 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页
字 数 273千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833-7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订购热线：025-86633278 质量热线：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我的姐妹希拉、诺拉、凯茜，
以及我的舅婆、姑婆阿格尼丝、玛丽、洛娜、威妮弗雷德、
玛丽、诺尔玛、莫德和珀尔

通过看,你就可以察觉到很多东西。

约吉·贝拉

第一版序言

本书缘起于1978至1981年间,当时我和同事里娜·邦马约尔在斯坦福大学共同教授一门关于旅行书写与欧洲扩张的课程。之后,她转向其他领域,而我则坚持把这个课题做了下来。

本课题研究工作得到多方支持。当初开设的课程,通过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计划获得国家人文基金资助。1982至1983年,在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下,我得以从事一年的独立研究。1987至1988年撰写本书期间,皮尤基金会、古根海姆奖学金、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为我提供资助。我对各方为我研究工作提供的支持深表感谢。

本书以全球重组和意识形态巨变为其标志性特点。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持续至今。本书的写作始于痛苦的里根—撒切尔岁月,当时去神秘化帝国主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也更加希望渺茫。后来,本书的撰写工作一度中断,原因是爆发了目前正在大多数美国大学进行的,有关本科人文学科课程的激烈的机构斗争;确切地说,这些斗争围绕的是教育和官方文化中的欧洲帝国主义、大男子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遗产。因此,本书的撰写一直伴随着与某些意识

形态的持续交锋，而这些意识形态的作用，又恰恰是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无论如何，本书的出版适逢哥伦布诞生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欧洲和南北美洲，人们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认识欧洲殖民主义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在官方文化领域，这提供了一个机会，对有关欧洲优越性的赞美叙事(celebratory narratives)加以修正。南北美洲的土著民族觉得，这次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是天赐良机，让他们可以坚持一种反历史(counterhistory)，重申他们的生活方式，加强当今为争夺地域和自治权而进行的斗争。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对他们与知识和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界定或重新界定，他们既是这些知识和权力结构的生产者，又是由这些知识和权力结构造就的。在生态浩劫和持续的帝国冒险主义境况下，这场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凸显了以领土和全球占有欲为特征的欧洲意识形态所运用的巨大历史力量，而这些意识形态正是本书的批评焦点。

这还是一本由英裔加拿大移民撰写的书。对我来说，20世纪60和70年代走向世界，目的是使得自己在美国教书、生养、写作、成熟以及与伴侣的生活得以持续。这些年来，我的心智、幸福、学识要归功于许多人，没有他们，这本书的完成也许会更晚(难有任何优势可言)，这些人包括：斯坦福大学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系以及现代思潮与文学课题的研究生们，参加拉丁美洲和文化研究团体举办的妇女与文化研讨班的同事们，我亲爱的孩子萨姆、曼纽尔和奥利维娅，我的伴侣和极珍贵的对话者雷纳托·罗萨尔多。感谢琼·佛朗哥、凯瑟琳·纽曼、埃德·科恩、里娜·邦马约尔、南希·多纳姆、吉姆·克利福德；感谢他们与我的交谈以及对本书部分章节提出的意见，不过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们永恒的友谊。感谢哈丽雅特·里特沃和比森特·拉斐尔，他们给予我慷慨无私的帮助，不仅通读本书各章，而且还提出许多有益意见。朱迪思·赖斯基、伊丽莎白·库克、戴恩·约翰逊是我的研究和编辑助手，

他们工作勤奋,富有想象力,其程度超过我的奢望。我很感激他们的帮助。

本书所有内容都未曾以书的形式呈现过,但是某些部分的较早版本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分别见于: *College Literature* (8, 1981); *Escritura* (7, 1979);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table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2); *Critical Inquiry* (12, 1985); *Nuevo Texto Crítico* (1, 1987); *Inscriptions* (1, 1987); 以及 *Writing Culture* (eds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Berkeley, California UP, 1986);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ed. Henry Louis Gates, Chicago, Chicago UP, 1986);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eds Jonathan Hall and Ackbar Abbas, Hong Kong, Hong Kong UP, 1986)。

1992年于帕洛阿尔托 xii

第二版序言

《帝国之眼》被认为是一种智性努力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殖民、新殖民、非殖民形态的帝国主义所产生的作用呈现出来，供人们进行反思和改造。这种努力是要松动帝国主义对想象和知识的控制，并创造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并生活在其中的空间。过去五十年间，数代学者和艺术家一直在从事这种努力。它也一直是智性生活的核心关切。

世界当前的状况很难对这项事业是否成功做出肯定性的结论。帝国思想继续自我更新，并以极大的适应力发生变化。今天的帝国之眼盯着那些“欠发达的”空间，寻找工业外包场所、转基因单一作物种植园、有害废物倾倒地。¹老调总是重弹。2003年初，乔治·W. 布什总统对美国军人说，他派他们去伊拉克，“不是为了征服任何人，而是为了解放人民”；他实际上是在重复1917年3月占领巴格达的英国将军斯坦利·莫德爵士说过的话：“我们的军队不是作为征服者或敌人，而是作为解放者进入你们的城市和国土。”²英国军队于1958年撤出伊拉克，那一年，布什十二岁，而萨达姆·侯赛因则是二十一岁。萨达姆·侯赛因由与英国人做斗争的叔父抚养成人，当时已经加入反抗英国占领的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马上就要进入第四个年头。

我有幸以更新和扩充的形式重新出版《帝国之眼》。感谢读者提出建议发行新版，并讲明要这样做的原因。他们的慷慨之辞，加上“导论”中描述的一位使者的神秘抵达，让我克服自己虔诚的顾虑，不再担心同事和学生们不得不再次购买这本书。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赖克教授，他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一个小阅览室里发现原稿后与我取得联系。当时为了这些手稿，我已经寻找了十五年。

第二版最大的改动是最后新增加的一章，这使得本书第三部分比原来有所改善。这一章“在新殖民地：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有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20世纪现代主义美学和新殖民主义，聚焦于20世纪20到4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以及巴西的一些作家。第二部分反思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的流动性，在最初撰写这本书时，这种全球性的轮廓才刚刚进入人们视野。我考察新式的流动性，比如从前殖民地 toward 宗主国的反向流散和旅行档案的新循环。在一些读者建议下，本书的“导论”部分实质上重新撰写，其目的是使之更容易理解。新增有几幅插图。 xiii

1998至1999年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社会人类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y Estudios Superiores de Antropología Social)的一年，是我思考现代性、迁徙和许多其他问题的一次重要机会。第十章的初稿写于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年期间，其中有些部分早先出现在Mabel Moraña, Enrique Dussel and Carlos Jauregui (eds) *Coloniality at Large: Latin America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 (Durham: Duke UP) 中。它还将出现在本书新的西班牙语版本中(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92年版的“序言”中提到的

那些孩子们，如今已经长成聪明的年轻人，能够对我的书稿提出批评。令人惊奇的是，雷纳托·罗萨尔多依然是我最珍贵的对话者。“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朋友仍然如故。万分感谢他们所有的人，感谢每天迎接我的纽约市那浓厚的生命力。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001
第二版序言·····	004
第一章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001

第一部分 科学与情绪,1750—1800

第二章 科学、行星意识、内陆·····	019
第三章 叙述反征服·····	048
第四章 反征服之二：互惠的奥秘·····	088
第五章 性爱与废奴·····	111

第二部分 重构美洲,1800—1850

第六章	亚历山大·冯·洪堡与美洲之重构	143
第七章	重构美洲之二:资本主义先锋与女性社会探索者	184
第八章	重构美洲/重构欧洲:克里奥尔人的自我塑形	222

第三部分 帝国之文体学,1860—2007

第九章	从维多利亚湖到圣萨尔瓦多喜来登酒店	261
第十章	在新殖民地: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	297
注 释	324
索 引	360

第一章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我生长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叫利斯托尔的农场小镇。在镇子主要路口的一角，有一家利文斯通医生经营的杂货店。利文斯通医生是由药剂师改行做的杂货店主。不过对孩子们来说，他的杂货店首先是个能够买到恶作剧道具的地方。有时利文斯通医生会用这些道具对你开玩笑，特别是在利文斯通太太没在店里的时候。比如，正是通过利文斯通医生，我见识了种种神奇之物：滴水杯、喷水指环、中式手铐、突然夹住你手指的假果汁口香糖包，还有1955年左右利文斯通医生偷偷给我弟弟和他朋友的一件令人恐惧的新玩意儿——塑料呕吐物。有一天，他将一张笔迹褪色的纸装在一个相框里，说那是他一位曾在非洲当过著名传教士的大伯写的信。当时，我无法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只是在主日学校请教过萝克西·埃利斯小姐（她本人原来也是传教士）之后，我才把这件事当真。“我们的”利文斯通医生，乃是非洲那位“真实的”利文斯通医生的大侄子。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英语区仍然处于殖民状态：现实与历史在别的地方，在英国人身上体现出来。

那封褪色信上的名字，带着其殖民的羽毛伴随着我。人们铺设里斯托尔的排水沟时，决定将所有街道的名字也加以升级。我们的街道由拉格伦街改成利文斯通大街。这个镇子的名字，是一个世纪前邮政局长依照他妻子在爱尔兰的出生地取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妹妹在非洲也偶遇了那段历史。在内罗毕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大厅，她见到了朱迪思·里斯托尔夫人，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探险家。里斯托尔夫人长得瘦长结实，但身无分文、性格古怪。她反感于旅馆的费用，对使用她名字的那个加拿大乡镇几乎毫无兴趣。那之后过了几年，我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调研时，偶然发现朱迪思女士写的一本书。我妹妹遇见她时，她一定刚写完那本书——戴维·利文斯通的传记。我不知道朱迪思女士的情况怎样，不过我母亲是在里斯托尔一个名为利文斯通庄园的养老院安度的晚年。“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们，团结起来！”我父亲一生都热情地忠实于那个怀旧的新帝国主义口号。即便是在他们更改了他街道的名字，我妹妹从内罗毕返回之后，他也从未承认过他们已经团结起来，或者至少口头上在全球范围内团结一致。利文斯通，里斯托尔，利文斯通。这些音节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凭借重复那些相距遥远、不连贯、非真实的事物串联起来。帝国就是这样让世界对其属民具有意义，就是这样将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在我生活过的里斯托尔，帝国将我们变成某种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却是在别的地方被人们而不是我们创造的。与此同时，当谈论非洲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谁了。主日学校传教士的故事，将种族区分植入我们的想象之中。把我们变成帝国的属民，给予我们在帝国秩序中的地位，这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这个故事还有续集。2006年夏，就在我考虑是否继续出版新版的《帝国之眼》期间，我在休伦湖畔我们家的村舍里住了些日子。邻居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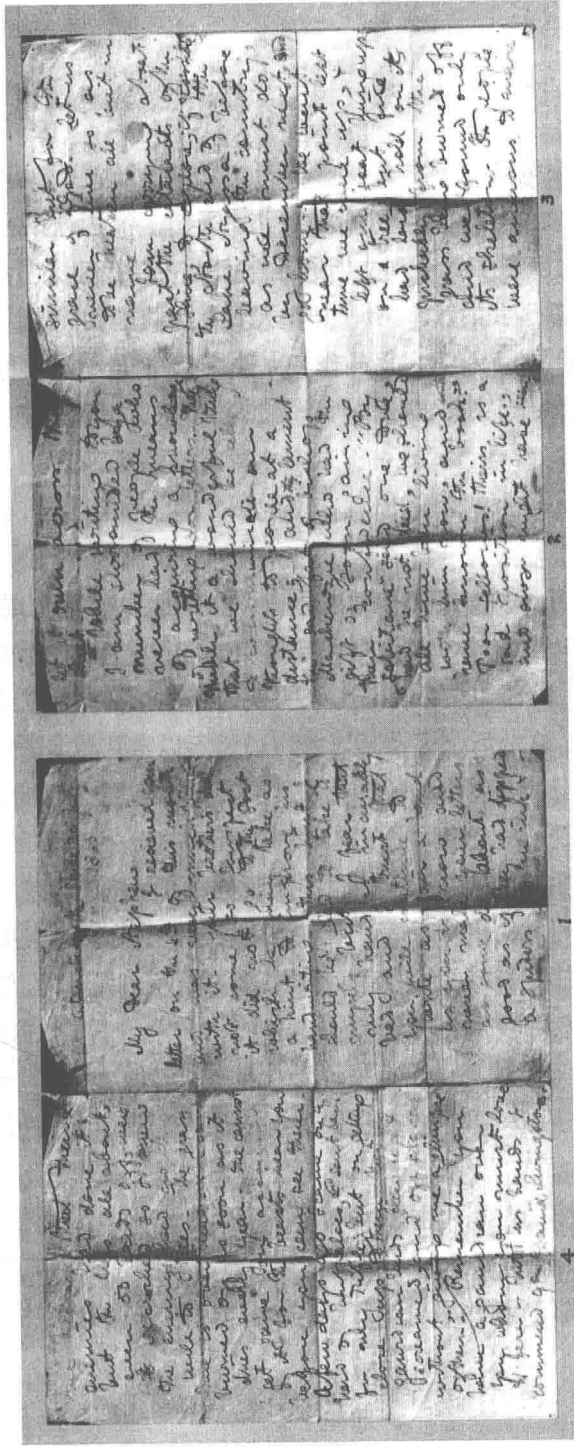


图1：戴维·利文斯通1863年7月20日写给他十二岁侄子约翰·利文斯通的信。开头是：“我亲爱的侄儿：你本月4日的来信收到，我甚是高兴。你弟弟的信没有收到，我怀疑它根本就没有寄出，他也许由此明白要把字写好些才行。”利文斯通对那些没接触过书信者的“可悲地位”加以评论，然后谈到他探访希雷布的计划，谈到让狩猎困难重重的草地火灾。约翰·利文斯通的孙子，戴维·利文斯通提供。

来说，他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想见您，”他对我说，“他说您写了一本书。”第二天，一个白发苍苍、举止优雅的高个子男子溜达进我的院落，伸出手说：“您好，我是戴维·利文斯通。”这就是那位医生杂货店主的儿子。有人给他看了我的这本书，所以他想见一见将他的父亲、杂货店以及与他大名相同的人写进书里的作者。他有两件事情要告诉我：一是以后不要让我的作品那么难读，再就是他父亲把那封装在相框里的信留给了他。他问我是否想要一份副本。我回答说当然想要！于是，经过信主人的允许，那封信就出现在这里（图1）。利文斯通，里斯托尔，利文斯通。

20世纪最后几十年，去殖民化进程将帝国构建意义的权力置于监视之下，作为对知识、历史、人际关系实施去殖民化的大规模努力的组成部分。本书就是该努力的一部分，其主要但并非唯一的话题是欧洲旅行和探险书写；这个话题根据其与大约1750年以来欧洲经济和政治扩张的关系得到分析。本书的宗旨既是文类研究，又是意识形态批判。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欧洲人写的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以何种方式为欧洲人“在国内”创造帝国秩序，并给予他们在其中的地位。我在书中探究旅行书写如何使得帝国扩张对帝国的公民具有意义且值得渴望，尽管帝国带来的物质利益主要归为数不多者所有。我认为，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旅行书很受欢迎。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我认为，它们是使得那些在欧洲“家里”的人感受到部分行星计划的重要工具之一；换言之，它们是创造帝国之“国内主体”¹的重要工具。

我通过阅读与帝国事业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有关的一批特殊的旅行记述，着手对此类问题的考察。第三章在内陆扩张和博物学兴起的语

境下，讨论18世纪欧洲有关南美洲的书写；第四、五章通过来自加勒比地区和英国早期西非探险的资料，探讨感伤旅行书写的兴起；第六、七章考察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期间，旅行作家如何重构南美洲；第九章追溯从中美洲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1860—1900），到20世纪6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旅行者帝国想象的转变；第二版新增的一章，讨论旅行故事正如何被重新利用，以呈现自1980年以来的全球化新浪潮。

这些个案研究基于一些共同的问题。在欧洲扩张主义进程的特殊关头，旅行和探险书写，用何种代码为欧洲读者生产“欧洲以外的世界”？旅行和探险书写，用什么方式生产欧洲不断变化的关于自身的概念，对比于有可能称作“欧洲以外的世界”的东西？旅行书写的表意实践，如何对帝国经济扩张的抱负进行编码并给予其合法性？它们在何种环节上危害那些抱负？欧洲介入之接受端的作家，如何处置欧洲人对他们现实的那些编撰？他们如何认领、修订、拒绝、超越这些编撰？从属欧洲的他者，如何塑造欧洲对他们以及其栖居地的构建，抑或欧洲对自身的理解？帝国倾向于想象自己决定边缘（比如，在光芒四射的文明使命或者开发的现金流中），它却习惯性地无视相反的动力，殖民地对其“宗主”国的权力。比如，帝国在帝国的权力中心创造一种强迫性的需要，不断向自己呈现并再现其边缘及他者，因为帝国依赖于他者才能了解自己。在各种机构中，旅行书写主要是为了服务于那种需要而得以组织的。

在这些个案研究中，我提出一种方法论的强假定：重要的历史转折改变人们书写的方式，因为这些转折改变人们的经验，以及人们想象、感受、思考其所生活世界的方式。因此，书写上的变化，将会告诉你与上述变迁有关的某种东西。这种书写上的变化，如果在历史上意义深远，那么其影响不只局限于一种文类。这个事实使得以下事情变得重

要,那就是追问发生在旅行书写上的这些变化,如何与其他的知识和表达形式发生交错。比如,本书开始就考察欧洲旅行书写如何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互动,产生一种欧洲中心形态的全球或“行星”意识。我根据博物学分类图式与它们寻求取代的本土农民知识的关系,对其进行思考。后来,我将科学和感伤旅行书写,作为取代较古老的生存文学传统的资产阶级权威形态,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在对感伤旅行书写的讨论中,涉及同时出现并相互影响的旅行叙事与奴隶自传之间的关系。我考察19世纪初女性主义对旅行书写的影响,聚焦点是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之间相当出乎意料的劳动分工。20世纪60年代的旅行书写,则与旅游宣传以及证言(*testimonio*)和口述史相提并论。

可是,对过去两百五十年欧洲人卷帙浩繁的旅行文学研究越多,我却越发意识到,很多参与者的声音我并没有听见。档案中存在巨大的缺漏。接待这些来访者的人们,曾如何看待他们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帝国设计?他们如何并以何种形式阐释他们经历的历史进程?在阅读文献期间,我不时在惊鸿一瞥中发现,帝国正在不断被那些生活受到帝国干预的人们编码——在仪式、雕塑、绘画、舞蹈、戏仿、哲学、历史之中,在未曾觉察、受到压制、失传抑或简单重叠着重复和不真实的表达之中。这需要与另外一封信有关的故事。

1908年,一位名叫理查德·皮奇曼(Richard Pietschmann)的秘鲁主义者,正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档案馆搜寻,他突然发现一份以前从未见过的手稿。手稿标明的日期是1615年,印加帝国最终败在西班牙人手中之后大约四十年,上面明确签着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安第斯姓名:费利佩·乌阿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在盖丘亚语中,乌阿曼的意思是“鹰”或“隼”,波马的意思是“美洲狮”。)这份手稿用盖丘亚语和未经修饰、文法不通的西班牙语混在一

起写成，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安第斯人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一封信。皮奇曼惊愕地发现，这封信有一千二百页长，有将近八百页的书写文本和四百页精心绘制的线条图，而且这些图还配有说明性的题注。这份以《新编年史和好政府及正义》为标题的手稿，提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手稿开始时重写基督教的历史，将美洲的土著人包括在内，接着详尽描述安第斯人及其领导者的历史和生活方式。在这之后，是用修正主义和批判态度对西班牙人征服的记述，数百页的文献记录并谴责西班牙人对安第斯人的剥削和虐待。四百幅插图附带题注，是欧洲样式的线条图；不过，如同随后研究表明的那样，这些插图明确展现安第斯人的空间象征主义结构（参见图2、图3）。乌阿曼·波马的信以一场模拟采访结束，在采访中他针对西班牙国王的责任向其提出建议，倡导通过安第斯人与西班牙精英的合作，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形态。

过去或现在都没人知道，这份离奇的作品是怎么来到哥本哈根的图书馆，有多长时间了。很显然，没有人特意读过它，甚或想过如何读它。在1908年时，人们并不认为盖丘亚语是一种书面语，也不认为安第斯人文化是一种读写文化。

皮奇曼就他的发现写了一篇论文，1912年在伦敦一个美洲主义者国际会议上宣读，引起的反响不一。又过了二十五年，乌阿曼·波马著作的复制版才在巴黎出现；为数不多研究它的学者都是在孤立状态下各自从事研究。20世纪初的欧洲学者，缺乏把握乌阿曼·波马文本的工具。根据当时的阅读习惯，他们简单地根据其真实和虚假、准确和误差对其进行评判，觉得它不符合要求。透过欧洲中心精英主义的眼睛，这部杰作看来只有初等文化，且文法不通。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逐渐形成更精细的方法阐释文本表征，既包括虚构的又包括非



图2: 乌阿曼·波马·德·阿亚拉画的圣经创世。²题注写着:“世界之初/亚当,夏娃。”这幅画是按照安第斯人的象征空间组织的,亚当和雄鸡占据图中“雄性”一边,在雄性象征太阳之下,而夏娃、小鸡、孩子则在“雌性”一边,以月亮为标志。两片区域被一条斜线分开,标志是亚当的挖掘棒,安第斯人农业的基本工具。印加帝国以同样的方式排列成四个王国,由在库斯科城相交的两条斜线分开。

虚构的。发源于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观点开始进入对话，挑战欧洲中心的价值观，并将殖民主义和帝国创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带入人们的视野。终于，乌阿曼·波马的文本，作为非同寻常的文化间杰作，开始被解读。³

被解读，且可读。乌阿曼·波马书信现今的可读性，是不断变化的智性机制的另外一个标志；帝国构建意义的能力已经通过这种机制，成为批判性考察的一个主题。他那精妙的文化间文本以及其悲剧性的历史，为书写在本书谓之“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的地区存在的可能和遭遇的危险提供范例。所谓“接触地带”，就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冲突、格斗的空间，往往表现为非对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比如殖民主义与奴隶制，或者今天它们在全球范围被实践时所造成的影响。这个关键术语下面会更充分地加以讨论。

本书的主题是帝国构建意义的历史；想要开始讨论那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连绵不断的历史，至少要用到这两封信：一封是身在非洲的英国人写给其侄子的，似乎必然仅用一种语言书写的那一页信，它在加拿大一家乡村杂货店的墙壁上日渐褪色；另一封是陌生的安第斯人写的，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用两种语言书写的一千二百页信，这封信失落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档案馆里。如果人们只研究欧洲人的所见所言，就会再生产出帝国事业所寻求的对知识和阐释的垄断。这是极大的歪曲，因为那种垄断当然不存在。像乌阿曼·波马一样，欧洲帝国主义接受端的人，有时用欧洲人自己的工具，制造他们自己的知识和阐释。这是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这个词出现在我标题中的原因。人种志学者曾用这个词，描述从属或边缘群体对支配或宗主国文化传输给他们的材料进行挑选和构建的方式。⁴尽管被征服的人们无法轻易控制支配文化迁移于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他们将吸

收什么为己所用？如何使用它？让它意味着什么？文化互化是一种接触地带现象。在本书的语境下，文化互化的概念可用来提出数个系列问题。帝国接受端的人如何处置宗主国的表征模式？他们如何挪用这些模式？他们如何反驳？人们可以用什么材料回答那些问题？在本书中，我只是开始处理最后这一个问题。本土文本和绘画（像乌阿曼·波马的书信）提供了一些例证。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来自被殖民之地的作家撰写的文学文本。欧洲殖民地、前殖民地、新殖民地的作家发现，他们在逐渐获得表征自己的手段时，必须努力对付欧洲的旅行文学。欧洲档案馆常提供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供人们在上面练习去殖民化的创造力。本书的第八章致力于考察19世纪初，西班牙裔美洲作家在保留欧洲价值观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同时，如何挑选欧洲人关于美洲的话语，并使之适应他们自己创造自治、去殖民化文化的任务。这一章是克里奥尔人自我塑形的机制方面的研究。这里新增加的一章，将这种研究方法推广至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拉丁美洲作家，以及他们在新殖民主义与现代性令人恼火的交汇处发现的创造性潜能。

为了尝试形成一种辩证的、历史化的方法研究帝国的书写，我在向着目标迈进的过程中，精心设计了一些术语。一个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的新造词是“接触地带”这个术语；我用它来指帝国遭遇的空间，也就是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分割的人们彼此接触并建立不间断关系的空间，通常涉及高压政治、种族不平等以及棘手冲突的情况。我从语言学中借用“接触”这个词；在语言学中接触语言这个术语指一种即兴语言，这种语言在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中间形成，他们需要彼此始终交流，通常是在贸易的语境下。这种语言开始时是混杂语，在逐渐有人以其为母语后，便被称作克里奥尔语。如同接触地带的社会一样，这种语言一般被认为是混乱的、野蛮的、缺乏结构的。（罗恩·卡特曾建议，用“接

触文学”这个术语，指来自欧洲以外的用欧洲语言书写的文学。⁵)在我的讨论中，“接触地带”经常是“殖民前沿”(colonial frontier)的同义语。不过，后一个术语基于欧洲扩张主义的观点(前沿只有在与欧洲相比时才成其为前沿)，“接触地带”却转移重心和视角。它调用先前被地理和历史分离的主体如今共存的空间和时间，也就是他们的轨迹现在彼此交错的点。“接触”这个术语突出帝国遭遇互动、即兴的维度，这些维度容易被从入侵者角度讲述的有关征服和控制的记述所遗忘或压制。一种“接触”视角，强调主体处在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被这种关系构成的方式。它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抑或旅行者与被旅行者(travelers)之间的关系，根据的不是分离，而是共存、互动、连锁性的理解和实践，并且常常是在根本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中。⁶

我在下文常用的另一个术语是“反征服”(anti-conquest)。我用这个词指欧洲资产阶级主体在维护欧洲霸权的同时，用来试图保护其天真无辜的表征策略。我认为，“反征服”这个术语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在现代旅行和探险书写中，这些天真无辜策略的构建，涉及与专制主义时代相联系的老牌帝国关于征服的修辞。反征服的主人公是一位我有时称之为“看客”(seeing-man)的人物；人们公认这是一个不友好的标签，指欧洲风景话语的白人男性主体——他长着消极察看并占有的帝国之眼。

我使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非传统术语，是“自传式人种志”(autoethnography)或“自传式人种志表达”。这个术语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个，都指被殖民主体试图用与殖民者的术语结合的方式表征自己。如果人种志的文本是欧洲人向自己表征其(通常是被征服的)他者的手段，那么自传式人种志文本，则是他者为回应那些宗主国表征抑或与之对话而构建的文本。乌阿曼·波马在其《新编年史和好政府及正

义》中回顾印加帝国的历史和习俗,并挪用西班牙编年史的形式。这是自传式人种志表征的一个典型实例,图2、图3、图4、图26中,安第斯艺术家的视觉作品也是如此。自传式人种志文本,不同于被认为是“可信的”抑或本土形式的自我表征。比如,与西班牙人发生接触时,安第斯山区并没有书写系统。用来储存信息的,是被称作奎普斯(*quipus*)的精心编码的结绳,乌阿曼·波马后来书写下的信息早前也储存在这种结绳之中。奎普斯是一种本土的或者说“纯”安第斯山区的形式(尽管它很可能来自别的地方)。今天,没人知道如何破译它们。相形之下,自传式人种志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与征服者用语的合作,以及对其的挪用——例如,拼音文字、西班牙语、编年史形式、线条图,所有这些乌阿曼·波马都加以接受并进行文化互化。正如乌阿曼·波马的案例一样,自传式人种志常挪用旅行和探险书写的用语,不同程度地将它们与本土模式融合或渗透。在许多场合,像乌阿曼·波马的书信一样,自传式人种志是双语的、对话式的。自传式人种志文本在接受端同样一贯是异质的。这就是说,这些文本通常既是写给宗主国读者的,又是写给说话者自己社会群体中有文化的那部分人的。它们注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这些不同读者所接受。这种文本常构成一个群体进入宗主国书面文化的进入点。⁷

尽管我在本书中不能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相信,自传式人种志表达是接触地带的普遍现象,并将对从历史发生地的视角阐明帝国征服和反抗的历史至关重要。

本研究的大纲故意设定得很宽泛,不过这些大纲是从一个相当具
9 体的出发点展开的。我认为,这个出发点以18世纪中期北欧同时出现的两个交叉的进程为标志。一个是作为一种知识结构的博物学的出现;另一个是与海洋相反的内陆探险转向。正如我在下一章指出的那



图3: 乌阿曼·波马《新编年史和好政府及正义》中的自传式人种志描述, 源自安第斯农业的系列表征。说明文字的内容是: “Trabaxa/Zara, papa hallmai mita”, 意为“工作[西班牙语]/玉米, 下雨和筑堤的时候[盖丘亚语]”。说明文字下的小字是“enero/Capac Raymi Quilla”, 意为“一月[西班牙语]/大吃大喝的月份[盖丘亚语]”。左侧的人是一位“labrador, chacarq camahoc”, 意为“劳动者[西班牙语], 负责播种[盖丘亚语]”。

样,这两方面的发展,显示出一种可以被称作欧洲“行星意识”之物的变化。这一变化与许多别的变化不谋而合。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形态巩固了自身,受寻找原始材料驱动的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领土阶段开始了,沿海贸易向内陆延伸,各个国家开始夺取海外领土以防其被敌对的欧洲列强夺取。从这个出发点,本书大致按照年代顺序进行。

我所选定的地理参数也由历史提供。18世纪末,长期通过贸易与欧洲联系并彼此联系的南美洲和非洲,对欧洲新扩张主义行动来说成了类似的场所。非洲的“开放”,随着非洲协会的建立,蹒跚起步于18世纪80年代。与此同时,独立运动正在西班牙语美洲发生,将会向相同的扩张主义势力打开南美洲大陆,尽管是在迟疑不决地发生(1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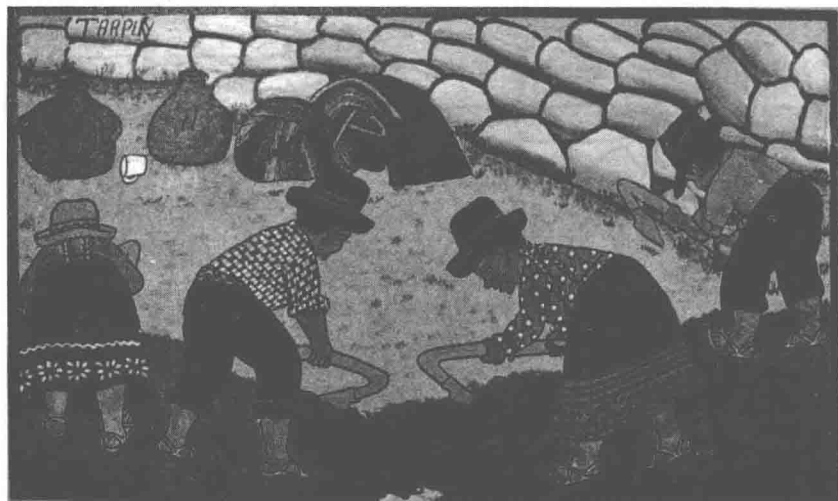


图4:当代自传式人种志绘画,用秘鲁阿亚库乔州萨胡阿镇画家形成的一种风格画成。说明文字“Tarpuy”意思是盖丘亚语的“播种”。这些绘画基于一种较古老的非商业形态的纪念画,常包括西班牙文的较长说明文字,解释用盖丘亚语命名的习俗。源自秘鲁利马乔里约斯的鹿佩约、卡梅隆、马西亚诺·贝罗卡尔画室。

80年代，弗朗西斯科·米兰达首先向英国寻求革命支持)。正如我在此讨论的许多作家的情况一样，作用于这两个大陆的大部分动力都来自英国。1806年，英国入侵南美洲拉普拉塔河和非洲好望角——甚至还在这两个地方使用了某些相同的军官。不过，参与者绝非完全是英国人。1799年，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法国人艾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正在准备参加一次溯尼罗河而上的旅程，突然被拿破仑入侵北非所阻。他们将旅程路线由非洲改为南美洲，转而沿着奥里诺科河逆流而行。20世纪60和70年代，非洲去殖民化运动与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享有共同的理想、实践和知识分子领导。绝非偶然，两个大陆都在相同时期，成为性情乖戾的宗主国话语的客体；我在第九章将其作为“第三世界的布鲁斯”(third-world blues)加以讨论。

关于欧洲的欧洲旅行书的读者曾经指出，我在此与帝国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一些许多惯例和写作策略，也出现在关于欧洲的旅行书写中。正如我在讨论中数次指出的那样，这些惯例和写作策略出现在关于欧洲的旅行书写中时，有关的权力和挪用机制也有可能在那里存在。比如，使资产阶级权威合法化以及使农民的生存生活方式不合法的话语，可能在欧洲起到与在南非或阿根廷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欧洲妇女借以在国内索要政治声音的社会批评形态，使得她们能够在海外提出类似的要求，尽管并不完全相同。18世纪时，北欧声称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宣称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归它所有。⁸因此，要是发现德国或英国有关地中海的描述，听起来很像德国或英国有关南美洲的描述，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照我早先的描述，本书既是文类方面的研究，又是意识形态批判。就我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的情况而论，旅行和探险文学方面的学术研

究,并没有沿着这两条线发展,而往往以赞赏的态度,重点描述无畏的古怪人或者有奉献精神科学家的业绩。在其他情况下,学者们利用旅行记述,简单地将其作为与他们所讨论的地点、人物、时间有关的信息源。在现代主义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唯美主义或文学倾向的学术研究,从艺术和智性的维度,并根据欧洲存在主义的困境,研究通常由著名文学家撰写的旅行记述。我不会做这些事情。关于文类,我尝试认真关注欧洲旅行书写所展现的表征惯例,识别不同的部分,并提出解读和聚焦修辞分析的方式。然而,我的目的不是定义抑或编码。我试图将对转义语词(trope)的研究,同等地用于分裂和统一人们可能称作旅行书写的修辞。我曾打算不要将旅行书写当作一种文类加以限制,而是指出其异质性以及与其他种类表达的互动。本书包括许多对引用段落的解读。我希望我提供的某些解读和解读方式,将会对思考来自

12 其他时代和地方类似资料的人起到提示作用。

第一部分
科学与情绪，
1750—1800

第二章

科学、行星意识、内陆

[他可以]在书中周游世界，他可以在我们数学家的地图、地图集和测量数据中，使自己成为地理宇宙的主人。 he可以和历史学家一起在陆地旅行，和航海家一起在海面上旅行。 he可以和丹皮尔与罗杰斯一起环游地球，并且知道怎么环游地球，比所有那些目不识丁的水手强一千倍。

丹尼尔·笛福，《道地的英国绅士》(1730)

诗歌很难再流行。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假装是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情绪、想象以及风度已经被流放……文学正在我们眼前消失。

伏尔泰，《致西德维尔的信》(1735年4月16日)¹

这个故事的欧洲部分开始于欧洲人的1735年。至少这一年是叙述将要开始之处——这个故事真正开始还需要二三十年。1735年那

一年，发生了两个新鲜且极为欧洲的事件。一件事是卡尔·林奈(Carl Linné, Linnaeus)的《自然系统》出版，这位瑞典博物学家在书中展示了一个分类系统，旨在将欧洲人已知或未知的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形态加以分类。另一件事是欧洲发起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探险，这是一次共同的努力，打算一劳永逸地确定地球的准确形状。正如我打算证明的那样，这两个事件以及其同时发生，暗示欧洲精英分子在理解自己以及他们与地球其余部分关系方面发生变化的重要维度。本章讨论我称作欧洲“行星意识”的一个新版本的出现，这个版本的标志是一种走向内陆探索的向度，以及通过博物学的描述机制构建全球规模的意义。我将提出，这种新的行星意识，是构建现代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基本元素，而这种霸权主义的习惯性思维，即便在继续作为西方人第二自然的情况下，也令他们烦恼不已。

15 在法国领导下，1735年的国际科学探险出发了，它旨在解决一个迫切的经验主义问题：地球是否如笛卡儿的(法国)地理学所言，是一个球体，抑或如(英国人)牛顿猜测的，是一个两极平坦的椭球体？这是一个高度充斥法国与英国之间政治对立的问题。一队科学家和地理学家在法国物理学家莫佩尔蒂(Maupertuis)带领下，被派往北方的拉普兰测量子午线的经度。另一队科学家和地理学家前往南美洲，对基多附近的赤道线进行相同的测量。这次科学探险名义上由数学家路易·戈丹(Louis Godin)领队，却以其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地理学家夏尔·德·拉·孔达米纳(Charles de la Condamine)的名字载入史册。

对于欧洲科学界来说，拉·孔达米纳科学探险是一次特殊的外交胜利。西班牙的美洲领土对任何种类外国人的公务旅行都是严格关闭的，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两个多世纪。西班牙朝廷极度沉迷于封闭其殖民地，使之隔绝于外来影响和外国的间谍活动。1713年，西班牙在

奴隶贸易控制权上输给英国之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他人给其经济和文化垄断带来的损害。其殖民地内的克里奥尔人精英的国际接触越是扩大，西班牙就变得越发担心。英国海盗比塔夫(Betagh)于18世纪20年代写道，“西班牙人的政策主要包括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阻止那些广阔领地的巨大财富流入他人手中”。²比塔夫说，与那些财富以及“美洲人对欧洲制造的大量需求”有关的知识，“曾经让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兴奋不已”。在西属美洲港口的军事设施以及内地的采矿作业，是得到最仔细庇护以避免外人眼睛的两种殖民地建筑物，因为西班牙的对手们不遗余力地要将它们搜寻出来。比如，1712年，法国国王雇佣了一个名叫弗雷齐耶(Frézier)的年轻工程师，冒充生意人旅行到智利和秘鲁海岸，“最好潜入西班牙总督府，利用一切机会了解他们的实力”。³尽管他一心寻找矿井，弗雷齐耶却连一座矿井都没见到。然而即便是他所报道的传闻，也被法国和英国的读者们贪婪地吞食。在关于南美洲的新书写缺席的情况下，丘吉尔航海系列的编者于1745年翻译了西班牙耶稣会信徒阿隆索·德·奥瓦列(Alonso de Ovalle)一个世纪前撰写的有关智利的记述。⁴关于西班牙语美洲的内陆，即使是这种过时的记述也比当代的推测更值得依赖，比如，比塔夫在报道内陆的一次地震时说，它“举起整个田野，将其搬运数英里远”。⁵

对于拉·孔达米纳探险，西班牙国王将其传奇的保护主义弃之不顾。菲利普五世急于建立其声望并忘却西班牙残忍的“黑色传奇”，他抓住机会充当起一位开明的大陆君主。关于探险范围的条件双方达成了一致，两名西班牙船长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和豪尔赫·胡安(Jorge Juan)被派来，以确保科学探险不会沦为间谍活动——但这样的情况立即就发生了。差不多别的一切也都出了错。16拉·孔达米纳探险是一项如此难堪的事业，结果是过了六十多年，人

们才再次做类似的尝试。⁶法国分遣队内部的竞争迅速战胜合作约定。国际合作被与当地殖民当局无休无止的争吵所取代,包括什么可看、可测量、可绘图、可取样,和什么不可看、不可测量、不可绘图、不可取样。有一次,由于受到指控密谋掠夺印加帝国的宝藏,整个探险队被迫在基多滞留八个月之久。这些外国人用各种怪模怪样的工具着迷地测量重力、声速、高度、距离、河道、海拔、气压、日月食、折光、星体轨迹,一再成为人们怀疑的目标。1739年,探险队的外科医生在厄瓜多尔的昆卡卷入两大家族之间的争吵遭到谋杀;拉·孔达米纳只是勉强逃过相同的命运。为了法国百合花能否放在探险队的三角锥上的问题,一场官司就打了一年多(百合花那一派失败了)。结果证明,内陆探险是一场比先前的海上探险更大的政治梦魇。

内陆探险的后勤噩梦都是从未经历过的,而拉·孔达米纳探险全都遇到了。安第斯山脉酷烈的气候和陆路旅行,造成探险队员们频繁生病,器材损坏,标本丢失,笔记本受潮,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挫折和延误。到最后,法国分遣队彻底解散,每个人只好自找门路回家,或者滞留南美洲。尽管南美洲探险比北极探险早一年出发,可是几乎过了十年,其第一批幸存者才开始零零星星返回欧洲。这时有关地球形状的问题早已无人问津(牛顿赢了)。

除了其他方面的信息以外,南美洲探险队带回欧洲的,是政治和科学(反)英雄修辞方面令人懊恼的教训。数学家皮埃尔·布给(Pierre Bouguer)最先返回,赢得向法国科学院报告的荣誉。拉·孔达米纳于1744年返回,他经由亚马孙河,因其前无古人的亚马孙河之旅而饱受赞誉。拉·孔达米纳借助一场攻击布给的运动,终于使自己成为这场探险在全欧洲的代言人。与此同时,这场探险名义上的领队路易·戈丹正在缓慢的归国途中。他于1751年抵达西班牙,但是由于

布给和拉·孔达米纳的诡计，未能得到前往法国的护照。博物学家约瑟夫·德·朱西厄(Joseph de Jussieu)继续在新西班牙从事研究，直到1771年人们从基多将他送回，这时他已经彻底精神错乱。年轻技师戈丹·德·奥多奈(Godin des Odonais)历尽艰难到了卡宴，为等待其秘鲁妻子(下面还有更多关于她的故事)与他团聚，他在那里滞留了十八年，最后于1773年返回法国。其余的人再也杳无音讯。

西班牙与拉·孔达米纳探险的合作引人注目地证明科学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欧洲人上升到超越哪怕是最为激烈的民族竞争的层面。拉·孔达米纳本人在其旅行记述的“序言”中赞美这次大陆探险，他致敬了路易十五，甚至在与兄弟国家交战的同时支持与它们进行科学合作：“在国王陛下的军队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同时，”拉·孔达米纳说，“他的数学家们则分布在世界各地，为了科学的改进和各国的共同利益，工作在炎热和寒冷地带。”⁷然而，人们不由得注意到，拉·孔达米纳的情绪中显然带有民族主义的语气：法国科学家骄傲地赞颂自己国王开明的世界主义。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以一种类似的带有双重目的的情绪，授予西班牙人胡安和乌略亚荣誉会员和院士身份。这种跨越国界的姿态与英法之间紧张的国家对抗，以及它们对西班牙语美洲具有竞争性的兴趣不无关系。它对国家抱负与大陆抱负含混不清的相互影响做了总结，这种相互影响乃是欧洲扩张中始终存在的一种不变的现象，并且将在科学时代继续存在下去。一方面，主导意识形态对(有利害关系的)财富追求与(无利害关系的)知识追求做了明确区分；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继续是欧洲海外扩张的能量源。

拉·孔达米纳探险在一个方面是一次真正的成功，也就是，书写。由它所引发的故事和文本，通过口头渠道和书面形式在欧洲反复流传数十年。当然，拉·孔达米纳探险所产生的大部分文本，相当好地表明

18世纪中叶旅行所产生的书写的范围和多样性；这种书写转而又为欧洲人的想象生产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列举一下产生于拉·孔达米纳探险的书写，也许有助于表明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刻，谈论旅行、书写和接触地带的意义是什么。

1744年，最早返回的数学家布给，将他写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扩充成《一次秘鲁之航的简略关系》。最初，科学家的声音在这份记述中占主导地位，围绕着测量、气候现象等组织话语。然而，随着旅行转向内陆，布给的科学叙事便与历经千难万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即使在今天，也有助于激发人们的阅读欲望。当探险队在寒冷的安第斯山区宿营进行三角测量时，有关出血冻疮和死于严寒的美洲印第安人奴隶的逸事，点缀着与保持体温有关的生理学推测。关于矿山，布给只报道传闻，指出“这个国家令人费解的特性”使得发现新矿山很难，而且“印第安人很聪明，不怎么提供这种研究方面的帮助”，因为“假如他们成功，就等于开始一种痛苦至极的劳动，而只有他们自己会承受其重负，却没有什么利益可图”。⁸布给还写过一本关于这次探险的技术书，书名叫《地球的形状》。

拉·孔达米纳也出版了他写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标题是《穿越南
18 美内陆旅行简述》(1745)。该书读者面很广，并被翻译成外语。也许是因为布给已经讲述了在安第斯山区的那部分探险经历，拉·孔达米纳的记述主要讲述他顺亚马孙河而下的非同寻常的归国之旅，以及绘制其河道及支流的尝试。这份记述主要不是科学报告的形式，而是采用生存文学的通俗样式。除航行以外，生存文学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方面是苦难和危险，另一方面是奇迹和逸闻。16世纪在该地区探险的戏剧——奥雷利亚纳·雷利、阿吉雷——在拉·孔达米纳的记述中重新上演，带有其全部的神话般联想。进入丛林后，拉·孔达米纳发觉自己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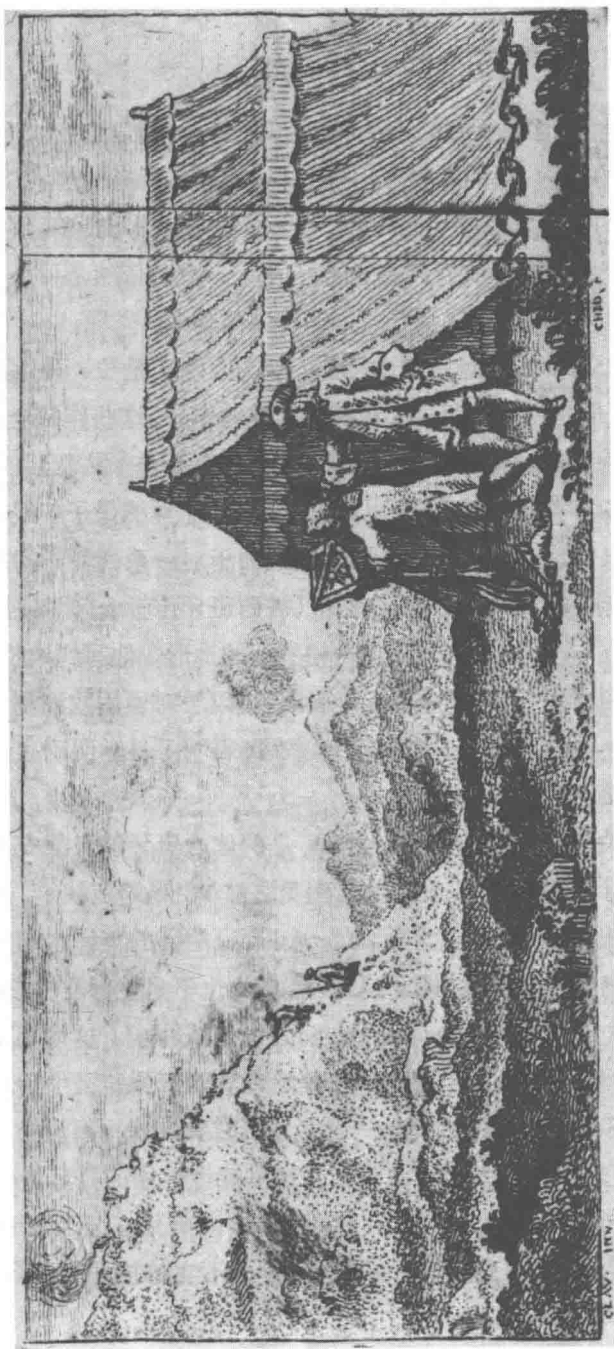


图5: 拉·孔达米纳探险队正在测量。选自夏尔·德·拉·孔达米纳,《在南半球量子午线的前三度》(巴黎, Imprimerie Royal, 1751)。

处“一个新世界，远离所有的人类商业活动，在一片淡水之上……我在那里见到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人”。⁹如同其所有的前人一样，他推测黄金国的位置以及亚马孙人的存在，尽管他们很可能曾经存在过，但是极可能“现在已经放弃其古老的习俗”。¹⁰丛林依然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危险的世界。¹¹

虽然1745年的《穿越南美内陆旅行简述》确实是拉·孔达米纳最著名的著作，但是他还出版过大量其他文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全都以他的美洲旅行为基础。他的《关于昆卡人民起义的信件》发表于1746年，随后是《基多金字塔史》(1751)以及关于《在南半球测量子午线的前三度》的报告(1751)。拉·孔达米纳余生致力于对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包括奎宁的功效、天花疫苗(被西班牙传教士广为使用)、亚马孙人的存在、奥里诺科河和里奥内格罗河的地形。他写到橡胶，将其介绍给欧洲科学家，还写到箭毒、其解毒剂，以及对通用欧洲测量标准的需要。拉·孔达米纳专业化的科学书写，表明了科学明确表达欧洲与帝国边界接触达到的程度。

写出有关这次探险的完整记述的，是两位西班牙船长胡安和乌略亚。应西班牙国王的要求，他们的《南美之航》由乌略亚执笔，于1747年在马德里出版，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翻译的英译本印行了五版。胡安和乌略亚的记述，既不是科学文献，也不是生存文学，而是用一种我称作“公民描述”(civic description)的模式写成。这本书实际上没有任何逸闻趣事，是关于西班牙殖民地理和西班牙殖民生活许多方面信息的一部卷帙浩繁的纲要——当然，不包括矿山、军事设施和其他战略信息。它是一部“统计学”著作。这里统计学用的是其最早的意义，指“对一个国家状况的调查”(《牛津英语词典》)。亚当斯称赞其记述具有可信性，与“充满美妙好奇心、华而不实的描述者”¹²形成反

差,这个影射一般是指生存文学,也许特别是指拉·孔达米纳。

胡安和乌略亚还给他们的国王私下写了另外一本书,题名是《美洲秘闻》,从批判的角度报道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许多方面;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这本书解释了“法国院士的著作中许多未曾言说的东西”。¹³直到19世纪初,当西班牙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时,这部作品才落入英国人手中并对外公开。

除了根据拉·孔达米纳探险写成的这些文本以外,还有一系列不是根据这次探险写出来的文本。比如,约瑟夫·德·朱西厄的著作,这位博物学家在南美又逗留了二十年,继续从事他的专业。当他最终精神失常并被迫从基多返回法国时,送他走的朋友们似乎连装了他毕生研究成果的行李箱都弄丢了。只有一项关于奎宁功效的研究得以出版——以拉·孔达米纳的名义!其余的也许有一天仍会在基多重见天日。

拉·孔达米纳探险所产生的最引人入胜、经久不衰的故事是口头传诵的,得以付梓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内容。这是一个生存故事,主人公不是欧洲科学人士,而是一位欧—美背景的妇女,伊莎贝拉·戈丹·德·奥多奈(Isabela Godin des Odonais)。这位上层社会的秘鲁人嫁给拉·孔达米纳探险队的一名成员,与其生了四个孩子。科学探险队员各自分手后,她丈夫历尽艰辛到达卡宴,在那里耗费十八年的时间,设法为自己和家人安排护照和前往法国的旅行。在第四个也就是最小的孩子令人悲伤地去世后,已经四十多岁的戈丹夫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包括其兄弟、侄子和很多仆人的一群人的陪同下,她动身翻越安第斯山脉并顺亚马孙河而下,去和丈夫相聚,这与使得拉·孔达米纳成为英雄的路线相同。灾难接踵而至。据说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担心染上天花,她的土著向导弃他们而去,而所有的人,包括她兄弟、侄子、仆人,在丛林中受尽折磨数日之后,全都因感染天花死去。戈丹夫

人神志不清，毫无目的地漫游，逐渐独自找到回河边的路，划独木舟的土著人将她救起，送到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的前哨站。接下去的故事是，她骨瘦如柴，头发变白，出现在圭亚那海岸，被一直忠诚于她的丈夫带回了欧洲。

戈丹夫人浪漫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于1773年被书写下来——书写者不是她，而是她丈夫。他是应拉·孔达米纳的邀请写的，后者将这个�故事作为附录添加在他自己记述的各种版本中。¹⁴即使在今天，这个故事也十分引人入胜，其错综复杂的经过，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在殖民前沿的全部传说中，只要有女主人公出现，似乎常常是这样的情形。戈丹夫人的故事是伟大的亚马孙探秘的重放，它是由女性的亚马孙本人——或者与之近似的什么完成的。爱情、失败、丛林，将这位克里奥尔女性从一位白人贵族变成好战的女斗士，这是欧洲人曾在心目中创造的象征美洲的形象。与此同时，这也毁掉了作为性对象的她：戈丹夫人的形象是伏尔泰笔下老实人所爱恋的破落公主居内贡的真实版。象征性的逆转充斥在故事当中。比如，黄金的交换转向相反方向。有一次，戈丹夫人把两条金链子送给在丛林中救过她命的两个印第安人，将征服的范式调转回去。令她愤怒的是，这两件礼物立即被常住的牧师拿走，换成典型的殖民化商品：布料。由于这种饶有兴味的反讽，戈丹夫人在亚马孙河顺流而下的经历在整个欧洲盛传五十多年，这丝毫也不奇怪。她丈夫写下的二十页信，表现出在口头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存在的些许不易察觉的踪迹。

镶边之内的地毯

拉·孔达米纳文集包括口头文本、书面文本、遗失文本、秘密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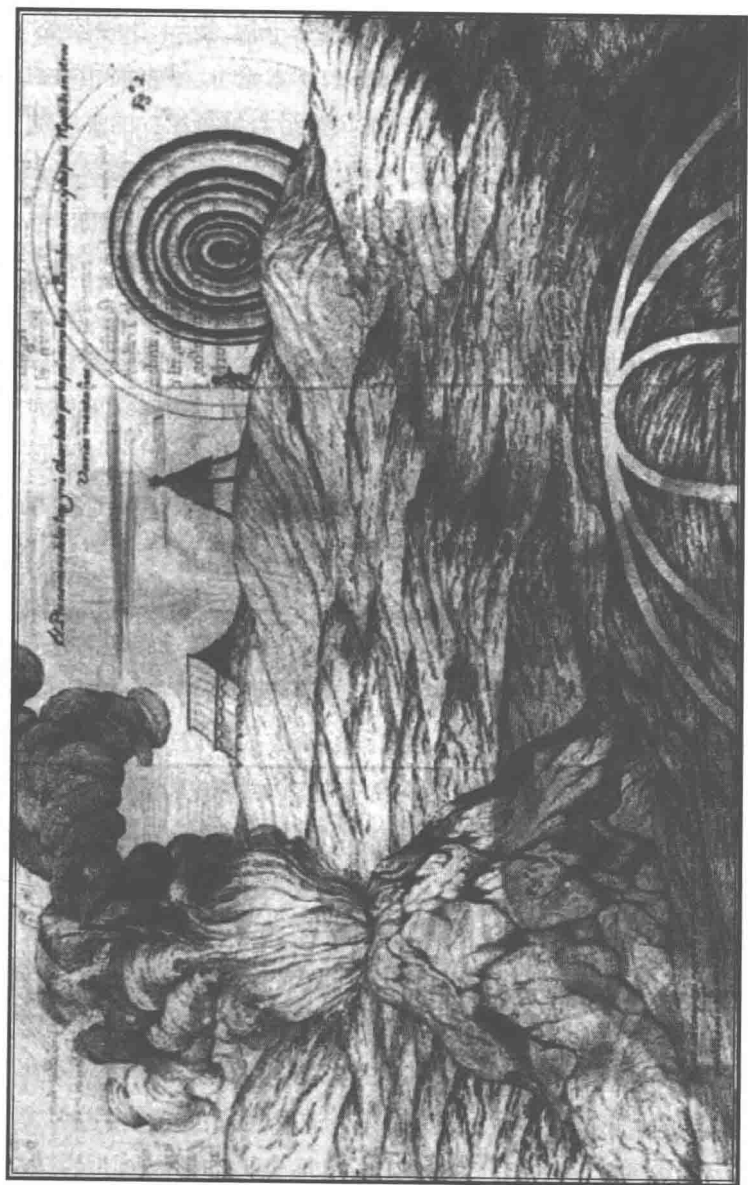


图6：孔达米纳探险队所见的南美自然现象。左下角矗立着被积雪覆盖且正在喷发的科托帕希火山，右下角画的是投射到山坡上的“月弧现象”，右上角画的是“第一次在帕姆巴马卡山上且后来在其他各种山上看见的三重彩虹现象”。选自安东尼奥·乌略亚和豪尔赫·胡安，《南美之航》（马德里，Antonio Marin, 1748）。

以及被挪用、删减、翻译、选辑、抄袭的文本，还有书信、报告、生存故事、公民描述、航海叙事、怪兽和奇迹、医学论文、学术论争、被重演和颠倒的古老神话，它们阐明18世纪中叶欧洲扩张前沿与旅行相关的书写的不同侧面。这次探险本身在此的意义在于，它是国际科学探险早期一个众所周知的不成功例证，而国际探险不久将成为欧洲最引以为荣、最引人注目的扩张工具。18世纪下半叶，科学探险将成为一块磁铁，吸引来自整个欧洲的知识和商业精英组成的错综复杂联盟的能量和资源。同等重要的是，科学探险将成为公众热情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及某种最强有力观念和意识形态机器的根源；欧洲公民就是通过科学探险使自已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关联。

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论，拉·孔达米纳探险还有一种更加具体的意义。它是一种探索和记载大陆内部的新取向的早期例证，与已占据舞台中心三百年的海洋探险范式形成反差。到18世纪最后几年，内陆探险已经成为扩张主义力量和想象的主要目标。这种转变对旅行书写造成重要影响，它需要并且导向欧洲知识和自我认识的新形态、欧洲人越界接触的新模式、欧洲帝国主义野心编码的新方式。1715年，法国间谍弗雷齐耶认为，不可能在秘鲁进行内陆探险，因为“旅行者必须携带包括床在内的那么多东西，除非他们愿意照土著人的样子睡在地上，用羊皮做床单，用天空做房顶”。¹⁵乌略亚的叙述三十年后印行英语版，对于其“前言”的撰写者来说，内陆探险是必要的下一步，他问道：“假如我们只看着边界，或者说是镶边，我们怎么可能对土耳其地毯形成什么思想？”¹⁶到1792年，法国旅行者索格尼耶(Saugnier)将其视为一个与全球公正有关的问题：非洲内陆如同海岸一样“应该得到”欧洲人造访的“荣誉”。¹⁷1822年，亚历山大·冯·洪堡断言：“光是沿着海岸航行，我们无法发现山脉的走向和地质构造、每个地带的气候以及其对

有组织生物的形态和习惯的影响。”在其英语译者看来，这是一个审美问题：“一般来说，海洋探险有一定程度的单调乏味，这是因旅行者需要频繁用一种技术性语言谈及航海产生的……在偏远地区陆路旅行的历史，更有可能刺激大众的兴趣。”¹⁸

那么，作为旅行，拉·孔达米纳探险标志着一个科学旅行和内陆探险时代的开始，这转而暗示欧洲自身概念以及其全球关系方面的转变。就其灾难性的失败来说，这次探险可充当先导。作为书写，这次探险提供旅行书写结构的范例，随着资产阶级形态的权威发展加快，这种结构将被彻底重组。（下一章将考察有关南部非洲的旅行书写中的这些转变。）18世纪下半叶，许多旅行者作家将会摆脱生存文学、公民描述或航海叙事等传统，因为他们会受到博物学知识构建计划的吸引。该计划的出现，以我承诺要讨论的1735年的第二个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林奈《自然系统》的出版。

自然系统

就在拉·孔达米纳探险正在以科学的名义成功横渡大西洋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瑞典博物学家正在出版他对知识的第一次重要贡献。这位博物学家名叫卡尔·林奈，他出版的书名是《自然系统》。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创新，不仅将会对旅行和旅行书写，而且还会对欧洲公民在地球上占据并了解其位置的全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对当代读者来说，《自然系统》似乎是一个平常且实际上奇怪的成就。它是一个描述性的系统，旨在根据地球上所有已知和未知植物生殖器的特点对它们进行分类。¹⁹二十四（后来是二十六）种雄蕊、雌蕊等基本配置得到识别，并根据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出来（见图7）。四个额外的视觉参数

补全了这种分类法：数量、形状、位置、相对大小。林奈宣称，地球上所有的植物，都可以纳入这种单一区别系统，包括欧洲人尚不知晓的任何植物。林奈的分类方法，产生于罗伊、杜纳福尔等人早先的分类努力，具有一种其先行者未曾达到的简单和优雅。将适用于所有植物的统一分类系统的理想，与如何构建这种系统的具体、实用的建议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就连其批评者都视他的计划是变混沌为有序——既指自然的混沌，又指早期植物学的混沌。林奈说，“植物学中的阿里阿德涅线是分类法，少了它就只有混沌”。²⁰

结果证明，1735年的《自然系统》只是初次尝试。正当拉·孔达米纳在南美各地艰苦跋涉之时，林奈对这一系统进行微调，在两部决定性的著作中为其最后定型，这两部著作是《植物哲学》(1751)和《植物种志》(1753)。多亏有了这些著作，欧洲科学才有了标准的植物学命名法，为植物分配属类的名字，属类之后是它们的种类，种类之后是将它们与相近类别区分开来必不可少的其他种差。他还为动物和矿物提出了类似的系统。

林奈的系统集中体现欧洲科学的大陆和跨国抱负。这先前与拉·孔达米纳探险一起讨论过。林奈有意地复活拉丁文用于其命名法，恰恰是因为它是不属于任何民族的语言。他自己来自瑞典，全球经济和帝国竞争中一个相对较小的参与者，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整个大陆范围内对其系统的接受度。与之竞争的范式，特别是法国人创造的那些，在范围和设计上同样是鼓吹大陆主义的。只有林奈的系统，发起在规模和吸引力上都前所未有的欧洲知识构建事业。他写下的一页页拉丁文名单也许看起来静止且抽象，可是它们所做且被认为要做的是，启动一项有待在这个最具体意义上的世界实现的事业。随着他的分类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整个欧洲生根，他的“门徒们”（他们就是这样自

称的)在全球范围内大量通过海路和陆路呈扇形散开,执行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谓的“救世主式的策略”。²¹与海外贸易公司,特别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约定,为林奈的学生们提供了自由通道,因此他们开始出现在各地搜集植物和昆虫,测量、注释、保存、绘图,拼命地试图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弄回去。信息被记载到书中;标本要是死了,就被放进博物学收藏中,这成为整个大陆富人们的重要兴趣爱好;标本要是活着,就被种植在同样开始在整个大陆的城市和私家场所涌现的植物园中。林奈的学生卡尔姆1747年去北美,奥斯贝克1750年去中国,洛夫林1754年去南美,福什卡尔1761年去近东,而索兰德则于1768年参加库克的第一次航行,斯帕尔曼于1772年参加其第二次航行(参见下面第三章),等等。林奈自己1771年对同事讲的话,传递出这项事业的能量、刺激、全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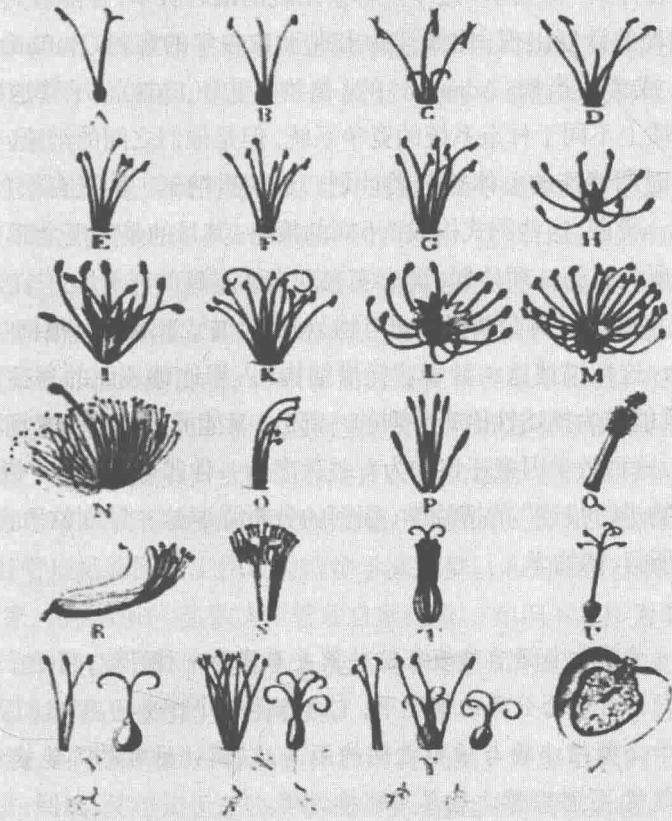
我的学生斯帕尔曼刚刚航行前往好望角,我的另一个学生桑伯格将要陪伴一名荷兰大使去日本;这两个人都是称职的博物学家。25 更年轻的格梅林仍然在波斯,而我的朋友法尔克则在鞑靼。穆蒂斯正在墨西哥从事辉煌的植物学发现。柯尼希已在特兰奎巴发现许多新物种。哥本哈根的弗里斯·罗特博尔教授正在发布罗兰德在苏里南发现的植物。福什卡尔的阿拉伯发现很快将送到哥本哈根出版。²²

这听起来俨然如他正在谈论大使和帝国一般。当然,我想说明的是,他确实在以一种相当意味深长的方式这样做。正如基督教发动了一场全球性宗教皈依工作一样,博物学也发动了一场世俗的全球性工作。前者在每一次与其他社会接触时都迫使人们承认自己的权威;后者,除了

别的以外，则使得接触地带成为一个不仅是智性而且是体力劳动的场所，并在该场所设置两者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林奈的系统化计划具有一种明显的民主的维度，将科学探索普及到以前从未普及到的程度。正如一位当今评论者所言，“林奈首先是一个为非专业人士写作的人”。他的梦想是，“凭借他的方法，任何曾学过这个系统的人，都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将任何植物归入即使不是正确的属类，也是正确的种类和秩序之中，无论这种植物先前为科学界知道与否”。²³

旅行和旅行书写从此不同于之前。在18世纪下半叶，无论一次探险首先是否是科学性质的，抑或旅行者是否是科学家，博物学都在其中发挥作用。标本搜集、藏品积累、新物种命名、未知物种确认，成为旅行和旅行书中的标准主题。除了海员、征服者、俘虏、外交家这样的开拓人物外，到处都开始出现温和的、显然有文化的“植物采集者”；这种人物只装备一只采集用的袋子、一册笔记本和一些标本瓶，除了想与虫子和花朵单独平静相处几个小时之外，别无所求。各种旅行叙事，开始产生出彬彬有礼的“自然化”的悠闲间歇。有关动植物的描述，对旅行书写来说本身并不陌生。正相反，至少自从16世纪以来，这样的描写一直是旅行书的传统构成部分。然而，它们通常被当作附录抑或对叙事的形式偏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分类计划的确立，对自然本身的观察和编目变得可以叙述。它可以构成一系列事件，甚或产生一个情节。它可以形成一个完整记述的主要故事情节。从某种角度看，被讲述的是一个与正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欧洲人有关的故事，他们呈扇形散开寻找与自然的非剥削性关系之时，恰恰是他们在自己的权力中心摧毁这类关系之日。正如我下一章试图证明的那样，还有一种“反征服”的叙事被人们讲述；在这种叙事中，博物学家将资产阶级欧洲自己的全球在场和权威自然化。这种博物学家的

Christi LINNÆI M. D.
 METHODUS plantarum SEXUALIS
 in SISTEMATE NATURÆ
 descripta



G. D. EITREICH, Palatheidels
 fecit & edidit

1736. Tab. 1736

图7: 林奈根据生殖器识别植物的系统。这幅由格奥尔格·D. 埃雷特绘制的插图, 最先出现于1736年某登版的《植物种志》。

叙事,在整个19世纪将会继续保持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并且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

林奈系统只是总体化分类图式的一个例证;这种分类图式于18世纪中叶合并到“博物学”之中。林奈系统的最后版本,伴随着其他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出现,比如开始出现于1749年的布封(Buffon)的《自然史》,或者阿当松(Adanson)的《植物科志》(1763)。尽管这些作家提出本质上不同于林奈系统的竞争系统,但是他们之间的辩论,仍然基于这个时期特殊的总体化分类计划。正如贡纳尔·埃里克松(Gunnar Eriksson)所言,这些图式构成“不同的策略,其目的是实现全部18世纪博物学所共有的一项计划,即忠实表现自然本身的样子”。²⁴在其对18世纪思想进行经典分析的《词与物》(1970)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描述这一计划:“凭借结构,占据地球表面的存在物大量增生,既能成为描述性语言序列的一部分,又能成为数学因素场域的组成部分,这种数学因素还将作为有关秩序的一种普通科学。”²⁵说到“对可见之物进行描述”的博物学,福柯的分析强调这一计划的语言特征。正如他所言,博物学

使得物与语言和表征的共同关系成为一种可能;不过,只有在物与语言恰巧分离的情况下,它才作为一个任务而存在。因此,博物学必须缩小物与语言之间的距离,以便让语言尽可能接近观察的凝视,让被观察之物尽可能接近词。²⁶

作为一种不仅在相关性而且在归约性方面的操练,博物学

将可见之物的整个领域归约为一个变量系统,这个系统的所

有价值都可以被指定,如果不是被数量,至少也是被一种完全清楚和永远有限的描述。因此,就有可能确立存在于自然实体之间的身份系统和差异秩序。²⁷

博物学家常自认为忙于发现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自然的计划);可是,根据当代的观点,这更是一个关于“新的可见性场域得以全面构建”的问题。²⁸

尽管博物学毫无疑问是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构建的,但它是一种在社会以及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被实现的事业。欧洲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受到来自对保存、运输、展出、记录标本的更好手段之需求的挑战;植物学和动物学绘图方面的艺术专门化得到发展;印刷商面临着改进视觉资料再生产的挑战;钟表匠们需要发明和维修器具;在商业探险和殖民前哨科学家的工作应运而生;赞助网络为旅行和随后的写作提供基金;各种业余和专业社团在地方、全国、国际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博物学收藏获得商业以及声望价值;植物园变成大规模的公众景观,而且管理植物园的工作成为博物学家之梦。(布封做了法国国王花园的管家,而林奈则一生致力于管理自家花园。)知识不是作为事实、比特或字节的静态积累,而是作为人类活动、纠缠不清的言语和非言语实践存在,博物学正是它的生动例证。

当然,科学探险涉及各种各样的语言机制。许多形式的书写、出版、演讲、阅读,使得知识在公共领域产生,创造并维持其价值。科学的权威被最直接地蕴藏于专业描述文本上,以及围绕各种命名法和分类标准组织的难以计数的植物学论文上。然而,报纸杂志和叙事性旅行记述,是科学网络与广大欧洲公众之间必要的中介。它们与欧洲了解世界并存在于其中的其他方式一起,是使得科学权威及其全球计划合

法化的主要代理。18世纪下半叶,科学旅行者将会制定话语范式,这些范式自身明显区别于拉·孔达米纳在该世纪上半叶继承的那些。

我认为,自然的系统化是一项新型的欧洲计划,一种人们可以称作欧洲行星意识之物的新形态。三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知识构建机制一直首先用航海的术语解释这颗行星。这些术语导致两个总体化计划抑或行星计划。第一个是环球航行,一种包括环世界航行然后撰写有关航行的记述的双重行动(“环球航行”这个术语要么指航行,要么指航行产生的书)。自从16世纪20年代麦哲伦首次完成环球航行以来,欧洲人几乎从未间断地在重复这种双重行动。第二个行星计划同样依赖于纸张和墨水,它就是世界海岸线的地图绘制,一项18世纪仍然在进行但已知可以完成的集体任务。用一位旅行书编辑的话说,人们1704年就有可能谈到“欧洲帝国”延伸“至地球最边缘处,好几个欧洲国家在那里有战利品和殖民地”。²⁹ 环球航行和地图绘制,当时已经产生人们也许可以称作全球或行星主体的东西。在本章第一段引语中,这种主体的轮廓被丹尼尔·笛福轻松且随意地加以概括。正如笛福的用词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个世界的历史主体是世俗的、有文化的欧洲男性³⁰;

29 他的行星意识是他与印刷文化接触的产物,远远比水手的生活经验更加“道地”。

18世纪下半叶自然的系统化,更为有力地显示了印刷业的权威,因此显示了控制印刷业的阶级之权威。这种系统化似乎要使一种全球想象具体化,这种想象不同于旧的航海想象。博物学在地图上标示的,不是所走路线稀疏的轨迹,也不是陆地和水域的汇合线,而是那些构成行星表面的陆地和水体的内在“内容”。这些大量的内容不是通过白纸上的细线,而是通过依次用专门术语归纳的文字表征,抑或通过实体会被放入其中的标记网格得以了解。这些表征或者分类有限的整体性,

构成一种不仅是海岸线或河流，而且还有地球表面每一个看得见的平方英寸，乃至立方英寸的“绘图”。“博物学”，布封1749年写道：

从整体上看，是一部无边无际的历史，包括宇宙赠予我们的所有物体。这异常众多的四足动物、鸟类、鱼类、昆虫、植物、矿物质等，为人文精神的好奇心提供一个硕大无朋的景观；其总数如此之大，以至于看起来并确实所有细节上是无尽的。³¹

和这种整体的特性相比，旧的航海习俗显得何等缩手缩脚，例如在地图的空白处画出区域性奇闻和危险——亚马孙河的亚马孙人、加勒比海的加勒比人、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印度的大象等。

如同内陆探险的兴起一样，与对地球进行系统的地表图绘相对应的，是不断扩大寻找商业上可以利用的资源、市场和拓展殖民的土地，这宛如航海图绘与寻找贸易通道之间存在的关联。然而，与航海图绘不同的是，博物学将世界设想为一片混沌，科学家则从这混沌之中创造出一种秩序。那么，这就不只是一个按照这颗行星过去的样子描述它的问题。对阿当松（1763）来说，未经科学家之眼整理的自然世界是

似乎被偶然弄到一起的存在物胡乱的混合：在这里，黄金与另一种金属、石头、泥土混在一起；在那里，紫罗兰则与橡木生长在一起。在这些植物中间，还有四足动物、爬行动物、昆虫四处游荡；大家可能会说，各种鱼与它们游于其中的水环境，与在深水中生长的植物相混杂……这种混合的确如此普遍、如此多样，似乎成了一种自然法则。³²

30 对于20世纪晚期的西方想象来说,这样的视角也许显得稀奇古怪,因为这些想象受到训练,将自然视为一个自我均衡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的介入使之陷入混乱。博物学则要求人类介入(主要是智性上的)以构成秩序。18世纪的分类系统创造的任务,是在这颗行星上为每一个物种定位,将其从独有的、任意的环境(混沌)中提取出来,并将其置于系统(秩序名册、收藏或花园)中合适的位置上,附上其正式、世俗的欧洲新名称。林奈自己一生就给物种名录添加了八千个新条目。

诸如福柯那样的博物学研究,并不总是强调其概念的改造和挪用的维度。这颗行星的生命形态,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从它们纷繁纠缠的生活环境中抽离出来,重新编织进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统一和秩序模式。拥有这个系统的(有文化的、男性的、欧洲人的)眼睛,一经接触新场所/场景,可以马上就采用将其整合进语言系统的方式熟悉(“归化”或“自然化”)它们。距离的差异,自身就成了不相干的因素:就含羞草而言,希腊可以与委内瑞拉、西非、日本相同;“花岗岩峰”这个标签,可以等同地适用于东欧、安第斯山脉、美国西部。芭芭拉·斯塔福德(Barbara Stafford)曾提及这种全球再语义化的一个极端例证,德国人塞缪尔·维特(Samuel Witte)1789年的论文声称,世界上所有的金字塔,从埃及到美洲,实际上都是“玄武岩喷发物”。³³这个例证很生动,因为它暗示这个系统将文化和历史归入自然的能力。博物学提取标本,不仅从其彼此的有机或生态关系中,而且从它们在其他民族的经济、历史、社会、符号系统的地位中。18世纪40年代,在分类计划成为主导之前,拉·孔达米纳认为,博物学家的知识与更为有价值的地方知识并存。他预言性地提到,亚马孙河边“植物和树木的多样性,会为最勤劳的植物学家找到足够从事多年的职业,正如它也会为不止一个设计者

找到足够从事多年的职业一样”；他接着补充了一个想法，到18世纪末，这个想法也许会在科学语境下变得几乎不可思议：

我在此只谈及以下事情可能需要的劳动，即：准确描述这些植物，将它们分解成类别，把每一种植物归类于适当的属、类之下。由此我们可想，这个国家土著人对它们的优点进行的考察，是怎样的？这样一种考察，无疑是此项研究的所有分支中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³⁴

博物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无论运用到何处，都会中断人、植物、动物之间现存的历史、物质关系网络。欧洲观察者自己没有出现在这种描述中。林奈式的计划，通常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形象中得到象征。丹尼尔·布尔斯廷说，在林奈看来：“自然是自然物的巨大集成，他自己作为 31
监督者，在其中四处走动，为它们贴上各种标签。他有一个从事这种艰巨任务的先驱：天堂里的亚当。”³⁵像许多其他评论者一样，布尔斯廷在调用原始天真形象的同时，并没有怀疑这种形象。³⁶假如对其提出质疑，人们就能明白，人类，特别是欧洲人，从一开始就给分类者出了一个难题：亚当能够给自己命名和分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博物学家是否正在取代上帝？在这场博弈初期，林奈似乎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人们一度认为，他说过上帝曾“允许他窥视他的秘密橱柜”。³⁷让包括教皇在内的许多人严重不安的是，他最终将人包括在其对动物的分类中（智人这个标签就是他提出的）。然而，对人类的描述与对其他生物的描述截然不同。最初，林奈在四足动物中假定了一个单独的类别——人（只用“认识你自己”这个短语描述），并且只在智人与畸人之间划定了区别。到1758年，智人已经被分为六个变种，其主要特

征被归纳如下：

一、野人。四足的、哑的、多毛的。

二、美洲人。赤褐色的、易怒的、直立的。头发黑、直、厚，鼻孔阔，面部粗糙，胡子稀疏，倔强、满足、自由。用红色细线描绘自己。受习俗控制。

三、欧洲人。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肌肉发达，头发棕黄、平滑，眼睛蓝色，温和、敏锐、善于创造。身穿紧身礼服。受法律控制。

四、亚洲人。乌黑色、忧郁、死板。黑头发，黑眼睛，苛刻、自大、贪婪。身穿宽松服装。受看法控制。

五、非洲人。黑色、迟钝、悠闲。头发黑、鬃曲，皮肤柔滑，鼻子扁平、唇厚，狡猾、懒惰、粗心大意。用油脂涂抹身体。受任性控制。³⁸

最后一个类别“怪物”包括侏儒和巨人(巴塔哥尼亚的巨人当时依然是一种确定的现实)，以及像阉人这样的人造“怪物”。你将会注意到，人类的分类显然是比较性的。这一分类将有关欧洲人优越论的神话“自然化”，人们很难找到比此更明显的尝试。除了怪物和野人以外，这种分类法几乎未加修改地存在于今天的某些教科书中。

当然，航海图绘也行使了命名的权力。当使者们用欧洲基督教的名称给地标和地理形态命名时，宗教和地理事业确实在命名中走到一起。不过，博物学的命名再一次更直接地起到改造作用。它提取世上万物并将它们重新分配进一种新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的价值就在于其与混乱本源的不同。在这里，命名、表征、要求全都是同一的；命名导致秩序现实的产生。

然而，从另一种角度看，博物学丝毫不具有改造作用。这就是说，



图8：林奈的人形动物类型学，从左到右：类人猿、有尾人（这里指撒旦）、半人半兽、俾格米人。选自林奈，《人形动物》，载 *Amoenitates academiae* (1763)。

正如对自身的理解一样，博物学几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抑或对其做成任何事情。将原生态的自然“转变”进自然系统，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抽象的、非英雄式的姿态，没有多少利害攸关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灵魂。与航海家或征服者相比，博物收藏家是一个温和且往往朴实无华的人物，其所具有的改造力在花园或收藏室的家庭语境下发挥作用。正如我下一章将要进一步阐明的那样，博物学家的形象经常具有某种双性同体特征 (androgyny)；其知识产品存在某些毫无疑问非阳物崇拜的方面，这些方面也许是由林奈自己提供的意象暗示的，即阿里阿德涅跟随她的线团走出弥诺陶洛斯的迷宫。

这里可以发现欧洲资产阶级主体的一种乌托邦意象，它既天真无辜又是帝国性质的，它显示一种没有恶意的霸权想象，但是没有装配任何控制机器。博物学家充其量被视为欧洲扩张性商业抱负的侍女。实

实际上,为了搭免费的船,他们与贸易公司等进行交流,生产出商业开发的知识。一位作者在1759年的“前言”中说,“我们主要从博物学中搜集某个国家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我们从那里了解到其各种产品”。³⁹ 1756年,德·布罗斯(De Brosse)在介绍一本新的旅行概略时,赞扬“用一个新世界将地球变大,用这个新世界的**所有自然产品和有用风俗丰富旧世界**”的能力。⁴⁰1766年,有人在评论林奈一位学生写的一本旅行书时宣称,在文学和商业领域,“科学人”的旅行都优越于“富人”的旅行:

博物学家的研究,尤其可能为他人带来益处,这丝毫不亚于他给自己带来的乐趣;**植物学家**的研究特别是这样,他们的发现和收获,往往对其国家的贸易和商业利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著名的林奈甚至敢于声称,关于植物的知识,是整个公共经济的根本基础;因为正是这种知识,为一个民族提供衣食。⁴¹

与此同时,科学和商业的利益是细心截然分开的。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远征呈上升趋势,就像18世纪60和70年代库克的太平洋远航,这些远征经常接受密令设法发现商业机会和威胁。有命令下达,却秘而不宣,这暗示科学和商业事业之间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们认为商业与公正无私的科学相抵触。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这两者反映彼此的抱负并互相提供合法化依据。林奈的学生安德斯·斯帕尔曼(Anders Sparrman)说,“一次纪律严明的商业活动以及一般意义的航海,其基础在于科学……而科学,反过来又从前者获得支持,并因前者而得到扩大”。⁴²

可以说,商业前景将科学置于一般公众感兴趣的范围之内,尽管

商业扩张和帝国主义带来的利益，事实上压倒性地归少数精英分子所有。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科学——如布封的话就是“精确描绘一切”——创造出高于和超越商业的全球性想象。科学起的作用如同一面富丽堂皇、多层面的镜子，整个欧洲都能将自己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行星进程”投射到这面镜子上，这一进程不包含商业和政治扩张以及殖民控制所奉行的竞争、剥削、暴力。

的确，在涉及植物、动物、矿物时，尽管没有涉及人，这些系统也同样自动地应用于欧洲，就像应用于亚洲、非洲、美洲一样。如同我一直讨论的那样，自然的系统化，不仅表征一种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欧洲话语，而且表征一种关于非城市世界的城市话语，以及一种关于无文化修养农民世界的有文化修养资产阶级话语。自然系统被投射在欧洲边界之内及其之外。植物采集者在苏格兰或法国南部乡村，宛如他们在亚马孙河或南部非洲一样快乐。在欧洲内部，自然的系统化进行之时，城市中心与农村的关系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城市资产阶级开始以一种新的规模上干预农业生产，寻求使生产合理化，增加剩余，强化对农民劳动力的剥削，管理城市中心绝对依赖的食品生产。圈地运动是一种更明显的干预，它让许多农民丧失土地并进入城市或非法居民社区。用科学的方式改进家畜饲养和农作物种植的尝试，就开始于这个时候。⁴³任何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和剩余取向的模式相比，都显得落后，似乎需要得到“改善”。1750年，法国评论家杜克洛(Duclos)在其《有关本世纪习俗的思考》中认为，“那些居住在距首都一百英里以外的人，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一个世纪”；当今的启蒙学者常常不假思索地复制这一观点。⁴⁴

随着城乡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变大，欧洲农民逐渐显得只是比亚马孙河流域的居民略少一些原始特征。同样，自然系统也在欧洲内部重写地方和农民的认知方式，正如它重写海外地方土著人的认知方式

一样。斯滕·林德罗特(Sten Lindroth)将林奈纪实性、总体化的方法,与在瑞典得到高度发展的国家官僚形式联系起来,特别是那种精心记录个体公民并为他们分类的机器。到18世纪中叶,林德罗特说,“欧洲没有任何别的民族比瑞典人更深入了解其人口,一百五十万瑞典公民全都按照出生、死亡、已婚、生病等录入适当的统计专栏”。⁴⁵确实,林奈的属类和物种标签,看起来非常像公民必须有的姓和名——林奈称属名为“我们植物共和国的官方货币”。⁴⁶尽管自然的系统化先于工业革命的开始,林德罗特却注意到“[林奈的]书写方式与制造业中出现的准则之间惊人的相似性”。⁴⁷例如,标准化和系列制造已经设法进入生产领域,尤其是在用于枪炮的可更换部件的制造中。其他的类比出现在军事组织领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军事组织开始标准化制服、演习、纪律等等。

官僚机构和军事化是帝国的主要工具,而且一直到今天,对枪炮的控制都是欧洲征服他人唯一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思及此则这种类比就变得更具启示性。(就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手无寸铁的被征服人民正在索韦托以及约旦河西岸向装甲车投掷石块,也许在你阅读这一章时仍然如此。)绝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有关启蒙运动的学术研究,常常忽视欧洲那些侵略性的殖民和帝国冒险,而那些冒险乃是社会规训模式的典范、灵感、试验场。这些社会规训模式于18世纪被输送回欧洲,加以改造后用来构建资产阶级秩序。自然的系统化,与北美洲和南美洲奴隶贸易的顶峰、种植园制度、殖民种族清洗,以及安第斯山脉、加勒比海地区、北美等地的奴隶叛乱同时发生。因此,颠倒林奈式凝视的方向,抑或笛福笔下空想旅行家的凝视的方向,从帝国的边界向外眺望欧洲,这样做是可能的。因此,以标准化、官僚主义、正规化为标志的启蒙运动进程的其他谱系,出现在视野中。奴隶贸易和种植园制度不正是

社会工程和规训、系列生产、人生的系统化、人的标准化方面的大规模试验吗？这些试验已经证明，其益处超过任何一位欧洲人最为疯狂的梦想。（挑起法国革命的财富是在圣多明各创造的，到18世纪60年代，那里是地球上曾经见过的最多产的地方。）种植园农业显然成为工业革命和生产机械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与之类似，直到17世纪初，也没有像殖民官僚政治这样的官僚政治，西班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经济史学家有时称1500至1800年为“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奴隶制和国家保护的垄断，积累发动工业革命的资本。人们想知道，这种积累中有什么是原始的（正如人们想知道，发达资本主义中有什么是发达的），但是它的确是积累。在文化领域，这个时期被实践的许多收藏形式，部分是作为那种积累的意象、作为其合法化形成的。自然的系统化将这种积累的意象带到极致；与此同时，它还塑造了工业资本主义榨取自然资源的、起改造作用的性质，以及正开始在欧洲形成的、受制于资产阶级霸权的、城市大众社会的排序机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构建，自然的系统化绘制出一幅从统一的欧洲视角挪用和重新部署这颗行星的图画。

在欧洲，正如在欧洲以外的扩张前沿一样，这种知识的生产，并不表达与不断变化的劳动或贫穷关系抑或领土愿望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现代国家结构的当代理论化中，这种知识的生产受到了间接评论。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认为，国家总是“用一种拓扑的外部意象”，将自己刻画得独立于经济：“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客体，国家被认为拥有不变的疆界，它是通过其被排除在经济的非时间领域之外得以确定的。”⁴⁸随着欧洲扩张的势头为了“开放”内陆转向内地，这种概念在欧洲内部和其扩张前沿开始发挥作用。接下去的各章将更充分地说明，这些概念如何在旅行和探险文学中得到展开并受到挑战。

第三章

叙述反征服

公司官员有时的确允许开普敦主要的奴隶仓库用作妓院。

菲利普·柯廷等,《非洲史》(1978)

从这些争论和无序的场景,转而注意数位殖民者此时[1793]为改进这个国家的家畜所做的努力,这是一种慰藉。

乔治·M. 西尔,《南部非洲史》(1907)¹

前一章介绍了18世纪对自然的系统化。作为一项欧洲知识构建计划,这种系统化创造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行星意识。这种行星意识普遍适用于地球表面,它在视觉方面将动植物当作互不关联的实体加以具体说明,并根据一种有限的、总体的欧洲制造的秩序,将它们归类并重新聚集起来。也许,人们应该对这些术语有更为明确的理解。“欧洲人”在这个例子里,首先指一个由有文化的北欧人组成的网络,他们主要来自下层贵族和中上层资产阶级。“自然”首先意味着不受“欧

洲人”控制的所有区域和生态系统,同时也包括名为欧洲的地理实体中的许多区域。

博物学的计划决定许多种社会和表意实践,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旅行和旅行书写。就本书目的而论,首先令人感兴趣的是博物学与欧洲经济、政治扩张主义之间的相互约束。正如我上文表明的那样,博物学假定城市里有文化的男性对整个行星的权威;它详细阐述一种合理化、抽取、分离的理解,从而遮掩人、植物、动物之间功能和经验方面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博物学描绘出某种全球霸权,尤其是一种以拥有土地和资源而非控制路径为基础的霸权。与此同时,自然系统作为一种描述性范式,本质上自然而然是对地球的一种完全温和的、抽象的挪用。它不要求赋予任何改造性的潜能,与帝国公然阐明的征服、转化、领土占用和奴役截然不同。正如我上文表明的那样,这个系统创造一个关于欧洲全球权威的乌托邦式、天真无辜的想象,我称之为一种反征服。这个术语旨在强调博物学的相关意义,特别是在与帝国初期的前资产阶级欧洲扩张主义存在对比时,它在何种程度上变得意味深长。

本章的任务是更具体说明博物学和全球科学对旅行书写的影响。我打算通过一系列例证表明,博物学如何为讲述内陆旅行和探险提供方法,这种内陆旅行和探险不是为了发现贸易通道,而是为了监管领土、盗取资源、行政控制。这种讨论意在与随后的两章连起来阅读,那两章论及的是感伤旅行书写,这一时期反征服的另外一种主要形式。我认为,在旅行文学中,科学与情绪采用两种永远冲突且互补的资产阶级主体性语言,为帝国的前沿进行编码。

下文,我将考察由四部关于南部非洲的北欧旅行书组成的一个系列。这些书写于18世纪并跨越我一直称作的林奈分水岭,包括:彼得·科尔布(Peter Kolb)的《好望角现状》(德国,1719)、安德斯·斯帕

尔曼的《好望角之航》(瑞典, 1775)、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关于在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土地上四次旅行的叙事》(英国, 1789)以及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英国, 1801)。我在此的目的, 不是全面考察这一时期关于南部非洲的大量旅行文学, 而是挑选四个特别说明博物学的话语影响以及新行星意识的文本。(下一章将举一个南部非洲旅行书写的例证加以对比。)我的言论在诸多方面与J. M. 库切(Coetzee)1988年的研究著作《白人书写: 论南非的文学文化》不谋而合。这部重要著作开始的几章, 主要聚焦于18和19世纪关于南非的旅行书写, 包括这里讨论的作家在内。库切接着考察错综复杂的欧洲表征转而进入南非19和20世纪文学的方式, 正如我在下面第七章试图对西班牙语美洲所做的考察一样。

有关好望角的文献, 对研究旅行书写中的话语转移特别卓有成效, 因为好望角是这样—个地方: 科学旅行、内陆扩张的动力以及不断变化的接触关系, 这些都引人注目、戏剧性地在那里产生、终结。科学旅行的“伟大时代”, 通常与库克、布干维尔等人的太平洋探险联系在一起, 其中第一次是1768年金星凌日前后组织的。这些海洋探险的确开启了科学旅行和科学旅行书写的时代。不过, 与此同时, 它们也标志着一种

38 结束: 欧洲探险最后一个伟大的航海阶段。库克发现最后一个未知大陆澳洲的海岸, 并将其绘制成地图。在某种程度上, 他为内陆探险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北欧人进入非洲内陆的通道为数不多, 好望角是这些地方中的一个。对于殖民者和探险者来说, 它都是一块磁石, 他们急于在上面留下标记。在这个地方, 内陆殖民化与面向海洋的商业主义产生公开冲突, 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最终演变成战争。19世纪最初几十年, 随着内陆扩张向前推进, 南部非洲在伦敦传道会及其无法驾驭的明星戴维·利文斯通的努力下, 也将成为文明使命的一个典范试验场。

开普殖民地1652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原本是用作商船的补给港，结果却成为形形色色欧洲旅行者一个重要的停留地。新鲜肉类由土著的科伊人（“霍屯督人”）²提供，而公司则种植对付坏血病的新鲜蔬菜，提供休闲，照顾生病的海员，为船只提供健康的船员，等等。因易受攻击，依靠土著人养牛提供新鲜肉类，公司最初极力将其对该地区的侵蚀和对土著劳动力的剥削减少到最低限度。1654年，一项旨在奴役科伊人的提案遭到否决；奴隶最初是从西非而后又从马来和锡兰弄来。尽管如此，边界冲突却随时且经常发生（第一次有记录的跨种族谋杀发生于1653年），并且也随着欧洲人内陆殖民化的扩张，于17世纪70年代愈演愈烈。

开普殖民地建立后几年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勉强同意给予部分居民“自由公民”或独立农场主身份，允许他们从养牛的土著人那里夺取牧场和耕地。这种独立殖民者的人口缓慢增长，他们主要来自公司职员、落单的水手、非洲或欧裔非洲妇女这些阶层。（1685年以前没有不让种族间通婚的禁令；1685年，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婚姻是法律禁止的，但欧洲人与混血人种之间的婚姻则不受禁止。）1689年，殖民者人数因从荷兰来的一百五十名胡格诺派教徒得到实质性增加，这些人同时带来荷兰归正教会。1699年，自由公民（布尔人），也就是今天南非白人祖先的人口只有一千多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拥有不确定数目的奴隶。一个世纪后，他们的人口是一万七千，加上两万六千名奴隶。今天，他们的人数已达两百万。³

因此，到1700年，今天南非白人农牧社会的轮廓——以及今天南非的种族战争——就已经形成。20世纪60年代关押纳尔逊·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创始人的罗本岛监狱，于1657年为关押“攻击或抢劫公民”的霍屯督人而建。⁴自由公民社会大多不受公司管理部门控制， 39

经常与公司利益存在纠纷。它沿着自己的扩张路线发展,强行向内陆推进,通常与科伊酋长领地的居民发生冲突,当然偶尔也会与之结成同盟。欧洲人借助(法律禁止土著非洲人拥有的)马匹,(法律要求欧洲殖民者拥有的)枪炮,以及竞争群体之间的战略同盟,逐渐克服土著人的控制,打破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1713、1755、1767年出现的天花疫情,削弱了土著人的地位。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科伊人被迫成为勉强糊口的劳动者,为布尔人而不是自己牧牛。到1778年,新任总督冯·普拉滕伯格(Von Plattenburg)报告称,在开普殖民地没有发现自治的科伊人社群。当然,这不是说土著人社会和土著人对殖民化的抵抗就此结束;无论是土著人社会还是其对殖民化的抵抗,都以我将进一步讨论的形式继续着。

自从其在开普的存在开始,欧洲人便周期性地地进行内陆探险。早期吸引人们探险的一个目标具备17世纪的典型特征,那就是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产金帝国,名为莫诺莫塔帕(Monomatapa),与人们长期在美洲寻找的黄金国类似。⁵在人们看来,这些早期探险并没有导致任何有价值的发现;而且在航海叙事时代,它们也没有产生旅行书。直到18世纪初叶,关于南部非洲旅行的欧洲文献才开始郑重其事地出现,早期做出重要贡献的一本书,是彼得·科尔布的《好望角现状》。

彼得·科尔布与霍屯督人的正名

科尔布的书1719年用德语出版,后被翻译成荷兰语(1721)、英语(1731)、法语(1741),在18世纪上半叶一直是有关南部非洲的主要出版物之一。⁶科尔布接受过数学专业的培训,1706年被一名普鲁士赞助人派往开普,进行天文和气象研究。

尽管科尔布执行的是科学任务，但是他的记述，如同拉·孔达米纳在南美的记述一样，并不科学。就像拉·孔达米纳的书一样，科尔布的书在若干方面与林奈分水岭另一侧的写作形成对比。正如其扉页表明，这本书主要致力于“专门记述霍屯督人的数个国家：他们的宗教、政府、法律、风俗、礼仪、观念，他们的兵法、行业、语言、天赋，并同时简单记述在开普的荷兰殖民地”。科尔布的记述，大致由对科伊人社会 and 生活方式生动的人种志描述构成，采用的是传统的风俗习惯描述模式。尽管科尔布的记述以他所谓的与许多不同霍屯督人群体数年的接触为基础，但是书中并没有讲述这种接触，也没有讲述科尔布在内陆的旅行。科尔布写作这本书，是在内陆旅行和探险叙事范式出现于18世纪最后几十年之前。1719年，航海范式依然流行：科尔布讲述中唯一涉及其经历的部分，是他前往开普的六个月海上航行。与航海叙事的惯例相一致，这次旅行被讲述成一个生存故事，包括风暴、疾病、苦咸水以及公海上的攻击威胁。

正如书的标题允诺的那样，科尔布的叙述包括有关科伊人政府形式、宗教、礼仪、国内经济、养牛、药品等等的章节。保证描述的生动性很容易，但是要说到其准确性就不那么容易了。科尔布声称，他“确定的原则是不相信任何没有亲眼看到的东西”，可是紧随其后的句子他就肯定地说曾经见过“黑人生下来是白的”⁷，但数天之后颜色就变了！尽管如此，他的记述无疑是关于这一时期开普土著人的最真实的原始资料。下面这个有代表性的片段，可以让人领略一番他的写作风格：

为了制作奶油，他们将一块野生动物皮有毛发的一面向内，做成一只袋子样的东西，用来代替搅拌器。他们将牛奶倒进这只袋



图9: 彼得·科尔布,《好望角现状》,法文版卷首插图(阿姆斯特丹, Jean Catuffe, 1741)。说明文字的内容是:“历史准备书写经验传授给她的东西,并用其试金石和格言 *Rerum Magistra* 将她自己呈现出来。在背景中出现的是好望角的海湾;在一片云朵之上,东印度公司的标志由商业之神举起。”

子里,大约半袋的样子。然后,他们系紧袋口,男女二人分别从两端抓住袋子,来回快速晃动牛奶,直到变成奶油为止。然后,他们将其装在罐子里,或用于涂抹在身体和十字架上,或卖给欧洲人;至于霍屯督人,除那些为欧洲人服务者外,并不食用奶油。⁸

最后一句很说明问题,因为它以一种始终在接触地带进行的互动方式,将“欧洲人”与霍屯督人置于相同的框架中。这样的互动在其后作家的作品中没有多少地位。科尔布有关奶油的言论,使得欧洲殖民交换和文化价值通常的方向发生逆转。在这里,是欧洲人消费一种非洲人认为不能吃而拒绝的物质;欧洲人正在从非洲人那里购买而非出售一种制成品。谁是野蛮人而谁又是文明人?谁是市场而谁又是买主?

人们也许可以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对观点的操纵,是因为科尔布意在挑起争论,反驳早先作家对科伊人的否定性成见,为其正名。科尔布抨击前人,认为“他们对霍屯督人特点的描述蛮横而鲁莽,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和举止,虽然相当令人难受,但并没有达到他们描写的程度”。⁹科尔布有一种在后来的作家身上见不到的人文主义,他首先肯定霍屯督人是文化存在(cultural beings)。他尖锐地批评欧洲人有关霍屯督人不具备宗教信仰能力的断言;当然,这种断言是基督教作家做出的,其目的是寻求解释传教活动在开普的彻底失败。作为回应,科尔布强调科伊人如何强烈地执着于自己的宗教——换言之,他坚持认为, 42 欧洲人应该用与理解自己同样的方式理解他们。科尔布不否认科伊人的许多做法与欧洲人存在不同,而是拒绝接受那些有关本质区别的范式,因为这些范式使得欧洲人“自然而然”用不同于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对待非洲人。比如,接在上面引用的关于奶油制作段落后面的,是遣

责这种产品“令人作呕”，以及其生产条件的肮脏；但是那之后的段落则以类似的方式谴责开普的欧洲人，因为他们大量购买这种东西。在科尔布的描述中，科伊人虽然奇怪且往往令人厌恶，但是他们并不是被征服的民族。实际上，科尔布在描述他们与荷兰殖民者的关系时，描绘出一幅理想化的图画：在最初的冲突之后，两个民族做出“最神圣的承诺”，不再争战，而是作为联盟共存，彼此保护，抗击共同的敌人。

与其互动视角相一致的，是科尔布的记述引人注目的对话特征，在与后来的记述相比较时尤其是这样。科伊人的话往往被引用（虽然从来不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抑或被呈现为在回答作者问题时为自己的行为和习俗辩护；的确，科尔布展示出对接触地带内互动复杂性的一种特殊迷恋。在其记述开始处，他借助一段冗长的逸闻，确立人们也许可称作接触视角的东西；这段逸闻是关于一位科伊人天才企业家的，他名叫克拉斯，是欧洲人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经纪人，最终与双方都发生冲突。先期讲述的另外一件逸闻，是关于一位土著男孩的；荷兰人将他养大并送往国外，可是他回来后却重新加入土著人社会。

科尔布坚持认为，科伊人的社会与欧洲人的社会存在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这也恰恰就是他研究方法的局限所在。他为科伊人正名的策略，不是证明他们与欧洲人平等（他并不这样认为），而是证明他们完全是欧洲人类学意义上的人。与诋毁他们的断言相反，他们实际上可以用完整系列的范畴加以描述：宗教、政府、法律、职业等等——来自科尔布标题的整个系列，欧洲人正是通过这些范畴认定其他社会属于真正的人类社会。这些还是欧洲人用来进行自身界定和评价，将自己与他人对比的范畴。科尔布对科伊人的正名，显然是将欧洲文化范式套用在他们身上。在这些范式之外存在的差异并没有进入话语，抑或只是作为缺席和缺乏之物得到表达。因此，正如J. M.库切暗

示的那样,科伊人与欧洲社会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可能更明确地展现于他们诋毁者的话语之中,虽然是以恶意的形式。库切将17和18世纪欧洲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对“霍屯督人”的诽谤,归结为他们对科伊人没能满足人类学、经济学上的期望而感到的失望。正如库切记载的那样,从他们第一次接触开普开始,欧洲人就不断地批评“霍屯督人”的懒惰——也就是他们没有(拒绝)对为物质回报而工作的机会(要求)做出响应。库切认为,丢失的是对科伊人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内在价值的认可。“旅行作家谴责霍屯督人无所事事的那一刻,也就标志着霍屯督人让他开始直接面对(如果他意识得到的话)自己概念框架之极限的时刻。”¹⁰无论是彼得·科尔布的记述,还是他反驳的那些人的记述,都展示出这种意味深长的局限性。

到18世纪末,随着现代种族主义范畴的出现,随着欧洲干涉主义变得愈发好战,随着科伊人社会被殖民主义者打破并用契约加以束缚,科尔布的人道主义立场作为一种话语的可能性消失殆尽。“霍屯督人”不再被欧洲人用政府、职业、意见或天才(如同科尔布的标题中那样)这样的范畴加以描述,甚或不再可以描述。的确,林奈1763年对人的分类(第33页,此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下同),用“受任性控制”这么一个贬义的短语将那些范畴本身抹去。正如其他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就连在这一时期给非欧洲生活方式做评价的欧洲哲学家,也倾向于赞同这种还原论的看法:在欧洲人的构建中,美洲高贵的野蛮人和极乐的波利尼西亚人的价值,恰恰是因为假定他们缺乏政府、职业、法律、机构。¹¹科尔布从事写作,是在这种全球性的将生存还原为自然的做法固定下来之前。

最后和可以预见的是,科尔布记述中对陆地和空间的处理与后来的写作形成强烈反差。回过头看,将要成为风景和博物学的东西,在科

尔布的记述中以缺席的形式引人注目。当它确实出现时，描述的措辞也与分类的、后林奈时代作者的措辞极为不同。比如，下面这段对开普内地的描述，虽然赞美多样性，但是没有表明要进行区分、分类的任何冲动：

平原和河谷全都是秀丽的草地，大自然美景纷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到处都充满微笑，到处都装饰着美丽的树木、植物、鲜花，其中有些是如此奇异，有着如此诱人的形态和美丽，所有这一切都芬芳四溢，赏心悦目，沁人心脾。芦荟以及其他稀有的药树就生长在它们当中，有药用价值的草本植物十分丰富。¹²

上述段落使用的语言证实了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的观点。他将17世纪风景描述的特征归纳为“复合型的”，“不是对个别地方的描写，而是一种对特殊主题的完美构建；其目的是表现一个地区的特色，抑或有关好土地的一般观念”。¹³正如在拉·孔达米纳的记述中那样，特殊的动植物群在科尔布的记述中被指认出来，是因为它们的奇特性和药用潜质，抑或它们在土著生活方式中的地位。比如，科尔布收入书中的两幅精细植物画像，是科伊人自己都特别珍视的物质，恰达（印度大麻）叶和卡纳（人参）根。欧洲的整体描写计划在此踪影难觅。

尽管科尔布拒不承认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存在本质不同，可是另外一条等级分界线，却深深穿透他的人道主义世界，那就是奴隶制。科尔布在与有关（不是作为奴隶被拥有的）科伊人的还原论成见进行论战时，显然是从废奴主义出现之前的世界内部写作的。他对开普殖民地的描述从房屋和教堂开始，以奴隶的临时住所和牛棚收场。正是奴隶不断地使社会以及科尔布的话语陷入无序之中。科尔布将开普的西

*Maniere dont les Hottentottes portent leurs Enfans,
leur donnent le soin, & les accoutument au Tabac.*



Tom. I. pag. 270.

图10:《霍屯督人如何携带和看护婴儿并让他们习惯于抽烟》。选自彼得·科尔布,《好望角现状》,1741年法文版。

Villages & Hüttes des Hottentots .



Tom. I. pag. 288.

图11:《霍屯督人的村庄和棚屋》。选自彼得·科尔布,《好望角现状》,1741年法文版。

非奴隶描述为“我曾听说过的最难以驯服、充满仇恨、残酷的坏蛋”，他以一个关于“一两次处死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结束第一卷。其中一段逸闻涉及一群奴隶的命运，他们在试图逃跑的过程中杀死一个欧洲人，“撕开他的肚皮，掏出他的内脏，将它们挂在邻近的灌木丛上”。他们被捕后被定罪，遭酷刑致死：

这些人中有四个被活活弄死：当选女王被绞死。其余的人脖子套着绞索陪刑，然后被人用开裂的藤杖狠狠抽打，并用烧红的铁烙上印记。四个被活活弄死的人被绑在轮子上时，没有丝毫反应。行刑者用最猛烈的力气撞断他们的肋骨时，他们也没有喊叫，任何一个都没有发出哪怕是“哎呀！”的声音，抑或流露出些许抱怨……¹⁴

这种血淋淋的描述还有半页纸的篇幅。读过米歇尔·福柯研究肉刑的《我，皮埃尔·里维埃……》¹⁵的人，在此将会意识到关于酷刑诉诸感官、追求轰动效应的话语；这种话语早于诸如监狱、诊所、学校这类机构形式的社会控制在欧洲的合并。科尔布在这里没有对那种话语表现出任何不安，可是有关奴隶酷刑的追求轰动效应的逸闻，的确中断了——爆发于——他的文本。对话维度消失得无影无踪；被记录下来的不是说出的话，而是受酷刑奴隶沉默的无尖叫声（nonscreams）。在科尔布的世界里，奴隶制似乎是一种干扰，一个制造轰动事件的契机，不过也是被控制或标准化的契机。当然，在这个世纪的后来几十年，其被控制和标准化的程度有所降低。在后来的科学旅行作家的作品中，追求轰动效应和奴隶制实际上消失了，大多数各种类型的社会戏剧也消失了。一方面，正如我在下一章将表明的那样，这两者最终都在感伤的旅行书

写中找到新家，这种写作中许多都与废奴主义事业结盟。在旅行书写中，科尔布用来重申奴隶制、追求轰动效应、描述痛苦的语言，在策略上被转变成一种激烈的抗议性修辞。

总之，像许多有关拉·孔达米纳探险的文献一样，科尔布的记述，既早于自然系统，又早于内陆探险和欧洲扩张前沿旅行的标准化。它还代表南非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转折关头。到了科尔布所处的时代，持续六十年的欧洲在场仍未带来对当地的征服，土著的霸权依然存在。不过，欧洲的主导已在议事日程上，尤其是在科尔布写作反驳的那些书中；它们倡导对科伊人的彻底征服。比如，在这些书的意识形态范围内，科伊人对基督教的抵制本身，就可以视为本质低下的证据，更进一步地证明征服的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科尔布断言科伊人是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存在，也许并非一种天真的平等主义姿态，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姿态；根据这种姿态，（科尔布当然置身于其中的）欧洲人的优越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征服。六十年后，使得这种姿态遭到废弃并实际上已不可能的话语就确立了。

将接触地带自然化：

安德斯·斯帕尔曼和威廉·佩特森

18世纪末是好望角充满危机和急变的时代。随着欧洲殖民地的扩大，当地人对东印度公司保护主义政策不耐烦的情绪愈益强烈，这个过程同时发生在南北美洲。1779年，开普敦爆发针对殖民主义者的反叛。在内陆，南非白人的扩张主义农业力量，使之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和当地的土著民族，都产生激烈的地方性冲突。1778年，公司官员试图将鱼河确定为所属公民侵占内陆的界限，河那边的一切，继续归独立的

土著恩古尼人(讲班图语的“卡菲尔人”)社会控制。毫无疑问,这个声明没能稳定形势,东印度公司也不打算做出可能需要强制实施的广泛承诺。正如柯廷等人描述的那样,“萌芽期的南非白人”继续追求自己的利益,建设自己的社会。1987年在南非暂停的那些通行证法律,在18世纪70年代就已经生效。恩古尼人群体继续反对来自对岸的南非白人的入侵,而且南非白人也继续受到他们当中的土著群体,尤其是桑人(布须曼人)的侵扰。他们还为接触地带的另一个现象所困扰,也就是科伊人、桑人、逃脱奴隶、欧非混血人以及偶尔会有的白人变节者构成的所谓“混合带”。¹⁶

尽管这一时期充满巨变,但到18世纪晚期,殖民者社会的延伸使得南部非洲的内陆旅行对欧洲人来说越来越可行。博物学的成熟使得这种旅行越来越令人神往,而且新叙事范式的出现,使得这种旅行越来越具有可写性和可读性。这些变迁在18世纪70年代两位旅行者的作品中有清楚记载,这两个人就是瑞典人安德斯·斯帕尔曼和英国人威廉·佩特森。 48

林奈的学生斯帕尔曼于1772年作为博物学家被派往南部非洲,他当时以做家庭教师为生。那一年末,他参加库克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两年后他重新开始开普的工作,并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776年。斯帕尔曼常被引用的《好望角之航》¹⁷,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的有关南非腹地旅行的个人记述”¹⁸,该书的瑞典语版本于1783年出版,德语译本于1784年面世,随后从1785年开始出了四个英语版本,其荷兰语和法语译本则出版于1787年。

佩特森是一位苏格兰园丁的儿子,他被斯特拉思莫尔伯爵夫人派往开普,从事植物搜集工作。他被描述为“第一位用英语写作并出版一本书,完全致力于直接描述南非旅行经历的人”¹⁹;他的《关于在霍屯督

人和卡菲尔人土地上四次旅行的叙事》²⁰ 英语版本面世于1789年，第二年相继出版法语、德语译本和英语的第二版。1781年，佩特森已经是一位英军陆军中尉，参加英军对开普殖民地的进攻。这导致人们对他的指责，说他参加上述旅行是为了从事间谍活动。当然，英国人可能确实受益于他的战略知识。

在给他们的书撰写的“序言”中，斯帕尔曼和佩特森都被明确认定为开启了内陆探险和旅行的新时代，特别是就非洲而言。佩特森给自己的书撰写的“前言”中，对自己的界定是高于并反对征服者和商业旅行者；他说，这两种人都不能欣赏非洲：

野心可能从未在世界征服者的心中灌输将他们的帝国延伸到非洲沙漠的欲望，商业可能未曾诱惑人们考察一个外表不可能吸引任何一心想着增加自己财富的人的国家……虽然如此，也还有人觉得这些国家是能够增加他们满足感的目标，尽管那里充满恐怖。²¹

这些新人当然就是博物学家。斯帕尔曼的英语版“前言”也将他认定为一位创新者，指出“实际上他对这个国家整体面貌的记述，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鲜的”，因为“不可能指望”海上旅行者提供这样的信息。²²

毫不奇怪的是，这两位作者都明确疏远逸闻般的生存文学，以及追求轰动效应的奇闻怪事话语。实际上，他们通过那种反差显示权威。佩特森在“前言”中严肃宣布，他的书“不是一本披着旅行书伪装的长篇小说”，而斯帕尔曼则提醒读者，“我经常被问及的许多奇事和不寻常的现象……不会在我的日志中找到”。尽管“一只脚的人，固然还有独

眼巨人、海妖、穴居人，以及诸如此类虚构的存在，几乎完全消失在这个启蒙的时代”，斯帕尔曼指出，他前辈们的过错就在于写出“几乎同样不可思议”的故事，特别是与霍屯督人有关。²³（这里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彼得·科尔布。）

在林奈的两位使者这里，旅行叙事是根据对地理、动植物群进行记录的积累性、观察性计划组织的。与自然的遭遇以及其转化成博物学的过程，构成叙事的平台。这个过程似乎十分显而易见，很难认为它是一种创新。正如人们也许会期望的那样，这些书中的风景不再具有象征性或复合性，而是高度具体和分化的。下面这段话说明自然系统如何产生佩特森旅行记述的实质：

白昼的炎热消退之后，我们向东、转而向北、再向东跋涉，穿过一片极度干旱的地区，将连绵的大山撇在右手边：我们看见，左手边四十英里远处，还有另外一个山脉。尽管这片地区表面上极度干旱，却生长着丰富的大戟属、**景天**、松叶菊属植物，以及数种天竺葵类植物。²⁴

这段话的语言极具视觉性和分析性。林奈式的强调字体散见于书页上，尽管没有多到令外行人困窘的地步。下面是斯帕尔曼的一段类似风格的文字：

夜里很晚的时候，我们到了车夫家的农场。农场非常舒适地坐落在博特河对岸。这条河每隔不远便会依傍相当高的山峰而流，山顶和峰峦衬托起变化万千、赏心悦目的风景。在有些山坡上，可见洞穴和石窟；它们开始时当然并不存在，而是所有的自然

物都摆脱不了的兴衰变迁所致。²⁵

这种用温和笔调写下的活动记录连续数页，足以让人再一次想起如同独处伊甸园中的亚当一样的博物学家形象。人们问，人在何处？这风景被写得如同杳无人迹，无人拥有、无历史记载、无人占领，甚至就连旅行者自己都不在其中。描述地理和识别动植物的活动，构成一种非社会性的叙事，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在其中的在场都是绝对边缘化的，尽管这种在场当然是旅行本身一个始终如一和必不可少的方面。在这部作品中，人们似乎随着亚当的接近从花园里消失了，这当然也是他能够尽情在各处走动，并以他自己和家里的朋友给物命名的原因。书中有一处，在一座荒芜的小岛上，斯帕尔曼描述他自己“身着和亚当
50 在自然状态下穿着的同样的衣服……正在研究植物”。正如这位博物学家身上所体现的那样，欧洲人的权威和合法性毋庸置疑，这无疑是对欧洲读者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想象。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世界被自然化了，起到这位博物学家探索背景的作用。在斯帕尔曼和佩特森两人的记述中，通常的情形是，旅行特遣队构成殖民关系的一个微观世界，这样的世界偶尔在惊鸿一瞥时才能看见。在浏览大地的眼睛的余光之外，科伊仆人时而进入、时而走出故事的边缘，他们取水、搬行李、赶牛、偷白兰地酒、带路、翻译、寻找丢失的运货车。他们被简单地称作“一位/那位/我的霍屯督人”（或者只字不提，就像在永远不变的“我们的行李第二天到达”中一样），一切都是可以互换的；任何一个都不凭借名字或其他特征区别于另外一个；而且他们的在场、他们的可自由处理（*disponibilité*）以及其属民地位，都变成理所当然之事。（佩特森：“第二天早晨，发现两英里外的一个霍屯督人牛栏之后，我让其中的一个居民给我做向导。”²⁶）

除了其作为“特遣队”成员幽灵般的在场以外，科伊人在这些书中栖居在一个独立的文本家园，在那里他们作为刻板的人种志描述客体被呈现出来。斯帕尔曼在书的中间，用三十页的篇幅偏离主题描述他们；而佩特森则将描述放在第一章的一个长达十四页的注释中，其前后则是很短的关于大羚羊和斑马的注释。科伊人的这些后林奈式人种志画像与彼得·科尔布的描述形成反差，其方式图示性地表达殖民主义者兴趣的增加。坦率地说，尽管科尔布将科伊人首先描写为文化存在，这两个18世纪80年代的文本则首先将他们呈现为身体和附加物。在斯帕尔曼和佩特森这里，科尔布的人种志问答形式被作为获取知识手段的视觉审查所取代。斯帕尔曼的霍屯督人画像，始于五页对人体部位特别是生殖器的描写²⁷、四页对服装的描写、三页对装饰品的描写。科尔布也描写身体和生殖器，可是其话语中的身体，却是由文化形成或者(用现代的说法)铭刻的实体。比如，在描写少年(大概)被摘除一只睾丸并用一只羊脂球替换的仪式时，科尔布的主要反应是反复评论手术得以实施的细致性和精确性。然而，斯帕尔曼注意到霍屯督人男性有两只睾丸，并在其观察的基础上否认存在科尔布所描述的那种过程。这样做的效果，是使得越来越被征服的非洲人丧失文化。自不待言，科尔布记述的对话维度，与佩特森和斯帕尔曼的记述中静态的描述机制形成反差。在这些18世纪晚期的记述中，土著人的声音几乎从未被引用、复制乃至虚构；科尔布详细说明了智性和精神属性，几乎一一遭到否认。当斯帕尔曼评论印度大麻时，他的突出目的不是讨论其在土著习俗中的地位，而是暗示殖民主义者“将其制成被单、麻布袋、帆布、绳索等物品”。²⁸

51

在当前对殖民主义话语的学术批评中，当代读者很难不将这种无言、剥蚀性、生物化身体的创造，与灭绝性、剥夺性、任意的劳动力联系

在一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其海外根据地残忍而又不知疲倦奋力创造的，就是这种劳动力。人们也许想证明，斯帕尔曼和佩特森的记述只不过反映自科尔布开始的殖民介入五十年间，科伊人自身经历的变迁。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终被永远中断。可是，这些文本的共谋开始于这个事实：它们刻画的非洲人，不是经历生活方式上的历史变迁，而是根本就没有生活方式，是无文化的存在（用佩特森法语版的说法就是无习俗的）。在这些文本中，无论可能发生怎样的变迁，往往不被表述为变迁，而是被“自然化”为缺席和缺乏。斯帕尔曼的描述表现为永恒真理，并且在与科尔布早先记述发生冲突时，简单地对其真实性发起挑战。随着科伊人被剥夺领土权——被从他们依然生活在其中的风景中抽取出来——他们因此也被去除与经济、文化、历史的联系。博物学计划的目的就是使之变得容易，且实际上具有强制性的就是这些措施。反征服也是如此“认购”殖民挪用，尽管它拒绝征服和制服的修辞，大概还有实践。

尽管斯帕尔曼严格限定于非洲土著人，他却特别经常戏剧性地描述他与南非白人（布尔人）殖民者的互动，而他也依赖于他们的帮助。在这里，解释并理想化地描述定居者与旅行者之间关系的词是“好客”。旅行者与南非白人的遭遇，通常以可爱的资产阶级设想为背景得到评价；在这种设想中粗野、低下的农民欣然与宗主国的开明人士共享其生活，尽管这种开明人士的依赖性备受蔑视，但是其本质上的优越性得到认可。斯帕尔曼和佩特森几乎很少提及最具体地构成他们与殖民者关系的交换实践。例如，按照习惯，南非白人殖民者提供的帮助——食物、住所、牛、仆人——是用弹药支付的，这些物质在偏远地区很难储存和获取，而且又是殖民入侵完全且有组织依赖的物质。在旅行记述中，这种交换只字未提，这也许和很少谈到军火用途出于同样的原因。

接触地带生活的复杂性,以类似的方式只是在惊鸿一瞥中出现。南非白人殖民者的贫穷,往往会使范畴混乱不清——斯帕尔曼和佩特森都讲述过走近非洲人的小屋,却发现它们是欧洲殖民者住所的情形。在最偏僻的地区,可以遇到流动的欧洲独行者,穿越分界线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两位作者都报道过跨种族的性联盟和联姻——不只是通常的欧洲男人纳非洲妾的情况,而且还有欧洲女人与非洲情人生孩子,以及欧洲男人出于真爱迎娶部落女人为妻的故事。接触地带的暴力和破坏也可见一斑,不过只是在它们造成的后果中,在身体上留下的 52 踪迹中,抑或在奇闻逸事中:一个多年前被布须曼人用箭射伤的女人、一个妻子和孩子被杀害的男人、一个被剥夺土地的酋长。契约非洲劳工与他们主人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则在幕后,时而被提起,但并没有得到戏剧性的描述、详尽阐释或亲眼见证。例如,在斯帕尔曼的记述中,正在进行的针对布须曼人的种族灭绝活动,呈现为对布尔人组织狩猎布须曼人的一段冷静、食谱般的描述。²⁹

在斯帕尔曼的书中,与好客定居者的遭遇往往上演一出意识形态的戏剧;对博物学家的权威,也就是验证其认知如何超越前人的权威来说,这种戏剧是必不可少的。斯帕尔曼与南非白人的互动,常戏剧性地呈现出农民的知识与科学之间的冲突。斯帕尔曼尖锐地将“农民”这个词强加在一般意义乃至富裕的南非白人身上,而这些人当然不愿意用这个词指称他们自己。在许多逸闻中,南非白人屈尊成为农民,或者特别作为农民遭到取笑。一个引人发笑的系列逸闻,将定居者的自然观与博物学家的自然观之间的反差置于突出位置。有一天,采集标本的收获特别丰硕,斯帕尔曼发现自己的昆虫盒子满了,他“被迫将成群的苍蝇和其他昆虫放在[他的]帽檐上”。³⁰在寻找住宿场所的过程中,他被引向一所房子,房子属于“一位富有、瘦弱的五十二岁寡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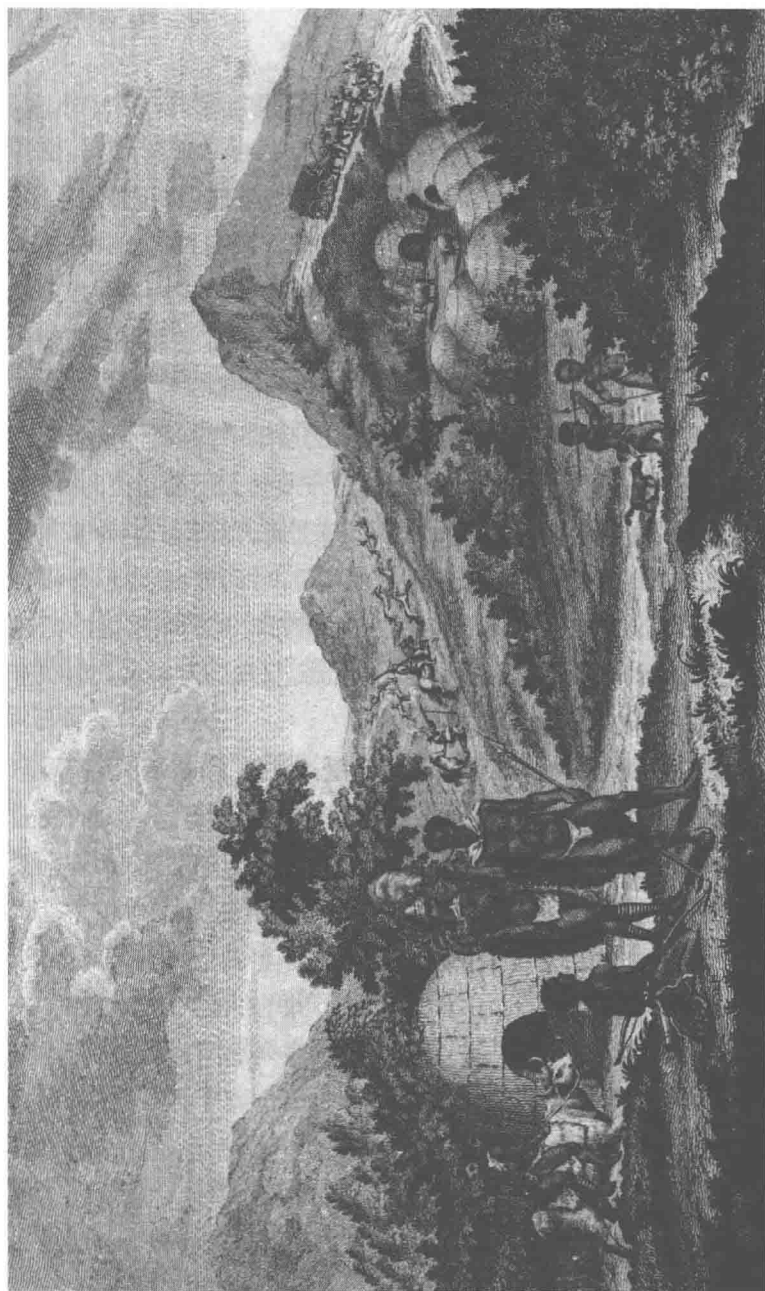


图12：斯帕尔曼，《好望角之航》（伦敦，1785），英译本卷头插图，描写“位于好望角的国家景象”。

到那里后，斯帕尔曼把周围满是虫子的帽子藏起来，以便不要惊扰女主人。可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仆人们把他的秘密泄露了。其中一位仆人对女主人低声说，他的帽子“满是小野兽(*kleine bestjes*)”。这时，斯帕尔曼站起身来：

我现在有必要停止用餐一会儿，因为我担心会被某些大字眼和长长的荷兰短语噎住；我被迫当场杜撰那些词和短语，是为了让她相信，了解这些小动物对医学和经济，并且同时对伟大造物主的光辉成就具有重要作用。³¹

通过引用南非白人的短语 *kleine bestjes*，斯帕尔曼强调构成其博物学家使命的词语代用。他将会提供“正确的”名称。异质语的作用强大，因为南非白人的短语使得南非白人女主持人与她的非洲仆人在缺乏科学知识的范畴上成为同盟。随着奇闻逸事的继续，斯帕尔曼的解释成功了。可是当寡妇的一大群朋友和亲戚来后不久，需要他重新表演一次。外行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距离，再一次被幽默地用到极致：“他们从前见过一位昆虫猎手，可是当他们看着我收集的草本植物时，却发现里面不仅有花，而且还有草和灌木条、小树枝。见到如此出乎意料的一幕，他们忍俊不禁。”³²

54

在这段逸闻中，斯帕尔曼明确无误既是在嘲弄自己，又是在将其主人原始化。这种自我嘲弄符合这两位后林奈式作者在他们自己与其读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当这位谦逊的反征服主人公真正出现时，他常被一种光环所包围，那不是权威的光环，而是天真无辜、脆弱的光环。斯帕尔曼有关那位寡妇的逸闻，在这方面具有启迪作用。作者将这个场景（年轻的单身汉/富有的寡妇）惯常可能有的色情意味抛在一边，将

其变成一出戏仿恋母情结的戏剧。在将自己幼稚化的同时，斯帕尔曼消解那位寡妇身上的色情色彩，对她的弱点进行评论，直接讲出而非巧妙处理她的年龄。化身为男孩的斯帕尔曼，努力做到不在口中塞满食物的情况下讲话，而是试图通过语言，特别是通过关于博物学的话语，拥有化身为母亲的寡妇。当然，这个环节被别人打断了，他们是有权对她提出要求的人，斯帕尔曼既不能吓唬又不能强迫他们。在社会意义上，也是在性的意义上，斯帕尔曼实施了一次反征服。

这其中没有十分重要的内容，因为真正重要的人物，是在瑞典等待儿子归来的父亲。与征服者和狩猎者之类的先行者不同，博物学家主人公的形象往往具有一定的性无能或者双性同体特征；因为他常用孩子气或青春期的语汇刻画自己。博物学家的知识生产，具有某些毫无疑问非阳物崇拜的方面，这也许由林奈自己描述的阿里阿德涅跟随着线团走出弥诺陶洛斯迷宫的意象所暗示（参见前文第25页）。林奈的门徒们漫步在乡间，寻找、搜集，对无论什么存在于彼的东西做出即兴反应，他们不完全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们抑或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们。（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包括一幅作者身穿土耳其长袍采集植物的画像。³³）

然而，博物学家主人公并不是女人——没有一个世界比博物学的世界更加以男性为中心（当然，这不是说没有女性博物学家）。门徒训练的父性结构极为明显。当父亲/国王身份的林奈在国内管理花园/王国时，他的儿子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寻找将会使之完整的那些缺少的部分。原始花园中的亚当形象，是一个在创造夏娃之前的亚当形象。正如他们书的“前言”常暗示的那样，促使林奈们前往海外的欲望与一种选择有关，它和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选择一样，背离异性婚姻的生活和女人。夏娃的缺席无疑是亚当幼稚和天真的先决条件。

正如我早先提出的那样，博物学家的追求虽然天真无辜，但确实包含一种征服和拥有的意象。夏娃就是他以婉转的方式掠夺和拥有的花园。佩特森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停下来休息，我将好几个标本加进我的收藏中”。不过与征服者不同，他的战利品不是从别的任何人那里获取的。干巴巴的小标本自身毫无价值——它们只不过是自己的实例、它们种属的符号而已。佩特森的“前言”强调征服与科学反征服 55 之间的反差，与此同时，它还揭示出两者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非洲的“荒野”，

博物学家将会发现一个巨大的观察场；在那里，他将发现能够满足他所有品味的极其多样的物品，见到所有自然状态中的简单物品，在野蛮的霍屯督人中，沉思他也许徒劳地希望在文明社会发现的美德。受到此类情绪穿透，被一片其产品不为我们所知的陆地之远景深深激动，我离开英国，决心满足一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假如不被视为对社会有用，至少也是天真的（黑体为我所加）。³⁴

在这为数不多的几行句子中有着何等的意识形态纠结！一方面宣称天真、漠然，另一方面则是表达以自我为中心的渴求和欲望的语汇。一方面，一个索取性的（男性）自我有需要待满足；另一方面，一个接纳性的（女性）自我被情绪所穿透。积累性、区分性的科学计划，与被称作品味的其他形态的区分和积累明确地并列在一起。知识被等同于消费（就像坐在寡妇餐桌上的斯帕尔曼一样），并作为对一种自我欲望的满足。

我认为，在有关帝国前沿的文献中，博物学家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天真无辜；这种天真无辜之获得意义，涉及一种假定的征服罪行，一种博

物学家形象不断试图逃避并最终引起的罪行，他但愿自己能再一次摆脱它。即使旅行者正在目睹接触地带的日常现实，即使扩张主义的制度使得他们的旅行成为可能，博物学引发并由之生产的旅行话语还是为人们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憧憬：一种不需要诉诸征服和暴力的占有方式。在我建议考察的最后一本南非记述，即约翰·巴罗的《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中，这种憧憬达到近乎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本书于1801年在伦敦出版。

这个国家的外貌的划痕，或曰 巴罗先生在布须曼人土地上所见之事

巴罗在开普殖民地内陆多次旅行的起因是，有一个时期，东印度公司、南非殖民者社会、土著酋邦的内部关系出现爆炸性的分裂，与此同时，还有来自法国、英国越来越强的外部侵略。在鱼河牵制欧洲扩张的努力没有成功，而且南非白人继续向内陆扩张，占领恩古尼人控制的土地。他们还继续对东印度公司不愿支持他们表达深切的怨恨。1786年，东印度公司派出一名农村行政官或行政主管，控制越来越好战的南非白人。这位官员只存在了数月。没过多久，南非白人向恩古尼人发动攻击，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非洲人反欧大起义。³⁵众多受契约束缚的科伊人、被奴役的桑人奋起造反，他们带着从他们欧洲主人那里偷来的珍贵马匹和枪支，加入到恩古尼人当中。这些马匹和枪支被调转过来对南非白人殖民主义者发起毁灭性攻击，而殖民政府则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南非白人以反抗的姿态回敬殖民当局，并在某些地区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

惶惑和暴力风行好多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遭遇财政困难，限制其

做出回应的能力。1795年,开普殖民地被英国夺得(其借口是它存在落入法国人手中的危险,因为法国人在拿破仑领导下刚刚侵占荷兰)。英国殖民者(今天的英裔南非人)开始到来,受到南非白人明确无误的反感。殖民地于1803年归还给荷兰人,1806年再次被英国人夺取,并于1815年确认归英国统治。约翰·巴罗是一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他在英国控制开普的第一阶段来到那里,充当新任殖民总督乔治·麦卡特尼勋爵(Lord George McCartney)的私人秘书。麦卡特尼任命巴罗担任他的代表前往内陆,要求巴罗对内陆做几次长途旅行。巴罗的工作是探究殖民者与公司官员之间的怨恨,在南非白人和土著人当中建立一种英国存在感,进一步记录“这个国家的外貌”。

与科尔布、佩特森、斯帕尔曼不同,巴罗是以一项欧洲殖民领地计划的名义进行的官方旅行。在他有关旅行的记述中,博物学家反征服的修辞差不多起到一种官方话语的作用,旨在为英国接管开普提供合法化依据。看似悖论的是,巴罗的记述只是十分有限地提及任务的军事和外交意义。他反倒是用斯帕尔曼和佩特森的模式,以博物学家、地理学家、人种志学者的身份写作。这些话语在巴罗的文本中以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出现,比它们在斯帕尔曼或佩特森的写作中,更明确地与帝国扩张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巴罗是作为一名官员(实际上是秘书)写作的,或者也许是由他自身的气质所决定。

如同其先行者一样,巴罗的记述大体上将非洲人从非洲分离出来(也将欧洲人从非洲人分离出来),将非洲人归入关于旅行的叙事所引发的具体化的人种学画像。巴罗的叙事绝大部分由风景和自然描述构成,是一种对巴罗也喜欢称作的“这个国家的外貌”不令人激动的编目。下面的段落可作为例证:

第二天，我们过了大鱼河，虽然并非不费周折。河岸又高又陡，水流湍急，河底多岩石，水很深。此处的河边，生长着一些依依的巴比伦柳树或者其变种。河的对岸呈现一派美丽乡村景色，树木茂盛，水体丰沛，芳草葱茏，一种槐蓝属植物大量生长于其间，显然与马森先生描述的大叶杨相同。

我们在卡菲尔乡间露营的第一夜，是在一条叫考沙的溪流附近，这条溪流在下游汇入大鱼河。接下来这一天，我们经过马陆和图里的村庄。这些村庄赏心悦目地坐落在从上述溪流边升起的两处高地上。马陆和图里，是我们在祖尔草原曾经见过的两位酋长和兄弟。我们还经过滚卡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好几个村庄。第三天，我们来到一条相当大的河边，河的名字叫凯斯卡玛。³⁶

四百页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这样一种奇妙、高度稀释的叙述，它似乎竭尽一切努力将人类的存在最小化。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场景或背景。视觉细节点缀着技术性、分类性信息。作者倾向于提供一种全景式的视野，间或使用少量审美修辞，为原本千篇一律、冷漠的词汇平添些许生气。旅行者们主要是作为记录场景/场所的一种集体移动之眼在场，作为中介，其在场已十分弱化。比如，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这队人横渡河流的努力，没有从人类的角度得到叙述或戏剧性描述，而是用极其间接的方式表达为对产生困难的河流之特性的列举。优先描述英勇事迹遭到拒绝，欧洲的主人公们自动缺席于他们自己的故事。³⁷至于标本搜集，甚至没有露出任何迹象。

这个国家的居民，无论是土著非洲人还是布尔人定居者，主要都是作为在风景上留下的踪迹出现在叙事中。例如，上文提及的恩古尼人的村庄，在话语中没有河流和小溪那么重要，而且村里的居民也没有出

现。促成巴罗在场并决定其旅程的历史，不在文本中发挥基本的作用。在讲述横渡鱼河的经过时，没有提及这条河作为南非白人深入内陆前沿的政治意义——尽管其作为边界的地位，是巴罗在那里横渡它的根本原因。在讲述翻越雪山的经过时，没有提及它们作为反欧洲游击战主要基地的意义——对于所有到那里的旅行者来说，这都是一个相当令人焦虑的原因。还有一次，只是在讲述一片连绵的“荒凉、杳无人迹的乡村”之后，巴罗才提到这一片先前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部分”，现在人口减少是因为“农民阶级与卡菲尔人之间令人震惊的决裂”。³⁸后来，巴罗还会说他在记述中“故意回避”政治讨论，部分因为谨慎，部分 58 因为“我当时以为就好望角的真正价值而言只存在一种观点”。³⁹

在巴罗的叙述中，产生戏剧性效果的不是历史，也不是旅行者自己的主体性，而是这个国家在向未现身的欧洲观者自动呈现时不断变化的外貌。巴罗自己的语言，暗示被构建到这种原本被动、公开姿态中的对支配和挪用的幻想。眼睛“控制”落在其凝视之中的一切；群山和河谷“自动展示”，“呈现一幅图画”；这个国家在来访者面前“敞开胸怀”。欧洲人的在场绝对无可争议。与此同时，浏览陆地的欧洲之眼，似乎无力作用于这自动展示的风景，抑或与之互动。这眼睛普普通通、没有特色、毫无私念，除了从其创造物的边缘凝视以外，似乎很少能做什么：我们再一次处于反征服的领域之内。

巴罗的风景描写时常伴随着一种阐释性的话语，这种话语的出现反映18世纪晚期博物学方面的进展。在这种阐释性的模式中，因果关系——而非分类法——对这一任务做出界定；观察者的任务不仅是收集可见之物，而且要根据不可见之物阐释可见之物。在描述盐湖边一个秀丽的营地之后，接着的两页是对盐湖起源的推测。⁴⁰为了解释矿物质的存在、沼泽的构成、山脉和河流的走向，提出各种化学的、温度的、

地球物理学的假定。为了揭示隐秘的特性,进行各种实验——世界并非只是养眼的,如同它对于林奈式收藏家那样。作为一种话语,解释为林奈式术语的表层平添一种深层次的维度。它还为博物学家产生新的行星力量,赋予其一种内在的眼睛,有能力破译亚历山大·冯·洪堡(解释模式的大师)也许会称之为自然之“神秘力量”的东西。在这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间,这些新的解释力量,与新近从欧洲传出的工业技术的神秘力量和贪婪的企业精神之间是什么关系?

撇开这些神秘的深度不谈,几乎毫不令人惊讶,这个欧洲帝国力量的使者,首要的任务是界定领土和勘测边界,在南部非洲这个地方尤其如此,因为在这里拥有领土已经成为扩张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在巴罗的记述中,下述情况更甚于其先行者的记述:在空间意义上浏览景象之眼,知道自己正在时间意义上看着景象——欧洲殖民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被编码成有待开发的资源、有待交易的剩余、有待建设的城市。这样的景象,正是使得信息在描述中具有相关性的东西。它们将一个平原变得“优良”,或者让一个“花岗岩的”山峰抑或一个“林木茂密的”河谷变得值得关注。视觉描述假定——自然化——一项体现在欧洲人身上的变革计划。这项计划经常明确浮现在巴罗的文本中,浮现在其价值往往被表达为审美的“改良”的想象中。在阿尔戈阿湾的一处地方,被描述成“能想象得到的最适宜于小渔村的位置”;不远处坐落着一片大沼泽,“只需抽干里面的水,就可以被变成一个美丽的牧场”⁴¹;发现一块含铅的矿石,意味着“殖民地一个有价值的收获”,尤其因为这是在一个可以很容易发展矿业城镇的地方。⁴²最为实用主义的情况是,巴罗并不反对讨论商品的价格水平,抑或英国的军事存在作为当地产品市场的价值。除这些明确的展现之外,英国的“改良精神”弥漫巴罗的文本,其处方来自无形、无辜、发言的“我”背后的一个权力之源。

资本主义“改良”先行童子军的任务，是将他们遭遇的一切编码成“未加改良的”，并且按照反征服的术语，编码成可自由处理(*disponible*)、可用于改良的。欧洲人的抱负必须被表现成不容置疑的。在这里，文本隔离将风景与人，将有关居民的记述与有关他们栖息地的记述区分开来，实现文本隔离的逻辑。欧洲人的改良之眼造就宛如“空洞”风景般的生存栖息地，它们只有在资本主义未来以及其生产市场剩余之可能性的意义上才具有意义。当然，从其居民的角度看，这些空间是作为强烈人性化、充满地方志和意义的空间被体验的；在这些空间的土著知识构成中，植物、动物、地理形态均拥有其名称、用途、符号功能、历史、地位。

不只是栖息地必须被造就成空洞的和未加改良的，居民也必须被造就成这样。在改良者看来，欧洲殖民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依赖的基础，是当下非洲生活的缺席和缺乏。在巴罗那里，未改良的非洲当下，不仅包括科伊人(霍屯督人)、桑人(布须曼人)、恩古尼人(卡菲尔人)，而且也包括他们的南非白人开拓者和竞争对手。欧裔非洲人以及非洲人，必须与英国人的抱负相比较具体加以编码；先前荷兰人的主张以及一百五十年的荷兰殖民主义，必须受到质疑。当南非白人殖民者社会出现在巴罗文本中时，它成了不加区分批评的目标，轻蔑地被认定为缺乏品味、舒适、改良精神。有关好客之道的陈旧叙事已不再有用：一个真正的荷兰农民，或者他自称的粗人，一点也不知道舒适这个词对英国农场主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度，不仅各种生活必需品，而且几乎每一件生活奢侈品，也许都要靠工业获取；他置身于此，却享受不到任何一种东西。尽管他拥有大量奶牛，但是很少食用牛奶或黄油。身处在最适合种植葡萄的土地和气候之中，他却从未喝过葡萄酒。一天三次，他的餐桌摆满大量羊肉，浸泡在羊尾的油脂中。他的房子要么顶棚

60 开放,要么只用粗糙的柱子支撑起草皮……他的椅子腿钉着从小公牛皮上剪下的皮垫子。窗户上没装玻璃。

这样的描述长达两页。当然,对于相反的价值记号,这种描写算得上是对高尚的野蛮人和俭朴生活的赞歌。这段描述由于过于评头论足而不能被当作人种志来读,其结尾的用词出现明显变化(黑体为我所加):

带着摆脱各种忧虑和反思的心智,过分沉溺于每一种感官欲望带来的满足,这位**非洲农民**的个头,长到笨手笨脚的程度,第一次遭受炎症疾病攻击,便被推下舞台。⁴³

正如库切指出的那样,欧洲旅行者常用他们谴责霍屯督人同样的措辞谴责布尔人,其关键词是“懒惰”和“闲散”。他认为,这两个群体都受到欧洲人对南部非洲传统生活方式刻意的误解,无论是被殖民的非洲人还是欧裔非洲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库切暗示,布尔人(南非白人)对欧洲资产阶级价值观构成一种特殊挑战的确切原因是:他们作为一个殖民统治阶级,可以得到几乎无限量土地和自由劳动力,因此有途径通过劳动实现积累、消费、致富的欧洲价值,不过他们却选择不这么做。按照库切的观点,他们为欧洲观察者们提供以下可能性:“在肮脏的皮肤、遮天蔽日的苍蝇、粗鲁的装束之下”,南非白人殖民者也许“代表着拒绝规训和劳动的诅咒,支持一种非洲生活方式;按照这种生活方式,大地的果实在掉进手中时才被享用,劳动被当作罪恶加以避免,休闲和懒惰成了一回事”。⁴⁴1801年,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巴罗用来对比“(蓄奴的)非洲农民”的是“英国的贫穷劳动者”,其相对于欧裔非洲人的优越性莫名其妙地在于这个事实:“为了给家人挣得一口面包,一周内有

六天,[他们]注定要每天辛劳十二小时。”⁴⁵已经被遗忘抑或根本就没有被认识到的,是创造英国工人阶级并强迫其拥抱上进心和职业道德所需要的紧张的教化、强制过程。⁴⁶

相同的文本策略,也在大西洋彼岸发挥作用。巴罗对在南非的荷兰人轻蔑的描写,与他的同行们有关加勒比地区荷兰殖民社会的书写不相上下,比如其著作第五章讨论的约翰·斯特德曼(John Stedman),巴罗可能读过他的书。在西班牙语美洲,潮水般的英国商人旅行者在19世纪早期常嘲弄西班牙语美洲的克里奥尔人社会,采用的措辞与巴罗用来反对南非白人的相同(参阅本书第七章)。这之间的相似绝非偶然。1800年,英国对南美洲如同对南部非洲一样有强烈兴趣。巴罗本人描绘这两者之间极其相似之处,称它们为“对立的大陆”,将开普殖民地与合恩角外海斯塔滕岛上的英国据点相提并论。⁴⁷历史将会证实他的描述。1806年,为英国收复开普的将军当中,有些人几个月后接着到阿根廷参加英国人对拉普拉塔的攻击。 61

巴罗《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主要的人种志兴趣不是科伊人,而是桑人,更以他们的殖民称呼布须曼人而为人所知。一直到现在,桑人都是强烈的人种志兴趣和西方意识形态幻想的对象。他们是南部非洲的古老居民,在欧洲人前来拓居时,他们已经与来这里的科伊和恩古尼牧民进行过激烈竞争。桑人是以小群体生存的高度流动性人口,他们既不饲养动物,也不种植庄稼。17和18世纪,他们夜间先是抢劫科伊人,后来又抢劫欧洲人的家畜,并因此而出名,令人闻风丧胆。

巴罗重复他通常对文本的做法,用与叙事本身不相干的十六页人种志描述呈现桑人。且让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契机,思考这些标准的旅行书写机制以何种方式为帝国主义的国内受众生产出非欧洲的主体。这里是一段摘录:

他[布须曼人]性格活泼开朗,做人积极主动。他的天才远高于平庸;而且,由于讨厌懒惰,他们都工作。他们白天一般都待在棚舍里,担心受到农夫的惊吓;在月光明亮的夜晚,他们有时跳舞,从日落一直跳到日出……他们小屋周围践踏而成的小圆圈,表明其对这种娱乐形式的喜好。由于他获得维持生命的一小口饭食是历经危险、疲惫不堪挣来的,因此其开朗就越发非同寻常。他既不耕种土地,也不饲养牲畜;他的国家产出不了多少可用作食物的自然产品。鸢尾属植物的球茎,以及一些味道苦涩刺激的草本植物的根茎,就是植物王国为他提供的一切。为寻找这些东西,部落附近平原的整个地表,都被刨得遍体鳞伤。⁴⁸

最初的人种志表述是将人民均质化成一个主语,一个集体的他们,也就是被作为主语生产的人民,这个词进一步蒸馏净化成一个标志性的他(即标准的男性成人样本)。这个分离出来的他/他们,充当的是一些永恒现在时态动词的主语。这些动词描绘出“他”所是或所做之物的特征,不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事件,而是作为一种先在的习俗或特征之范例(因为一种植物乃是其属类和种类的实例)。人与人之间的特殊遭遇,然后被文本化为对此类特征的列举。例如,18世纪晚期桑人社群经常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中的事实,被编码成一种白天躲藏、夜间跳舞的习俗。

批判人类学已经认识到这些描写性实践起作用的程度,这包括:将
62 其他社会标准化;将其与自己社会的差别编码;将其成员固定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在这里“他的”所有行动和反应,都是对“他的”正常习惯的重复。像自然系统一样,批判人类学在对局外人来说存在混乱的地方制造秩序。其他社会的文本生产,既不明确固定在观察自我之中,也不明确固定在这种观察发生的特殊接触处境之中。“他”是一种自成一

格的结构,常常只是一系列特征,处在与认知和说话主体不同的一种时间秩序中。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曾用“同在否定”(denial of coevalness)这个短语,特别指时间上的疏远。⁴⁹这种陈旧的文本实践很容易对先前讨论的去文化和去领土化进程做出补充。

从语法上讲,刚才引用的段落中有两处,标准描述的永恒“人种志”现在,被叙事性的过去时所打断。布须曼人小屋周围被践踏之处,表明(indicated)他们对舞蹈的喜好,而附近平原的地表被他们寻找草根刨得遍体鳞伤(was scratched)。这两个过去时,以一种幽灵似的方式重新提及一种具体的巴罗与布须曼人之间的接触场合。然而,他们历史化的一切,并非是他与他们的遭遇,而是他们与他们留在风景上的踪迹——他们留在“这个国家的外貌”的划痕——的遭遇。

人种志礼仪和风俗描述之正规化、普及化的声音,不同于风景叙事者,但又对其做出补充。这两者都经由博物学的全球计划授权:一个呈现作为风景和疆土的陆地,为了景象进行浏览;另一个呈现作为人体风景的本土居民,也是为了景象而被浏览。它们一起拆除了先前的社会生态网,确立一种话语秩序,其疆土和视觉形态的权威是属于现代国家的。土著民族脱离了讨论之中的风景,被剥离正在创造的历史——欧洲人想将他们作为受剥削的劳动力储备重新插进这种历史。

在这种语境下,人们不禁注意到,与南非白人和科伊人的懒惰形成对比的是,巴罗在桑人身上发现与他珍视的英国工人阶级相同的品质。他们讨厌懒惰,且愿意为不多的报酬(对英国人是面包,对布须曼人是苦涩的根茎)辛勤劳动。这两个群体都不是农牧民,那是一种对改良精神似乎有害的生活方式。这种言论尽管看似没有时间意义,可是它们却将巴罗的描述与引发为桑人正名的特定历史时刻联系起来。

无论17世纪之前桑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欧洲人来到时,他们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遭到围攻、被调动起来的群体,被科伊人当作野蛮和邪恶之人加以憎恨。这是欧洲殖民者乐意接受的一种神话;如同常说的那样,他们与科伊人结成联盟,发动野蛮的战斗,压制这些“憎恶田园生活”的“野蛮”人。面对经常的有关“布须曼人掠夺行径”的抱怨,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定期给殖民者授权,加强他们自己的报复性掠夺活动,结果这些活动演变成种族灭绝式的狩猎聚会。斯帕尔曼和佩特森都描写过夜间定位并攻击桑人营地的各种做法。

桑人对入侵者的回应,是变得越发神出鬼没和撤退到更加偏远的地区。(他们并非一直住在他们假定的“自然”栖息地,卡拉哈里沙漠。)到了斯帕尔曼和佩特森时代,似乎独立的桑人社群已经变得很难找到,幸存者躲藏得十分隐秘。然而,有些桑人被迫融入欧洲人的田园经济,采取的是旅行者经常谴责的方式。虽然公司的规章禁止对科伊人实施奴役,但是桑人则可以被奴役并且确实受到奴役,当然他们总是不断逃脱。斯帕尔曼对欧洲人的一种做法深感遗憾,那就是绑架桑人的婴儿,从而确保伤心的母亲会留在附近,同意受欧洲人奴役,以换得与孩子的接近。这种做法是从捕捉动物的技术改造而来。⁵⁰

到18世纪末,桑人已经不再构成严重威胁,成为一个被征服民族。在欧洲人的书写中,他们开始不再以邪恶野蛮人的面目出现,而是根据一种新的感伤定式,被表现为温和、天真、幼稚的受害者。巴罗是开创这种定式的作家之一,正如上面所引段落中那样。在一个片段中,他讲述在一个南非白人指挥官家里遇见一个桑人的情景,这个人刚刚被南非白人入侵者俘虏。巴罗对他和男性俘虏的谈话做了扼要叙述,与他的书占主导地位的修辞形成惊人对比。巴罗没有将他者转化成信息,而是尝试表达他的观点,并评价其对殖民迫害的体验:

他告诉我们，其同胞的状况确实可悲。每年有好几个月，当霜雪阻碍他们进行远足抢劫农夫时，他们遭受的寒冷和食物短缺难以形容：他们经常眼睁睁看着妻儿饿死，而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好季节也不能给他们的苦难带来多少缓解。他们知道所有人都恨他们，他们周围的每个民族都是敌人，正在计划毁灭他们。树叶间的每一阵微风，鸟儿的每一声尖叫，无不被认为预示着危险的来临。⁵¹

不过，这里不存在是否将说话者吸收进欧洲殖民权力结构之中的问题。他已经身处其中，在巴罗眼中：“这个小个子的人旨在陪伴我们；但是由于他似乎更愿意和其妻子们在一起，他被允许按照其放纵的爱好行事。”（黑体为我所加）这个片段就此结束。

64

最后，巴罗对桑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将他带到科学反征服的彼岸，其视觉和客观主义的修辞在那里失效。被压制者确实返回他的文本，但那是在我将用来结束这冗长一章的一个片段里。巴罗被桑人深深吸引，只想看见他们处于未被殖民的“自然”状态。但这成了对桑人的迫害，因为与他们的社群接触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就是入侵他们。只有通过征服（入侵）这种罪恶行径，反征服（观看）的天真无辜的行为才能进行下去。巴罗以观看的名义，不情愿地雇用一些南非白人农夫做这件事。他们带着征服的工具——枪械和马匹——夜间突袭，按巴罗的条件，除非受到枪击，否则谁也不许开枪。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次创伤性的冒险，一次名副其实的地狱之行，其叙述与书的其余部分存在显著的反差。对“游牧部落”的夜间袭击，使得征服的语言和懊悔的语言都突然浮现在文本表面：

一阵令人恐怖的尖叫声，宛如野人打仗时发出的咆哮，令我们

震耳欲聋；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哭喊从四方传来。我和指挥官以及另一位农夫拱起身，他们俩都向着部落开火。我立即向指挥官表示，在所有人当中，他第一个违背先前郑重承诺遵守的条件，这令我极为惊讶，因为我本指望他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举动。“上帝啊！”他喊道，“你难道没有看见如雨的箭落在我们中间吗？”我确实既没见到箭，也没见到人，但只听见足以撕裂铁石心肠的声音。⁵²

这个片段在巴罗的文本中毫无掩饰地突出，这么说丝毫不为过。这是书中唯一一个夜间场景，唯一一个直接对话的例证，唯一一次巴罗将自己描述为参与者，唯一一次情感爆发，唯一一次暴力爆发，人物和地点同时出现的不多场景中的一个，唯一一次巴罗怀疑自己对环境的理解。巴罗的书中戏剧性的片段为数不多，这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陈述的主体分裂，并作为观者（seer）与被观者（seen）同时出现的唯一片段。看来在此引起危机的，是巴罗选择行使其国家授予的“权利”，为暴力“赋予合法性”的事实；然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或同胞，也不是为了驱逐入侵者，而只为了一睹满足其好奇心。将观看解释成内在被动的，并将好奇心解释为天真无辜的，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持久，巴罗的话语秩序连同其人道主义道德秩序一起土崩瓦解。一种感伤的反话语于是乘虚而入。巴罗用一种忏悔模式结束叙述：“没有任何东西，”他后来说，“能够比我们这群人对部落的进攻更加无正当理由，因为这次进攻残酷且不公。”⁵³

这是一种忏悔模式，但确实不是一种起改造作用的模式，因为巴罗之丧失天真，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自我和新的言语关系。他堕落进殖民地狱，将会被后来的作家多次重复。一个世纪后，北欧在对非洲邪恶的种族灭绝式争夺中创造其自己的黑色传奇，那种堕落

将会变成有关欧洲在非洲的典型故事：从阳光普照的景象掉进黑暗的中心。

基于史实的附言

1803年，英国将开普殖民地归还给荷兰，这是一个令巴罗十分痛苦的损失，于是他丢下手中所有的事情，用三个月撰写其《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的第二卷，证明开普对英国的全球商业和军事利益所具有的价值。他的论证也许奏效了，因为英国确实于1806年用武力重新夺取开普。巴罗的旅行标志着英国统治带来种种变迁的开始，这种统治于1815年得到最终确认。英国人加强对鱼河边界的防守，与南非白人联手对付恩古尼人。恩古尼人的反抗持续整个19世纪，并于1819年、1834至1835年、1850至1853年、1877至1878年多次爆发战争。

与此同时，新法律试图将对土著人的征服合法化。按照柯廷等人的标准史，“1809年，科伊人和不属于奴隶的其他黑肤色人的法律地位这样得到界定：虽然他们享有某种保护，可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且有权进入法庭，但是大多数人被迫为欧洲人工作”。布尔人为奴役布须曼人发明的花招被合法化：“1812年，欧洲地主获得让在他们自己农场养大的孩童当学徒的权力……一种将他们父母也固定下来的统治方法。”⁵⁴1820年，五千名英国定居者来到这里，随之带来一股来自欧洲的新势力：伦敦传道会，该组织向某些最残忍的暴行发起人道主义挑战。人道主义，加上科学，乃是其自己形态的反征服；其在旅行书写中表现出的动力，将是下一章的话题。

第四章

反征服之二：互惠的奥秘

我们沿着这伟大的埃塞俄比亚[也就是非洲]航行。似乎因为我们的罪恶，抑或因为上帝高深莫测的审判，他在其所有的入口处都安排一个引人注目的天使，手执一把熊熊燃烧、热力极高的宝剑，不让我们进入内陆，前往这个花园的泉源，从那些泉源流出的金河在我们征服的许多地方流向大海。

若昂·德·巴罗斯，葡萄牙(1552)¹

1797年6月，一个二十五岁的苏格兰人出乎意料地在西非海岸露面，他独自一人、穷困潦倒、穿着相当破旧不堪。他名叫芒戈·帕克(Mungo Park)，刚刚完成在内陆的尼日尔盆地一年半的探险。他打算返回英国，将撰写出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一本旅行书。帕克此番旅行，受雇于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洲内陆发现促进协会，以其简称非洲协会而闻名。这是一个由贵族和富有商人组成的联盟，“包括贵族、准男爵、国会议员、一名退休将军、一个主教”。²它成立于1788年，由约瑟夫·班

克斯(Joseph Banks)领导,并在随后四十年间指导英国在西非的探险。(1815年,接替班克斯的恰恰是约翰·巴罗,他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旅行在本书前一章讨论过。)在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十二名富有的绅士”聚集起来,用悲叹的语气发表宣言,

尽管在那个劣等大陆[也就是非洲]海岸和边界上的发现取得了进展,其内陆的地图仍然只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空白。在利奥·阿弗里卡纳斯和努比亚语作者埃德里希的谢利夫的权威下,地理学家在这片空白上用踌躇不决的手段,追踪几条未开发河流和某些不确定国家的名字……一些个人察觉到这种特征,渴望使这个时代免遭指控被说成是愚昧无知的,而在其他方面,这不怎么属于其特征;他们坚持扩大人类知识储备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的信念,由此构想出成立一个非洲内陆发现促进协会的计划。³ 67

强调可行性,只字不提科学,以及人类知识作为一种“储备”的形象,这些都反映出非洲协会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目的。协会成员是经济扩张主义者,对“合法的商业”感兴趣;这就是说,他们对殖民化或者殖民地,特别是奴隶贸易不感兴趣。在两年之内,协会发展到九十五名成员。

结果证明,这个群体最初为自己制订的计划十分困难,成为他们实施的唯一一项任务:查明尼日尔河的河道、走向、源头、终点,与那些居住在其周围地区的人进行商业和外交接触。协会的创办者们对可能等待他们的景象抱有很高的期望。希罗德德曾经提出,尼日尔河有可能一直向东穿过非洲流向尼罗河,构成一条横贯大陆、通向地中海的贸易通道;特别是自从利奥·阿弗里卡纳斯(Leo Africanus),那位西班牙穆

斯林的《非洲历史和描述》于1550年问世以来，廷巴克图作为一个位于富有和有文化的王国中心的黄金城，就一直存在于欧洲人的心理地图上。⁴早期的报道导致欧洲人推测，“古埃及的知识和语言也许仍然不完美地幸存”在内陆，而且在某个隐蔽地区甚至可以找到迦太基人，保留“那些迦太基的居民曾经以此而闻名的艺术和科学以及商业知识的某些部分”。如同芒戈·帕克一样，协会的使者得到指令，不仅要为尼日尔河定位，而且，引用给帕克的命令，还要“访问其邻近的主要城镇，特别是托姆布克图和豪萨”。⁵

认为非洲内陆人口稠密，拥有已建立的城市和国家、商业网络，以及英国商品的市场，这样一种观念与几十年前的看法形成反差，那时受奴隶贸易决定的陈腔滥调主导欧洲人的意识形态。例如，1759年，阿当松《塞内加尔之航》（法国，1756）的英语译者介绍非洲时，称之为“布满痛苦的国度”，构成其风景的有栖息“老虎、野猪、鳄鱼、蛇以及其他野兽”的“燃烧的沙漠、河道和激流”。当地居民，无论黑人还是摩尔人，尽管“对人友善、温顺听话”，但都被描述成“一贫如洗、好逸恶劳”。⁶三十年后，这样的观点受到挑战。丹麦医生保罗·伊泽特（Paul Isert）在其《几内亚和美洲加勒比群岛旅行记》（1793）中表明，认为非洲人“天生懒惰、固执、惯偷、酗酒、有所有恶习”的那些奴隶制的支持者，“要是真心想去除偏见”，就得在非洲内陆旅行。⁷1782年，从前的奴隶伊格内修斯·桑乔（Ignatius Sancho）那些著名书信的英国编辑，用类似的语汇解释其话题的文学天才。“他深入了非洲内陆，”她写道，“也许能发现黑人的艺术和政体，因为这些与甘蔗岛上奴隶的无知和野蛮没有多少可比性，这些奴隶在婴儿时期就遭到放逐，在鞭子和工头的抽打下变得残酷无情。”⁸正如这些思索表明的，18世纪末对非洲内陆的再想象，恰逢1770年后反奴隶制运动非同寻常的加速，以及将非洲人重新构想

为一个市场而非一件商品。的确，非洲协会形成仅几个月之后，一个同等重要的历史实体成立了，那就是废除奴隶贸易协会。著名国会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这两个协会都是会员。

芒戈·帕克开始执行其前往尼日尔河使命的事实，抑或他大难不死活下来的事实，很难说究竟哪一个更加引人注目。在他之前，人们曾经历过一系列惨淡的失败。⁹协会的第一位使者西蒙·卢卡斯(Simon Lucas)在的黎波里以外一百英里处折转回头；第二位使者是个名叫约翰·莱迪亚德(John Ledyard)的美国人，在走出开罗之前就死了；第三位丹尼尔·霍顿(Daniel Houghton)假扮成阿拉伯人加入一个大篷车队进入沙漠，他传出几条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后，消失在撒哈拉沙漠中的邦布。不过，国内对尼日尔河探险的热情从未减弱。到帕克于1794年供职于协会时，非洲协会仍然有接近一百名来自全大陆的成员(包括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年轻德国人，他的旅行尚未开始)，并成功说服英国政府在塞内冈比亚设立一名总督，派驻五十人的军队，在尼日尔河和冈比亚河的流经之处为贸易开发提供帮助。

1795年12月，帕克从欧洲人在冈比亚河畔最高的前哨皮萨尼亚向内陆出发。最初他还有六个人陪伴，逐渐减少到只剩下一个少年奴隶，因为人们允诺他结束行程之后可获得自由，可是就连他最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向东旅行时，帕克穿过曼丁哥人(穆斯林非洲人，其中许多人都沦为奴隶贸易的牺牲品)居住的区域，然后进入富拉尼人的领地，其帝国一直向内陆延伸，包括廷巴克图在内。在此地可怕的摩尔人中间，正如帕克所言，他的麻烦开始了，不断遭遇土匪、交战的国家和贪婪的国王；他被一名叫阿里的富拉尼人统治者关押、折磨一个月之久，这位阿里被东方主义的样式刻画为腐败专制主义的典型。帕克获释后，向南进入坐落在尼日尔河两岸的敌对的班巴拉王国。在其

首都塞古，帕克最终见到“寻求已久的、庄严的尼日尔河，它在朝阳下熠熠闪亮，宛如威斯敏斯特附近的泰晤士河一样宽广，缓缓地流向东方”。¹⁰由于一贫如洗且经常挨饿，帕克放弃向廷巴克图推进的企图，折返向海岸进发，一路上大部分时间与一群奴隶同行，靠他们的施舍为生。在离开皮萨尼亚一年半后，帕克回到这里——这时人们以为他早已经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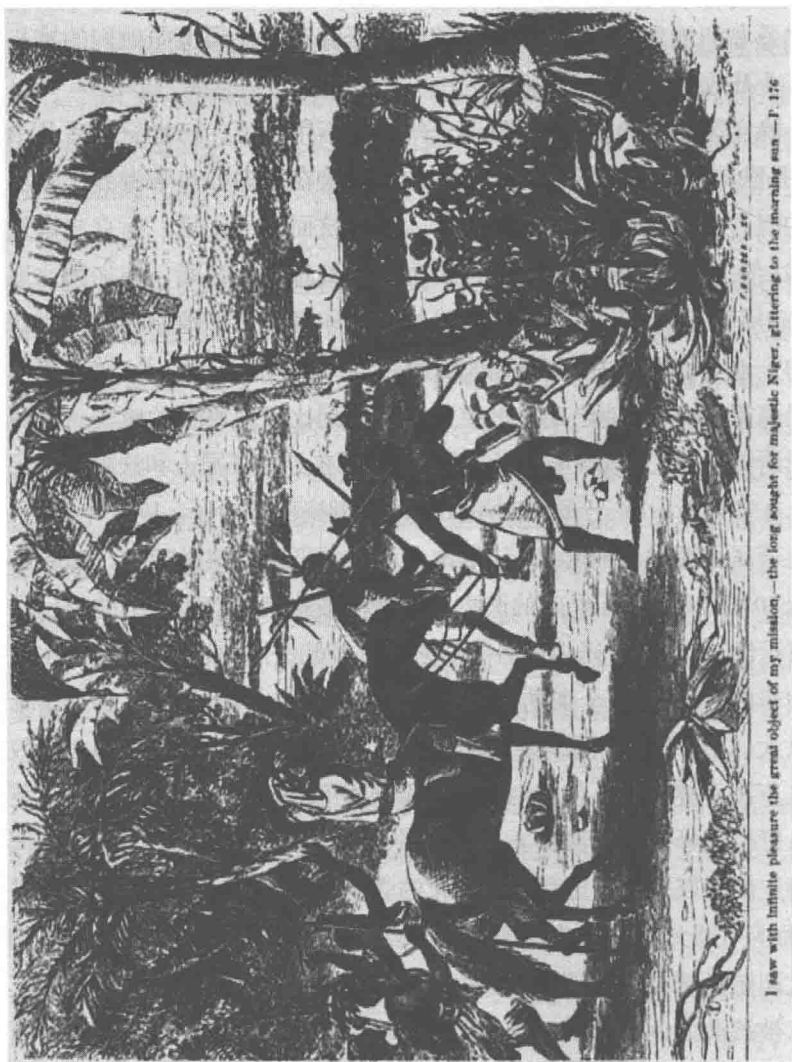
帕克的确从未到达廷巴克图，没有发现埃及人、迦太基人或古代基督教王国遗迹。不过他确实到了尼日尔河，并确切指出它向东流淌；
69 对于它是否汇入尼罗河这个令人振奋的可能性，他则未做解释。（它实际上没有汇入尼罗河。）同样重要的是，帕克与中西部非洲大量繁荣兴盛的富拉尼人和班巴拉人王国有过直接的接触，证实一个英国评论者描述的“内陆居民与毗邻海岸的国家居民相比较高的进步状态和优越的文明”。¹¹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羞辱的发现；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及其奴隶贸易在“降低”沿海岸非洲社会“进步状态”上扮演什么角色。还有另外一方面也令人羞辱，因为虽然欧洲的进步状态如此，但依然不了解西部和中部非洲的社会，可事实上，这些社会很久以前就接触过来自欧洲的商品和知识。

最重要的是，帕克活着完成返回英国的旅程，将其发现传达给他的欧洲赞助商。协会对市场的幻想呈现出一种新的强度。“借助帕克先生的发现”，他们欣喜若狂，

一扇门对每一个商业国家敞开，让他们从西方进入非洲的最东部从事贸易……基于英国信贷和企业预期的方向和努力，很难想象如此辽阔和人口稠密的国家，对我们国家制造业的要求可能会达到的程度。¹²

帕克本人得到好评，既因地理壮举又因商业壮举：他“使得我的同胞们更熟悉非洲地理，并且……将新的财富资源和商业渠道向他们的雄心和工业开放”。¹³

确实需要新的渠道，要鼓动士气就更不用说了。18世纪最后几十年，是欧洲帝国主义的艰难岁月。内陆探险在大多数热带世界受到疾病的阻碍，而在其他地方则因土著人的抵抗而陷入困境。库克之惨遭杀害，使人们对田园牧歌般的波利尼西亚幻想产生怀疑。在加勒比地区，动用数千名英国军队才最终将加勒比印第安人从他们在圣文森特岛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而那是他们通过条约获得的土地。¹⁴当然，美国已经赢得独立，其他已建立的殖民据点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威胁。在西班牙语美洲，独立运动正方兴未艾，有些还在寻求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支持。在安第斯山脉，土著人对殖民统治的抵抗稳步增强。1781年，安第斯土著居民爆发全面起义，从根本上动摇西班牙的殖民精英。自从18世纪70年代以来，苏里南的逃亡黑奴社群威胁到种植园经济的稳定性和可行性。1790年，圣多明各的奴隶叛乱推翻法国的殖民统治，产生独立的非白人政府，整个加勒比地区都有可能效仿。¹⁵圣多明各的冲击十分巨大，以至于让英国废奴运动停滞不前——不过只是暂时的。废奴主义不屈不挠的势头依然对危机感起支配作用，这种情形不仅限于英国。可供选择的帝国策略方面的实验产生令人沮丧的失败，比如英国支持先前的奴隶将塞拉利昂殖民化的尝试。对西北通道的寻找毫无进展，而且在极地区域很难发现其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像从前一样，随着欧洲殖民据点在欧洲殖民势力之间来回转手，欧洲殖民势力发现其国库被彼此之间的冲突消耗殆尽；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据点的价值（要不是由于奴隶贸易）仍然不清楚，正如内陆的情形仍然不为人所知一样。



I saw with infinite pleasure the great object of my mission,—the long sought for majestic Niger, glistening to the morning sun.—F. 176

图13: 描绘芒戈·帕克看见尼日尔河的卷首插图。选自帕克,《非洲内陆旅行记》,1860年版。

不过,最重要的是,欧洲帝国主义面临一种合法化危机。随着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得到确立,有关撕毁条约、种族灭绝、大规模转移和奴役的历史,变得越来越不可以接受。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内平均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外残忍的控制、灭绝结构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然而,资本的需求依然存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只会随着资本的扩张而变得激烈起来。而且,一如既往,正是欧洲列强自己的相互竞争将它们绑缚在一起,发现了欧洲帝国干涉的新形式和合法的新意识形态:文明使命、科学种族主义、以技术为本的进步和发展范式。

毫不奇怪,在回应芒戈·帕克的归来时,非洲协会表现出帝国式的狂喜;这种狂喜用种族主义的语言,并用重新绘制地图的意象表达:“正如伟大的非洲大陆在其无边的沙漠中偶尔展示出其绿洲一样……与这个国家的外貌类似,其人民空虚且迟钝的精神,确实偶尔显示出智慧和博爱的音符、各种各样的点滴天才、已改良社会体制的部分场景。”¹⁶那些侮辱性的话并没有开始暗示帕克的旅行/《旅行》带来的影响。甚至在他的书问世之前,非洲协会就知道它会引起轰动。“帕克胜利地继续下去,”被指派监督他写作的官员宣称,“他最近寄给我的某些部分,堪与任何用英语写成的作品比肩。”¹⁷《非洲内陆旅行记》第一版问世于1799年4月,且印行的一千五百本在一个月之内销售一空。同一年,又印刷了两版;法语、德语译本、美国版问世于1800年。帕克得到一千金币的酬金——旅行文学产业日益健康的一个指标。自那时起,这本书不断被收入选集、节选、重编,其戏剧性的场景和不事张扬的风格,成为欧洲旅行作家数十年遵循的标准。

尽管《非洲内陆旅行记》总是被读作帕克谓之的“朴实无华的故事”,可是它却为18世纪末感伤模式喷发进入有关接触地带的欧洲叙

72 事提供了丰富例证。反过来说，他的书阐明的是接触地带被欧洲人的感伤复原的方式，正如彼得·休姆(Peter Hulme)如此恰当指出的那样，当时“感伤的同情开始沿着欧洲商业的动脉流动，寻找其受害者”。¹⁸在接下去的几页，我打算更详细地思考帕克的文本，将其当作帝国前沿感伤旅行书写的一个例证。我的解读将会强调其与前一章讨论的科学旅行书写的相反之处。我的目的是暗示，感伤如何挑战并补充客观主义科学新兴的权威。然后，我接着考虑感伤模式的其他例证，试图将感伤旅行书写置于18世纪晚期欧洲帝国主义，特别是有关奴隶制的辩论的语境之下。

从经验出发的非英雄

芒戈·帕克并没有详细记载关于地理发现、观察或采集的叙事，尽管他本来可以这样做；他详细记载的是有关个人经验和历险的叙事。他不是以科学人，而是以多愁善感的男主角的身份写作，并书写自己。他将自己变成其叙述主角和核心人物，采取一种史诗般的系列形式，讲述考验、挑战、与不可预知事物的遭遇。帕克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路穿越西非内陆，与一个又一个酋长商讨安全通道，拿小饰品做交换以便生存下去、得到保护。他还在社会阶梯上垂直上下(大多向下)移动，从与王子们彬彬有礼的相会，到向奴隶乞讨食物的穷困情景。他横穿沙漠荒野，遭受口渴难耐、野兽攻击、土匪抢劫的考验。下面的段落可作为帕克书中日复一日叙事的例证：

第二天早晨(3月10日)，我们动身前往萨马明库斯。在路上，我们赶上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赶着一头驴子。她告诉我们，她正

在前往班巴拉，但是在路上被一队摩尔人阻拦，抢走她的大部分衣服和一些金子；等斋月结束后，她就要返回帝拿。同一天傍晚，新月出现了，它引来斋月。在镇子的不同地方，人们点起大火，现场并排放着比通常多的大量食品。

3月11日。白天，摩尔人准备就绪；不过因为我在路上遭受干渴，我让我的孩子装了满满一水袋水自用；而摩尔人向我保证，他们在日落前既不能吃肉也不能饮水。然而，我发现，过热的太阳和我们旅行产生的尘土战胜了他们的焦虑，使得我的水袋成为我们行李中非常有用的一部分。¹⁹

与旅行的空间/时间相对应的文本空间/时间，充满（产生于）人类活动、旅行者之间抑或他们与所遇之人的互动。和那女人和两个孩子谈话的 73
停顿，在文本意义上得到再现，是借助讲述她故事的停顿，而这本身就包含一出人类戏剧。夜的停顿不是以在何处停留，而是以人们在那里干什么为特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风景描述。自然之在场，是在其对社会世界造成影响的范围之内：满月开启斋月；尘土和太阳使每个人都干渴。从语法上讲，在帕克的文本中，人类主体比比皆是，而且主动语态的动词结构处于优势，尽管的确出现了被动语态。自然界主动与人产生联系：月亮引来斋月；尘土战胜人们的焦虑，使得水袋有用。

与上一章讨论的科学、信息类旅行书写之间的这种对比，很难更具示意性。例如，帕克的书在约翰·巴罗《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出版两年内问世。正如上面讨论的那样，巴罗的写作中旅行的空间/时间，主要是被主体所见的“这个国家的外貌”的语言呈现文本化，这些主体的在场却被文本的语言抹去。巴罗自己这队人和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没有得到渲染，至多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为了比较之目

的,我们再看一下第58页引自巴罗的段落,为方便起见,这里有所压缩:

第二天,我们过了大鱼河,虽然并非不费周折。河岸又高又陡,水流湍急,河底多岩石,水很深。此处的河边,生长着一些依依的巴比伦柳树或者其变种。河的对岸呈现一派美丽乡村景色,树木茂盛,水体丰沛……我们在卡菲尔乡间露营的第一夜,是在一条叫考沙的溪流附近,这条溪流在下游汇入大鱼河。接下来这一天,我们经过马陆和图里的村庄。这些村庄赏心悦目地坐落在从上述溪流边升起的两处高地上。马陆和图里,是我们在祖尔草原曾经见过的两位酋长和兄弟。

不出所料,在巴罗的文本中,静态动词和不及物结构比比皆是:河岸高、村庄坐落、什么在别的什么附近、树木茂盛、水体丰沛、高地升起、溪流汇入。主动的动词结构导致的,不是行动而是静止的景观:树木生长在河边,河岸呈现一派美丽乡村景色。与官僚/科学的客观主义实践相一致,巴罗话语的权威存在于说话者和体验者的主体性与所说内容之间的疏离。在帕克那里,情形正相反。感伤写作明确地集中在用感觉经验、判断、主体性或人类主体之欲望表达的一切。权威在于某个人感觉经验的真实性。谓语动词倾向于附属在身处其中的观察者身上,往往是借助表达经验或心理过程的动词:摩尔人向帕克保证他们斋戒的意愿,可是他却通过经验发现,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至于言语的指示性标志,代词“我”当然是最清楚地标明科学与情感之间互补线的元素。比如,仔细考虑帕克对极其口渴的一日的记述。这段记述可以与前一章注释37中引用的巴罗有关地表火的记述相比较(黑体为我所加):

[两个男孩]给我看他们的空水袋，告诉我他们在树林中没发现水。这番叙述只给我一点点安慰；然而，抱怨是徒劳的，我尽可能努力向前，希望在夜间到达某个有水的地方。我的干渴到这时候已变得难以忍受，我的口干渴不已、着火一般；我的双眼常常突然模糊不清，伴有昏厥的其他征候；而且我的马十分疲乏，我开始认真地担心我可能渴死。为了缓解我口腔和咽喉中的灼痛，我咀嚼各种灌木叶，但觉得它们全都发苦且毫无用处。²⁰

很难想象一个更加敏感和装腔作势的说话者。帕克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他自己的身体体验，构成事件并表明它们的意义。表达情感的语言——安慰、抱怨、希望、难以忍受——给予这些事件以价值。信息，就其与说话者—旅行者以及其追求而论，在文本意义上具有相关性（有价值）。相比之下，在科学叙事中，信息之具有相关性（有价值），在于其对文本之外制度化的知识目标和体系的依附。在帕克的《非洲内陆旅行记》中，一代又一代读者迄今发现最为难忘的场景，是一个将科学话语吸收进感伤自恋的场景。这个为帕克《非洲内陆旅行记》1860年版扉页（见图14）平添风采的场景，描述他遭遇最深刻危机的时刻。当时他在敌人地盘上遭到土匪抢劫，被留在沙漠里等死。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孤苦伶仃，被野兽和更野蛮的人围绕着”，帕克承认，“我的精神开始垮下来”。他被一种博物学家的顿悟所救：

这时，虽然我的身体反应令人不快，但一小块丰厚的苔藓的非同寻常之美，吸引了我的目光，难以抗拒。我提及此，是为了表明，心灵有时将会从何等微不足道的情形中汲取安慰；因为虽然整棵植物并不比我的一个手指尖大，我却无法不无钦佩地注视

其根茎、叶子和被膜的精致构造。(我想)在世界上这无名之地种植、浇灌并使之完美创造一件看起来如此无足轻重的东西的那个存在,会对模仿他自己的形象形成的造物之处境和苦难无动于衷吗?——当然不会!²¹

- 75 感性之人,在他需要的时候,穿透科学的语言,并发现自然作为神性形象的别样的精神理解。如果约翰·巴罗对布须曼人营地的入侵引发科学语言的崩溃,那么帕克在此的情感自展,是感伤语言以及其主人公——一个人——的胜利。

假如像我早先说明的那样,那位浏览陆地的、谦逊的信息生产者与官僚国家的全景展示机构相关联,那么这位感伤的、经验主义的主体则栖居在资产阶级世界那个自我界定的“其他”部分,私人领域——欲望、性、灵性、个体(the Individual)之家。在帝国前沿,如果前者为基于国家的领土野心编码,那么正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后者体现的不是家庭生活,而是商业和私营企业的理想。这两种话语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不过当然,要点正在这里。这两者之截然不同,是因为它们如此依赖彼此得以界定;它们是互补的,而且它们在其互补性中标示出新生资产阶级霸权的特征。在帝国前沿,感伤的主体与科学的主体共享某些重要特征:当然是欧洲性、男性、中产阶级性,不过还有天真无辜和被动性。他也是反征服的非英雄。我希望通过解读帕克的书表明,如同在信息/科学文献中一样,欧洲扩张主义在感伤文学中得到净化和神秘化。尽管他被置于话语场的中心而非边缘,尽管他由一个完整的身体而非一只空洞的眼睛构成,感伤的主人公还是被构建为一种不干涉主义的欧洲在场。各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而他都坚持并幸存下来。作为一种文本构建,他的天真无辜不在于谦逊,而在于服从和脆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BY MUNGO PARK.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NORTH BRIDGE.

MDCCLX.

111

图14: 帕克,《非洲内陆旅行记》,1860年版扉页,画的是帕克在一切都被强盗抢走之后的著名场景。

弱,抑或是谦逊的展示。芒戈·帕克把自己写成一个接受者而非创始者,如同其从事科学的同类人一样没有欲望。

互惠的奥秘

芒戈·帕克非常生动的旅行记述中某些最生动的瞬间,是特别经常打断其叙事的抵达场景。我在别处讨论过²²,抵达场景是几乎每一种旅行书写的惯例,充当框定接触关系和设定其表征条件的特别有效的场所。在下面的例子中,帕克讲述他一天傍晚寻找食宿,到达一个镇子时的情景:

在达利,这一天碰巧是个宗教节日,人们在都提的房子前跳舞。可是当被告知一个白人进了镇子时,他们停下来,到了我投宿的地方,两人成对、秩序井然地行走,音乐在前面带路……他们接着跳舞、唱歌,直到午夜。这期间我被一大群人围着,这使得我必须静坐不动,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²³

这个片段的结构可以描述成互相挪用。帕克的到达打断了当地的仪式,而这个仪式然后又在他周围重新开始。他挪用仪式,并同时被其所挪用;他被要求扮演满足人们好奇心的角色,以换取自己好奇心的满足。然而,他的角色是被动的,他自己的主体性和欲望起很小的作用。他没有预言日食月食,没有治愈病人,抑或成为将要做国王的人。这不是征服,而是反征服。虽然如此,在他与村民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关系,而非一个真空抑或深渊。与巴罗《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进行比较,这再一次具有启发性。巴罗讲述过一个类似的抵达场景:

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而来，跟随我们走在路上。天气温暖，男人们已经脱去斗篷，全身裸露。但女人们仍披着牛皮斗篷，而且她们为满足一睹生人的好奇心的努力，似乎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²⁴

虽然语词相同，可是巴罗版本中的欧洲人与非洲人（男人和女人）保持在分开的、非互动领域，各自为自己的欲望、意图、行为负责。村民们妨碍、影响、满足他们自己。我们假定，欧洲旅行者只是路过并观看；没有任何东西要求他们静坐并被观看。另一方面，在帕克的版本中，双方决定彼此的行为和欲望。帕克“必须”静坐以满足村民的好奇心；作为交换，他们给他提供住处和食品。作为一种表征，这个场景受互惠的支配。

我打算指出，互惠首先是组织帕克以人为中心的互动叙事的动力。它有时作为一种实现的现实，但是永远作为一种欲望目标、一种价值在场。在构成帕克叙事的系列人类遭遇中，确立戏剧性效果和张力的，几乎总是通过交流实现互惠、建立均衡的欲望。与地方统治者的遭遇是叙事的基本构件，尤其是帕克试图馈赠欧洲商品以求生存和安全通道而进行的商讨。这些商讨是在帕克商品的有限性与其寄主贪婪程度之间寻求均衡的一种斗争。即使在掠夺和盗窃已经使得帕克一贫如洗时，我们也总是发现他努力进行交换。当他被一个奴隶施舍收留时，他将“留在我马甲上的四颗铜纽扣中的两颗”送给其“慈悲的女房东”，而那些纽扣“是我能够给她的唯一的酬谢”。²⁵在另一次有启发性的场合，一个向他要食物的奴隶被贫困的帕克告知，他没有东西给他。那人回答说：“你饿的时候我给过你食物。你忘了在卡兰卡拉给你拿牛奶的那个人吗？”“我立即记起了他，”帕克写道，“便从卡尔发那里要了些花

生给他，作为对他先前善行的回报。”²⁶最后，当不再有纽扣剩下时，为了完成旅行，帕克拿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他在绝望之中遇见一位奴隶贩子，那人正在前往海岸途中，答应支付他“一个年轻奴隶的价钱”，将帕克移交给他在那里的英国联络人。

帕克每天的奋斗，主要包括实现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互惠，抑或容忍这种互惠的在场。我将说明，正是在这里，他的记述象征他旅行和写作的商业扩张目的。在巴罗的叙事中，欧洲帝国主义者的领土、殖民愿望被理想化成这个国家人口减少的局面，而在帕克的叙事中，扩张主义的商业愿望则将自身理想化为互惠的戏剧。帕克一路谈判，横穿非洲，俨然是企业家的化身。可是，欧洲资本主义明显非互惠的势头，几乎难以在他孤独、坚忍的形象中看出，无论你（读者或非洲人）多么久地凝视他。他做生意，但从不牟利。读者一次又一次看见的是，欧洲商品象征性的交换和生存。充其量，帕克现身时，只有他的生命——以及他的天真无辜。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终将证明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丰厚的苔藓带来的顿悟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瞬间，不是因为帕克活了下来，而是因为他最后失去了一切。他不再受到欧洲商品的界定。他已经变成其读者可能渴望相信的具有生存能力和真实性的生物：赤裸的、本质的、天性强大的白人男性。

互惠的幻象

在帕克以主体为中心的叙述中，商品并非唯一的交换场所。与科学旅行书写形成对比的是，在他的文本中，观看本身是沿着互惠的线路运作的。正如上文引用的抵达场景所示，作为观看非洲和非洲人的交

换，帕克反复描写自己受到非洲人的监视。在一次戏仿的逆转中，帕克的多用旅行箱成了满足其非洲“被旅行者”好奇心的橱柜，而他的身体同时被当作风景和动物标本加以考察：

附近的侍者，特别是女士，更为好奇；她们提出成千个问题，检查我衣服的每个部位，搜查我的衣袋，强迫我解开背心，露出我白色的皮肤；她们甚至数我的脚趾和手指，仿佛怀疑我是否真的是人。²⁷ 79

如这个段落所示，相互的观看是按照性别组织的，它决定于那种巨大的情感痴迷，跨种族的好色之徒。虽然非洲男人是帕克自己观看的主要目标，可是非洲女人却是观察帕克的特殊主体。上面引用的场景以帕克走向独裁者阿里开始，他正在一个女侍者举着的镜子里看着自己。阿里发现帕克不会说阿拉伯语，对他失去了兴趣；于是帕克便成了女性凝视的目标，她们咄咄逼人的窥阴癖，在这一过程中将他女性化——又一种反征服。

这种女性的监视，常常是帕克为获取食物付出的代价。在曼丁哥的宫廷里，他被转交给国王的全部妻妾检查。在那里，互惠的规则以一种滑稽—色情的方式显示其权威。女人们取笑帕克，坚持说他皮肤的白色和“[他]鼻子的突起”是假的。“就我而言，”帕克说，“我没有为自己的畸形辩解，而是说了许多好话赞美她们的非洲美。”²⁸ 另外一次，出现了一场危机，当时一群女人参观帕克，其目的是“通过实际查看，确定受割礼是否扩大至拿撒勒人”。帕克坚持要一种互惠待遇，使自己摆脱困境：

我对她们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如此多的美女，提供直观的

实证不符合我国的习俗；不过，假如她们全都退去，只留下我指着的这位年轻女士（挑选最年轻漂亮的），我就满足她的好奇心。女士们喜欢这个玩笑，开心地笑着走了；那位年轻夫人本人……给我送了些膳食和牛奶做午餐。²⁹

像这样的后宫场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8世纪兴盛于欧洲的东方主义书写传统。正如在孟德斯鸠著名的《波斯人信札》中那样，大部分的喜剧效果在于欧洲为中心的权力关系和文化规范的戏仿性逆转，特别是有关观看与被观看的规范。然而，我在此处的兴趣，首先是帕克使用这些语词的明确互动式特征，其次是它们如何被用来确定其作为反征服者的地位。

互惠的规则延伸到知识以及文化。帕克常常煞费苦心地报道非洲人对他的反应，以及他对非洲人的反应，肯定欧洲和非洲生活方式的可通约性，尽管它们可能存在不同。他的记述包括一些例子，这两种生活方式在这些例子里非常故意地与人们也许可以称作“互惠幻象”的东西并置。³⁰比如，有一次，帕克的医疗技术要派上用场，于是他建议采用截肢以挽救一个腿部中枪的年轻人的性命。非洲人惊恐万分地做出回应。“他们显然把我当作某种食人族，居然建议做这种残酷而又闻所未闻的手术。在他们看来，这种手术会带来比伤口本身更厉害的疼痛和更大的危险。”³¹土著人的治疗方法被采用了，病人注定要死去。帕克对拒绝欧洲治疗方法的决定没发表任何批评，他也没有尝试用自己的评论反对这样做。相反，他使读者能够接受非洲人对截肢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与帕克病人不截肢就会死的观点一样有理。

围绕西医药出现这种意识形态交流并非偶然，因为西医药已经证明（并依然）是欧洲扩张主义最有效的工具。就在西医药正在表现出

其作为欧洲影响的一个方面——对伊斯兰世界尤其如此，因为其统治者常常传唤欧洲医生给他们治病——之时，帕克却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不可知论的立场。他未将欧洲医药的优越性凌驾在非洲“迷信”之上，在此公然具有平均主义的含意，是对一种老生常谈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质疑。其他一些互惠幻象起到同样的作用。比如，有一次，一群前往海岸的奴隶告诉帕克，他们认为将会被卖掉让人吃了。帕克解释说，他们正在被送去干农活，但他们不相信这种解释。帕克非但没有嘲笑或反驳他们的观点，而且对其合理性表示敬意，只是评论说这种观念“自然使得奴隶带着极大的恐惧考虑前往海岸的旅行”。³²对于奴隶制是否等同于同类相食的问题，留有讨论的余地。有时，帕克构建各种类比，根据英国人的做法理解非洲人的做法。譬如，为了解释曼丁哥人抢劫他财物的倾向，帕克将种族和地理对立颠倒过来：“且让我们假定，有人发现一个来自印度斯坦的黑人商人在进入英国中心的路上，身上背着一箱珠宝，而王国的法律并没有保障其安全……”³³

帕克反复通过互惠幻象说明的一种不协调，是他自己在非洲的在场，他描绘非洲人反复在这件事情上质问他。有一位国王，“别人告诉他，我历经许多危险从大老远而来，为了一睹焦利巴河，他自然问我自己的国家没有河流吗，一条河与另一条河是否不同”。³⁴另外一个国王，听了帕克有关自己的叙述，似乎“只得到部分满足”。“为满足好奇心而旅行的观点对他很新鲜，”帕克说，“他说，他认为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只为看一眼这个国家及其居民，进行一次这么危险的旅行。”根据一种解读，这些困惑不解的非洲对话者，对反征服的构成原则本身，即天真追求知识的需求提出质疑。根据另一种解读，他们强化帕克的反征服——非洲人终于发现他不危险，只是愚蠢。在刚才引用的片段中，帕克再次确立其观光的天真无辜；当作回报，他为“只得到部分满

足”的国王提供了一种场景，或者倒不如说是一种非场景(non-sight)。为证明他的目的不是侵犯当地的商业，帕克让国王看了其旅行箱里为数不多的物品。“他被说服了，他的怀疑显然源自每个白人必定是商人的观念。”³⁵当然，帕克和他的读者明白，那国王并没太错。帕克通过非洲国王的“误”解，展示了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背信弃义，恢复了他的天真无辜。

帕克的互惠幻象，以及他指出欧洲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矛盾的方式，确实对他的书在许多代读者中产生似真性和可信性的效果做出贡献。整个19世纪，每个新版的评论者都赞赏帕克的谦逊和真诚。³⁶这种魅力一直在持续。当代著名泛非主义者菲利普·柯廷用同样的措辞说：“他[帕克]只是讲述他所见之物，没有傲慢，没有特别的辩护，而且(因为他不是学者)没有解释。”³⁷虽然天真用在他身上也许被误置，但赞赏没有用错。与许多其他旅行者，特别是追随他的某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比，帕克肯定了合理的非洲主体性和经验的世界。他研究文化的相关方法，提升了批判性自我质疑的真实可能性。与此同时，尽管欧洲意识形态遭到相对化甚或戏仿，但是它们从未直接受到质疑。帕克的书的大部分力量，归功于这种稳固地存在于欧洲的真实性、权力、合法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平等主义、批判相对论的结合。

互惠一直是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在其引人注目的研究殖民前沿感伤文学的著作中，彼得·休姆证明了这一点，这让人记起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礼物》中对互惠的经典研究。莫斯认为，在无国家主权、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互惠起到社会互动基础的作用，即使在诸如封建主义这种极端等级森严的社会形态中也是如此。用休姆的话说，“只有在盲目迷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互惠才会完全消失，无论其在场如何响亮地得到吹嘘”。³⁸虽然资本主义废除作为

社会互动基础的互惠，但它将其作为有关资本主义自身的一个故事加以保留。平等与不平等交换之间的差别遭到抑制。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段落中，马克思更宽泛地证明了这一点：

流动或商品交换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伊甸园。劳动力的买和卖，就是在这些领域的界限内进行。那是一个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的王国。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其买者和卖者都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缔结契约，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契约是他们的共同意志在其中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各自进入彼此的关系，正如单纯的商品所有者一样，他们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各自都只支配属于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他们各自都只盯着自己的利益。将他们聚在一起并结成彼此间关系的唯一力量，是利己主义，是各自的所得和私人利益。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要么根据事物预定的和谐，要么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为了共同福祉和共同的利益，共同努力实现互惠互利。³⁹

马克思说，这些概念为“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提供“观点、概念、标准，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在若干方面，这就是我们看着帕克在非洲所到之处试图使之产生的乌托邦。当然，通往乌托邦的障碍不是欧洲的而是非洲的。非洲的贪婪、非洲的土匪行为、非洲的奴隶贸易，到处对互惠的奥秘构成威胁——而且这些方面是帕克唯一不予回报的。他宁愿死也不愿偷。非洲人也能变得那么好吗？帕克通过其反征服，实践了一种价值观，为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非互惠的非交换，即文明使命（the Civilizing Mission），提供了保险。

由于疟疾、黄热病、痢疾的缘故，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尼日尔河探险鼓噪了几下便销声匿迹；直到后来，威廉·贝凯(William Baikie)博士决定测试奎宁治疗那些中断该地区所有扩张梦的致命热病的效果。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尼日尔的努力相当成功。它产生了一种充满活力、广为阅读的探险文学，其中许多是沿着帕克的《非洲内陆旅行记》划定的丰富多彩的线路写下的。结果证明，厄运和受害的感伤情节线索十分适合表现一次又一次尼日尔探险的苦难和失败；孤独的欧洲主人公确实成为能够活着待在这个地区的唯一的人。⁴⁰由于没能沿着先人的路线行进，芒戈·帕克于1806年失去生命。当时他带领一大支高度武装的探险队返回尼日尔，结果遭遇枪击，全军覆没。非洲协会成员减少至十四人，于1831年被吸收进皇家地理学会。

第五章

性爱与废奴

感伤和感性(*sensibilité*)开始在旅行书写中显示其权威,时间大致与科学相同,是从18世纪60年代以降。到1799年芒戈·帕克的《非洲内陆旅行记》面世时,读者已经为接触地带感伤的戏剧场面做好准备,这些场面中许多是废奴运动产生的。性和奴隶制是此类文献的重要主题,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重要主题;这两者在寓言性叙事中总是结伴出现,而这些叙事调用夫妻之爱作为奴役和殖民统治的一种替代,抑或作为这两者新近获得合法化的版本。

如同帕克的叙述一样,感伤旅行书写吸收我一直称之为生存文学的较古老传统——用第一人称讲述有关海难、漂泊、兵变、遗弃、(专门内陆版的)囚禁故事。自15世纪晚期欧洲第一波扩张浪潮开始,这种文学一直流行,并凭借自身力量在18世纪继续繁荣发展,正如它在今天一样。尽管其浅薄的感伤主义受到我在本书中一直讨论的资产阶级权威形式的挑战,但是流行的生存文学受惠于大众印刷文化的发展。海难或囚禁的幸存者可以写出他们的故事,以廉价的单行本或故事集的

方式出售，为重新开始旅行筹措资金。比如，《每月评论》于1759年宣布，有可能发行“做出重大改进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残酷：以彼得·威廉森的生活和种种命运兴衰为例》第四版。读者得到承诺，能在其中读到有关威廉森孩童时代遭到绑架，他作为奴隶、种植园主、印第安人俘虏、志愿兵生活经历的记述，还能读到有关“剥头皮、焚烧以及其他野蛮行径”的记述，而这一切只需要花一个先令。《每月评论》补充说：“我们猜想，一般来说，彼得·威廉森的故事实际上是借某位文坛朋友之手，做了一些可以原谅的润色。这本书的印行，是为了那位不幸作者的利益。”¹

84 生存文学已经逐渐形成的性和奴隶制的主题，在18世纪末十分强烈地吸引感伤派作家的注意力。他们许多人都是俘虏和漂泊者，靠的是做异教徒和不信神者的奴隶才得以生存。（18世纪，欧洲政府依然拥有一——和需要——一种制度，以从北非的阿拉伯人那里赎回被奴役的俘虏。阿拉伯国家当代的绑架人质行为反映了这一传统。）许多人是俘虏（和漂泊者），做了逮捕者的丈夫、妻子或情妇。在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的全部历史中，生存文学为展现跨文化接触的交替、相对化和禁忌结构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语境：被非欧洲人奴役的欧洲人、与非欧洲社会同化的欧洲人、共同创立新型跨种族社会秩序的欧洲人。生存文学的语境对越界性的情节是“安全的”，因为文本的存在本身假定了帝国主义意义上正确的结果：幸存者幸存下来，并寻求重新整合进入国内社会。故事永远是从返回的欧洲人的角度讲述。

感伤突然于18世纪80和90年代自身强化成表征殖民关系和帝国前沿的强有力模式，部分是因为废奴运动的兴起，部分是因为作为一种有利可图印刷产业的旅行文学的兴起。在旅行书写和想象性文献中，帝国的国内主体都发现自己得到召唤，与个体的受害主人公和女主人

公分享新的激情,并通过与他们的移情以一种新的方式认同扩张。²毫不奇怪,这类有移情作用的、主体性的修辞,看来与科学的权威存在矛盾。综述文献充斥着有关启蒙时代如何书写旅行书的讨论,两种主要紧张关系存在于“天真”(流行)与文学写作之间以及信息性和经验性写作之间。有关“修饰润色”与“赤裸裸的真实”之相对价值的文体辩论,常常反映科学之人与感性之人之间,抑或有学问的作家与通俗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赤裸、修饰、穿衣、脱衣这种色情化的语汇,将读者的欲望引入讨论之中。1766年,在感伤激流出现之前,林奈门徒哈塞尔奎斯特(Hasselquist)一本关于中东旅行的书,激发《每月评论》庆祝“科学之人”对“命运之人”的优越性,后者只是“将自己从一个国家运输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镇运输到另一个城镇,而没有思考或改善”。³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语言上的摇摆不定,使得像哈塞尔奎斯特这样的书读起来可信但经常枯燥乏味。这位评论者接着对哈塞尔奎斯特明显缺乏“文学写作的天赋”表示惋惜:

他的言辞被粗枝大叶地记录下来,不怎么注意秩序或规则,表面上就像一本日记,以同样马虎的简装出版,按照原汁原味写成的样子,就连其所涉及的旅行线路都保持不变。——不过赤裸之美也许并不因为缺乏修饰而有损魅力,因为修饰有时只会使试图润色的那些魅力黯然失色。⁴

赤裸之美抑或马虎的简装?读者与文本的关系,用大男子主义和色情化的措辞加以编码,和给欧洲旅行者与其所访问的异国他乡的关系编码的措辞相同。

三十年后,这同一份期刊评论约翰·欧文(John Owen)的《深入欧

洲各地的旅行》时，兴高采烈地报道称：“写作有关旅行的书的方法，近年得到相当大的改进。先前，大多数此类出版物都不过是所发生事件的日记，充斥着单调乏味、无关紧要的细节，很少有充满智慧的言辞使之获得生气，也没有用优雅的文体加以修饰润色。”然而，现在人们发现“许多作品，由于其写作的方式独立于其包含的内容，有可能被学者和有品位之人愉快地细读”。变化发生在快乐的方向上。对于这位18世纪90年代的评价者来说，欧文先生的记述可能的缺点不在于缺乏修饰润色，而在于缺乏性和感情色彩，因为欧文是一位新教牧师。在一句也许旨在警告和免除疑虑的话中，这位评论者发现，“尽管作家在感性色彩和语言上都一致地保留牧师角色的礼节，但是他的作品包含很多有趣的事情，以至于不存在因枯燥无味或无聊招致责备的危险”。⁵

修饰润色并非总是那么受欢迎，感情色彩也是如此。18世纪70年代，约翰·霍克斯沃思(John Hawkesworth)被指定编辑有关库克第一次远征的记述。他自作主张将这些记述混合成一种第一人称的记述，充满他自己的修饰润色，从而在英国引起喧闹的争议。他表示，如果要求他只是“以几个指挥官的名义”写，“我可以只呈现一个赤裸的叙事，没有任何我自己的观点或感情色彩”。⁶围绕霍克斯沃思的介入展开的争议，不仅与修饰润色有关，而且与编辑和代笔作家有关。旅行文学在18世纪，并没免受写作职业化的影响。既然写作已经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旅行者作家及其出版商越来越依赖职业作家和编辑，以确保创造出更具竞争性的作品。他们往往将手稿完全加以改造，通常是沿着长篇小说的方向。有关修饰润色、魅力、赤裸事实之类的争论，常常是关于这些人物的作用以及涉及为钱写作的种种妥协的争论。《每月评论》发现，1771年出版的一个生存故事《皮埃尔·维奥先生遭遇的海难和历险》“很受修饰润色的伤害”，比如作者“在北美森林遇见

老虎和狮子”之类难以置信的情节。然而，维奥先生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被“斯韦特纳姆海军上尉签发的……对其评估的证书”所拯救。⁷

没有任何一位修饰润色者比弗朗索瓦·勒瓦扬(François Le Vaillant)更激怒科学机构，他是上一章讨论的于18世纪末开始的南部非洲内陆探索潮中那些博物学家中的一员。如前所述，关于开普殖民地的文献，在形成欧洲科学旅行和旅行书写范式方面富有影响力。勒瓦扬过去是，而且今天依然是这些文献客观性方面的一个不受欢迎之人。作为一个专业博物学家，他参加过拓殖南非的努力，并于1781至1785年间追寻安德斯·斯帕尔曼等人的足迹。他逐渐形成巨大的标本收藏，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间，他努力将这些标本卖给不同欧洲国家的政府。但是在他1790年面世的两卷本《非洲内陆旅行记》(另有三卷随后于1796年出版)中，他表现为科学和信息事业模棱两可的支持者。尽管勒瓦扬的旅行书包含丰富的植物学、动物学、人种志信息，但是渗透着卢梭式的感性。勒瓦扬像他肯定影响的芒戈·帕克一样，围绕着他自己是主人公的人类戏剧，创作了一种明显实验性、自恋的叙事。在下面这个描写营地酗酒之夜的选段中，这种模式很容易识别：

我们立即离开树林，试着在更高的开阔地安营扎寨。我极其悲苦地说，我们没有可能离开被困的那个地方。早先看起来那么欢快可爱的溪流，已经变成狂怒的激流，卷走了泥沙、树木、成群的岩石；我觉得除非冒最大的险，我们不可能跨过激流。在另外一处，我的牛又冷又疲倦，已经抛弃我的营地。我不知道从何处或者如何派什么人将它们找回来，我的处境当然一点儿都不好玩；我经历了巨大的不幸。我的那些可怜的霍屯督人又累又病，他们已经开始私下抱怨。⁸

从开始到结束，勒瓦扬像帕克一样，完全就是他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在这里，一部势不可当的人类戏剧，在一个受好客和战争主宰的非资本主义世界演出，其中心轴也是互惠和交换。一种相对主义、平等主义的精神得到坚持；卢梭式的高贵野性和感性大量存在。其中至少有些是由勒瓦扬的编辑助理添加进来的，他是一个年轻人，名字足够浪漫地叫作卡西米尔·瓦龙(Casimir Varon)。⁹

勒瓦扬的叙事不可避免地风靡是因为一场戏剧，它在所有南非文献中闻所未闻：他本人与一位名叫纳丽娜的年轻高纳夸(科伊)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在有关勒瓦扬访问高纳夸人的几章中，这种关系是叙述的焦点。芒戈·帕克描述自己并非自愿地做了非洲女人的色情对象，而勒瓦扬则成了一位追求其欲望对象的神魂颠倒的求婚者。当他藏在灌木丛中观看纳丽娜及其同伴在河中沐浴并偷走她们的衣服时，发现者变成了偷窥狂。¹⁰这部色情戏剧在各方面都被呈现得简单且愉快，没有人伤心欲绝。这段情节大大有助于勒瓦扬的书在欧洲读者当中引起轰动，在当时跨种族爱情也正在成为虚构作品的一个主题。¹¹

正如为其1932年版撰写“序言”的人指出的那样，勒瓦扬的记述既被广泛阅读，又遭到“猛烈攻击”。在其《非洲内陆旅行记》1789年的法语版之后，1790年出了三个英语版和一个德语版，接着是1791年的荷兰语版，而全五卷的意大利语版则面世于1816至1817年。这些都证明人们对这部作品持久不衰的兴趣，尽管也有对其文体和不可靠性的无情批评。对于其同时代的客观主义者，比如约翰·巴罗来说，勒瓦扬的戏剧性、自恋和色情，如同其不准确之处一样令人不悦。当今的评论者倾向于赞同这样做。¹²

勒瓦扬普遍被当作法国作家，不过恰当地说，他实际上是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白肤色克里奥尔人，是接触地带的产物。他出生在苏里

南的一个种植园，是来自梅斯的一名法国领事与其法国妻子的儿子。勒瓦扬十岁左右时，全家移居法国。他作为一名博物学家的强烈职业意识和超前专门知识，正是在种植园的孩提时代获得的。的确，他的殖民生活经验和荷兰语知识，有助于官方认可其南非旅行。纳丽娜的故事利用了勒瓦扬在加勒比地区确实目睹过的跨种族社会和性制度（比如“苏里南婚姻”——见下文），以及长期在场于欧洲人的美洲想象中的一种色情戏剧。勒瓦扬的多种族殖民社会经验，确实既塑造了他与南部非洲人的关系，也塑造了他在《非洲内陆旅行记》中对这些人的描写，但是无法系统地评估这种影响的程度。至于来自美洲、非洲或亚洲的克里奥尔人，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参与那些产生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信条的对话，存在许多有待认识之处；这些对话不只是在18世纪，而且从产生这些对话的欧洲殖民主义之始就有。总的来说，将欧洲文化看作从自生的（self-generating）中心向殖民地边缘扩散的帝国倾向，模糊了人和观念在另一方向的不断运动，特别是在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见下面第六、八章）。¹³

从纳丽娜到乔安娜

并非巧合的是，勒瓦扬的出生地苏里南是一本旅行书的背景，这本书几年后引人注目地使得接触地带的色情化愈演愈烈。没有多少旅行记述，曾比约翰·斯特德曼《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得到更热情的国际认可（和推广）。这本书1796年问世后吸引整个欧洲的想象力长达三十年之久。¹⁴

斯特德曼的《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以奢华的两卷本出版，有八十幅版画插图，其中包括出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十六幅,其生动、散乱的纲要将18世纪欧洲帝国前沿编码的全部保留剧目编织起来:人种志、博物学、军事回忆、狩猎故事、公民描述、生存故事、反奴隶制批判、跨种族爱情。这样的结合,使得他的书成为“曾经写过的有关18世纪种植园社会生活最细致的‘外来者’描述之一”。¹⁵复调看来是故意而为的。斯特德曼认为,他的书“也许是曾经向公众提供的最非凡的作品之一”。他在“前言”中将这本书描述成被安排得“有几分像一个大花园,在那里人们与芳香的花儿和荆棘、金光闪闪的苍蝇、令人厌恶的爬行动物相遇”,希望整个花园将会“如此杂色斑驳以至于提供……信息和娱乐”。¹⁶该书初次出版之后的四十年里,被翻译成德语(1797)、法语(1798)、荷兰语(1799)、瑞典语(1800)、意大利语(1818);其爱情情节被作为戏剧、诗歌、短篇故事、长篇小说反复上演。

约翰·斯特德曼是苏格兰人,他继承父亲的任命在荷兰军队的苏格兰旅做军官。¹⁷他出生于1744年,似乎十分认真地接受了新兴的现代个人主义。他努力工作将自己塑造成一种绅士流氓(*gentleman Dicaro*);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以罗德里克·兰登、汤姆·琼斯、班菲尔德·穆尔·卡鲁为模型塑造的自己,最后一位是逃跑并加入吉卜赛人的英国男孩。作为作家,他的偶像是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极其令他懊恼并激烈反对的是,斯特恩书中的人物被从手稿编辑删除,而某些感伤则是编辑进去的。)

1773年,斯特德曼作为一次军事远征的志愿者去了苏里南,那次远征是对殖民开发制度中的一场危机做出的回应。由于好几个原因,包括区域地理在内,苏里南的奴隶有可能大批逃进茂密的森林,而要在森林里再将他们抓捕则十分困难。到18世纪中叶,两个成熟的逃亡黑奴社会,萨拉马卡人和德朱卡人,已经在内陆形成,并展开与种植园主的持久恐怖战争。由于不能打败逃亡黑奴社会,种植园主被迫在18世纪

60年代与他们签订和平条约,包括保证他们的独立以换取他们不会帮助更多人逃跑的承诺。对于种植园主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签订条约的消息使得叛逃奴隶人数以天文数字增加。几年之内,由于不能维持所需的奴隶劳动力,苏里南的整个种植园经济都岌岌可危。1773年,荷兰政府出手相助,派出斯特德曼参加的远征军击败逃亡黑奴群体,重将他们变为奴隶。军事行动于1778年结束,反叛的逃亡黑奴逃往法属圭亚那。这是一次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胜利,重新沦为奴隶者为数寥寥,而欧洲军队则表现出其在丛林战中的无能为力。战争中,欧洲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大多是死于疾病。逃亡黑奴社群的后代,依然被人称作萨拉马卡人,现在仍生活在那个地区,保持着他们18世纪形成的独特的非裔美洲文化。 89

斯特德曼有关其在苏里南岁月的记述,大多致力于生动讲述杂乱无章、装备不良的丛林战。结果证明,这场战争在对付逃亡黑奴方面完全无效,反倒是极其有效地使欧洲士兵暴露于热带疾病的侵害之下。斯特德曼用悲哀的笔调详细讲述他们的悲惨境遇,用细致但绝非技术性的动植物群描述点缀苦难,这些描述常常是关于狩猎偷袭或准备食物的场景。因此,斯特德曼正是通过军事行动,将他自己与内陆旅行的新时代联系在一起。他在“引言”中说,尽管苏里南长期以“欧洲人在其海岸附近栖息和耕作”而著名,自然障碍却使得内陆探险不可能进行下去。不过,一场军事行动的必要性“迫使我对其[它]进行观察”。¹⁸

在针对逃亡黑奴的远征间歇期间,斯特德曼生活在荷兰殖民社会的核心,用戏剧性且往往坦率的细节描述其运作方式。他轻蔑地描述荷兰种植园主的懒惰、嗜虐、饮食过量,与巴罗对南非白人最差的描述完全吻合。很难说他书的哪方面在欧洲引起更大的轰动:对荷兰人残

酷对待其奴隶的惊人谴责和可怕图解，抑或他与穆拉托人女奴乔安娜理想化的浪漫传奇和婚姻。废奴运动大量利用刻画奴隶制之恐怖的戏剧性版画（特别是布莱克所作的）；而这个爱情故事生成了浪漫文学的后代，包括弗朗茨·克拉特（Franz Kratter）的一部题为《苏里南的奴隶》（1804）的德语戏剧、1824年在伦敦发表的一个短篇故事《乔安娜或那个女奴》、欧仁·休（Eugène Sue）的长篇小说《埃居尔·阿尔迪历险记》（巴黎，1840），以及赫尔曼·J·德·里德（Herman J. de Ridder）的《杀戮场上的生活》（1857）和约翰·埃德温·霍克斯塔姆（Johan Edwin Hokstam）的《博尼》（1983）两部荷兰语长篇小说。¹⁹我建议在此考察斯特德曼的爱情情节，作为对种植园社会面临严重危机时殖民关系的再审视。

正如斯特德曼讲述的那样，他在抵达苏里南后不久，在一个殖民者家里遇见十五岁的乔安娜。当时她在那里做家奴，是全家人都喜欢的人。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和魅力弄得神魂颠倒，而这种美貌和魅力又得到一种相对裸露状态的修饰润色。人们也许觉得，有关她身世的解释，几乎和有关殖民地错综复杂的性和种族的解释一样，是一个寓言。乔安娜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绅士”和一名女奴的女儿，她和他生了五个孩子。那绅士不是他的情妇的主人，他曾尝试购买其孩子的解放，但遭到他们主人的拒绝并伤心而死。然后心胸狭窄（且无绅士风度）的奴隶主自己破产了，“因为他不公正且苛刻地将他所有最好的黑人木匠赶进了森林”。他逃到荷兰，留下妻子因其债务而被逮捕。这位女士现在住在斯特德曼遇见乔安娜的那个人家里，由乔安娜照料。乔安娜自己的命运依然不确定，因为她是最终将被清算用以偿付那位奴隶主债务的资产之一。有一天，斯特德曼听说这件丑恶的事确实就要发生，便焦急不安、发疯地跑到乔安娜身边：“我发现她浸透在泪水中。——她给我这



图15:《一个手拿武器正在站岗的反叛的黑人》,选自约翰·斯特德曼,《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1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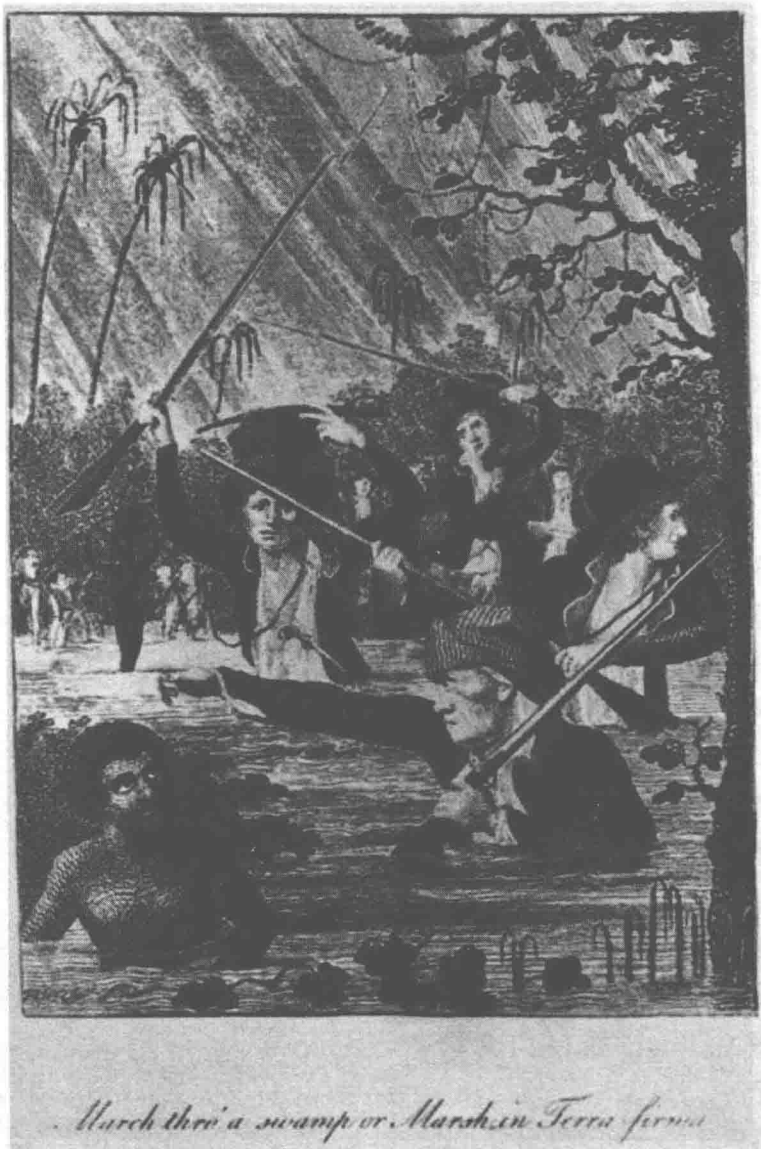


图16:《行军过沼泽》,选自斯特德曼,《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1796)。

样一副样子——啊！这样一副样子！——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心做她的保护人，使她免受任何侮辱。”²⁰

斯特德曼立即做出“奇怪的决定”，他要买下乔安娜，让她接受教育，并与她一起返回英国。乔安娜拒绝他的建议，并具有说服力地陈述原因：她正处于奴役状态，“如果我[斯特德曼]很快返回欧洲，她要么必须永远与我分离，要么得陪我到世界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她的低劣身份必定极大地成为她自己以及她恩人的不利条件，因此无论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很悲惨”。²¹斯特德曼病倒了；当乔安娜和妹妹来看他时，她的保留意见却不可思议地有了转机。她不同意去英国或接受教育，但是暂时地“匍匐在他的脚前”，“直到命运把我们分开”或者她的举止使他不快为止。斯特德曼康复了，他们结婚并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婚礼上我像任何新郎一样幸福”。²²

这对夫妻一起的生活，包括在一个（奴隶们给他们造的）乡村农舍伊甸园般的插曲，一个被命名为约翰尼的儿子诞生。他们间或会因斯特德曼返回丛林，抑或乔安娜返回种植园而分离，不能生活在一起。当斯特德曼的军团被召回欧洲时，他再一次强求乔安娜与其同行，而她再一次拒绝。斯特德曼独自离开，许诺要寄钱来。五年后，他在英国与别人结婚时，得到乔安娜的死讯，显然是嫉妒她幸福和声望的人将她毒死的。他们的儿子带着母亲积攒的两百英镑到了英国，后来当上年轻的水手，结果死于海上。斯特德曼在书的结尾写了一首挽歌，与读者挥泪作别，希望读者能够“带着同情的感性细读这个叙事”。²³

像这个时代小说中的许多跨种族风流韵事一样，斯特德曼与乔安娜的婚姻，是对一种特殊形式的殖民主义性剥削的浪漫主义改造；根据这种形式，派往殖民地的欧洲男人从当地家庭购买女人，作为他们逗留期间的性伴侣和家庭伴侣。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也许还有其他地方，

93 此类安排可以借助举行正式仪式的假结婚得到官方认可，这种婚姻有时需要领事（如勒瓦扬的父亲这种人）的允许。比如，1782年，丹麦旅行者保罗·伊泽特详细描写圭亚那海岸的制度，指出这种纳妾制被认为是欧洲人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因为女人知道如何制作当地食物和药物，能够在欧洲人生病时照料他们。²⁴感伤旅行书写将这一作用加以转变，形成以“体贴的本地人”闻名的慈善女性形象；她出于同情、自发的仁慈抑或性激情，照顾受苦受难的欧洲人。她是这种感伤版反征服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和萨莉·普赖斯(Sally Price)讨论过斯特德曼的日记。在其日记中，斯特德曼实际上就是将他与乔安娜的伴侣关系当作一种正式的纳妾制关系。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斯特德曼从她家人那里得到她，并使之成为他在苏里南抛弃的许多性伙伴中的一员。这种安排的踪迹依然保留在这本书的浪漫传奇化版本中，大多是经由或通过乔安娜而非斯特德曼表达的。比如，她“在其妹妹陪伴下”意外出现在他的住处，而在斯特德曼日记中记录的则是现实中的谈判会议。²⁵在发表的旅行记述中，纳妾制似乎首先是通过乔安娜对它的意识以及系统抵制明确表达的。例如，从一开始，乔安娜就反对这种婚姻，不管斯特德曼说什么，她都清楚表明自己知道这种安排是临时的。虽然斯特德曼并没有提到购买乔安娜的服务，而是讲述用二十个几尼给她买礼物的事——但是他们订婚的第二天，她就归还礼物并且把钱交给他，强调自己奴隶和妻子身份的现实。他的爱和善待是她想要的一切，她对他说。在面临以斯特德曼妻子的身份前往英国的选择时，乔安娜拒绝了。她说出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斯特德曼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建议非人道的一面。以下是斯特德曼对她(假定的)原话的转述(我加的黑体)：

想不到，虽然命中注定的分离显得令人恐怖，或许再也不能相见，可是她却宁愿留在苏里南：首先是出于一种意识，按照礼节，她没有权利支配自己[她仍然是奴隶]；其次是出于自尊，在她目前条件下，宁愿在美洲做她那个阶级的一位顶尖人物，也不愿在欧洲成为我的影子或负担，因为她坚信情况必将如此，除非我们的处境将会变得更为独立。²⁶

正如彼得·休姆如此敏锐讨论的那样，18世纪晚期叙事中大量出现的跨种族爱情故事，在许多方面是由经典扩张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塑造的，尤其是《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例如，狄多和埃涅阿斯的故事，就是体贴的本地人与困难重重的旅行者结成夫妻，并始爱终离模式的先例。²⁷与此同时，这些情节对18世纪晚期欧洲帝国主义的危机做出回应。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在新前线被热带疾病和当地的抵抗所困扰，在老前线则受到独立运动、废奴主义、奴隶制利润下降，以及空前规模和效力的土著人和奴隶反叛的挑战。例如，斯特德曼的叙述在1791年 94 圣多明各奴隶暴动的直接语境下被解读，这场暴动是一个血腥、令人恐怖的事件，其成功几乎一手造成废奴运动数年的瘫痪。废奴主义和美国独立战争引发的合法化危机，需要对奴隶制和军事征服以外的世界进行想象。人们很容易将跨种族恋爱情节视为想象之物；在这些想象中，欧洲人的霸权得到情感和社会纽带的保证，性取代奴隶制成为他者被视为从属于白肤色男人的方式，浪漫爱情而非孝顺的奴役或力量，为被殖民者有意的屈服提供保证。乔安娜和斯特德曼是星期五和克鲁索想象的替代者。在这种转换中，殖民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消失了，也就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就像星期五们一样，乔安娜们是财产，可是她们不是因为其劳动力而被拥有。浪漫爱情的寓言将剥削神秘化到让人茫然

无知的地步。

如果跨种族恋爱情节，借用休姆精心挑选的字眼，“通过浪漫传奇”明确表达“文化和谐的理想”²⁸，那么使得这种理想成为一种理想的还是互惠的奥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浪漫爱情就像资本主义商业，自认为是互惠的。互惠，即匹配的个体之间彼此得到回报的爱情，是其理想的状态。互惠抑或双方之间对等关系的失败，是其主要的悲剧和丑闻。芒戈·帕克的旅行在交换的戏剧中付诸行动，斯特德曼与乔安娜的浪漫传奇也是如此。这些情侣的对话常常包括用什么作为对什么的回报等真诚交换。乔安娜送给斯特德曼一篮水果，帮助他从他在得知其境况后陷入的“精神压抑”中恢复。他后来辩称，那种姿态让他一辈子都欠她的，使得他欠她的债，成为他要她的基础。芒戈·帕克的礼物交换，是对商业抱负的一种意识形态概括，而他正是以其名义旅行的；同样，斯特德曼与乔安娜互惠的浪漫传奇，在一个平等主义价值观的时代，概括了在美洲的白人抱负。尽管这对情侣挑战殖民地等级秩序，但最终他们还是默认了这些等级。互惠是不相干的。

这就是要从殖民地爱情故事中汲取的教训；在这些故事收场时，“通过浪漫传奇达到文化和谐”总会破灭。无论爱情最终得到回报与否，无论被殖民的情人是女性还是男性，结局似乎大致相同：情侣分离，欧洲人被欧洲重新吸收，非欧洲人则英年早逝。譬如，乔安娜与斯特德曼的命运，与故事在18世纪晚期取得神话地位的另外一对著名情侣，尹克尔与雅丽可的命运只略有不同。根据这个流行的可能是杜撰的故事，美洲印第安女人雅丽可在海滩上发现遭遇海难的英国水手尹克尔，她照料他起死回生并爱上他。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尹克尔在身体复原的同时也恢复了对利润的贪婪，将她又卖给奴隶主。在一个更耸人听闻的版本中，雅丽可试图改变情人的主意，对他说她怀了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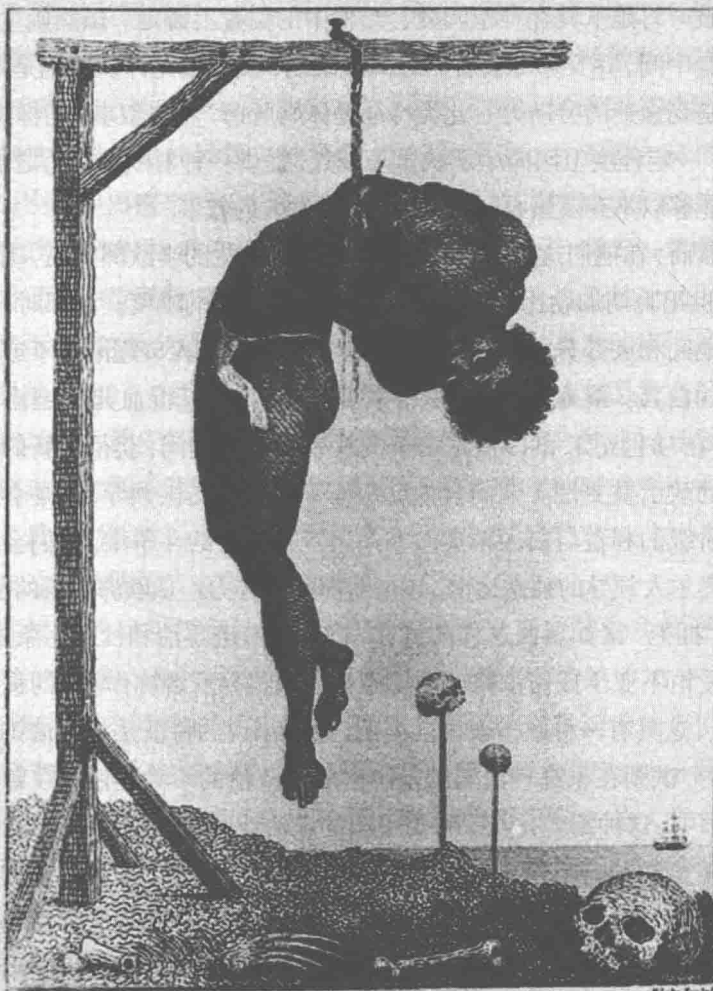
孩子。尹克尔的反应却是提高卖她的价格。²⁹

斯特德曼在书中直接提及尹克尔与雅丽可的故事,列举出其与自己故事(实在太)显著的差别。尹克尔与雅丽可的故事,将资本主义贪婪导致的互惠性的失败变成主题,强调浪漫爱情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难怪这故事令人难以忘怀。尽管如同所有这些故事一样,这个故事被吸收进废奴主义的宣传,但是它不出意料地清楚表达了作为奴隶制基础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价值观。可是,虽然斯特德曼是尹克尔的对立面(他回报乔安娜的爱并且不想抛弃她),而乔安娜是雅丽可的对立面(她拒绝追寻其情人的足迹),但是两个故事里的底线相同。乔安娜和雅丽可的结局都是失去丈夫并在殖民地遭到奴役,而尹克尔和斯特德曼最后都返回了英国。不管怎样,对“通过浪漫传奇达到文化和谐”的幻想并没有实现;一种融合的后殖民社会的寓言本身根本没有完成。对于支持或反对奴隶制的事业,这种寓言并没有起作用。乔安娜不是被嫉妒她的邻居,而是被文类下了毒。

正如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欧洲感伤文学中被殖民的男女主人公,很少是“纯粹的”非白人或“真正的”奴隶。像乔安娜一样,这些男女主人公是典型的穆拉托混血儿或梅斯蒂索混血儿,他们已经拥有欧洲亲缘关系,或者用一种较老的说法,他们“实际上”是王子或公主。³⁰非欧洲爱情对象的传统面部素描,将她或他与刻板的奴隶和野人画像区分开来。譬如,乔安娜有着“自然能够展示出的最优雅的身材……尽管她肤色黝黑,可是长着透出美丽的朱砂色调的脸颊……她的鼻子形状完美、纤小;她的嘴唇有些突出”,凡此等等。³¹尽管这些跨种族爱情故事普遍被解读为废奴主义的,但是它们通常抵消奴隶制的具体维度。爱情关系在某个边缘抑或特许的空间展开,在这里劳动力和财产的关系被束之高阁。海难常常会提供这样的空间。在乔安娜的例子中,她主



图 17:《乔安娜》,选自斯特德曼,《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1796)。



A Negro hung alive by the Ribs to a Gallows

图18:《肋骨部位吊在绞刑架上的黑人》,选自斯特德曼,《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1796)。

人的破产将她从其在种植园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上挪走。虽然她生活在奴隶制中间，乔安娜却被看作远离奴隶制；读者被允许认为她是财产，而不是受强迫的劳动力。此类特征是休姆所谓“特许叙事”的标志，意思是“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承认土著观点，提供一种对欧洲行为之批判，但只能够以不涉及核心问题的方式这样做”的叙事。³²

然而，在他们这种不真实之中，这些理想化的半欧洲属民，确实体现18世纪晚期加勒比社会的另外一种完全真实的维度。到那时，在加勒比地区和大部分西班牙语美洲，非奴役混血儿人口逐渐等于或超过那里的白人。混血群体（梅斯蒂索混血儿、穆拉托混血儿、“自由有色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洲反殖民起义期间，获得了新的引人注目的政治重要性。他们会为反叛的下层阶级提供领导，还是会追随自己阶级的利益与白人精英站在一边？在独立的斗争中，他们会支持克里奥尔人领导的独立运动，还是欧洲殖民势力？从欧洲霸权的角度，对于“拥抱”诸如属民这样的群体，将他们带进政治和社会想象来说，浪漫爱情不亚于任何策略。斯特德曼习惯将乔安娜称作“我的穆拉托女人”，这具有一种政治效用。当然，感伤小说的特征是将政治铸造成色情的，试图在家庭和繁殖的范围内解决政治的不确定性。在斯特德曼的书中，这种寓言化与一种更平实的政治戏剧形成对比：他与“他的穆拉托女人”的和谐插曲，与深入内陆打击黑人反叛的军事攻击交替出现；前者产生一个儿子，后者则导致欧洲士兵的死亡。尽管存在废奴主义的解读，在斯特德曼的叙事中，社会和谐依然与奴隶制结盟，而解放则与致命的战争携手。

斯特德曼记述中的新元素，是乔安娜拒不接受欧洲文化和进行同化的邀请。与其著名的先行者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甚或其同时代人菲莉丝·惠特利(Phyllis Wheatley)不同，乔安娜不想接受学校教育、

穿鞋子、觐见英国国王。根据斯特德曼描述她品质的生动文字，她宁愿留在美洲做她自己阶层中的顶尖人物，也不愿意在欧洲做斯特德曼的“影子或负担”。如果读作政治寓言，这些话暗指18世纪90年代欧洲人越来越被要求想象的另外一种景象，美洲的独立。乔安娜在其与斯特德曼告别时提出这个词语：假如她与他更为独立，她说，他们的关系也许会奏效。就这样，乔安娜和她四分之一混血的儿子，带着一笔收入和他们自己的一位黑奴，留下来漂白这个种族，开创一个新的后殖民精英时代。不过，这景象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自治的：美洲的家依然是斯特德曼的属地，一个没有他而不完整的家庭，这个家忠诚且没有反叛的方法或动机。乔安娜之被毒死，是处理这种幻想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施毒常常与非裔加勒比宗教相联系，是加勒比地区奴隶用来消灭其主人最戏剧性的工具之一。看起来，一如在战争情节中一样，非裔的美洲在这种爱情情节中有最终的发言权。

苏里南的反叛奴隶社群，有他们自己关于斯特德曼所描述的抵抗斗争的记述。在《初次：非裔美洲人的历史想象》这本书中，理查德·普赖斯将苏里南内部逃亡黑人奴隶社群的当代后裔向他提供的口头故事和历史收集在一起。³³ 这些故事和历史许多回溯到18世纪70和80年代的戏剧性事件。萨拉马卡人的这种证词，被一位人类学家转换成印刷文字，进入也是在斯特德曼有生之年开始形成的一种话语空间。随着第一批前奴隶通过废奴运动开启的一扇门进入欧洲印刷文化圈，18世纪最后几十年标志着非裔美洲文学的开始。进入的方式主要是自传。第一批奴隶自传是自我描述，其出版常得到持不同政见的西方知识分子的促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描述的结构与西方文学机构以及西方的文化和自我理念一致，但是直接对立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首先将非洲人排除在西方文化和自

我理念之外)。斯特德曼高度意识到这种新兴文学。他提到伊格内修斯·桑乔的书信和菲莉丝·惠特利的诗歌。在他写自己的书期间,大量欧洲人正在阅读《奥拉达·艾奎亚诺生活趣事》(1789),到1794年,这本书出了第八个英语版本。这些早期文本以十分详尽的方式承诺不再复制,而是参与西方有关身份、社群自我、他者性的话语。他们的动力是跨文化的,以从属与抵抗的关系为先决条件。我将表明,这些动力在当代自传以及诸如口头历史、证词、本土艺术这些相关形式中继续。这就是我说的,普赖斯搜集的萨拉马卡故事进入了始于斯特德曼时代的印刷圈。正如我上文表明的那样,当这种“自传式人种志的”文本,被简单地读作“真实的”自我表达或者“不真实的”同化时,它们的跨文化特征便遭到忘却,而且它们与西方表征模式的对话性接触也输掉了。

感情与女性旅行者

我在讨论戈丹夫人的故事时(参见第二章)提出,女主人公在接触地带出现,倾向于产生反讽性的逆转。恰逢戈丹夫人的故事在欧洲传播之时,一个英国女性安娜·玛丽亚·福尔肯布里奇(Anna Maria Falconbridge)正在撰写一本有关非洲的旅行书,这本书将会让感伤传统以及其与废奴主义的联系颠倒过来。这本书的标题为《关于两次塞拉利昂河之旅的叙事》(1802),是1850年以前出自女性之手的为数不多关于非洲的欧洲旅行书之一,而且是在任何时期都最不同寻常的一本。在这种开始谴责废奴主义改良家的虚伪和无知的叙事中,性别、婚姻、男性支配权是显著的主题。感伤和人道主义被引入反一反奴隶制的事业。

1791年，福尔肯布里奇作为内科医师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Alexander Falconbridge)勋爵的年轻妻子来到西非。这位医师在奴隶船上工作多年之后，成为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他曾为废奴主义文学宝库贡献《非洲海岸奴隶贸易记述》(1788)，为被奴役的非洲人和受雇于船上的欧洲人生动记录奴隶贸易的种种令人恐怖之事。辞去“非洲贸易”的工作后，福尔肯布里奇加入塞拉利昂公司。该公司是在塞拉利昂为从北美运输来的前奴隶(“穷黑人”)建立殖民地的废奴主义企业。在其新妻子安娜·玛丽亚陪同下，他于1791年被公司派去帮助据说正处于严重危难之中的一个海岸定居点。在第二次航行时，福尔肯布里奇的丈夫执行一次商业任务，但失败了。正如福尔肯布里奇所言，他因饮酒和沮丧死于非洲，将她留在那里独自开始新的生活。

如同帕克、斯特德曼以及其他感伤主义的同代人一样，福尔肯布里奇有关其两次非洲之行的书信体记述，吸收了较古老的生存叙事传统，常采取考验和磨难叙事的形式。除塞拉利昂殖民主义者的不幸之外，福尔肯布里奇还详述她自己的苦难。例如，在到达非洲没多久，她就发现自己成了囚徒、奴隶。然而，她的捕获者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的丈夫；他不让她上岸与富有的欧洲奴隶贩子交往，残酷地将她禁闭在载着他们来到那里的狭窄、肮脏的船上。在描写她的住处时，福尔肯布里奇确实想要再现对奴隶船的废奴主义描述(比如她自己丈夫写的那些)：

想象你自己被幽禁在一个漂浮的笼子里，既没有走动、直立的空间，甚至也没有空间挺直身子躺着；暴露在严酷的气候下，眼睛和耳朵时刻受到猥亵行为和恐怖到无法讲述的语言的冒犯——再加上乱糟糟的污物，从上面发出的臭气不断攻击你的鼻子，然后你将会对麦鸡艇有一个模糊的概念。³⁴

当福尔肯布里奇确实让自己获得自由到了岸上，她就像任何一位欧洲旅行者一样，开始观察并有了种种发现。然而，与反征服的修辞形成对比，她所见到的景象既不受欢迎亦不是天真的。例如，她去当地奴隶贩子家里吃饭，并“身不由己地漫步”到窗前，“对我将见的一切丝毫深信不疑”。她审视奴隶的院子：

知道我的惊愕和感受如何再做判断，因为我看见两百到三百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被绳索捆绑，分别围成圆圈，只能靠放在每个圆圈中央的一水槽饭，满足天性的渴望。

这一场景产生的内疚转移到她自己身上：

令人不悦的怯懦让我内心受到谴责，脸色发红，因为我未能迅速将目光从如此令人恶心的场景移开；不过，无论是受到女性好奇心抑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吸引，有好几分钟，我都没能让自己回过神来……确信从房子的这一边，我从此再不会见到这样的景象。³⁵

“景象”这个术语反讽性地让人回想起浏览风景并梦想着风景之转换的霸权主义欧洲主体。正如那个人格面具是男性的一样，福尔肯布里奇也将她之所见和欲望视为与其性别（“怯懦”、“女性的好奇心”）是一致的。

关于发现的客观主义修辞的权威是独白的和自足的；相形之下，福尔肯布里奇却是决然对话性的，是寻找而非挑战地方知识。她随后的种种发现，远非归属于欧洲设计的辉煌，而是产生了一种对她丈夫、废奴主义者、塞拉利昂公司以及英国政府的激烈批评。她的凝视揭示的，

不是反征服的乌托邦,而是剥削和忽视的反乌托邦;其之所以更令人不安,是因为它们是人道主义带来的结果。他们要去解救的那个危难定居点,是一个两个人种的社区,包括来自新斯科舍的获释奴隶和从英国运来的女人。福尔肯布里奇夹在这些人中间到达,再一次对她希望永远不要让她知道的一切进行了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苦难,而且请上帝允许我再也不要见证我被迫在此旁观的这么多苦难。”³⁶与关于发现的男性修辞形成对比,观看有违属于她性别的行为规范。劳动的分工十分刻板:男性旅行者注定受好奇心驱使,这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提供合法化依据;在福尔肯布里奇那里,标示为女性的好奇心(欲望)则需要加以控制。她声称不情愿获取知识,这似乎与占有形成对照,是对统治权的拒绝。这是另外一种反征服。

梦想幻灭的殖民主义者一贫如洗,他们报告说,他们移居国外的基础是公司没有兑现的一千个许诺。与当地居民的争执,使得殖民者不可能在他们能养活自己的土地上定居。福尔肯布里奇报道称:“我很惊讶,我们自吹自擂的慈善家、公司主管们,居然会让自己因为拿如此数目同伴的生命开玩笑,而受制于他们必须应付的责难;我指的是在房屋、建房材料或其他便利设施做好准备接待他们之前,同时向这里派那么多人。”³⁷她尤其因这群人中七名英国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痛苦。她报告说,在与她们交谈时,这些女性对她说,她们根本就不是自愿的殖民者,而是伦敦的妓女,她们遭到围捕并用药麻醉,“被诱骗到船上,与以前从未见过的黑人结婚”,然后被打发到非洲过一种新的生活。福尔肯布里奇的回应,是由天真无辜的怀疑修辞构成的一种抗议。“天啊!”她说,

这个故事的关系令我不寒而栗……我完全不能使自己相信

它；因为几乎不可能的是，在这个进步和启蒙的时代，如此受到世人嫉妒和钦佩的英国政府，居然能实施或支持对人类自由的这种哥特式的冒犯。³⁸

102

自由、启蒙、进步、世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官方语汇，被以讽刺的方式召唤而来进行解释。福尔肯布里奇的怀疑修辞，就像她声称不观看的欲望一样，是对欧洲主导话语权威的嘲弄；这些话语宣称希望观看并希望了解，但是只观看其想观看之物，了解其想了解之物。

与此同时，就性别系统而论，福尔肯布里奇的修辞与其说是关于发现和占有的男性修辞，不如说是男性修辞准确的补充，准确实现与其共享基础的男性价值另外（他者）的一面。如同关于发现的男性修辞一样，福尔肯布里奇对知识的女性拒绝，根植于反征服中有关欧洲特权和无法解释性的种种假定。她的语言与帕克、巴罗或斯特德曼有着相同的对天真的需求，尽管这种需求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得到满足：福尔肯布里奇索取一种其性别已经给予她的天真。她记述中非同寻常的是，她用那种给予作为一个出发点，对另一种版本的反征服，发动一次目标明确的攻击。

在与感伤传统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福尔肯布里奇叙事中的政治性，在性爱和家庭领域消耗殆尽。尽管婚姻与奴隶制在斯特德曼和乔安娜的故事里产生分歧，可是在福尔肯布里奇的叙事中，这两者却合二为一；对英国妓女和她自己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她将自己丈夫的早逝，描写成全然是受欢迎的，承认长期以来他的虐待已迫使她放弃“我曾经对他的每一点感情或尊重”。³⁹她很快便在殖民地找到一个新配偶。18世纪晚期女性主义的回声，就这样悖论性地在了一本赞成奴隶制的宣传手册的语境下进入接触地带！在其结束的书页中，福尔肯布里奇宣布，

由于已经“掌握足够的信息以形成关于这个话题的独立思维”，她现在认为奴隶制“既不违背道德亦不违背宗教”⁴⁰。

在非洲旅行书写的记录中，安娜·玛丽亚·福尔肯布里奇比人们可能期望的更加独一无二。作为一位旅行者兼旅行作家，她与我在第七章讨论的19世纪20至40年代的“女性社会探索者”存在接触点。可是，尽管帕克、斯特德曼以及其他感伤主义者拥有许多仰慕者和门徒，似乎并没有人追寻福尔肯布里奇的足迹。尽管女性作家获得“授权”生产小说，但她们对旅行书写的接触似乎比她们对旅行本身的接触更受局限，至少是离开欧洲的情况。当然，作为读者，她们是这一文类重要且积极的参与者。有时候，她们通过后门得到这种写作。1819年，一位名叫凯瑟琳·赫顿(Catherine Hutton)的英国女性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非洲之旅》，讲述根据现存的有关这一地区旅行文学汇编的一次穿越非洲的虚构之旅。该书用第一人称讲述，叙述者是一个虚构的男性人物，他细心周到地介绍自己：

我是一个拥有好家庭和大笔财产的英国乡绅的儿子。我母亲 103
让我牢记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生来就要做一名伟大的旅行者。在我幼年时代我不断重复听到这种宿命是否影响我性格的形成……我必须让哲学家们决定；但确定的是，当我从保姆手里逃脱的时候，总会在我以前从未去过的某个旷野抑或某条道路上被发现……二十一岁时，我发现自己富有、独立，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让我留在祖国。我决心以观看世界的方式将我的命运付诸实践，或者说满足我的愿望，无论主导因素是哪一个。⁴¹

人们不禁想知道，这种传统的开场白，是否也是赫顿对自己的幻想。

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比萨拉·李(Sarah Lee)(或者,如她自己签名的那样,R.李夫人)写的一本书,更清楚地呈现出围绕旅行和写作依照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这本书的名字叫《异乡故事和一位旅行者笔记的片段》(1835)。李是著名博物学家兼商人T.爱德华·鲍迪奇(Edward Bowdich)的遗孀,他曾经在西非旅行,试图与阿散蒂人商谈贸易协定。如李所述,她忙着忠实地编辑丈夫死后留下的著作,这时,一本杂志的编辑鼓励她根据自己在非洲的经历写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讲述当地西非生活的戏剧性事件,主要以非洲人做主人公。⁴²李在“序言”中说,所有的内容都“建立在真实之上;对场景、风俗习惯的每一个描写,都取自生活”。⁴³尽管她承认十分喜好“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沉思”,李却只字未提撰写有关她自己在西非岁月记述的任何可能。

然而,结果是,李独创性地为她的故事创造了一种场景,而非另写一部她自己的非洲记述。每一个故事都伴随着一长串脚注,其中有些达数页之长,并包含插图。正是在这些注释中,我们发现李从未写过的旅行书的素材:说明性的评论、人种学描述、动植物群的观察报告、个人逸事。⁴⁴这些注释似乎是李在这本书中感到自豪的主要来源。她在“引言”中抱怨写这些注释时需要自制,“以免出现大量的评论和细节”,“避免唯我主义”:“我划掉的‘我’的个数,以及为避免这种刺激人的单音节词遭到改写和调整的句子,几乎令人难以置信。”⁴⁵

划掉、改写、调整:李本人列举了对她写作的限制,却只是部分地违抗了这些限制。绝非偶然的是,李将她的书献给欧洲舞台上一位新的女性权威人物,维多利亚女王。在献词中,李尖锐地提醒维多利亚女王,“保护文学和女性作家,是值得英国女王关注的目标”。就旅行书写而论,维多利亚当然会满足这种需求,因为她确实主持了大量的女性旅行书写,如同她自己的领土雄心一样,带有全球和帝国色彩。⁴⁶

后 记

1989年7月23日：

荷兰报纸星期天报道称，苏里南的一场游击战争以休战告终，这将允许叛乱者保留武器并最终加入这个南美国家的警察部队。

《圣何塞水星报》

1989年12月20日：

尽管上周陆军司令德西·鲍特瑟与叛军领导人罗尼·不伦瑞克举行新的和谈，这个国家已经打了三年的内战战斗仍在继续，直到最近这场战争才相对平静。据政府方面消息，12月4日凌晨，不伦瑞克的雇佣军在苏里南东部克拉卡进攻军事前哨，杀死六名政府军人。这次进攻紧随着与叛军的谈判之后发生，而鲍特瑟对将要进行的谈判的描述，则是“积极的和乐观的”。

《华盛顿关于半球的报告》105

第二部分
重构美洲，
1800—1850

第六章

亚历山大·冯·洪堡 与美洲之重构

在旧世界，民族及其文明的特征形成图画中的要点；在新世界，人及其产品几乎消失于狂野而广袤的自然惊人的展示之中。新世界的人类只呈现土著游牧部落的一些残余，在文明上稍微先进一些；或者只展示被欧洲殖民者移植到海外的习俗和惯例的一致性。

亚历山大·冯·洪堡，
《关于新大陆赤道地区旅行的个人叙事》(1814)

你对植物学感兴趣？我妻子也是。

拿破仑对亚历山大·冯·洪堡说过的(仅有的)话(1805)

1799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和艾梅·邦普朗到达南美时，他们走进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在随后多事

109 之秋的五年间，他们参与到那个时刻之中，走遍他们喜欢称作的新大陆。他们的历史性旅行以及其产生的不朽作品，为19世纪重要的最初几十年间在大西洋两岸发生的对美洲的意识形态重构制定路线。在民众起义、外族入侵、独立战争震撼西班牙语美洲的三十年间，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其赤道旅行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从巴黎源源不断流出，达三十卷之多。当放松的旅行限制开始将大量欧洲旅行者送往南美时，洪堡在重新想象和重新界定（当时西班牙语美洲正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进程中，依然是唯一最具影响力的对话者。洪堡过去而且现在依然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创造性的探险者”；他的美洲旅行被视为“典范的探索之旅和至高无上的地理成就”。¹在欧裔美洲，他如同在欧洲一样声名显赫，他的著作是大西洋两岸新近发起的美洲幻想之源。查尔斯·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船板上写道，他的“整个生命历程是由于”年轻时“曾经读过并重读过”洪堡的《关于新大陆赤道地区旅行的个人叙事》（以下简称《个人叙事》）。²西班牙语美洲独立的主要建筑师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向“洪堡男爵”表达敬意，称之为“伟人，他用自己的双眼让美洲脱离愚昧，用自己的笔将她描绘得如同她本质一样美丽”。³

这一章和接下去两章讨论的，是19世纪最初几十年对南美的意识形态重构。讨论采取一系列不同的视角。在这里，我根据其与旅行文学先前范式和欧洲在该地区野心的关系，考察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南美书写。第七章关注旅行者作家潮，当西班牙语美洲向北欧访问者，尤其是北欧资本完全开放时，这些旅行者作家于19世纪10、20、30年代接踵而至。在讨论中，我将男女作家之间的对比置于前景。第八章思考南美知识分子面对新共和时代和欧洲投资的繁荣，在寻求创造去殖民化价值观和霸权的情况下，如何挑选和采纳欧洲视角。如同本书通

篇一样，这一部分主要的关切依然是旅行书写与欧洲经济扩张进程之间的关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终结，导致全面重新商讨西班牙语美洲与北欧之间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同样必需的表征与想象之间的关系。欧洲不得不重新想象美洲，而且美洲也不得不重新想象欧洲。因此，美洲之重构是一个跨大西洋的进程；这一进程吸引南北半球知识分子和广泛读者公众的精力和想象，但不一定是以相同的方式。对于北欧精英分子来说，重构与欧洲资本、技术、商品、知识系统巨大的扩张主义可能性的前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西班牙语美洲新近独立的精英却面临着自我创造的必要，这既与欧洲有关，又与他们试图统治的非欧洲民众有关。因此，人们可能会惊叹，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写作为这两个群体提供了奠基性的观点。

“一种极不寻常和复杂的情形”

到洪堡和邦普朗从拉科鲁尼亚起航之时，西班牙语美洲的殖民结构出现公开的危机至少已经二十年。再过十年，羽翼丰满的革命改造将会生效，以1825年所有西班牙语美洲大陆的独立作为结束。西班牙殖民社会在文化上很复杂，它等级森严且充满矛盾。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占据社会等级的顶端，垄断最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他们之下是克里奥尔人，也就是在美洲出生且声称有欧洲人（或白人）祖先的人。110 他们下面是美洲人口的主体，根据形形色色的非欧洲祖先分群：美洲土著人、黑人（自由人和奴隶）、梅斯蒂索混血儿、穆拉托混血儿、桑伯人等等⁴——类别成倍增加，标志着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祖先的等级。（因此，西班牙对血统，也就是其与北非接触的遗产的痴迷，确实在美洲自动消失了。）在西班牙人征服后的两个半世纪里，这些从属的多数群

体，特别是受奴役的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劳动，制造出西班牙乃至欧洲财富。18世纪80年代，当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奋起反叛时，他们的要求包括豁免殖民、宗教、克里奥尔精英分子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可怕的负担。⁵

尽管欧裔美洲克里奥尔人自己从属于西班牙人，过了三个世纪之后他们本身已经稳稳确立其地位；作为土地拥有、商业、采矿、官僚的精英，他们控制着巨大的资源，包括大量土地、千百万非洲奴隶和签约印度人的强迫劳动，以及向等级低于他们的每个人榨取税金和礼物的权力。比如，1800年，在洪堡和邦普朗开始南美旅行的加拉加斯省，人口几乎有五百万，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为白人（主要是克里奥尔人），百分之十五为受奴役的黑人，百分之八为自由黑人，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为巴多人（他们用当代的说法就是“有色人种”），百分之十四为美洲印第安人。⁶大概占总人口近百分之零点五的四千人拥有所有的可用土地，这些土地由一个非洲奴隶、自由黑人、混血苦力、穷苦白人构成的劳动力储备耕作。作为革命领袖弗朗西斯科·米兰达、西蒙·玻利瓦尔、安德烈斯·贝略之家乡的委内瑞拉，将会成为克里奥尔人领导的独立运动在南美的熔炉；而且洪堡和邦普朗在美洲的第一年，正是在这里度过。

他们很容易就了解到，克里奥尔人土地拥有者和商人早就难以忍耐西班牙人的政治特权和经济限制。另一方面，许多人视西班牙为唯一能够让属民多数群体受到控制的力量。他们的担心有充分依据。苏里南逃亡黑奴反叛出乎意料的力量、圣文森特加勒比印第安人的不屈不挠、1781年安第斯山脉印第安人声势浩大但没有成功的起义、1790年圣多明各奴隶的成功叛乱，已经确实使各地的封建和拥有奴隶的阶级感到恐怖。洪堡和邦普朗出现时，所有这些暴力的戏剧仍在上演（就此

而言,目前仍在上演)。这种先例,加上来自法国、加勒比地区、美国的革命意识形态,正在刺激已经难以控制的属民人群,这些人常常围绕在准备沿着制度性路线坚持其要求的受过教育的领导人周围。1795年,在委内瑞拉,一群起义奴隶要求在“法国法律”之下组成一个共和国,解放奴隶,废除某些特别令人不快的税负。两年后,一个更加危险的工人和小私有者的多种族联盟,用同样的计划制造一场激进阴谋,另外增加“废除印第安贡品,把土地分给印第安人”的要求。它还呼吁“白人、印第安人、有色人种之间的和谐,‘在基督教内做兄弟且在上帝面前享有平等’”。⁷ 111

发生此类巨变之时,恰逢18世纪晚期西班牙努力重申其对美洲殖民地的支配。西班牙为洪堡和邦普朗旅行提供赞助,也属于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随着当地内部经济的扩大,美洲殖民地已经变得不那么从属和有利于西班牙。与成见可能暗示的情况相反,西班牙王室试图借助一场自由主义改革运动重申控制。安东尼奥·德·乌略亚和豪尔赫·胡安曾伴随孔达米纳探险队出行。西班牙部分受他们报告的鼓舞,开始推动对其视为落后的殖民地社会政治结构实施现代化。这种结构建立的基础是宗教教条主义、地方专制主义、奴隶制,以及对土著民族的残酷剥削。对于克里奥尔人精英阶层的许多成员来说,西班牙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像使他们免受反叛民众攻击的保护者;对于从属的多数群体来说,它开始看起来越来越不像压迫者敌人。保守的克里奥尔人被立法激怒,因为立法保证了殖民地从属多数群体的权利,向“自由的有色”人群开放学校,改正对奴隶、契约劳工、朝贡制度等等的滥用。由于西班牙寻求将布道带进正常的教会等级秩序,并用牧师和集权统治取代独立的传教士,布道团制度也受到挑战。大约在洪堡和邦普朗到达的时候,随着殖民地冲突白热化,受剥削的多数群体与“被启

蒙的”西班牙王室站在一起反对克里奥尔人“解放者”的情况屡见不鲜。同样,某些克里奥尔人支持独立,主要将其作为一种方式,以确保其阶级特权不受来自宗主国的自由主义挑战。1794年,委内瑞拉种植园主成功迫使西班牙五年前强制执行的一个新奴隶法得以废除,这一法律阐明奴隶的权利和奴隶主的责任。正如西蒙·玻利瓦尔在其著名的1815年牙买加信件中所言,这是“一种极不寻常和复杂的情形”。⁸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所有派别的有独立意识的克里奥尔人,艰苦跋涉来到伦敦和巴黎寻求支持,反对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政府曾拒绝与独立运动正式结盟,尽管它们没有尝试掩盖它们对该地区的计划。另一方面,在商业部门,北欧与西班牙语美洲商业利益间的接触十分活跃。西班牙保护主义一直臭名昭著,让西班牙语美洲港口对外国货物和几乎所有外国人保持正式关闭状态。走私一直常见,但是到18世纪80年代,对更广阔商业关系的需求,使得整个制度无法执行。许多学者怀疑,要不是因为北欧资本的不间断压力,西班牙语美洲独立运动也许无法成形。许多人也将扩张主义的欧洲利益,视为独立运动没怎么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原因之一。

三十卷的旅行

在某种程度上,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形象在19世纪的历史编纂中被拔高,我们要归功于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洪堡都不是作为一个旅行者或旅行作家存在,而是以一种只有在个人时代才成为可能的方式,作为一个人和一种生活存在;在这一点上他胜于本书讨论的任何一位作家。洪堡就这样造就了自己。与林奈的门徒或非洲公司的雇员不同,他从事写作或旅行,不是作为欧洲

知识制造机器的一个简单工具，而是作为这些机器的创造者。他不是以体现老家某个权威人物的父亲图式(paternal schema)的名义，被派去进行传教的。他是一位有非凡活力、有能力、有教养之人，他创造自己的旅行和题材，并耗费毕生精力促进这些旅行和题材。他的旅行和写作都具有史诗气势，那是他用自己生活和财富创造出来的。因为洪堡的确拥有一种只有财富才能提供的生活。与安德斯·斯帕尔曼们或芒戈·帕克们不同，洪堡是民族精英中的一员，拥有独立的财富用以从事和促进地理和文学事业。他取得的成就之所以具有史诗气势，既归功于他的财富和他那个时代的要旨，也归功于他自己大胆创新的天赋和充满热情的自我实现。因此，在书写洪堡时，人们倾向于将一切都归诸那种生活和那个人。下述内容既是对那种倾向的承认，又是对其的抵制。

根据一种常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旅行者相关联的范式，将亚历山大·冯·洪堡调动起来的，是遗产和期待已久的孤儿身份。⁹他生于1769年，与拿破仑同年；其父在普鲁士朝廷担任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大臣多年，于1777年去世，当时他年仅八岁。亚历山大及其十岁的哥哥威廉被留给他们的母亲，一位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和严厉的加尔文教徒。他们的童年在简朴环境中度过，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书本知识。他们不属于贵族，但在宫廷中长大；这种奇妙但有益的特权令他们受益匪浅。作为大胆的知识分子，两位年轻人在柏林名声大振，经常光顾自由主义的犹太人沙龙，而非德国贵族的沙龙。威廉痴迷于语言和哲学，而亚历山大则钟情于自然科学，并在哥廷根大学和弗赖堡矿业学院学习。在学生时代，亚历山大与格奥尔格·弗斯特(Georg Förster)成为密友，后者是博物学家，曾随同库克进行第二次航行并以其作品而闻名。113
1790年，亚历山大与格奥尔格一起旅行到英国和革命的巴黎。

亚历山大学业结束后，担任普鲁士政府的矿业咨询师和巡视员，经济上得到安全保障。这一职位既未能穷尽其才能，亦未能满足其抱负，但是使得他能继续其科学兴趣，开始出版著作，并在普鲁士国内旅行。根据当今一位仰慕者所言，亚历山大很久以前就已经养成将会成为其一生特征的习惯：“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很少与女性为伴，读过众多好书。”¹⁰ 当他母亲于1797年去世时，洪堡发现自己在三十岁上可以不受约束地离开已经厌倦的职业，满足其充满热情的愿望离开欧洲——前往几乎任何一个地方。

行动起来却耗费一段时间。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计划未能实现；然后，有人邀请他加入一群英国人沿尼罗河上行，结果因拿破仑入侵埃及受阻。一次加入法国探险队环游世界的机会，后来化为乌有。洪堡在巴黎与邦普朗相遇后，与其结伴再一次计划前往埃及，希望能加入拿破仑的远征军；战争和普法政治再次使其计划夭折。洪堡和邦普朗两人在马赛陷入困境，无处可去，遂动身前往西班牙，雄心勃勃地希望安排一次美洲之旅。在马德里游说数月之后，他们得到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德·乌尔基霍(Mariano de Urquijo)的支持，后者帮助他们说服查理四世，前所未有地全权委托他们在西班牙美洲领土内旅行，费用完全由洪堡负担。与1735年拉·孔达米纳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一次的外交成就也许更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洪堡将宫廷经历、科学知识、坚韧意志结合在一起。毋庸置疑，他让国王记起了安东尼奥·德·乌略亚和豪尔赫·胡安的报告(特别是他们的秘密发现)曾多么有助于改变西班牙的殖民政策。也许，查理四世希望，洪堡和邦普朗能帮助他重新获得对其躁动不安的殖民地的控制。他确实急于利用洪堡的矿业知识，请他特别报回有关矿物学方面的发现。

1799年，这两位合伙者向委内瑞拉扬帆远航(乘坐的依旧是一艘

叫皮萨罗号的船只)。他们在那里用一年多时间来回沿着奥里诺科河旅行,跨越大平原(南美大草原),攀登山峰,顺河而下,穿越丛林,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从一次使命到另一次使命,测量、搜集、实验、绘图、记录下一切。在奥里诺科河上,他们能够见证并详细报告箭毒的准备工作,这是一个令欧洲人充满好奇的话题。洪堡和邦普朗亲自游历连接奥里诺科河与亚马孙河的内陆水道,确切地向欧洲持怀疑态度的人证实这条水道的存在。(非怀疑论者数十年来一直使用它作为邮路。)也是在这里,当地居民向他们展示电鳗的神奇。他们负载着所收集的大量标本和植物,于1802年初转移到哈瓦那,但几乎是刚到那里,就听说一个环游世界的法国探险队有望在秘鲁停留。他们希望加入这个探险队,便返回南美。《自然系统》继续统一这颗行星:洪堡和邦普朗决定从陆路而非海路旅行到秘鲁,为的是穿过波哥大,并与林奈式博物学家何塞·塞莱斯蒂诺·穆蒂斯(José Celestino Mutis)分享笔记。他们与他和他收集的物品一起待了两个月。¹¹跨越科迪勒拉山后,他们到达基多,在那里又逗留六个月。他们的停留,以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吸引欧洲公众想象的壮举为标志。报纸上数月后刊出有关这一壮举的消息:他们试图丈量当时被认为是世界最高峰的安第斯山脉钦博腊索峰。洪堡身穿礼服大衣和牛角扣靴,在一小队人的陪同下,到达六千三百米峰顶的四百米以内,这才因寒冷和缺氧返回。1802年末,他的探险队到达利马,这时他已经意识到与法国人的约会将无法实现。于是他们转而乘船驶向墨西哥,在那里又逗留一年,主要是在以前从未向非西班牙人开放的内容丰富的墨西哥档案馆、图书馆、植物园中从事研究。他们对美国做了一次短暂访问,洪堡在那里与托马斯·杰斐逊结为朋友。1804年8月,他们返回巴黎,公众给予他们英雄般的欢迎;而在他返回之前,公众一直时断时续通过他们的信件密

114

切关注他们的壮举，期间还曾猜想他们俩都已死去。

洪堡像拉·孔达米纳一样，也许就是学习他的榜样，立即开始利用其旅行在巴黎彼此关联的上流社会、科学界、官场活动。在返回数周之内，他就在植物园开办了一场植物学展览。与此同时，邦普朗则隐退到后台，并最终消失在接触地带。¹²洪堡成了大陆名人。当时人们对有关南美的第一手信息普遍有强烈渴望，洪堡将自己造就成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他做演讲、组织会议、撰写大批书信、访问显要、不知疲倦地固守在沙龙中。其间，他建立团队编写注释和绘制插图，将他收集的物品和记下的笔记变成书籍。

书籍！洪堡的写作抱负与其旅行有着相同的史诗气势。在美洲旅行期间，他常忙着为其旅行将会产生的巨大印刷作品草拟计划。在北欧，西班牙语美洲是一个事实上的空白，洪堡似乎决心用自己的写作、绘画、地图彻底将其填满。他将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冲动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比如法国人前往埃及的探险，就产生二十四卷本的《描写埃及》。在当今的一位仰慕者看来，洪堡的文本抱负，实际上是对“文件、记录簿、注解的一种难以置信、近乎疯狂的癖好……是一种文化忧郁症”。¹³三十卷的《1799、1800、1801、1802、1803、1804年关于新大陆赤道地区旅行的个人叙事》，比任何东西更远离感伤的讲故事者怀有的宜于成年男人的抱负。所有这三十卷都在巴黎用法语出版，大多属于洪堡和邦普朗共同的作品。¹⁴这部印刷史诗，始于他们返回法国后数月发表的《论植物地理》（1805），终于1834年最后的三卷《草本植物调查》、《地理和物理图册》、《新大陆历史地理》。在这套书中，包括十六卷植物学和植物地理，两卷动物学，两卷天文和大气测量，七卷地理和地缘政治描述（包括著名的《新西班牙王国政治论》），三卷旅行叙事本身。作为形式的实验者，洪堡自己花费巨大代价，不仅专门研究印刷，



图 19:《洪堡和邦普朗在奥里诺科的丛林小屋里》,O. 罗斯根据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幅绘画雕刻。

而且还专攻绘图法。他的视觉革新为地图、图解、表格的使用确立新标准。在其非专业的著作中,考古和自然现象的版画依然令人惊叹(参见图20、图23、图24、图25)。

洪堡之寻求并赢得对欧洲和欧裔美洲公共想象最广泛的影响,正是通过其非专业写作,而不是其科学论文。这些非专业写作是我将要再次聚焦的作品:一是《自然的风景》(1808),洪堡最喜爱的关于美洲旅行的著作之一,也是他用德语撰写的唯一作品;二是《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1810年出版豪华插图两卷本,随后于1814年印行一个简略的普及本;最后是未完成的有关其旅行的《历史关系》或《个人叙事》,其三卷本出版于1814、1819、1825年。¹⁵这些首先是大陆和西班牙语美洲阅读公众于19世纪10和20年代正在阅读、评论、摘录、讨论的书。这些非专业著作的意义最接近旅行书写,也是大胆的话语实验。我将证明,洪堡在这些话语实验中试图重构有关美洲的大众想象,并且通过美洲重构有关这颗行星本身的想象。虽然洪堡设法将重构南美与其新近对北欧的开放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同时寻求重构资产阶级主体性,阻止其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策略、科学与情感、信息与经验分离开来。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起,向欧洲人提出一种新的行星意识。

评论者解读洪堡的美洲书写,常常参照著名的美洲之争(*querelle d'Amérique*)——欧洲知识分子之间旷日持久、傲慢自大的争论,围绕的是美洲与欧洲和其他大陆相比,相对的大小、价值、动植物多样性。18世纪下半叶,布封曾捍卫这样的观点,认为自然在美洲不及在世界其他部分那么成熟,因为这个大陆较为年轻。正如安东内洛·杰尔比(Antonello Gerbi)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新世界之争》(1955, 1983)中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经过激烈辩论,而且这个时期的每位思想家似乎都

觉得需要采取一种立场。¹⁶ 尽管洪堡在其流行的作品中没有详细讨论这场辩论本身,但他之颂扬美洲自然乃是参与了这场辩论,主要目的是重构“新大陆”。然而,洪堡绝未视其著作根植于这场辩论抑或被其所包括。杰尔比认为,他在辩论中的立场是“例外的”和“有几分边缘化的”,只产生一种“迟到的和侧面的影响”。¹⁷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发现,将洪堡的书写与美洲之争当作一种交叉现象更为有用,这一现象由欧洲共享的有关美洲的成见和焦虑形成。

“狂野而广袤的自然”

正如其作品标题所示,亚历山大·冯·洪堡首先将南美重构成自然。然而,它并不是林奈式可接近、可搜集、可辨认、可分类的自然,而是一种戏剧性的、非同寻常的自然,一种能够打败人类知识和理解力的景观。洪堡笔下的自然不是一种坐等了解和拥有的自然,而是一种运动中的自然,它受到各种生命力的驱动,其中许多都是人眼可见的;这是一个让人类显得渺小,控制其生命,唤醒其激情,挑战其认知的自然。难怪洪堡的画像要么被自然,要么被他自己描述自然的收藏品所吞没和缩小。

人类在洪堡的宇宙观中被如此吞没和缩小,以至于叙事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可行的表征模式。他谨慎避免这种叙事。他关于美洲的非专业书写采取的形式,是用作讲座的描述性、分析性论文。《自然的风光》1808年第一次出版的德语版《自然的风光画》(*Ansichten der Natur*)、法语版《自然的画面》(*Tableaux de la nature*),就是以1806年在柏林做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讲座开始的。那之后是1810年带豪华插图的《科迪勒拉山的风光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风光”或画面,是

洪堡在他所谓“探讨博物学话题的审美模式”中为其实验选择的形式。他的创新性尝试是为了改正他视之为他那个时代旅行书写的缺点：一方面，是对他所谓“纯个人的”东西的一种轻视的成见；另一方面，是对精神和审美上正在失去活力的科学细节的积累。洪堡《自然的风景》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科学的特征与崇高的审美融合起来。他确信，审美描述的生动性，将会得到科学所揭示的让自然起作用的“神秘力量”的补充和增强。用一位文学史学家的话说，结果是将“一种全新类型的自然话语引入德国文学”。¹⁸

洪堡的话语实验可以用《自然的风景》开篇的文章得到很好的说明，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大草原和沙漠之上》。如同许多风景一样，它从一个假定的旅行者的视角出发，这是叙事角色的遗迹。在这个实例中，抽象的（然而完全欧洲的、男性的）角色，将他的眼睛从经过教化的委内瑞拉海岸地带移开，转向内陆的大草原或大平原。在下面的选段中，注意视觉和情感语言与分类和技术语言的交织，以及读者反应的刻意编排：

花岗岩山巍峨高耸，山麓下延伸着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在我们这个行星的早期，那山峰曾阻挡加勒比湾形成时海水的侵入。当旅行者离开加拉加斯高山谷地和岛屿星罗棋布的塔卡里瓜湖——湖水倒映着附近香蕉的形状，当他走出浅淡嫩绿的塔希提甘蔗尽染的葱茏田野抑或可可林投下的忧郁阴影，他的双眼停留在南边的草原上，那草原看似正不断抬升，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走出这片丰富华美的有机生命，旅行者惊讶不已，他突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阴郁的边缘。¹⁹

在读者心中制造荒芜感之后，洪堡开始缓解这种感觉，用浓稠而有力的意义填充这片（“像某个荒凉行星裸露的岩石外壳般在我们眼前延伸的”）荒原。他在展示自己的行星意识的同时，将委内瑞拉的大草原与北欧的荒野、非洲的内陆平原、亚洲的大草原相比较。一页又一页分析性、常常也是统计性的描述接踵而来，但是采用的是一种也充满戏剧、争斗和一定程度淫荡的语言。例如，在下面这段相当冗长的选段中，洪堡试图解释南美为何没有相近纬度的其他地区那么炎热和干燥。这段文字不是叙事性的，连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没有出现。读者需要将其想象成是以演讲的形式发表的（黑体为我所加）：

热带北部这片犬牙交错大陆的狭窄处，大气所依赖的流体基础，导致不那么温暖的气流上升；气流向两个**冰极全面延伸**；**浩瀚**的海洋**扫过**凉爽的热带风；东海岸十分平坦；来自南极地区的寒冷海流，先是从西南朝东北方向流动，**冲击**低于南纬三十五度平行线的智利海岸，沿秘鲁海岸向北**前进**到帕里纳角，在那里**突然偏转**向西；**富有**泉水的群山，积雪盖顶的山峰**高耸**插入云层，使得气流**下降**到其斜坡之上；**极其**宽阔的河流水量**充沛**，在千回百折后总是寻找**最遥远**的海岸；大草原上沙土**全无**，因此不那么容易捕获热量；**无法穿越**的森林覆盖着赤道上**水分丰富**的平原，保护地球免受太阳的射线，抑或用它们叶子的表面辐射热量，将部分吸收、部分生成的**巨量**湿气，**蒸发**进**远离**山峰和海洋的这个国家的内陆……如此特别成为新大陆特征的**繁茂而旺盛**的植被和**华美的**树叶，依赖的**单单**就是这些。²⁰

这段散文令人疲劳，不是因为它如同林奈式散文般单调乏味，而是因为



图20：伊康农佐的自然桥。选自洪堡，《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1814）。

它有可能被口头诵读所强化的戏剧性和不规则的起伏。“上升”中的“不那么温暖的”空气急速向“冰极”“全面延伸”；“浩瀚的海洋”伸向一个大陆“平坦”的“海岸”；寒冷的水，宛如不受欢迎的热带入侵者，冲击、前进、突转；众多山峰高耸；巨大的河流水量充沛，攻击性地寻找海岸；森林无法穿越，忙着用无形的活动从事着保护、辐射、蒸发、吸收、生成。人们想起一架不停移动和转换焦距的照相机——只可惜视觉实际上在这段描述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洪堡在这里调用的，不是一个固定在视觉中的自然系统，而是无形力量没有止境地扩张和收缩。在这方面，他的话语与其林奈式先行者的话语形成鲜明对比。洪堡本人在动身从事美洲之旅头一天夜晚写的一封信中描绘了这种对比。虽然他将要搜集植物和化石并进行天文观察，但是他写信给萨尔茨堡的一位朋友说：“这全都不是我远征的主要目的。我的目光将永远对着各种力量的结合、无生命创造对有生命的动植物世界的影响以及这种和谐。”²¹当然，洪堡寻找的就是他在新大陆发现之物，而且他发现的正是他寻找之物。他作为科学家的目标变成了他作为作家的目标。他在《自然的风景》的“前言”中宣称，他的目的是再现“一颗敏感的心灵从直接的自然沉思中得到的……被对各种神秘力量之联系的洞见所增强的那种乐趣”。要是没有这种洞见，“奇妙、丰饶的自然”就会简单地沦为“单独形象的积聚”，缺乏“一幅图画的和谐与效果”。²²

如同他的所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洪堡对和谐与神秘力量的强调，将他与浪漫主义的唯心论美学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强调还将他与工业主义和机器时代，与正在生产那个时代并被那个时代所生产的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确，“无生命创造”与“有生命的动植物世界”，¹²¹也许并不像洪堡致力多年并且是欧洲在美洲的主要兴趣目标之一的采矿业那样，存在清楚的交叉。）其他作家曾就他与那个时代欧洲科学辩

论的联系，讨论过洪堡的著作。我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研究他的写作，考察其意识形态的维度以及其与旅行文学的关系。

与第四、五章讨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感伤叙事形成对比（其中许多他肯定曾经读过），洪堡寻求使情感脱离自传和自恋，将之与科学融合在一起。他在其《自然的风景》的“前言”中说，他的目标是在读者心中重现“自然与人类精神生活古老的交流”。赤道世界是进行这种联系的一个特许场所：“在任何地方，”洪堡说，“她[自然]都没有像这样用其伟大的意义更深地打动我们，在任何地方她都没有像这样更有说服力地对我们讲话。”²³

虽然带有洪堡烙印的行星意识与科学的反征服共享基本结构，但是洪堡的行星意识比其先前植物分类者们的行星意识对科学和“人”提出更为宏大的要求。与恭谦的、门徒般的植物采集者相比，洪堡采取一种上帝般的、无所不知的姿态，凌驾在行星及其读者之上。因为最直接试图“打动”、“有说服力地对我们讲话”的，当然是他而不是自然。他宛如艺术鉴赏家，利用了他假定其受众身上所具有的复杂的感性。比如，上面引文中主要属于感官的形象，是不可预知的阵阵寒冷的气流——一个北方人在想象的酷热地带最不期待或想要的东西。（用洪堡的名字给在太平洋上空奔涌的寒流命名，这是何等恰当。）

在《在大草原和沙漠之上》中，于上面引述的对全球的神秘力量冗长的附记之后，假想的旅行者一观者最终回到开篇段落描述的荒凉风景，并在读者眼前将其变成一幅运动和生气勃勃的景象：

在生机盎然的大草原被山稗属、具有多个圆锥花序的雀稗属植物以及各种草类覆盖之前，地球表面很少得到湿润。在光线力量的刺激下，草本的含羞草展开其静止、下垂的叶子，就这样在与百鸟晨

歌和水上花开的合唱中,向着东升的旭日欢呼。马匹和公牛生机勃勃、轻松愉快,在平原上徜徉,啃食牧草。繁茂的草地掩藏着长有美丽斑纹的美洲虎,它潜伏在安全的藏身之处,仔细计算着跳跃的距离,像亚洲虎一样,猫似的纵身一跃,朝路过的猎物冲去。²⁴

与严格的科学写作形成对比,此处话语的权威,明显不决定于存在于文本之外的整体化描述计划。在此,整体化的计划存在于文本之中,由说话者无限扩张的思想和灵魂精心编制。然而,其与科学旅行书写共享的是对人类的抹除。刚才引用的段落呈现出一幅风景,它浸染着各种社会幻想——与和谐、工业、自由、未异化的生活乐趣有关的——全都被投射到非人类的世界。人类历史的踪迹,虽未经确认,却在场于那里:马匹和公牛通过一种不亚于侵入的西班牙人的神秘力量抵达。但是大草原的人类居民并不在场。在这些“忧郁而神圣的孤独”中提及的唯一的“人”,就是那位假定且无形的欧洲旅行者自己。 122

《自然的风景》是一本十分受欢迎的书,一本似乎对洪堡极其重要的书。在放弃其《个人叙事》之后过了很久,他于1826年对《自然的风景》进行修改和扩充,并于1849年再次这样做。他在乎这本书是对的。欧洲和南美的读者大众,就是从洪堡的《自然的风景》及其续集《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中,挑选全部的基本意象,这些意象后来在1810至1850年这个重要的过渡期意味着“南美”。尤其是三种意象,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新大陆”规范的转喻表征;这三种意象全都因洪堡的《自然的风景》而被奉为经典,它们是:连绵不断的热带森林(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积雪盖顶的山峰(安第斯山脉的科迪勒拉峰和墨西哥的火山)、广袤的内陆平原(委内瑞拉大草原和阿根廷大草原)。²⁵洪堡本人在《自然的风景》最后一版挑出这经典的三位一体,

并将这本书介绍为“源自在场于海洋、奥里诺科森林、委内瑞拉大草原、秘鲁和墨西哥山间荒僻之地最高贵的自然客体的一系列论文”。²⁶

实际上,要将南美简化成纯自然和标志性的山峰、平原、丛林的三位一体,需要对洪堡的写作采取高度选择性的接受。下面我将讨论洪堡书写和思考南美的某些其他方式,尤其是考古学和人口统计学的方式。不过,在欧洲的想象中被编码成有关“新大陆”的意识形态的,毫无疑问是在其科学著作和其《自然的风景》中详尽阐述的原始自然的形象。为什么呢?首先,像大陆一样,这种意识形态恰恰不是新的。19世纪欧洲人将美洲重构成自然,部分是由于起初16和17世纪欧洲人就是这样为自己虚构美洲的,而且是由于许多相同的原因。洪堡笔下的看客虽然深深扎根于18世纪对自然和人类的构建,但他也是最初虚构美洲的欧洲人,即哥伦布、韦斯普奇、罗利等人的一个自觉的副本。他们也将美洲书写成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一个被植物和动物(其中有些是人类)占领,但不是由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无人认领的、永恒的空间;这个世界仅有的历史尚待开始。他们的书写也用一种积累、丰裕、天真无辜的话语描绘美洲。洪堡对一个繁荣兴旺原始世界的狂热调用,是诸如哥伦布1493年写给西班牙君主的那封著名书信的回响:

所有这些岛屿非常美丽,以景色多样而著名;岛上长满多种参天大树,我相信这些树一年四季都长着叶子;因为当我看见它们时,它们如同通常在西班牙五月那样葱茏、繁茂……此外,在胡安娜这同一座岛上,就有七八种棕榈树,它们像所有其他的树木、草本植物和水果一样,在高度和美丽上都大大超过我们的树种。松树也相当漂亮,还有非常宽阔的田野和草地、各种鸟、不同种类的蜜蜂、多种金属,但没有铁。²⁷

在洪堡的书写中，哥伦布时常亲自露面。比如，在《自然的风景》中，关于奥里诺科瀑布的那篇文章，重现了哥伦布第三次美洲航行时与奥里诺科河的著名相遇。²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6世纪编年史伊甸园般的大厦，被建立在哥伦布未能发现之物带来的失望之上：马可·波罗曾描述过的中国、大汗、巨大的城市和无尽头的道路。洪堡一直敬佩哥伦布，因为哥伦布对幻灭做出回应，给予此地一种固有的审美价值。尽管这种策略没能打动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它却在他们属民的想象中深深扎根。三百年后，那种伊甸园般的幻想在洪堡重新的第一次接触中复活。甚至连“新大陆”的标签都被复活，仿佛三个世纪的欧洲殖民从未发生，抑或没造成影响一样。对哥伦布有效的，再一次对洪堡起作用：原始自然的状态得以成形，成为与来自欧洲的变革性干预意愿有关的一种状态。哥伦布1493年给西班牙王室写信（上面引用的）之后，又写了一封信，不是建议让自己融入他所发现的伊甸园般的世界，而是建议由他负责一项大型殖民和奴役计划。洪堡没有这样的雄心。可是在西班牙语美洲独立前夜，在并非不同于争夺非洲的资本主义“争夺美洲”就要来临的前夜，洪堡的《自然的风景》和他的观察，标示着南美历史一个新的开端，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的（北欧的）原点；这个未来始于现在并将重构那片“野蛮的地域”。洪堡的《自然的风景》明确表达走向未来的一个原始起点；他同时代许多人视那个未来为不可避免的，并且充满激情地相信这一点。这种表达是爱好和平的、乌托邦式的：没有任何阻止欧化主义进步的障碍在风景中出现。

关键不是要证明洪堡的表征有些难以置信抑或缺乏真实性。然而，我坚持认为，这些表征并非是必然的，它们的轮廓决定于一种特殊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结合点，以及特殊的权力和特权关系。南美不必被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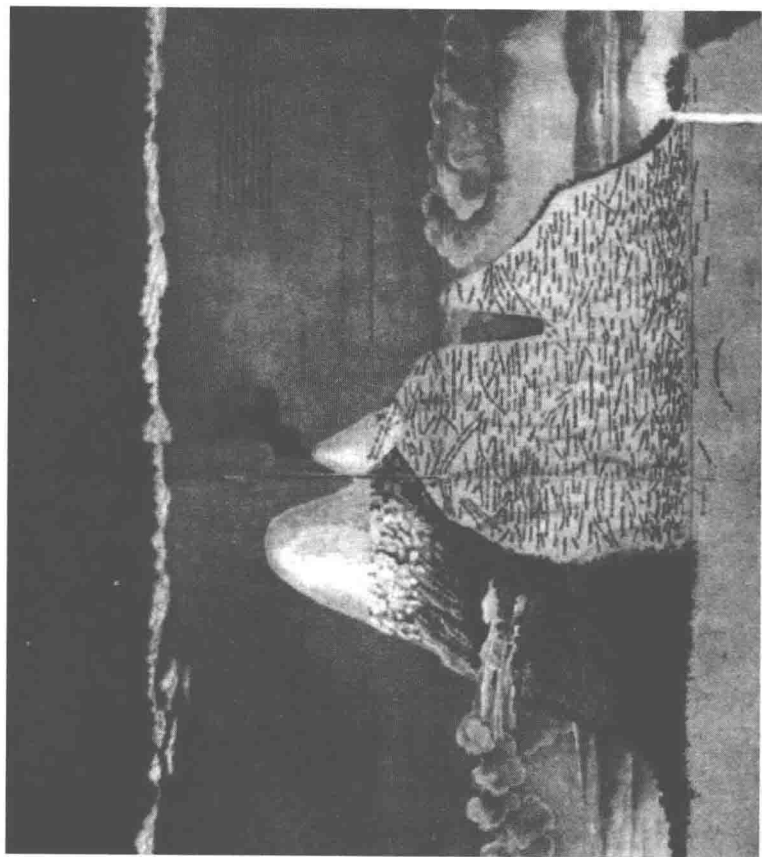


图 21: 亚历山大·冯·洪堡,《热带植物地理》,选自其《论植物地理》(巴黎,1807)。他为该图起的副标题是《安第斯山脉及邻国之物理画面》。

虚构抑或重构为原始的自然。洪堡和邦普朗除了强调原始自然以外，他们在所有的探险中，从未走出西班牙殖民地基础设施的范围——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依赖村庄、布道团、前哨、庄园、道路、殖民劳动制度的网络支撑他们的生活和计划，依靠这些为他们提供食物、住所以及给他们做向导和运输大型装备的劳力储备。即便是内陆平原、积雪盖顶的山峰、茂密丛林的经典意象，也不在人类历史乃至欧洲帝国主义历史之外。委内瑞拉大草原和阿根廷大草原的居民，虽然被迁移出殖民中心，但是即将要在独立战争中被招募为士兵。丛林曾经被殖民传教制度所渗透，其影响延伸到远超出殖民前沿微观社会秩序的地方。安第斯山脉的科迪勒拉峰（洪堡笔下的“山间荒僻之地”）也是大多数秘鲁居民的生活之地，前哥伦布的生活方式和殖民抵抗，继续在他们的日常现实中发挥巨大影响。在历史意义上，它还是殖民矿物资源的大母脉。洪堡对钦博腊索峰的生态描述（参见图21），与土著安第斯人对另外一座名山的表征形成有趣对比，那座山是波托西山，科帕卡巴纳的圣母在那里掌管着世上最大的银矿（参见图22）。

洪堡的《个人叙事》

在洪堡三卷本的《个人叙事》（1814—1825）中，叙事性本身使欧洲人的抱负浮出水面，也显示出洪堡所遭遇的西班牙语美洲社会的基础设施。在要创作有关其旅行记述的公众压力下，洪堡在返回十年之后，不情愿地开始这项工作。他“克服其对”个人叙事的“厌恶”，在五年内完成三卷，后来放弃计划并销毁第四卷的手稿。²⁹这个计划至少在一开始很受欢迎。《个人叙事》的英语译者欢欣鼓舞地说，“当旅行者沿着没有足迹的沙漠，留下通向文明以及其所有无边祝福的第一步时，他确

实激起了何等的共鸣”。欧洲扩张主义的目的论乃是这个叙事的“魅力”之所在。³⁰下面这个段落选自关于前往委内瑞拉一座驰名金矿的丛林的旅行记述,对《个人叙事》如何将人的主体性和时间性编织进自然景观做了说明:

农场主们在奴隶帮助下,开辟一条穿越树林通往胡阿瓜河第一瀑的道路……由于雪檐很窄,我们找不到地方落脚,便下到激流

126



图22:美洲最大的西班牙矿业场所,波托西山的土著安第斯艺术家所作的一幅绘画,时间是1588年。山脚下坐落着波托西城,山顶上画着长期与山有关的科帕卡巴纳圣母的形象。据信,原创者是弗朗西斯科·蒂图·尤潘基(Francisco Titu Yupanqui)。

中，涉水或坐在奴隶的肩膀上过河，爬上对面的陡坡……我们越往前走，植被就越茂密。在好几个地方，树根穿破石灰岩，嵌入将路基分开的裂缝。我们[原文如此]为带走沿途积累的植物颇为周折。美人蕉、长着精巧紫花的海里康属植物、闭鞘姜属植物以及其他不知名科类的植物……与叶子形态如此精巧的棕色树枝状蕨类植物形成明显对比。印第安人用大刀在树干上切开口子，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美丽的红色和金黄色树林；将来有一天，这树林将会被我们的车工和家具工找到。³¹

127

话题依然是令人欣喜的自然；美洲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只不过是直接服务于欧洲人。他们被看见发起的唯一的行动，是向访问者指明可开发的资源。的确，印第安人的邀请姿态，似乎触发了对一种未来相对罕见的暗示，那是一个被视为牢牢掌握在欧洲（“我们的”）资本和工业手中的未来。作为工具性主体的美洲人之在场，是《个人叙事》的典型特征。围绕自然景观的边缘，人们可以从这部著作学到许多有关西班牙语美洲社会的东西，不过学到的东西是从殖民关系结构内部传播的。美洲人，无论是西班牙传道士、殖民官员、克里奥尔人定居者、非洲奴隶、美洲印第安仆人，还是大草原上的雇农，绝大多数展现出工具性的功能。如上面段落所示，他们往往被完全归入那个含糊不清的“我们”，主人们用这个词将他们自己作为仆人工作的代理，包括在“我们”之中。众所周知，洪堡奉行自由主义，支持法国和美洲革命，毕生激烈反对奴隶制。然而，《个人叙事》采纳殖民关系和种族等级秩序，尤其是根据典型的可自由处理的殖民关系表征美洲。

在《个人叙事》“前言”的阈限空间里，洪堡直接提及激发其写作的

欧洲扩张主义进程。“假如我的某些书页被人从遗忘中抢救出来”，我们读到，那么

奥鲁诺克河岸的居民将会心怀狂喜地看见，那因商业而富足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在自由民手中得到耕种的肥沃田野，装扮那些地方；而在我旅行的时代，在那里只发现无法穿越的森林和被洪水淹没的土地。³²

狂喜和装扮，城市和田野：纠缠不清的城市和审美幻想，被“无法穿越的森林”和“被洪水淹没的土地”，这种相应的否定性景象赋予意义。不过谁将会是这位未来的观者？未来的耕种者自己会心怀狂喜地看（真的允许他们停下工作看）吗？森林的居民，如果能活下去，将会视田野为装扮吗？在洪堡与其未来的狂喜对应者之间存在一系列事件，洪堡将自己排斥在这些事件之外，可是却以它们的名义从事写作。

128 鉴于我关心的是对南美的表征，所以我不会讨论洪堡著名的《新西班牙王国（也就是墨西哥）政治论》和其姊妹篇《古巴岛政治论》。这些著作通过统计学和人口学描述、以环境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书写不同，它们不产生神话，可是分享原始自然神话世界的两个方面：非历史性和文化之缺席。学者们仍然重视洪堡的政治论作为资料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奴隶史和种族关系方面。据说，单是洪堡关于墨西哥的政治论，就导致英国投资那里银矿的繁荣；可是当繁荣于1830年走向萧条时，他却受到夸大其词的指责。洪堡对古巴奴隶制的揭露仍然极富争议：1856年，其关于古巴的政治论的一个北美版本遭到调整，删减了主张废奴的那一章。已八十多高龄的洪堡在德国报刊上发文，对此进行激烈抗议。

在地理意义上,考察古巴和墨西哥的政治论,与描述南美的自然书写存在互补性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布与洪堡自己旅行的后勤保障有关。他在古巴只停留很短时间,而他在墨西哥的一年主要待在首都或其附近,与学者讨论并翻阅图书馆的藏书。他的政治论反映这种研究,遵循的是殖民官僚设定的新闻报道路线。然而,他的政治论与其关于南美的书写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对比,因为洪堡实际上确实认为,墨西哥尤其以一种不同于南美的方式被文明化。他在“前言”中论及墨西哥:“与新西班牙文明和我刚通过的那些地区贫乏的物质和道德文化之间的反差相比,没有任何东西更强烈地打动我。”³³他在墨西哥的计划,变成对墨西哥相对于美洲赤道地区非凡进步的解释。这种态度显而易见于这里将要考虑的最后一本著作,受欢迎的《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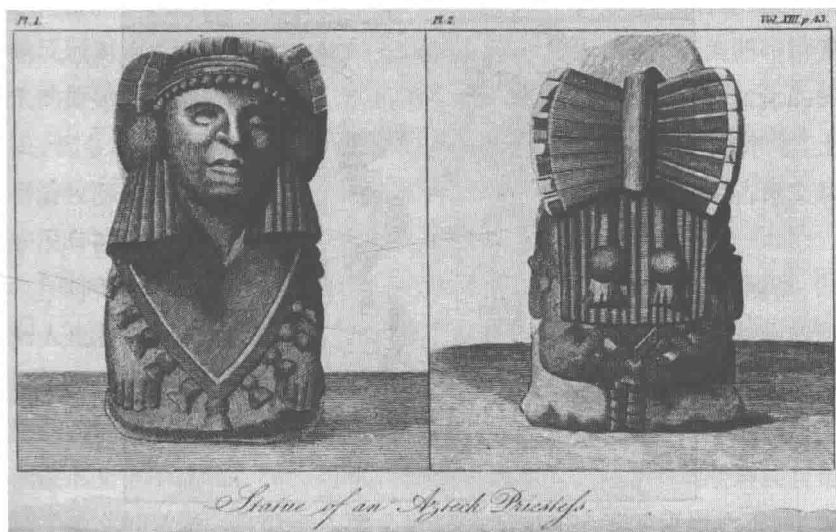


图23: 阿兹特克女祭司雕像。选自洪堡,《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1814)。

被考古的美洲

我早先提到,要对洪堡的美洲书写采取颇为选择性的接受态度,才能产生作为原始自然的美洲形象。这种接受态度的表现是,受欢迎的两卷本《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1810, 1814)几乎立即丧失标题的后一半,只被人记作《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它最初于1810年以两卷本《风景如画的地图集》出版,包括六十九幅极好的插图,是《自然的风景》受欢迎的姊妹篇。《风景和遗迹》(我将这样简称它),将对自然奇观——钦博拉腊峰、天然石桥、瀑布、湖泊——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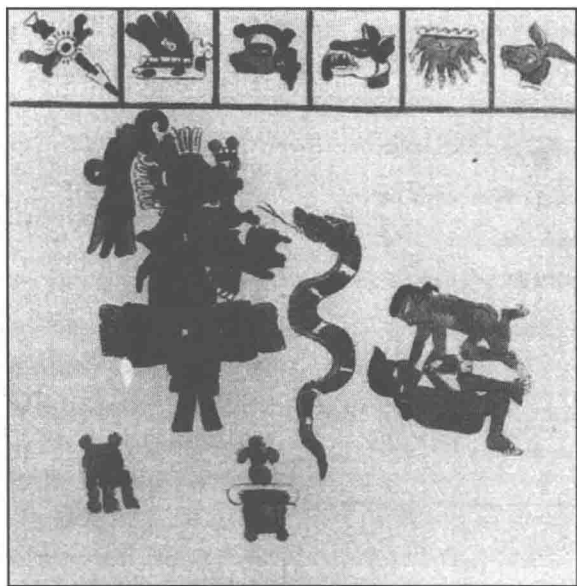


图24: 洪堡在梵蒂冈发现的阿兹特克象形文字手稿。选自《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1814)。

并茂的评注,与来自秘鲁和(主要是)墨西哥的前哥伦布考古遗迹——乔卢拉的金字塔、阿兹特克的日历石、象形绘画和手稿——结合在一起。这本书不是因为其考古部分被人铭记。一位现代评论者仍然将其当作“山区风景与阿兹特克艺术的描述和插图的奇怪混合物”而加以拒斥。³⁴

洪堡本人想要的,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奇怪混合物”。他的目标是创造某种东西,其之被人接受,既不因为它奇怪,又不因为它是一种混合物,而是因为它代表和谐和联系;显然他并不成功。“在同一本著作中呈现美洲土著部落原始的遗迹和他们居住的山区国度如画的风光”,目的是表明“气候、土壤的性质、植物的外貌、美丽或野蛮的自然景色,对艺术的进步有着巨大影响”。³⁵在这种情形下,和谐产生于将文化同化进自然,以一种确保土著美洲低等地位的方式:自然越野蛮,文化也越野蛮。虽然如此,《风景与遗迹》中的考古论文至少存在潜能,戏剧性地反驳对原始美洲去历史化的赞颂,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主义观点。即便是些许有关印加、阿兹特克或玛雅文化的知识,都会动摇原始森林中的野蛮人形象,包括洪堡自己笔下的作为“土著游牧部落残余”的美洲印第安人形象。也许,这就是这些考古论文从来没有被洪堡的读者和评论者吸收的根本原因。 130

对美洲的考古再发现来说,一个有影响的榜样是埃及。在埃及,欧洲人也在通过并作为“重新发现的”遗迹和废墟,重建一种失落的历史。在那里,再发现也发生在新欧洲扩张主义和对较早帝国的怀旧回想的语境之下。诸如罗塞塔石碑这样的埃及发现,无疑激发洪堡对美洲象形文字手稿和石碑的兴趣,这成为《风景与遗迹》中某些最长且最博学论文的话题。在欧洲人两个世纪的无知和冷漠的语境之下,洪堡有关土著人历史的言论值得注意,有时甚至有预见性:在描写过1790

年排水工人在墨西哥城发现的著名的“阿兹特克日历”石碑后，他说：“如果一个渴望了解遥远美洲文明的政府，会用在古老的特诺奇提特兰主广场的教堂周围挖掘的方式进行研究”，那么阿兹特克人“将会变得令人关注”。³⁶ 20世纪70年代，一群电业工人偶然发现了事实上证明是阿兹特克大神庙的东西，之后挖掘便开始了。

尽管洪堡显然痴迷并感动于其考古发现，但是他依然无情地蔑视前哥伦布文明的成就——当然，这是与古典地中海文明比较而言的：“我们不能太频繁地重复，虽然美洲的建筑，既不能靠其大小，亦不能靠其形态的优雅引起惊奇，”他写道，“但是它非常有趣，因为它阐明新大陆山区居民原始文明的历史。”³⁷ 在希腊，“宗教成为美术的主要支撑”，而在阿兹特克人当中，原始的死亡祭祀产生了种种遗迹，其唯一目标乃是“制造恐怖和沮丧”。³⁸ 正如相同时期对埃及的遗迹论重构一样，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被考古化，而它们的当代后代则毫不重要，甚至无法找到。这当然只是部分要点。欧洲人的想象采取将当代非欧洲人与他们的前殖民乃至殖民历史脱离的方式引起考古话题。复活作为古迹的土著历史和文化，就是复活已死亡的土著历史和文化。这种姿态将它们从欧洲人的忘却中拯救出来，同时又将它们重新指定给一个过去的时代。

我曾在本书反复提到欧洲风景话语如何剥夺土著民族的领土权，将他们从他们可能曾经统治并继续在其中谋生的领土上剥离出来。考古学的观点是补充性的。这种观点还抹杀了接触地带被征服的居民，他们作为历史主体与前欧洲过去存在生活上的连续性，且有着基于历史的对当下的渴望和要求。然而，殖民者们视为“土著游牧部落残余”的那些人，不可能这么看待自己。殖民者们当作古迹消灭的东西，往往作为自觉和历史意识——反殖民抵抗运动的两种主要成分——

存在于被殖民者中间。³⁹譬如,1781年的安第斯山叛乱,包含一场大规模、有超凡魅力的复兴,预示古老印加人的回归及其帝国的恢复。这场复兴在安第斯山民众当中,以有关印加人历史、神话、谱系的一种日常知识为先决条件,这种知识以结绳和口头、书面、图形形式得以保存。领导叛乱的是一对夫妻,其中一个将自己重新命名为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效仿的是最后一位合法的印加统治者。这位统治者于1572年被西班牙人在库斯科的主广场活活烧死。1781年,叛乱失败后,这位新图帕克·阿马鲁在同一地点被掏出内脏并遭到肢解。⁴⁰

作为文化互化者的洪堡

“印第安人,”上面引用的选自《个人叙事》的段落中写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美丽的红色和金黄色树林。”在奥里诺科河畔,一位行政酋长“给了我们三个印第安人,走在前面为我们开道”;他在交谈中证明,他是“一个令人喜欢的人,精神上很有教养”。⁴¹就在这稍后几行,一位传道士用急切的独白谈论近来的奴隶动乱,这令洪堡感到厌倦。美洲居民与欧洲来访者之间日常互动的踪迹,表明了产生欧洲人观察与认知的异质和异质话语关系(the heterogeneous and heteroglossic relationships)。这种洪堡谓之为“纯个人的”东西,被叙事性带出水面,从而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洪堡笔下的美洲对话者,在欧洲人对他们大陆的重构中,起到何种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洪堡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位文化互化者,将美洲本源的知识运输到欧洲,产生被非欧洲人知识过滤的欧洲知识?在殖民从属关系内,美洲人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铭刻在他身上,而他又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铭刻在美洲上?

此类问题很难由内而外地用资产阶级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认识文

132 本的方式回答——这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些问题不只针对洪堡，而且针对所有的旅行书写。每一个旅行记述都具有这种异质性维度；其知识不仅产生于旅行者的感性和观察力，而且产生于通常受“被旅行者”指挥和管理的互动和经验⁴²，这些被旅行者的行为是根据他们自己对他们的世界以及欧洲人正在或应该做之事的理解。例如，洪堡以自己是将海鸟粪当作肥料带到欧洲的第一人而自豪，这个“发现”最终导致海鸟粪激增，在世纪末引起秘鲁与智利之间的战争，并使后者经济上完全依赖于英国的银行家。当然，洪堡的发现在于海岸的秘鲁人告诉他这种物质及其肥土特性。谁知道他们的假定和期待是什么？旅行和探险书写的惯例（生产与接受），将欧洲主体构建成一种自负、一元的知识来源。这种结构实质上保证表征的互动历史将会仅作为踪迹⁴³，抑或通过“被旅行者”自己的表征形式出现，比如本书从头至尾多处提及的那种自传式人种志资料。

洪堡和邦普朗与西班牙语美洲知识分子的遭遇被记录了下来，是他们积极主动地去找这些人。西班牙将其帝国与外人封闭，让其余部分的欧洲对美洲土著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美洲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处于浑然无知的状态。然而，这些问题继续在美洲内部得到研究。（有必要重复指出秘鲁和墨西哥的大学始于16世纪吗？）我们被告知，洪堡和邦普朗特意远道去波哥大见穆蒂斯这样的美洲博物学家；让他们接触到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古代遗迹的，正是西班牙语美洲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洪堡在其考古论文中将一种美洲学术传统输送到欧洲，这一传统可上溯至第一批西班牙传教士，且得到西班牙、梅斯蒂索混血儿、土著知识分子的维持。洪堡在墨西哥的那一年（1803—1804），几乎全是在墨西哥城的知识分子和科学界中度过，他在那里研究已有的关于博物学、语言学、考古学的文集。回到欧洲后，他继续刻

苦地跟踪已经学到的东西,追踪被遗忘的美洲印第安人手稿,比如玛雅遗嘱附录;这些东西自从哈布斯堡王朝以来,一直尘封在巴黎、德累斯顿、梵蒂冈、维也纳、柏林的图书馆里。⁴⁴

因此,在克里奥尔人文化的某些部分中,一种被美化的美洲自然和美洲古迹,已经作为意识形态的构建存在。它是研究美洲的学者身份认同和自尊心的源泉,激起一种不断增强的与欧洲分离的意识。在这个有关殖民意义构建之镜舞(the mirror dance)的完美例证中,洪堡将美洲人界定自己为与欧洲分离的进程中产生的各种知识互化到欧洲。独立之后,欧裔美洲精英将会把那种知识作为欧洲知识再引入,因为其权威将会为欧裔美洲人的统治提供合法化依据。 133

浪漫主义的插曲

我提出的有关洪堡的作品的观点,常在文学批评家当中引发一种焦躁不安的反应。相当明显,洪堡在写作中只不过是做一位浪漫主义者,只不过是在从事浪漫主义,那么,有人问我,所有这种历史—殖民—意识形态阐释机制的意义何在?作为一名德国类型的浪漫主义者,他还能如何书写南美?人们只需要阅读《自然的风景》的“前言”就行了,其结尾是从席勒《墨西拿的新娘》引用的文字,讲的是自然在人类小心地改变其形态之前如何完美。在走出普鲁士之前,洪堡不正是席勒表示愿意在其杂志上发表的唯一科学家吗?比如,人们会不会认为,洪堡在其美洲《自然的风景》中只不过实施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1795)的计划——尽管席勒也许不这样看(他显然不喜欢洪堡)?难道不正是浪漫主义者要求进行“感性培养”吗?难道洪堡不正是试图用席勒规定的方式——“为接受的官能提供与世界最为多样性的接

触”——“栽培”其读者吗？⁴⁵人们为何需要哥伦布、西班牙殖民主义、独立斗争、奴隶叛乱乃至美洲去理解洪堡的写作方式？已经了解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一切，提供了一种极为令人满意的记述，却没有跳出欧洲抑或文学的边界。

如某些读者可能曾期望的那样，我会通过洪堡的美洲书写提出质疑的，正是这种满意和这些边界。如果说洪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那么浪漫主义就“是”洪堡；假如某种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东西，构成并“解释”洪堡关于美洲的作品，那些作品就构成并“解释”那个东西。认为前者简单地“反映”后者，就是以一种必然有待争议的方式，赋予文学和欧洲以特权。本书的观点将根据洪堡这样的作家和不断变化的与美洲接触这样的历史进程，重新思考“浪漫主义”（以及“文学”和“欧洲”）。因此，“浪漫主义”提供一种契机，重新思考将“欧洲”和“文学”想象为自成一体的实体的习惯，这些实体从内部构建自己，然后又向外投射到世界的其余部分。人们根据来自整个行星接触地带的被渗透、捐赠、吸收、挪用、强加的材料可以瞥见，将“欧洲”想象为也是从外向内构建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浪漫主义”塑造关于美洲、埃及、南非、波利尼西亚、意大利的新话语，那么它们也塑造它。（浪漫主义者当然是以分布在欧洲外
134 围——达达尼尔海峡、阿尔卑斯山区、比利牛斯山区、意大利、俄罗斯、埃及——而著名的。）此外，浪漫主义包括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变迁——尤其是美洲，确切地说，是美洲将自己从欧洲解放出来的过程。如果人们让洪堡与席勒脱钩，并将他定位在另外一条“浪漫主义”路线上——格奥尔格·弗斯特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t. Pierre）（洪堡个人偶像中的两位）、伏尔内、夏多布里昂、斯特德曼、布封、勒瓦扬、库克船长、撰写《布干维尔游记补遗》的狄德罗——那么，就

可能会认为浪漫主义发源于美洲、北非、太平洋的接触地带。

事实上,大约五十年前,这种观点就在南美被委内瑞拉作家特雷莎·德·拉·帕拉(Teresa de la Parra)在其自传体小说《布兰卡妈妈回忆录》(1929)中提出来。浪漫主义显现在拿破仑妻子约瑟芬皇后的形象中,她(就像引发法国大革命的财富一样)来自加勒比地区。“我相信”,叙述者说,

就像烟草、菠萝、甘蔗一样,浪漫主义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美洲]水果,它味道甘甜,隐藏在殖民地的倦怠和热带的慵懒中自然生长,直到18世纪末。大约那个时候,约瑟芬娜·塔舍,宛若一个完美的微生物一般,毫无疑问地将它裹在头饰的花边里带[到欧洲],把这种细菌以我们全都知道的那种严峻形式带给拿破仑;逐渐地,第一帝国的军队在夏多布里昂的帮助下,将这种流行的东西传遍每一个地方。⁴⁶

这一系列形象有着丰富的文化互化意义。文中提到头饰,让人想起美洲作为一名亚马孙女战士的画面,她头戴巨大的羽毛头饰,手抓头发提着一颗西班牙人头;细菌的形象让人想起梅毒作为帝国之病的历史,在此它通过其自己的掠夺者被输送回欧洲。同样的细菌,无疑是最终让约瑟芬皇后与艾梅·邦普朗走到一起的东西,后者从做她花园的管理人开始,最终成为她忠诚的朋友和知己。

有关浪漫主义起源的争吵,臭名昭著地不得要领。然而,强调被权威地称作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化互化维度,并非是毫无意义的。西方人习惯认为,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事业是从欧洲发散到殖民地边缘的,而不怎么习惯思考从接触地带反向进入欧洲的发散。就18

世纪80年代导致安第斯山脉印第安人起义、南非叛乱、巴西蒂拉登特斯人叛乱、圣多明各推翻白人统治的革命以及接触地带其他此类事件的紧张关系来说，欧洲受到的影响确实超过其所施加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趣地认为，与通常的扩散论分析相反，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在美洲确定，并于19世纪输送到欧洲。⁴⁷

我认为，人们需要寻找一个类似的相关视角，看待经常与洪堡联系的美洲之争。因为关于美洲自然假设的不成熟和等级低下的争论，确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欧洲抑或科学的问题。正如安东内洛·杰尔比记录的那样，来自美洲的知识分子在关于自然的争论中，是积极且兴趣浓厚的参与者，就像他们在同时发生的关于奴隶制的争论中一样。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具有迫切的重要性，假如没有美洲的参与，这两场争论都不可能形成一场争论。

且不说与不同大陆及其生态系统的相关年龄有关的具体争论，美洲之争的意识形态维度，取决于将美洲与欧洲捆绑在一种本质化否定性关系中的尝试，也就是殖民语义学的中心点。当然，这种尝试是当欧洲在美洲的殖民事业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进行的。一方面，全球探险正在展示大量的新现实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欧洲的殖民控制明显处于危险之中。这里的社会呈现出它们自己的生命。在某些情形下，这里的美洲知识分子正在构建与欧洲相关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积极的、去殖民化的想象。这里非欧洲的多数人正在坚持自己反对欧洲控制的主张。即便是在白人霸权稳固的地方，正在产生的社会也与它们的欧洲祖先大相径庭，并将在去殖民化时变得更加不同。这些社会将会是多种族的，许多是非白人占主导地位，最好的情况下是参差不齐的基督徒；它们永远不会实行君主制；它们将会根据奴隶制、种植园制度、大庄园、米塔⁴⁸的形态构建，欧洲人发明这些制度并从中渔利，但是其作



图25: 洪堡,《地理和物理图册》(巴黎,1814)。这幅寓言画描写一位战败的阿兹特克勇士王子受到智慧女神雅典娜和贸易神赫尔墨斯的安慰。背景中矗立着墨西哥帝国的两个重要地标: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和乔卢拉金字塔。说明文字是:“人类、知识、经济。”

为社会和文化形态在欧洲并没有丧失生命力。它们甚至将会是欧洲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控制的社会。

的确是神秘的力量!杰尔比提出,洪堡凭着其肯定性、总体化想象,让大西洋两岸的焦虑都平息下来,在基于欧洲的行星范式之内重新证明美洲的正确。杰尔比说:“多亏了洪堡,西方思想最终实现对那些地区的和平征服,以及其与自己世界,唯一宇宙的智性兼并;在那之前,那些地区只不过是一个让人好奇、惊愕、嘲笑的对象。”⁴⁹洪堡1814年的《地理和物理图册》扉页上有一幅寓言画(见图25)。赫尔墨斯和雅典娜正悲哀地俯视一位战败的阿兹特克人王子,他低垂着头颅,武器躺在地上。赫尔墨斯(贸易神)抓着武士的胳膊,雅典娜给他一枝毫无疑问非美洲的植物:橄榄枝。背景处高耸着钦博腊索雪峰。不过,人们疑惑的是,兼并是否真的那么和平。也许在洪堡的作品中盘旋的秘密事件、
137 无形能量、突如其来的寒风,象征着如此清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对于洪堡的仰慕者西蒙·玻利瓦尔来说,这些象征的确如此。“一座巨大的火山位于我们脚下,”玻利瓦尔在取得对西班牙的胜利后写道,“谁将控制被压迫阶级?奴隶制的枷锁将会打破,每一种肤色的人都将寻求主导权。”⁵⁰

如同我希望在下一章证明的那样,正是他们对社会力量的神秘化,使得洪堡的作品对欧裔美洲领导者和知识分子有用;他们在保持基于欧洲的价值观和白人霸权的同时,也寻求将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去殖民化。

附 言

即便其在欧洲的声誉逐渐消失或与其哥哥的声誉融合在一起,亚

历山大·冯·洪堡在南美官方文化中,也不可动摇地得到尊敬和复兴,恰恰因为他对该地区无条件、本质上的评价。一位评论者说:“我们心中播下对洪堡的记忆。”⁵¹这多么清晰地见证关于美洲的洪堡式欧洲神话(Euromyth)的遗产:说话者将自己构建成洪堡播种其言辞的土地。在欧洲神话内部,西班牙语美洲人几乎没有被给予其他任何存在形式,当然也没有声音:只有自然说话。

不过,也许还有其他更纠缠不清的谱系。图26中的粗麻布织物画,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秘鲁的出口艺术形式的一个例证,它吸收安第斯山脉娃娃制作和纺织艺术的古老传统。当代粗麻布画由城镇无产阶级妇女在母亲俱乐部制作,通常描写来自乡村生活的场景,就像这幅一样。这幅画标题是《丰收》,将传统安第斯人社群中农业生活的垂直组织置于前景。在顶部高高的牧场上,正在进行放牧,稍微向下长着在日常生活和求婚中如此珍视的花儿,然后是粮食和草,接着是土豆,就这样向下一直到热带山谷里的橘子和香蕉。这幅画表征一种生活方式;根据这种生活方式,社群在一年内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高度,在从热带到温带到几乎冻土带的各种不同条件下,种植形形色色的农作物。

将粗麻布画与上面图21中洪堡著名的带有标签的钦博腊索峰图进行比较。洪堡用他的图画描述安第斯山脉地区相同的垂直生态,在单一高度上有多种气候和植物类型共存。这两种表征都展示出一种非时间性的图绘,两者看来都打算赞美丰富性、多样性、细节。粗麻布画还与洪堡使用同样的供参考的文字标签(用一种欧洲语言)标注 *papas* 和 *sierra*, 西班牙语的“土豆”和“群山”。两种表征的差别也引人注目:粗麻布画描述一个充满人和家畜的社会空间,这些人和家畜的活动,如同植物世界一样有助于多样性。文字标签标志着传统安第斯文化的两个最有意义的元素:群山(众神之家)和土豆(非常重要的主食)。洪堡

的标签是参考性的、具体的，而这两种符号在粗麻布画中，则以一种内在于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可以想到，它们对安第斯山脉和宗主国受众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共鸣。例如，非安第斯人也许不知道居住在群峰叠嶂里的安第斯神，抑或土豆的治疗功效。而且假如他们确实“知道”这些事情，也是作为局外人知道的。比如，用西班牙语知道它们。而局内人则用盖丘亚语或艾马拉语弄明白这些事情。粗麻布画中贴标签的做法是从欧洲挪用的，似乎沿着不同于欧洲客观主义的路线前进。



图26：秘鲁粗麻布画（大约1米×1米，20世纪80年代，佚名艺术家制作）。这幅粗麻布画是一种用片状织物精工制作场景的艺术形式，描述安第斯山区农业生活的垂直组织。放牧的动物在高海拔上吃草，在那里人们也采集花草。许多种土豆种植在中海拔区域，而香蕉、橘子、其他水果则长在低地。羊驼作为负重牲畜到处都有。

但是,是否存在比较当代粗麻布画和洪堡1807年绘画的历史基础?为宗主国消费者制作⁵²的粗麻布画,是否假定了客观化、去历史化风景描写的西方传统?它是否提出一种人性化的反版本(counterversion)?它是否提供一种西方自己订购来对客观化传统进行补充的微型化的、“民俗的”反版本?另一方面,洪堡自己对钦博腊索峰的垂直阐释,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称作“不可思议的”⁵³,是否具有一种安第斯维度?带他到那里的安第斯人向导和翻译,是否向他转达过他们自己的生态系统知识以及他们对之的敬畏?

20世纪60年代,安第斯主义者开始迷恋于他们贴上传统安第斯农业生产的“垂直列岛”标签的东西。他们认识到,安第斯人社群由地球上已知的最为复杂的农业生态综合体组成。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和农学家在社会生态世界感到惊奇的,就是洪堡在植物世界曾经叹为观止的东西——同样,常常宛如他们“发现了”这种东西似的。粗麻布画制作者,是否如她了解抑或如她所知农学家了解的那样,在描述垂直列岛?她是否在再生产一种秘鲁民族神话?作为接触地带的一件产品,粗麻布画也许就是我在第一章称作自传式人种志姿态的东西,将宗主国话语的元素文化互化并创造出为宗主国接受而设计的自我肯定。在此类自传式人种志表征中,被征服的主体参与并寻求参与宗主国对它所征服的那些主体的构建。在这种陶西格谓之的“镜舞”中,洪堡笔下的美洲依然是一面镜子。

139

140

第七章

重构美洲之二： 资本主义先锋与女性社会探索者

序 言

据安第斯史学家讲述，从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时代起，安第斯贵族当中一直流传一种预言，说是英国人将会来到南美洲恢复印加王朝。¹1723年，这个预言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在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印加人皇家评论》新版的“前言”中，该书因其对本地精英造成潜在的叛乱影响而被殖民当局禁止。18世纪时，一本(引用一个拉丁语预言的)用西班牙语写成的书，居然被视为有可能在库斯科对印加贵族起煽动作用，这个事实既暗示当地精英作为一个对抗性社会团体保持一种身份的程度，又暗示他们与征服者的文化机构互联性的程度。自征服后的两百五十年间，他们已经适应西班牙人的统治，在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通婚并分享殖民开发成果的同时，一直保持独立的身份和政治抱负。

一个世纪后，等到英国人终于到来时，土著精英已不再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或政治力量存在。整个18世纪一直上升的土著精英的势力，在1781年叛乱之后的镇压浪潮中初次受到冲击，并最终被在独立斗争中胜出的共和力量所剥夺。然而，直到独立战争结束之时，神奇地与土著贵族存在联系的分离主义将军圣·马丁(San Martín)，一直为恢复印加王朝而战，并将此作为从西班牙独立的一条道路。在下面的内容中，圣·马丁作为在一位英国旅行者家中逗留的逃亡者短暂露面。这位英国旅行者对其特殊抱负背后值得注意的历史，有着弥足珍贵的不多的理解。她绝不可能见过安第斯人绘制的印加王朝十三人头像(参见图27)，也不可能见过圣·马丁本人身穿印加服装出现在其中的这幅画的新版本。²独立之后，印加王朝继续作为库斯科画家热衷的一个题材存在。他们有关印加王朝的系列绘画，最终成为一两个世纪后到来的英国旅行者中间受欢迎的纪念品。

141

资本主义先锋

紧随亚历山大·冯·洪堡之后，很多欧洲旅行者登陆南美洲。男人、女人、科学家、战士、投机者，所有来到那里的人全都兴奋不已。1825年，W. B. 史蒂文森(Stevenson)宣称，“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南美的陆地“发现于16世纪，可直到19世纪初，它们依然几乎默默无闻”；他这番话只是稍微有些夸大其词。³如他所言，仅仅二十年前，约翰·马维(John Mawe)“受到诱惑进行了一次范围有限前往拉普拉塔河的商业实验之旅”，可是他一到那里就立即被投入监狱，只是作为一名囚徒逐渐对内陆有所了解。⁴

到了19世纪20年代，南美革命已经成为欧洲兴趣的源泉；鉴于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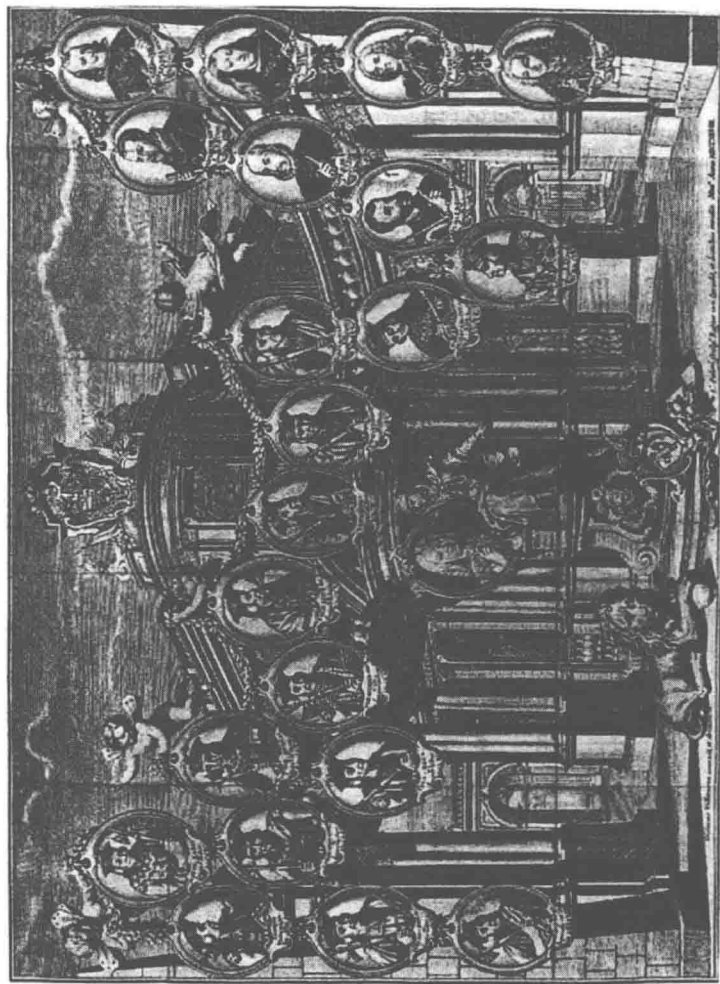


图27：秘鲁版画家何塞·帕洛米诺所作的印加西班牙王朝(1748)，根据阿隆索·德·拉·奎瓦一部较早的作品改作。这是一幅高度风格化、欧洲化版本的传统安第斯印加王朝绘画。按历时顺序，画是从曼科·卡帕克到阿塔瓦尔帕的十四名印加人的画像，跟在后面的是西班牙人征服后统治的八名西班牙君王的画像。在稍后某些独立时代的版本中，最后一个位置由西蒙·玻利瓦尔或者其讲盖丘亚语、身着印加服装的对手圣·马丁将军占据(特雷莎·希斯韦特，《艺术中的名人画像和土著传说》，拉巴斯，1980)。

法都是其主要的军事和金钱参与者，如史蒂文森所言，旅行者之“致力于写作”成为“一种几乎不可推卸的责任”。⁵这些革命也是使得旅行成为可能之物，它们开启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一种可与洪堡的科学和审美激情抗衡的力量。正如其他评论者说过的⁶，19世纪10和20年代的南美旅行者浪潮主要是英国人，他们主要是作为欧洲资本的先遣侦察员从事旅行和写作。工程师、矿物学家、饲养员、农学家以及军人——这些19世纪早期的旅行者，常被欧洲投资者的公司作为专家派往“新大陆”，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与当地精英接触和签订合约的机会，以及关于潜在风险、劳动力情况、运输、市场潜力的信息，等等。除了“特例”外，阿根廷史学家诺埃·基特里克(Noé Jitrik)说，

他们在没有意识到……欧洲经济不间断扩张的情况下，受到强烈的商业好奇心和各种工具的驱使访问我们；自18世纪末甚至更早以来，欧洲商业扩张就将知识与移植、科学兴趣与具体控制的需要、人道主义与生产和市场相结合。⁷

本章通过将他们的作品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作品以及美洲克里奥尔人自己的作品进行对比，讨论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美洲重构。讨论还涉及性别，因为这一波旅行者作家包括一些欧洲女人，她们属于这一文类中需要认真对待的第一批人。

到18世纪晚期，英国和法国的商业阶层，毫不掩饰他们对西班牙语美洲的设计。英国在1806和1807年入侵了拉普拉塔，均以失败告终，其在反对西班牙斗争的结果上有着长期利益。西班牙语美洲的精英，也不掩饰他们与北欧建立富有成效新关系的希望。克里奥尔人的首
143
领，经常不辞辛苦跋涉到伦敦和巴黎，寻求对他们努力的支持。比如，

西蒙·玻利瓦尔1808年就是这样遇见了亚历山大·冯·洪堡。1810年后,西班牙语美洲的革命果然爆发,充当雇佣兵的英国军官结果在反对西班牙的斗争,以及随后的内部冲突中极具影响力。数千名英国士兵和水手追随他们而来。一个英国军团为玻利瓦尔而战。在智利,像约翰·迈尔斯(John Miers)和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这种私人的欧洲商人,为共和事业提供了虽然并非总是心甘情愿的持续的资金支援。从1817年开始,玻利瓦尔的得力助手,是一个叫丹尼尔·欧利里(Daniel O'Leary)的爱尔兰人。

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移居海外的小型欧洲人社群在南美的许多首都形成,而且出现了各种经济冒险的机会。欧洲人共同痴迷于采矿业,对19世纪10和20年代间的英国投资来说特别是这样。西班牙人权威的衰落使得美洲许多著名矿山沦为废墟;振兴这些矿山需要大量资本和专门技术知识,这两者都是殖民地自身所缺乏的。外国人乐意介入;由于投资人准备迅速致富,矿业投资公司一夜之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迅速出现。西蒙·玻利瓦尔在1826年写的一封信中,重申他给予英国——“那位宇宙的女主人”——的厚望。他写信给同盟者桑坦德将军说:“如果我们能与她结盟,你就可以确信我们未来的幸福有了保证。”⁸

他们的未来没有得到保证,英国投资者的未来也没得到保证,至少在短期内得不到。在新生的共和国,多年战争和弃置导致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贸易和工业在后勤和技术上遇到的困难,结果远远超出预期。写于那个时期的好几本著名的旅行记述,都是由英国矿业协会派来调查其轻率的希望何以破灭的使者撰写的,譬如弗朗西斯·邦德·黑德(Francis Bond Head)的《数次穿越潘帕斯大草原和安第斯山脉之旅略记》(1826)、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的《从布宜诺斯艾利

斯到智利之旅》(1827)。的确,除信贷业务和阿根廷家畜业以外,英国最初在西班牙语美洲的投资热潮,到19世纪30年代大部分都已经退却。欧洲经济的渗透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报复性增长势头。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特别是英国资本以贷款形式涌入南美洲,用以修筑铁路和公路,对港口和矿山实施现代化,发展像秘鲁的硝酸盐以及阿根廷和智利的粮食生产这种新兴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好几个国家,包括刚刚提及的三个,经济上完全依赖于英国;更精确地说,依赖于英国证券交易所的投资人。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轨迹,既是西班牙语美洲的许多后独立时代的旅行者作家预料到的,又是他们设计的。我称他们为资本主义先锋。资本主义先锋远没有在其作品中将欧洲扩张主义的设计神秘化,而是倾向于将它们主题化——实际上就是将它们神圣化。约瑟夫·安德鲁斯将其1827年的《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智利之旅》献给英国财政大臣, 144 “因为[他的]政治天才和远见使得大不列颠有可能得到对南美洲新近解放国家全部的商业优势”⁹; W. B. 史蒂文森将他的书献给英国雇佣兵科克伦勋爵,“因为[他]对南美解放和大不列颠商业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¹⁰

有一条旅行线路尤其成为英国人南美旅行的经典英雄范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陆后,经陆路跋涉穿过阿根廷大草原,翻越安第斯山脉的科迪勒拉山,沿另一侧下山到智利或秘鲁的首都,最后从那里登船经海路回国。这是一条古老的路线,大部分在印加或前印加时代的路上。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贸易限制不允许布宜诺斯艾利斯与西班牙之间直接交往,致使这条路深度受损。前往阿根廷的货物和信件不得不先经利马船运,然后经陆路送到大陆的东南部。这种从利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折磨人的陆路跋涉,是西班牙语美洲殖民地范围内

写下的最著名旅行书的话题，这本书讽刺性的标题是《盲目行走指南》（*Lazarillo de ciegos caminantes*, 1771）。在一次新的但同样是帝国的计划中，资本主义先锋从相反方向进行了相同的旅行，依赖的是西班牙人曾经用过的相同的基础设施。独立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郊区迅速超过利马，成为跨大西洋商业力量的入口和中心，这些力量如同在北美一样向西流动。

与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不同，19世纪20年代这些旅行者并没有撰文赞扬他们认为新的种种现实；他们没有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原始世界的发现者；他们搜集的点滴自然是原材料的标本，而非自然之宇宙设计的碎片。在他们的作品中，沉思冥想的、审美化的关于发现的修辞，常常被以目标为导向的关于征服和成就的修辞所取代。在许多记述中，旅行路线本身就成为成功叙事的理由，旅行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成为一场胜利。被征服的是目的地，而非王国；被克服的不是军事挑战，而是后勤供给的挑战。旅行者们在不平等的战斗中与匮乏、低效、懒惰、不适、弱马匹、坏道路、坏天气、延误进行抗争。的确，在这种文献中，西班牙语美洲社会主要被编码为阻挡欧洲人前进的后勤供给障碍。此类事情很少被洪堡主题化（也没有英雄的潜能），可是对资本主义先锋来说，它们有时几乎令人着迷，这种旅行以寓言方式诠释前进的欲望。根据时间表进行写作的情况激增，如同约翰·迈尔斯书中的这段：

我们已经上路十三天，旅行一百八十里格，平均每天只有十四里格，而不是我们期望完成的二十五里格。我们已经进入较高的驿道，我并不会轻易认可劳工们在任何情况下总力劝我们接受的造成延误的借口。¹¹

注意，迈尔斯尤其匆忙，因为他是在妻子的陪伴下穿越安第斯山脉，而她马上就要临盆。她在一家驿站的地板上生产了；就像戈丹夫人一样，她因为一个自己从未写下的故事而成名。

正如人们也许会期望的，原始自然对于这些经济冒险家来说，吸引力比对洪堡及其门徒要小许多。原始自然确实不具有洪堡指派给它的那种固有的审美价值。正如让·佛朗哥(Jean Franco)曾讨论的那样，这股旅行者作家潮，确实在其作品中寻找一种自觉的反审美立场，引入实用主义、经济主义的修辞；这些修辞既不具备唯美主义，又不具备洪堡及其更文雅追随者的宽容。1815年，约翰·马维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没有能力描述“荒凉而浪漫的”拉普拉塔风景，而只是满足地惊呼：“对于一位富于进取的农学家来说，那是怎样一幅景色！现在一切都被忽视了。”¹²与洪堡形成直接对比，未开发的自然在这种文献中倾向于被视为令人不安的、丑陋的，其原始性本身就被视为人类事业失败的一种迹象。忽视成为一种消极审美的试金石，为欧洲的干涉主义提供合法化依据。¹³也许是受到洪堡审美描述的影响，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于1825年表达他对在安第斯山顶所见景色的失望。他引人注目地从金钱和支配的角度对这种失望进行编码：

在完全考虑到诗性夸张的情况下，我根据我在其他旅行者的记述中读到的东西认为，我当然应该能够将目光伸向智利，它被描述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像一张地图在我们脚下展开，用其无限、华美的景象回报我们的辛劳。¹⁴

相反，在他面前，“庞大的黑山无序地堆积在一起，似乎比我们已经走过的那些山贫瘠和野蛮许多”。1828年，查尔斯·布兰德(Charles Brand)

在土著人劳动的场面中感受到审美满足的同时,发现阿根廷大草原“贫瘠且荒凉”。当两支骡车队在一条小径上相遇时,他说“看见劳工们让他们自己的骡群彼此分开真是好极了”。¹⁵查尔斯·科克伦(Charles Cochrane)在哥伦比亚调查矿山和珍珠养殖的可能性时,撰文赞扬美洲风景,称之为“一台休眠的机器,正等待着被曲柄发动起来:

146 在那个国家,存在着干事业的每一种便利,成功的每一种景象:人只需要让整台机器动起来,这机器现在是闲置的;但是有了资本和工业,它就会被变得能够产生特定的优势和终极的财富。¹⁶

在这里,“人”显然指某个别的人,而不是这个国家现在的居民。对法国人加斯珀·莫利安(Gaspar Mollien)(《哥伦比亚共和国旅行记》,1824)来说,原始自然既令人厌倦,又无法解释。在下面的段落中,森林被文本化为一个不是意义密集而是意义缺席的场所;美在令他想起其故乡法国的人类驯服的风景中被发现:

穿越一片茂密的树林后,我们继续往上爬,直到抵达一个地点,一个真正壮丽的景象突然从那里出现在我们眼前——马里基塔全省都展现在我们面前,其群峰从我们所站的地方显现,但只是些不起眼的小山丘——然而,我们可以辨别出马里基塔白色的房屋。离我们最近的是翁达镇,镇子的墙被玛格达莱娜河水冲洗,葱茏的河岸为周围的风光平添一种特别的美。人们也许会以为它是蜿蜒流经诺曼底肥沃草地的塞纳河。然而,随着我再次钻进树林,这美景很快就消失了。¹⁷

描写以原始森林结束而非开始；洪堡及其追随者的异国情调和旁观者的审美化，被完全弃之不顾。有时，洪堡的作品被专门挑出来进行批评。史蒂文森发现它们“过于科学，涉及太少细节，因此变得不适合普通人阅读”。¹⁸（看起来，洪堡作品中缺乏的是后勤供给方面的细节，而这些细节能够为可能的访问者提供有关实际问题的信息。）在资本主义先锋的作品中，伊甸园田园牧歌特色常被一种现代化的、耗取自然资源的想象所取代，最好的例证是人们可以称作“工业空想”的一个转义语词。下面是1827年一位采矿工程师眼中安第斯山脉的景象：

凝望最近的山脉及其高耸的峰顶，唐·托马斯和我自己在巨大的山坡上建立起空中城堡。我们挖掘丰富的矿脉，竖起锅炉进行冶炼，在想象中看见一群工人像繁忙的昆虫沿着高处运动，幻想着蛮荒而广阔的地区，那里充满不远万里到来的英国人的活力。¹⁹

如果说西班牙语美洲社会在洪堡的旅行书写中占据的是边缘地位，那么它却是资本主义先锋美洲记述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当地精英分子常因他们的好客、贵族生活方式、对欧洲人的欣赏而得到赞扬。然而，一般而言，西班牙语美洲社会因为落后、懒散，尤其是开发周围资源的“失败”而遭到无情谴责。反审美的忽视，被应用于美洲社会世界以及其风景。约翰·马维说：“虽然自然的祝福一直慷慨，可是居民疏于改进它们。”²⁰莫利安指出：“绝大部分土地处于休耕状态；然而，如果居民不那么冷漠，这些土地可以生产相当多的庄稼。任何鼓励措施，都不能将他们从懒惰习惯和日常惯例中唤醒。”²¹据约翰·迈尔斯所言：“村庄外的人们虽然生活在最肥沃的土地上且没有事情做，但是他们从不耕种一丁点儿土地。”²²资本主义最大化、耗取自然资源的范式被假定，从而将

147

生存和非积累性的生活方式神秘化。

在这种文献中，西班牙语美洲经济生活的失败，不仅是简单地被诊断为对工作的拒绝，而且也被更具体地诊断为对生产实施合理化、专门化、最大化的失败。欧洲访问者表示失望，是因为那里没有围墙和栅栏，人们对区分杂草与庄稼态度冷漠，对庄稼多样化缺乏兴趣，（特别令约翰·马维苦恼的是）没能“保持”狗、马甚至他们自己的“血统”。克里奥尔人（即欧裔美洲人），尤其是在未开化的内陆，因没能养成现代消费习惯受到同样有力的批评。尽管人们常对未开化社会的如画美表达出热情，但是一批又一批幻想破灭的旅行者，抱怨克里奥尔人对舒适、效率、清洁、变化、品味这些美德的冷漠。此类批评在阿根廷特别有效，那里的“内陆”，那个国家离秘鲁的总督首府最近的部分，是该地区最发达而非最不发达的部分。因此，对阿根廷未开化社会的批评，不仅是指向加乌乔人勉强糊口的生活，而且指向殖民地精英基于大庄园的传统文化。约翰·马维声称，自己几乎不能设想一个社会的成员，甚至包括特权者，选择靠牛肉和马黛茶为食的生活，更不用说容忍这种社会。在殖民地内陆，一连串的抱怨产生了。人们发现住处令人讨厌地粗糙，马匹很难找到，延误难以忍受地长久。同样令人恐惧的是共用餐盘、饭锅、水杯、床铺。雇员们懒惰、撒谎、欺诈。如同在非洲一样，全体居民的“龌龊习惯”是不变的评论话题。很多时候，美洲的女性正是在这种不得体的场合罕见地出现。到达利马后，查尔斯·布兰德是许多旅行者中唯一宣称利马女人令其反感的，原因是她们“邋遢肮脏”，“抽烟”，“从不穿胸衣”。²³（有关弗洛拉·特里斯坦对利马女人显著不同的描述，参阅下文。）约翰·迈尔斯记录过在阿根廷大草原的一种类似印象：“这些人的肮脏习惯就是这样，没有人曾想起过洗脸，很少人洗补衣服：衣服只要一穿上身，白天黑夜都不会脱下，直到腐烂为止。”²⁴

这一连串批评当然根植于彻头彻尾的虚伪，因为最初为资本主义先锋的介入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正是美洲所谓的落后。在意识形态上，先锋的任务是将美洲重构为落后的、遭到忽视的，将其非资本主义的风 148

FATHER.	MOTHER.	CHILDREN.	COLOUR.
European.....	European.....	Creole	White.
Creole	Creole	Creole	White.
White	Indian	Mestiso	$\frac{6}{8}$ White, $\frac{2}{8}$ Indian—Fair.
Indian	White	Mestiso	$\frac{4}{8}$ White, $\frac{4}{8}$ Indian.
White	Mestiso	Creole	White—often very Fair.
Mestiso	White	Creole	White—but rather Sallow.
Mestiso	Mestiso	Creole	Sallow—often light Hair.
White	Negro	Mulatto	$\frac{7}{8}$ White, $\frac{1}{8}$ Negro—often Fair.
Negro	White	Zambo	$\frac{3}{8}$ White, $\frac{5}{8}$ Negro—dark copper
White	Mulatto	Quarteron	$\frac{6}{8}$ White, $\frac{2}{8}$ Negro—Fair.
Mulatto	White	Mulatto	$\frac{5}{8}$ White, $\frac{3}{8}$ Negro—Tawny.
White	Quarteron	Quinteron.....	$\frac{7}{8}$ White, $\frac{1}{8}$ Negro—very Fair.
Quarteron	White	Quarteron.....	$\frac{6}{8}$ White, $\frac{2}{8}$ Negro—Tawny
White	Quinteron	Creole	White—light Eyes, fair Hair.
Negro	Indian	Chino	$\frac{4}{8}$ Negro, $\frac{4}{8}$ Indian.
Indian	Negro	Chino	$\frac{6}{8}$ Negro, $\frac{2}{8}$ Indian.
Negro	Mulatto	Zambo	$\frac{5}{8}$ Negro, $\frac{3}{8}$ White.
Mulatto	Negro	Zambo	$\frac{4}{8}$ Negro, $\frac{4}{8}$ White.
Negro	Zambo	Zambo	$\frac{1}{2}$ Negro, $\frac{1}{2}$ White—Dark.
Zambo	Negro	Zambo	$\frac{7}{8}$ Negro, $\frac{1}{8}$ White.
Negro	Chino	Zambo-chino	$\frac{1}{2}$ Negro, $\frac{1}{2}$ Indian.
Chino	Negro	Zambo-chino	$\frac{7}{8}$ Negro, $\frac{1}{8}$ Indian.
Negro	Negro	Negro	

图28：选自W. B. 史蒂文森，《二十年南美生活叙事》(1825)的图表，描述“不同社会阶层在相同或不同名称下的混合”。尽管图表很详细，史蒂文森警告说，这个图“必须被认为是一般性的，不包括特例”。他提醒道，“我根据外貌而不是社会阶层的混合对肤色进行分类，因为我总是说，一个孩子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肤色比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多”(第1卷，第286页)。

景和社会编码成显然需要欧洲人带来的合理化的开发。殖民话语的研究者将会在此认出文明使命的语言，北欧人就是据此（为他们自己）将别人造就成“土著人”，简化的、不完全的人，这种人苦于没能变成欧洲人现在的样子，抑或将自己变成欧洲人想让他们变成的样子。资本主义先锋同样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力图利用的那些人的未来，是一种道德和历史的必然性。

- 149 习惯于思考与非洲有关的文明使命的读者可能会震惊地发现，相同的语言被用于西班牙语美洲后殖民地的民众——从大农场主、商人、小企业主、其他明显非部落的国民，到有在在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下三百年讨价还价生活经历的一系列土著社会。然而，这就是这种正规化、均质化的不平等的华丽修辞所具有的巨大灵活性。这种修辞向任何人或任何地方施加权力，只要那个人或那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不是根据工业生产的最大化、合理化机制和商品资本主义的操作原则得以组织。²⁵它容忍各种各样的矛盾。在西班牙语美洲，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对懒惰的判断与旅行者具体见证的劳动密集型的奴役完全兼容。旅行者自己的旅行需要的人类基础设施，要求成群的赶骡人和劳工，更不用说著名的安第斯背椅人，他们将欧洲人背在背上翻越科迪勒拉山（参见图29）。²⁶安第斯山脉的多数旅行者亲眼看见过这样的景观：土著矿工在科迪勒拉寒冷、易于汞中毒的矿山过着罄竹难书的生活，走向必然的死亡。这种反例对本质化的帝国之眼几乎不构成问题。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只需要看见一个闲着的人就能证明懒惰的特性。人们只需要看见污垢就能证明不洁的特征。在那些被观者也被倾听之前，这种本质化的话语权不受影响。

各种矛盾确实不时在这种文献中浮出水面。在大草原上，那些看似十分懒惰的人“却仍然健康、强壮、肌肉发达、行动敏捷”，约翰·迈尔

斯对此至少稍微感到迷惑不解。²⁷查尔斯·布兰德受到自由和平等的大草原社会的鼓舞：“他们像风一样自由、独立地生活，不可能也不会承认任何平凡对手的优越性。”不过，他觉得“同样奇怪”的是，这些自由主体居然自由地选择“肮脏和懒惰；尤其是女人……令人作呕地如此肮脏和懒惰。对于舒适，他们全然不知……”²⁸像罗伯特·普罗克特这样的其他一些作家心胸较为开阔。弗朗西斯·邦德·黑德，在一个很受欢迎的戏剧性叙述中，表达对整个话语的不满。在其《数次穿越潘帕斯大草原和安第斯山脉之旅略记》(1826)中，黑德攻击性地将其同胞的价值符号颠倒过来。在讲述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智利的经典旅行时，黑德对自由自在的大草原生活表达狂热、绝对的热情，他实际上将这种生活理想化。他还将其生态理想化，认为只要听其自然，大草原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庄稼轮作且杂草不生。黑德大声谴责对潘帕斯大草原印第安人的怠慢和滥用。对安第斯矿工的致命剥削激起他深深的恐惧：“只有贪婪之心才会赞成将众多同类置于”如此荒凉之地。²⁹然而，黑德的结论透露出一种任性的天真：他感到惊讶的是，矿工们在可以轻易移居到大草原的情况下，居然会“心甘情愿继续过这么一种艰苦的生活”。¹⁵⁰³⁰无论如何，在商业使者们的记述中，他的记述以其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批评观以及其对文化的相对化视角而引人注目。

勉强糊口的生活方式、非金钱的交换制度、自足的地区经济，这些都是对扩张资本主义的诅咒。扩张资本主义只要一发现它们，就力图将其加以诛杀。资本主义先锋话语的底线一目了然：美洲必须被改造成一个工业和效率的景象；其殖民地人必须从没有嗜好、等级、品味、现金，而且懒惰、无差别、不洁的民众，被改造成雇佣劳动力和宗主国消费品的市场。在独立后寻求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的自由主义的城市西班牙语美洲克里奥尔人，广泛共有这些雄心壮志。不过，他们尽管似乎



图29：安第斯山区的背椅人，正在将一个欧洲人背在背上翻越科迪勒拉山。尽管下着雨，乘客完全有可能被描绘成在读一本书，因为这是在从事这类旅行时推荐的消磨时间方式。选自E.安德烈：《如画美洲》中的《赤道美洲》（巴塞罗那，1884）。

不反对资本主义先锋的话语，但是并非将其全盘接受作为自己的话语。我在下一章将会讨论，恰恰是因为这些克里奥尔人不是资本主义先锋，而是这一地区的主人，所以他们才倾向于借助其他途径表达其现代化的、共和的愿望。

女性社会探索者

虽然资本主义先锋经常得到女性的陪伴，可是他们将自己编造进一个完全男性的、英雄的世界。在考察由同一时期的女旅行者写的作品时，该世界构建的性别化特征就变得一目了然——先锋们对这些女性并不赞同。

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的旅行书《一个流浪者的漫游》1838年从秘鲁抵达巴黎，这时她的雕像却在利马和阿雷基帕遭到焚烧。至少，秘鲁上层阶级的某些成员并不喜欢她描绘的画像，虽然她曾于1833至1834年在他们当中生活过一年。至于她在“序言”中就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国家事务发表的冗长说教，欣赏者也许更是寥寥。特里斯坦因其秘鲁经历变得激进并得到了力量，接着就成为法国最著名的前马克思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员，成为工会的创始人。多年后，她女儿艾琳将以寡妇身份返回秘鲁，带着她的小儿子保罗·高更；他将会像其非凡的外祖母一样，在接触地带成名。

弗洛拉·特里斯坦是独立之后数十年间撰写有关南美旅行的著名记述的两位女性之一。她的作品以及英国旅行者玛丽亚·考尔科特·格雷厄姆(Maria Callcott Graham)的作品(《巴西之旅》和《智利居留日记》，1824)是我在本章第二部分的话题。这些文本凭借自身实力就令人痴迷，它们与资本主义先锋的文本形成有趣的比较，暗示资产阶

级女性旅行书写在19世纪前半叶开始成形之时的某些轮廓。这些文本还构成我一直称为美洲之重构的另外一副面孔。

弗洛拉·特里斯坦是法国女性，她嫁给秘鲁贵族，阿雷基帕富有的特里斯坦家族的儿子。她生长在法国一个西班牙语美洲人精英经常光顾的家庭里，这些人中包括西蒙·玻利瓦尔。³²由于父亲早逝且没有立下遗嘱，弗洛拉和妈妈突然陷入贫困之中。特里斯坦很小就到印刷所工作，为摆脱困苦嫁给印刷所的主人。这场婚姻是灾难性的。到二十五六岁时，她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活了下来。这时她已经和丈夫分居，并已经就孩子的监护权与其卷入一场将会是无法形容残忍的、毕生的战斗。（最终，在一场非常知名的丑闻中，特里斯坦的前夫用枪射中她的后背。她活了下来，而他在狱中关了多年。）这段残忍的婚史，加上性别的原因，导致她丧失本该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和地位，构成特里斯坦终身致力于女性主义和经济公正的基础。

为养活自己和孩子进行八年的斗争之后，特里斯坦做出一个不顾一切的决定，前往秘鲁，希望向父亲的家庭索要一份继承权并由此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在三十岁生日那天乘船离开。据她讲述，她的秘鲁亲戚们热情接待她，但是家族的当家人，著名的保皇党人皮奥·特里斯坦（Pío Tristán）却利用一种法律技术，否认弗洛拉的继承权（她获准得到一小笔津贴）。³³特里斯坦毫不掩饰对他拒绝自己的要求感到极度震惊。然而，她仍然留在秘鲁与亲戚们一起生活一年多，并在这期间经历政治觉醒，从而使得她在1834年返回法国后全力投入行动主义。

特里斯坦余生最后十年在法国和英国度过，为工人权利、“女性的完全解放、社会沿着合作路线的和平重组”从事写作和鼓动。³⁴除了一本叫《无产者靡菲斯》（1838）的长篇小说和许多散文外，她以旅行记述为伪装写书，对英国（《伦敦漫步》，1840）和法国（《法兰西之旅》，直到

1977年才发表)的社会状况进行批评。1843年,她发表了让她成名的著作《工会》,这是一部社会和政治宣言,旨在将法国男女工人团结成一个单一工会;这个工会将为工人阶级实现平等和公正,并最终带来法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对于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女性的完全解放是一切的前提。《工会》出版后的那一年,特里斯坦简直是拼着命为工会的事业工作。她开始一次法国工业城市之旅,在工人集会上鼓吹《工会》和她的思想。她受到政府当局的迫害,染上天花并于1844年末去世,当时她极有可能正在打算开始所希望的非暴力群众运动。特里斯坦在欧洲很快便被忘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及20世纪70年代,民权主义才让人们重新记起她。19世纪70年代,玻利维亚女权主义者卡罗琳娜·弗雷雷·德·海梅斯(Carolina Freyre de Jaimes)呼吁为特里斯坦重新辩护,这时她的故事就已在秘鲁重新被人讲述。20世纪30年代,秘鲁社会主义领袖玛格达·波塔尔(Magda Portal)同样在一部传记中将弗洛拉·特里斯坦重新改造,称颂她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先驱。今天,秘鲁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女权主义机构,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即:利马的弗洛拉·特里斯坦中心。

如今,玛丽亚·考尔科特·格雷厄姆的1822年期间《智利居留日记》的西班牙语版比英语版更容易找到。自其西班牙语译本于1902年出版以来,格雷厄姆的记述在西班牙语美洲越来越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关于独立期间智利社会和政治的一种感知和同情之源。格雷厄姆生于1785年,她与丈夫一起航行到南美时正好接近四十岁。她丈夫托马斯·格雷厄姆是一名英国海军上尉,奉命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提供帮助。格雷厄姆出发时是为人妻,到达时却为寡妇;丈夫在绕行合恩角的航程中死在她的怀抱里。她拒绝过一次直接返回英国的机会,留在智利在托马斯·科克伦勋爵(Lord Thomas Cochrane)的保护下生活

了一年(1822—1823),后者是从事独立事业的一位著名英国雇佣兵。1823年,也许是为了追随科克伦的行动,格雷厄姆转移到里约热内卢,在那里与葡萄牙宫廷(自拿破仑入侵葡萄牙以来一直位于巴西)产生联系。在1824年返回英国之前,她曾短期担任葡萄牙王室的家庭教师。

到南美旅行之时,玛丽亚·格雷厄姆已经是一位有经验的旅行者、旅行作家、政治观察家。她出生于海军家庭,在一位“极端开明的”女家庭教师指导下接受教育,并在二十岁刚出头时陪伴父亲(他一定也十分“开明”)去过印度。³⁵1810至1811年,她与丈夫一起再次逗留印度,从而产生她的第一本旅行书《印度居留日记》(1812),然后是《印度来信》(1814),接着是1820年的《罗马山中三月》。尽管书中没这么说,但格雷厄姆确实是将“军官和其他绅士”所写的日记日志加以编辑、编译,从而产生讲述乔治·安森·拜伦男爵1824至1825年太平洋远征的《皇家海军舰艇布朗德号桑威奇群岛之航》(1826)。在其美洲旅行之后,她翻译过一些政治回忆录,出版了一部《西班牙史》(1829)和一部《绘画史》(1836),并因其儿童书籍而闻名。³⁶

格雷厄姆和特里斯坦相继在两年内去世(分别是1842、1844年)。虽然她们的南美旅行时间上相差十年,地理上分别是在智利和秘鲁境内(对此存在激烈争议),但是两人都是南美独立斗争以及随后的政治和军事巨变痴迷且机敏的见证人。与刻板的印象相反,西班牙语美洲的政治戏剧在这些女性旅行者的作品中,比在资本主义先锋抑或洪堡门徒的作品中展示得更加充分。这是她们与男性旅行者之间诸多有趣的不同点之一。

我曾指出,资本主义先锋在组织其旅行书结构时,常依赖于对征服叙事进行目标导向、线性的情节设置。格雷厄姆和特里斯坦的记述则不是这样,虽然它们本可以这样做。它们以一种围绕居所的向心方式

设置情节，主人公从这些居所出发并返回到那里。两位女性都以在一个城市中心定居下来开始其叙述（格雷厄姆在瓦尔帕来索，特里斯坦在阿雷基帕）。虽然两人都没有进行漫长的内陆旅行深入或跨越这个国家到其他城市，但将叙事组织起来的正是这最初的确切定位。这些女性的叙述以城市而非农村为基础，还遵循一种不同的描述议程。社会和政治生活是个人介入的中心；各自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种志兴趣。在资本主义先锋的记述中，干涉主义的目标常常产生一种反动的、判断性的能量。尽管格雷厄姆和特里斯坦也带有这些目标中的许多，但是她们在周围发生事情的结果中并没有多少直接投注，而是沿着更具阐释性、分析性的路线写作。她们几乎像资产阶级先锋一样，强烈抵制感伤和浪漫主义。对她们来说，在接触地带的认同在于她们的个人独立、财产、社会权威感，而非渊博的科学知识、生存、冒险主义。和男性一样的是，这些女性也占据一个仆人和奴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她们的阶级和种族特权是预设的，而且一日三餐、沐浴、毛毯、灯具全都来路不明。

格雷厄姆在其1822年5月9日日记的开头写道：“我在瓦尔帕来索拥有自己的小别墅，在安静和独处中感觉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³⁷她抵达智利已经十天，丈夫的葬礼已过去一个礼拜。无论对于格雷厄姆还是特里斯坦，室内的世界是自我的所在；两人都给予她们的房子以特权，而且最重要的是让其私人房间获得避难所和幸福之源的地位。格雷厄姆详细描述她的房子，包括从门窗看见的风景：智利最初将要从内部观看。（这让人们记起安娜·玛丽亚·福尔肯布里奇从一个客厅窗户向外看，看见奴隶院落的情景。）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室内的私人世界并不意味着家人或家庭生活，而实际上意味着家人和家庭生活的缺席：它首先是一个孤独的场所，孤独的主体性为动身进入世界整理



图 30:《从我的房子看见的瓦尔帕莱索湾风景》,玛丽亚·格雷厄姆,《智利居留日记》(1824)。注意这个风景是从室内视角构建的。

自己、创造自己的私人场所。特里斯坦住在亲戚的家中，她常常描写自己打破社会习俗，退至她的房间整理自己。这些房间本身变成她主观和相关状态的寓言：

这个房间，至少二十五英尺长二十五英尺高，只有装在墙上很高处的唯一的小窗户给光……太阳从来未曾穿透这个套房，其形状和氛围与地下洞穴没有什么不同。打量着家人分配给我的地方，一种深深的悲哀弥漫我的灵魂。³⁸

在女性旅行记述中，家庭环境比在男性旅行记述中（其中人们的确很难发现甚至是对房子内部的描写）的在场更加突出；这个可以预见的事实，不只是一个不同兴趣或专业知识领域的问题，而且是与构成知识和主体性的模式有关的问题。如果男性的工作是收集和拥有别的一切，那么这些女性旅行者则首先力图做到镇定和自制。她们对领土的要求就是私人空间，一个个人的、房间大小的帝国。格雷厄姆和特里斯坦描写自己从这些私人的自我所在脱身而出，参与探索世界的环形远征，这先将她们带进新鲜的公众世界，然后又将她们带回到熟悉的封闭世界。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这种范式的一个版本，当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轮回访问。这两位女性都周旋于克里奥尔人和被流放者的精英圈。格雷厄姆带着其读者访问总督，与其女主人喝茶，拜访像诗人梅塞德丝·马林·德·索拉尔（Mercedes Marín del Solar）这种受过教育的女性。特里斯坦对秘鲁社会较少宽容，反复抱怨频繁访问的乏味。更激发她兴趣的是像圣周游行、神秘剧、狂欢节庆典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内战这种景观。

同样与这些书相关联的，是19世纪初城市中产阶级女性认同的更

具体的探索活动。社会改革者和慈善工作者的政治工作，包括参观监狱、孤儿院、医院、女修道院、工厂、贫民窟、救济院以及其他社会管理控制场所的实践。德国批评家玛丽—克莱尔·霍克—德马勒(Marie-Claire Hoock-Demarle)用女性社会探索者(*exploratrice sociale*)这个术语，讨论弗洛拉·特里斯坦及其同时代德国人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的作品。³⁹在秘鲁，特里斯坦对阿雷基帕众多女修道院的生活很感兴趣，她访问过一座军营、一家面粉厂、一个甘蔗种植园以及

一家医院、一座疯人院、一个孤儿院，所有这三处在很大程度上管理都很差……只要儿童被给予足以维持悲惨生命的东西，慈善的义务就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更有甚者，他们没有接受教育或训练，所以但凡能活下来的最终都沦为乞丐。⁴⁰

这个标签也适用于玛丽亚·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在智利的社会探索包括访问一座监狱、一个工艺美术村落、港口、市场、年轻姑娘宗教静修所：“在静修所，这些如此退隐的年轻人在一位老牧师指导下，正日夜祷告，很少进食和睡眠，以至于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衰弱不堪。”⁴¹

正如此类引文回忆的那样，书面或口头批评对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社会探索不可或缺。这种制度性的批评，显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先锋提供的基于品味的对美洲人生活习惯的谴责——尽管两者都同等地根植于阶级价值观。文明使命的另外一个分支，社会改良主义，可以说在接触地带构成一种女性形态的帝国介入。当然，这不是说，对品味的批评专属于男性。弗洛拉·特里斯坦满怀热情地沉湎于其中，更甚于许多男性作家。她发现阿雷基帕的烹饪“令人厌恶”：

阿雷基帕的山谷十分肥沃，可是蔬菜质量很差。土豆淀粉量少，大白菜、生菜、豌豆又硬又不好吃。肉类发干，家禽硬邦邦的，宛如出自火山一般……我在阿雷基帕唯一喜欢的东西，是修女做的蛋糕和其他美味。⁴² 157

霍克—德马勒对女性社会探索者的研究，尤其集中在女性作家用来讲述其探索并架构其批评的语言上。“女性探索者”和“探索”的措辞由霍克—德马勒引入，以将这些“论辩女性”的作品与官僚作风的“研究”和“研究者”区分开来，后者的权威性话语是统计学和技术性描述。她认为，女性社会探索者瞄准广泛的受众，避免使用根植于专门知识的特殊化的统计学语言，取而代之以小说实践表达她们的发现，产生一种“在风格层面的文学范畴与社会范畴的微妙融合”。当然，对统计学描述的拒绝，与她们作品的对抗性，特别是对抗统计学的力量存在各种联系。霍克—德马勒说，她们采用现实主义的小说语言，这使得女性社会探索者能够

避免官僚技术的陷阱，也就是官方男性话语的禁区，她们认为这对大众的影响甚微。她们还摆脱正在开始的，不是不成功的，利用小册子这种样式的温和的社会情感。⁴³

霍克—德马勒的风格短评用于特里斯坦和格雷厄姆的南美书写都很恰当。例如，总是好问的特里斯坦参访利马附近的乔里约斯海滨胜地时，向一家制糖厂做过一次游览（“在那之前我只在巴黎的植物园见过糖料作物”）。她用一种解释性但非技术性的语言，凭经验描写这个地方：

我对用来榨甘蔗的四台压榨机很感兴趣；它们由瀑布提供动力。将水输送到制糖厂的渡槽十分完美，因地形方面的困难建造起来花费很多。我走到放置熬糖瓮的那个大棚，然后我们接着前往毗连的制糖厂，食糖在那里被从糖浆中分离出来。⁴⁴

毫不奇怪，这次访问给了她一次向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发动文字攻击的机会。特里斯坦通过与种植园主冗长、戏剧性的对话，用小说的方式提出批评；而她在对话中扮演的，则是启蒙女英雄的角色。然而，她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小说而非感伤小说的策略。正如以下选段表明的那样，特里斯坦的批评显现出在早期废奴主义书写中发现的感伤踪迹。

158 实际上，她部分通过挪用经济学措辞的一些元素确立自己的权威：

[特里斯坦:]“奴隶必须如此长时间工作，不可能行使购买其自由的权利。如果他劳动的产品会失去其价值，我肯定奴隶制将会被大大改善。”

[种植园主:]“怎么会如此呢，夫人？”

“如果食糖的价格与生产它的劳动支出的关系，和在欧洲的价格与劳动支出的关系相同，那么，主人在其失去奴隶造成的损失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就不会让他工作那么苦，并且会更好地关心他。”

“夫人，你谈到黑人时，就好像是一个只根据慈善家在议会所做的动听演说了解他们的某个人。不过很不幸，非常真实的情况是，如果不用鞭子，你不可能让他们工作。”

“如果是这样，先生，我就只能祈祷让你的制糖厂毁灭，而且我相信我的祈祷很快就会得到回答。再过几年，甜菜将会取代你的甘蔗。”⁴⁵

特里斯坦得出结论，称与老种植园主交谈“和与聋子交谈用处差不多”；而且她还颇为沾沾自喜地宣称，得知“一群英国女士”正在抵制奴隶制下生产的食糖，她极其高兴。与单声部、总体化形式的话语权威相比，特里斯坦试图找出并利用多声部。

尽管格雷厄姆和特里斯坦选择与小说有关的个人叙事和戏剧性话语，但两个人都不过多倚重于感伤的资源。格雷厄姆在丈夫葬礼后的悲哀，在一则一行字的日记中得到归纳：“我一直很不好；与此同时，我的朋友们在离港口有些距离的地方给我弄到一座小房子，而我正在准备搬进去。”⁴⁶ 特里斯坦没有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处理她的内心生活，但就她周围那些人来说，她往往是反多愁善感的。比如，她在书中很早就呈现出，看似当时著名的斯特德曼和乔安娜的故事一个刻意而为的相反版本（参见第五章）。在佛得角群岛与一位法国地主晚餐交谈期间，主人对她说，在奴隶试图毒害他三次之后，为了活下来，他被迫娶了“我的黑女人中的一位”。现在他妻子给他做饭，在尝过所有的东西之后，他才会吃。他们一起生了三个孩子，而且“她深爱着他们”。因此，特里斯坦说：“你不再想返回法国了吗？”“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回道。“是因为这个女人吗？”只要他发了财，他说，他就打算回去并让她一起回去，不过他知道她将会拒绝，因为“这些女人全都害怕大海”。即使遭到遗弃，妻子也不会抱怨：“她将会把孩子卖个好价钱，然后再找一个丈夫。”特里斯坦“因愤怒而脸红”。⁴⁷

在如刚才所引的戏剧性对话中，特里斯坦将自己构建和理想化成有进取心的、互动的知识探求者。玛丽亚·格雷厄姆做了同样的事情，和基于观者与被观者之间静态关系的客观主义认知方式形成对比。比如，在逗留智利初期，有一天，格雷厄姆出发访问一家陶器厂。她到了一个贫穷的村庄，那里没有她期望见到的工厂的任何迹象：“没有劳动

分工,没有机器,甚至没有陶艺工的转盘,没有任何有助于工业的东西,而我曾以为这些对于制作陶器这种手工行业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她发现一家人坐在一个小屋前的羊皮上面,有一堆刚准备好的黏土。“由于学习手艺的捷径是与我们希望向其求学的那些人混在一起,我在羊皮上落座,且也开始干起活来……那位老妇人,她似乎是领头的,非常严肃地看着我,然后看着我手里的活,告诉我如何重新开始。”⁴⁸格雷厄姆接着继续描述陶器制作过程,再一次使用解释性但绝非技术性的语言。与看客或统计学意义的观察者形成对比,格雷厄姆在此相当自觉地将自己描述成以参与的方式获取知识,而且是从一种幼稚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立场。然而,回忆起在第四章使用过的术语,出现在这里的是经验而非感伤。

格雷厄姆非但没有将手工陶制品当作一个需要改正的、落后的、可悲的例证对待,而且在这段插曲中将其表现为近乎是一种乌托邦,还是一个母权制的乌托邦。基于家庭的、非机械化的生产,由一位女性权威人物主持。可是即使在肯定非工业化和以女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同时,格雷厄姆也肯定欧洲人的特权。与她相比较,制陶工人保留基本的、被殖民的、可自由处理的品质——他们无条件接受格雷厄姆的介入,并且自发地扮演起格雷厄姆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当格雷厄姆用挑剔的目光注视村庄里她周围的环境时,她不是针对居民的疏忽、无知或失败,而是根据对贫穷的人道主义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这种判断也是否定的范畴:“要想象比林科纳制陶工村舍展示的贫穷更大程度的贫穷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地人向我指出他们的美景,漂洋过海登上积雪盖顶的安第斯山脉,那景色确实美不胜收。”⁴⁹

在其他场合,格雷厄姆明确批评其男性同行的客观主义知识。她讲述过一次午餐的经过,当时她“有机会观察到即使是明智之人如何

粗心大意地在外国发表自己的看法”。⁵⁰一位医师兼博物学家在赞扬一种名为库伦(*culen*)的植物的药性时提出,这种植物可以在智利种植。听闻此言,格雷厄姆回答说,当地人给她看过一种他们称作库伦的植物。但是那位专家告诉她这不可能,因为他“从未在此听说过这种植物”。格雷厄姆回到家里,在她房子后面的灌木丛中发现岩石上覆盖着这种植物。格雷厄姆本人是个业余博物学家,她讲述自己采集植物的经过时,有意将客观主义的、精英的知识,与当地入外行的专门知识混在一起。她将自己描述为这两种知识的有些天真的代理人。在描述一种叫“天使头发”的花儿时,她先是用一种明显非专业化的语言,并且很快转向当地的专门知识: 160

那种花成束密集生长,看似白蜡,中心带着淡淡的玫瑰色……这两种寄生物都被当地人认为是润肤剂,用于治疗伤口。

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的植物知识不够用,因此拿了一大把给一个邻居,人们普遍认为他熟知这些植物的特性。⁵¹

格雷厄姆发现,库伦具有抗拒邪恶诅咒的能力。

格雷厄姆也评论过资本主义先锋。她在骑马从瓦尔帕来索前往圣地亚哥途中,惊叹于从未读过对途中所见美景的描述。她对欧洲工业雄心的怀疑论,在她构建的海滨葡萄园的一幅栩栩如生的寓言画中得到概括:

我悲伤地看见大量非常好的机器,它们是被改装来用于轧制铜的,躺在海滨上,迈尔斯先生事先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小码头。某些政府成员曾经嫉妒地看待这种机器,因为其某些部分可以用来铸

币；可是，我担心，那种嫉妒不会促使国家买它，并因此改革他们自己铸币方面笨拙的程序。然而，这里躺着的转轮、螺丝、杠杠，等待着更有利的环境出现，从而使迈尔斯先生能采取进一步的计划。⁵²

政治和女性乌托邦

尽管官方历史当时是在战场上创造的，特里斯坦和格雷厄姆却将她们的房子和她们自己造就成政治理解和行动的特许场所。她们俩进入的精英社交圈，深深卷入那个时期的种种阴谋和巨变之中。格雷厄姆逗留期间，智利正在与秘鲁的保皇主义和君主主义堡垒进行战争（在其朋友科克伦勋爵的帮助下）。科克伦的雇主，阿根廷的圣·马丁将军，曾领导军队先是于1818年为智利，而后于1821年为秘鲁赢得独立。到1822年，圣·马丁正在为巩固其胜利进行斗争，既受到保皇派又受到自由共和派的抵抗，两者都抵制他建立一个美洲君主立宪政体的计划。共和事业的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拒不支持圣·马丁，于是1822年末，这位失望的将军离开秘鲁，前往智利。途经玛丽亚·格雷厄姆在瓦尔帕来索的房子后，他前往欧洲流亡。格雷厄姆在1822年的危机呈现之时对其进行详细评论。在提出忠告和判断（“假如我是一位立法者……”）的同时，她将自己描述成为了战俘进行游说之人，把自己的家当作开会地点和科克伦勋爵同盟者的避难所，并且在一个高潮性的插曲中，接待败退的逃亡者圣·马丁。

弗洛拉·特里斯坦对秘鲁的访问，处在相同危机的一个较晚阶段。在这期间的十年中，秘鲁经历过十二个不同的国家元首。特里斯坦见证了1834年政变之后的一段内战时期，这一政变将她属于保皇派的叔叔皮奥深深卷入其中。她还将特里斯坦家族的房子描述成一个当冲突



图31: 玛丽亚·格雷厄姆所绘“多娜·玛丽亚·德·耶稣”的画像,她是“一位年轻女性,最近刚在雷孔卡韦盆地战争中一举成名”。格雷厄姆补充道:“她穿的是皇帝部队士兵的服装,外加一条苏格兰格子呢短裙。她告诉我,那短裙是根据刻画一位高原人的图画改做的,作为最具女性色彩的军服。戈登们和麦克唐纳们对此会做何评说?”(《巴西之旅》,1824,第292页)。

导致在阿雷基帕当地爆发战斗时召开战略性会议的地方。在自己的记述中，特里斯坦深度参与这场危机，对自己的描述是向各方提供忠告，在危机中保持镇静，访问军营，勇敢地爬上屋顶视察战场（“只有一个有我那样大无畏本性的人，才能受得了在那里长期逗留”⁵³）。

由于其在秘鲁的政治参与以及个人希望的破灭，特里斯坦产生了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的雄心壮志。对她的转变起关键作用的，是秘鲁公共生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1829至1833年的秘鲁总统阿古斯丁·加马拉（Agustín Gamarra）的妻子彭恰女士（Doña Pencha）。彭恰女士是一位非同寻常、野心勃勃的女性，据说在其丈夫的任期内曾管理国家。她身着披肩马裤，横跨战马，领导抗击政变的军事行动，这场政变针对的是她选来替换其丈夫的那个人。特里斯坦在自己的书中详尽阐述这个女性尚武精神和领导的例子。另外一个女性战场现象同样令她感兴趣，那就是拉伯那人，即大量作为随军者生活在军营的土著女人，她们支撑着（主要是土著）军队，并在可能时参加战斗。在特里斯坦看来，拉伯那人的勇气、活力、自立，无疑证明了“女性在原始社会的优越性”。“如果男女受到类似的教育，”她问道，“对于处于更高级文明阶段的人们来说，相同的情形难道不会成为现实吗？我们必须希望，总有一天人们将会尝试这种实验。”⁵⁴

特里斯坦对拉伯那人的钦佩，以实例证明了对她和格雷厄姆行之有效的以女性为中心的视角，也证明了她们受益于法国革命和早期女性主义产生的女性权力形象。这两位作家都反复强调女性力量和英雄主义的例证。格雷厄姆刻画过诸如此类的人物：以“这些地方最好的驯马师”而闻名的女牧场主，她在巴西遇见的女步兵（参见图31），因拒绝读来自丈夫的编码信而遭到监禁和流放的前政客妻子，步行五百英里去圣地亚哥在军事监狱找到丈夫的女性。除彭恰女士（“这个真正具

有拿破仑式野心的女人”）之外，特里斯坦反复回到她表妹多明加的故事，后者被迫在一家女修道院过了十一年，将一具尸体偷运进来放在她的床上放火焚烧后得以逃脱。

这两位女性的记述还包括对可以恰当地称作“女性乌托邦”（feminotopias）之物的煞费苦心的构建。这些片断表现的是女性的自主权、授权、愉悦构成的理想化世界。特里斯坦独自在利马旅行，度过她逗留期间最后几个星期时，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女性乌托邦。她被利马女性的独立弄得神魂颠倒，欢欣鼓舞地说：“在利马，女性们那么自由且行使那么多权力，这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与之相比。”⁵⁵ 就像潘帕斯大草原上的弗朗西斯·邦德·黑德一样，她理想化地描述道：利马女士比男士个头高、早熟、易怀孕，无须美丽就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且智力和权力意志均远在男士之上。她们来去随意，婚后保留自己的姓名，戴男性珠宝，赌博，抽烟，穿马裤骑马，游泳，弹吉他。然而，她们缺乏教育，且十分无知。

居于特里斯坦的女性乌托邦之核心的，是对利马女士户外便装——萨雅加曼托（*saya y manto*）——独特风格的长篇分析。她认为这种服装对她们的社交和性自由很重要。萨雅是一种很紧绷的长裙，由很小的褶皱构成，它们能够“显示出整个身体的形状并且随穿着者的每一个举动伸缩”⁵⁶；曼托是一种头巾似的黑色外衣，能够完全覆盖除眼睛以外的头部和上身。这种服装为利马独有，它非常引人注目而且是插图画家的最爱（参见图32），即便外人批评它让身形毕现且令人恐怖地没有胸衣（参见上文查尔斯·布兰德，第151页）。特里斯坦对这种服装代码做了细致且透彻的女性主义分析。她认为，因为萨雅加曼托能够让女性四处走动而不被认出来，因此是她们自由的工具。其他作家标明为利马女性之不洁和凌乱的东西，特里斯坦则描述为一种策略

性的文化实践：

如果利马女性想使她们的伪装更彻底，她们就会穿一件旧紧身上衣、一件旧曼托和一条破烂不堪、没有褶皱的旧萨雅；但是为表明她们来自好的社会，她们穿着一尘不染的鞋子和袜子，拿着她们最好的手帕。这是一种可以识别的伪装形式，被称作 *disfrazar*（掩饰）。掩饰者被认为尤其令人尊敬，所以没有人会勾引她。⁵⁷

特里斯坦对萨雅加曼托分析的直接渊源，见于另外一位著名女性旅行者，英国女性玛丽·蒙塔古女士(Lady Mary Montagu)的作品。1714年，蒙塔古的丈夫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时，她曾经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居住到1718年。尽管她有生之年没能发表其书信，但是当那些书信于1763年真正出版时，在欧洲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特里斯坦肯定读过这些书信，因为她对萨雅加曼托的分析直接效仿蒙塔古女士对土耳其女性服装的讨论。蒙塔古同样对先前讨论土耳其女性的作家们“极端的愚蠢”进行谴责，她评论说：“很容易看到，她们比我们拥有更多自由；被允许上街的无论什么阶层的女性都会披戴两块平纹细布，一块覆盖着其脸部除眼睛以外的地方，另一块掩藏着她头部的所有装束。”在描述大量的身体覆盖物之后，她总结道，

你可以料想，这如何有效地伪装她们，大家闺秀与其奴隶之间没有区别；最猜疑的丈夫在遇见妻子时也不可能认出她来，而且没有任何男性敢在街上接触或跟踪女性。这种永久的伪装，让她们能够完全自由地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⁵⁸

十分有趣的是，玛丽亚·格雷厄姆文本中的女性乌托邦，还有一种明显东方主义的情调。她讲述过在瓦尔帕来索一次前往一个私人归隐园的远足，该归隐园由一位年长母亲和她的五个中年女儿管理。格雷厄姆带了位年轻的女性朋友去，她们在那里度过愉快的一天，最后享用经营者为她们准备的一顿大餐。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片段，充满寓言式的弦外之音，似乎独立于格雷厄姆叙事的其余部分。格雷厄姆本人调用了由女性随意维持的伊甸园意象。这个女性家庭得到表征所使用的语言，唤起并翻新欧洲传统，即将美洲寓言性地表征为一个女性人物，通常是一个胸怀裸露的亚马孙女战士的传统。她们到达时，迎接她们的母亲岁数极大，灰白的头发编成长辫子披在后背。女儿中最年轻的“看来至少五十岁，身体强健、身材匀称、丰韵犹存、腿脚灵活、声音好听”。⁵⁹格雷厄姆就这样对青春崇拜，只根据生殖能力评判女性的习惯，以及“新大陆”这个美洲形象本身提出质疑。在一个有着令人愉悦的东方主义氛围的场景中，女人们坐在地毯和垫子上吃橘子。她们后来分享的大餐以同样的方式出现，老夫人用手指拿取和分发食物，尽管她为两个欧洲人拿来了盘子和叉子。花园本身虽不事装饰却生长茂盛：里面没有家花，但有各种果树，包括像蛋黄果和番荔枝这种显而易见的美洲水果。在访问将要结束时，格雷厄姆突然转向巫术的话题：“在被其五个女儿围着的时候，她的面容中有某种东西，难以抗拒地让我想起命运三女神，我觉得几乎想要问她们是什么。”⁶⁰这个片段就这样结束了，一种异教崇拜、女性情欲、神秘姊妹的氛围将一切遮蔽其中。

如果说资本主义先锋的话语是由审美(或反审美)范畴与经济范畴的融合构造的，那么女性社会探索者的话语则将政治与个人融合在一起。先锋主义者倾向于将他们的叙述情节设计成由改造和支配的幻念所激发的对成就的追求，女性探索者设计的情节却是追求自我实现和

社会和谐 的幻念。这些特征在格雷厄姆和特里斯坦结束她们书的方式中显而易见，也就是在用高度政治性的语言将个人追求寓言化的那些片段中。美洲之重构，以一种洪堡和资本主义先锋都无法想象的方式，
165 与自我的重构不谋而合。

离开智利时，格雷厄姆构建出人们也许认为的一个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绕合恩角航行途中，她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短暂停留。这



图 32: W. B. 史蒂文森在《二十年南美生活叙事》(1825)中所作的《利马女性》，描绘萨雅加曼托。

个群岛是曾经的政治监狱，更加闻名的，是鲁滨孙·克鲁索的原型，亚历山大·赛尔扣克被放逐多年之地。在一次登岛期间，格雷厄姆发现自己独自在一片空地上，体验她自己版本的《鲁滨孙漂流记》：“尽管一开始我也许欣喜若狂地大喊，‘我乃目光所及处之君主/我拥有无可怀疑的权利’。可是我很快就感到，彻底的孤独异常令人难受。”⁶¹格雷厄姆拒绝了这有强烈占有欲的、领土的范式，引用柯珀(Cowper)的诗行结束：“宁愿居于报警声之中/不愿主宰这可怕之地。”当她失去丈夫，独自一人转身走向大千世界时，此类恐惧也许太真实了。(有关阿根廷旅行者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访问胡安·费尔南德斯时另一版本的《鲁滨孙漂流记》，参见下文。)

166

弗洛拉·特里斯坦也将她的离开时刻构建成一种政治寓言或个人寓言。当她计划搭乘的船只到达卡亚俄，她在船上居然发现了彭恰·加马拉女士，那位令她如此痴迷的女性政治军事领袖。加马拉令人绝望地衣冠不整，她一败涂地，正在流亡途中(被新任军事指挥官，弗洛拉的叔叔皮奥送到那里)。对彭恰女士的描述，也调用了美洲的寓言形象，一种实际上双面的形象。特里斯坦与她相遇时，加马拉夫人穿着一件鲜艳的绣花绸袍、粉色的袜子、白色的缎面拖鞋、红色的中国绉纱巾，是“我在利马见过的最美的人”，每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珠光宝气。特里斯坦说，“她新鲜、优雅、高贵的装扮，与她沙哑的嗓音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⁶²加马拉自己解释了这种奇怪的情况。这些“欧洲服装”不是她的，她说，而是她姐姐强迫她穿上的。长袍妨碍她的行动，袜子“让[她的]腿觉得很冷”，而且她担心雪茄会烧了纱巾。她用“唯一适合[她]的衣服”向弗洛拉描述自己：

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旅行一直身穿他们在我故乡库斯科制

作的粗布马裤,用相同材料做成的金线绣花的外套,带着金马刺的靴子。我喜爱金子;它是给这个国家带来声望的贵重金属,是一个秘鲁人能拥有的最好饰品。⁶³

在意乱情迷的“弗洛里塔”眼前,加马拉在一阵猛烈的痉挛中陷入崩溃,让她濒临死亡——这与仅仅六年后特里斯坦自己的死亡没什么不同,那时她已经在政治战斗中弄得精疲力竭。

1828年,《布莱克伍德杂志》上一篇古怪的评论抱怨当代旅行书写平庸无奇。批评的对象包括“无经验的新手”、“浅薄的花花公子”以及“浪漫的女性,她的眼睛,仅限于几间客厅,且她通过诗性虚构的媒介看一切事情”。⁶⁴ 请注意抱怨的事实,而非其内容:到1828年,已经有足够多的欧洲女性旅行作家出版著作,形成一个让男性抱怨的类别。她们当中有些人旅行到欧洲边界之外;一种文学应运而生,在接触地带确切地创造出与北欧扩张主义相连的女性关系、帝国的女性家庭属民以及各种女性帝国权威形态。弗洛拉·特里斯坦和玛丽亚·格雷厄姆是西班牙语美洲一系列女性旅行者中的早期例证,这些女性旅行者的记述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将会大放异彩:范妮·卡尔德龙·德·拉·巴尔卡(Fanny Calderón de la Barca),其经典的《生活在墨西哥》最先于1843年面世;出众的伊达·法伊弗(Ida Pfeiffer),她的《一位女士的环球之旅》面世于1852年;以及弗洛伦丝·迪克西(Florence Dixie)女士,《横穿巴塔哥尼亚》(1881)的作者,仅举几例为证。

在讨论关于美洲的女性旅行书写的产生时(上文第五章),我说女性接触旅行书写,似乎比她们接触旅行本身受到更多的限制。女性常常用诸如书信这种偶然的形式公布她们的旅行,就像蒙塔古女士在土耳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斯堪的纳维

亚(1794)和安娜·玛丽亚·福尔肯布里奇在西非使用的那样。玛丽亚·格雷厄姆使用的是男女都常用的日记形式。然而,弗洛拉·特里斯坦采用的是在资产阶级时代成为经典和权威的形式,自传性叙事。她将自己构建成其旅行及生活的主人公,提出直接对后世讲话的意图性。特里斯坦对权威的认领,直接依附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女性主义。并非巧合的是,早期女性旅行作家中许多也是女性主义者,并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写作,尤其是蒙塔古女士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特里斯坦写的关于秘鲁的第一个文本是一份宣言,标题是《论欢迎外国女性的必要性》(1835)。她在这个文本中展示女性海外旅行的必要性,奉劝女性通过旅行使自己接受教育。这份宣言本身,暗示资产阶级女性旅行的一种新的合法性。无独有偶,当特里斯坦的《一个流浪者的漫游》1837年付印时,维多利亚女王登上英国王位,准备编纂将会成为欧洲女性最出类拔萃的帝国追求之物:文明使命。与此同时,她的统治引起的幽闭恐惧症,将会招致另外一种特别可能在接触地带出现的人物:未婚的女冒险家,她们背对欧洲,逃离时代的限制,并间或重返欧洲,书写欧洲。

第八章

重构美洲/重构欧洲： 克里奥尔人的自我塑形

美洲是拥有人类神秘未来
的方舟且总有一天将显现；
然后永恒将会用手托举起
许诺给所有人的那份遗产。

何塞·马莫尔,《漂流者之歌》(阿根廷,1847)

只留意他想象的那些欢乐
他敏捷飞越那巨大的距离,
他声音嘶哑,精疲力竭,
抵达他希望的快乐的终点,
最终得到应准惊奇地观望……
一大片沙漠,铺满火山岩!

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

《美洲旅行者》(古巴, 1852)

1826年10月,西班牙束手无策于其美洲帝国的丧失;约翰·迈尔斯眼巴巴看着其在智利的铜业一败涂地;西蒙·玻利瓦尔击溃秘鲁最后一个保皇党堡垒;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巴黎辛勤撰写《个人叙事》第三卷;就在这个时候,一份新期刊的第一期在伦敦问世。这是一份名为《美洲目录》(*Repertorio Americano*)的西班牙语杂志,由委内瑞拉知识分子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创办。为寻求英国的帮助反对西班牙统治,贝略于1810年与玻利瓦尔一起旅行到伦敦。他身陷大都市之中,滞留伦敦十九年之后才于1829年返回南美,成为后独立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

贝略的《美洲目录》尝试为建立新美洲共和国的任务贡献知识及观念。他将自己变成欧洲作品的一个管道和过滤器,输送、选择有助于美洲建国进程的作品。他在创办计划书中允诺,这份杂志将会是“绝对美洲的”。有关物理和自然科学的部分,将只包括“直接和马上用于美洲的”材料;关于人文学科和智性道德科学的部分,将只包括“与美洲文化的现状保持一致的”材料。¹

《美洲目录》第一期包括讨论维吉尔和贺拉斯、气压表的使用和棉花的改善、时间的利用和哥伦比亚的革命进程的文章。上面还刊登有贝略写的一首长诗;从那时至今,这首诗一直被认为是“[南美洲]大陆上美洲主义文学的肇始和自觉的宣言”。²这首诗被认定为一首“美洲颂歌”,标题是《热带农业》。最初,这首诗准备引出一首名为《美洲》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史诗,可是贝略没能完成。对于当代后殖民读者来说,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创始文本之一居然是在英国写成并出版,而且是由在海外逗留十五年以上的某个人所为,还是一件未完成的总体工

作之一部分,这个事实看起来全然是对一种新殖民文化困窘的反讽性征候。但是在贝略看来,一种从欧洲向西传输的美洲主义,既不暗示着反讽,亦不暗示着一种困窘。这种欧裔美洲人的(克里奥尔人的)文化逻辑,是我在本章的话题。

贝略是为庆祝西班牙语美洲获得独立写的这首诗;他用一种发现的姿态唱响其“美洲颂歌”:诗的开头是“欢呼,哦,肥沃的地带”,仿佛第一次走近某个地方的旅行者在喊。诗人用一种很快在西班牙语中被取代的复杂的诗性句法,唱出一首对美洲自然的颂歌(字面的翻译系笔者所为):

Salve, fecunda zona,
que al sol enamorado circunscribe
el vago curso, y cuanto ser se anima
en cada vario clima,
acariciada de su luz, concibes!

欢呼,哦,肥沃的地带,
你划定狂喜的太阳漫游
的路径,受到阳光的爱抚
为各种多样性气候的每一个
生灵提供生命!

紧跟在对美洲自然财富的颂扬后面的,是一件件赞美之物:

Tú [fecunda zona] tejes al verano su guirnalda

de granadas espigas; tú la uva
 das a la hirviente cuba;
 no de purpúrea fruta, o roja o gualda,
 a tus florestas bellas
 falta matiz alguno; y bebe en ellas aromas mil el viento y greyes
 van sin cuento
 paciendo tu verdura desde el llano
 que tiene por lindero el horizonte, hasta el erguido monte,
 de inaccessible nieve siempre cano.

170

你为夏天编织重谷类的
 花环；你为翻气泡的木桶
 提供葡萄；
 你美丽的森林里不缺少丝毫水果
 的阴影，或紫、或红、或白；林中
 风吸收千种芬芳，
 数不胜数的畜群
 吃你的牧草，它们来自平原，
 平原的边界就是
 那座高山的地平线，
 它永远覆盖不可企及的白雪。³

这种罗列接下去还有四十行，用一种强烈美洲主义的情绪，赞美诸如甘蔗、胭脂虫红颜料、胭脂仙人掌、烟草、丝兰、棉花、面包果等美洲特有的产品。很多人讨论过维吉尔《农事诗》在这首诗中的影响。开篇的这

些诗行还带有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痕迹，将美洲描述为欧洲狂想式抵达话语中的原始世界。贝略在较早的一个题为《调用诗歌》(1823)的姊妹篇中直接提到哥伦布，呼吁“神诗”(divina poesía)离开“蔑视你天然质朴的有教养的欧洲”来到美洲，在那里“哥伦布的世界敞开其宽广的舞台”。⁴殖民反讽再一次大量出现。对质朴的要求是用西班牙语当时能够给予的最不质朴、最博学的诗性辞藻做出的；与此同时，这种有教养的西班牙语充满美洲(主义)的历史和物质参照——阿兹特克、亚拉维、考波利坎、丝兰——贝略恰当地认为有责任在脚注中加以解释。

这些解释性脚注中不少都引证一个人物：亚历山大·冯·洪堡，他在时间和文本意义上都超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与安德烈斯·贝略之上。作为一名在库马纳的年轻学生，贝略抵达委内瑞拉后不久曾与洪堡和邦普朗相遇，并且陪伴他们在当地几次远足。他持续关注19世纪10和20年代从巴黎传来的洪堡作品。每一期《美洲目录》问世时都会包括一段引自洪堡的话，由贝略挑选并翻译成西班牙语。贝略美洲颂歌的开头并非简单地类似于洪堡在《自然的风景》中对美洲的审美化调用。它重复并内化了洪堡的姿态，一直到著名的“森林”、“平原”和“高山，永远……的白雪”三位一体。

洪堡1814年宣布，“如果我的某些书页是从遗忘中抓出来的，那么奥鲁诺克河岸的居民将会带着狂喜的心情目睹……因商业而富足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自由民耕种的肥沃田野”。⁵关于奥里诺科河，他真是大错而特错，可是关于这本书，他是正确的。那些书页的确被抓出来。洪堡的作品成为19世纪20、30、40年代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塑造美洲和美洲主义意识形态必要的原材料——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先锋或者女性社会探索者的著作。他的著作是代表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独立的公

民文学的试金石，构想出了自豪的美洲主义的，而且同时，如文化史学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Pedro Henríquez Ureña)所言，不是欧洲但欧洲化的自我理解。⁶在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创始文本中，洪堡审美化的原始美洲，再三为新共和国的道德和公民惯例提供出发点。他为了欧洲对美洲的重构，被欧裔美洲作家文化互化进一种克里奥尔人的自我创造过程。这种文化互化，以及其挑选和创造的方面，是下文的聚焦点。

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与“欧洲化的”之间的区别囊括跨大西洋的挪用；自由主义克里奥尔人精英作为白肤色美洲人，最初就是通过这种挪用寻求审美和意识形态依据。此类依据难以获取，而且面对来自底层的震动或火山喷发十分脆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自由主义克里奥尔人的计划包含建立一个独立的、去殖民化的美洲社会和文化，同时又要保持欧洲价值观和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⁷在一种重要意义上，如贝略所言，美洲将依然是“哥伦布的土地”(大哥伦比亚是西蒙·玻利瓦尔为他希望建立的大南美洲共和国选的名字)。与此同时，克里奥尔人必须努力克服他们如此钦佩的欧洲人的贪婪，还要应对从属的土著人、梅斯蒂索混血儿、占多数的非裔对平等的要求，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在独立战争中战斗。在克里奥尔人等级内，自由主义者面临强大的保守势力，这些势力虽然支持独立，但反对诸如自由贸易、废奴、世俗教育乃至共和主义本身等变迁。⁸

人们不用认同克里奥尔人精英分子的兴趣和偏见，便能识别南美洲人在去殖民化时面临的种种挑战。“独立”并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过程，而是一个即便在他们写作之时仍在美洲被即兴创作的过程。当时，“去殖民化”和“新殖民主义”这些词并不存在。在南北两个美洲，这第一波的去殖民化，意味着开始一个(今天依旧)完全超出欧洲社会经

172 验的未来。毕竟,像殖民主义、奴隶制、种植园制度、屯田制、殖民贡物、封建使命论等“欧洲的”制度,并不是在欧洲被作为历史、语言、文化、日常生活得到实践。在这种意义上,独立时的西班牙语美洲的确是一个新世界,正走在欧洲宗主国并没提供多少先例的社会实验的道路上。被授权在美洲构建新霸权的精英分子受到挑战,要想象许多并不存在的事物,包括作为美洲共和国公民主体的他们自己。



173 图33: 安德烈斯·贝略在伦敦编辑的《美洲目录》第一期(1826)卷首插图。欧洲的自由神像拿着自由帽向美洲致意,美洲按照欧洲传统被描绘为胸部裸露的女性。

且让我强调安德烈斯·贝略《热带农业》中那些想象的某些作用。我先前表明，这首诗开头的诗行（“欢呼，哦，肥沃的地带！”）重演了洪堡重新发现作为原始自然的美洲的挪用姿态：也就是，重演了洪堡重演的哥伦布。然而，重要的意义在于，贝略只将发现作为一种姿态加以重复。六十行的自然狂想曲之后，贝略的诗歌突然改变方向，从歌颂转向劝告。他号召其读者“弥合战争深深的创伤”，开始行动认领荒凉之地：

Cerrad, cerrad las hondas
heridas de la guerra; el fértil suelo,
áspero ahora y bravo
al desacostumbrado yugo torne
del arte humana, y le tribute esclavo.
Del obstruido estanque del molino
recuerden y a las aguas el camino;
el intrincado bosque el hacha rompa,
consume el fuego; abri en luengas calles
la oscuridad de su infructuosa pompa.
Abrigo den los valles
a la sediente caña;
la manzana y la pera
en la fresca montaña
el cielo olviden de su madre España;
adorne la ladera
el cafetal ...

弥合,弥合战争深深的
创伤;肥沃的土地
现在崎岖且荒芜,让它
变成人类艺术异乎寻常的
束缚,向它致以奴隶的敬意。
让那河水记起水坝
和贮木场的路径;
让斧头砍伐纠结交错的森林
并让火将它耗尽;在长街上
展开其徒然浮华的黑暗。
让山谷保护
干渴的甘蔗;
让凉爽的山中的
苹果和梨
忘却母亲西班牙的天空;
让咖啡园装扮山坡。⁹

174

在上演欧洲看客的原始幻想之后,贝略创造出欧洲看客只会梦想到,但是其在场预示着的变化的未来。一种社会想象被引入可自由处理的空白的风景。这个文本意识到自己是基础性的,阐明了其自己版本的传播论的进步叙事,寻求将其合法化为一个集体的、霸权的事业。

这种想象的某些细节对那项事业来说很有吸引力。贝略对新美洲的幻想,是农业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尖锐地说,它既不是工业的、城市的,亦不是商业的。比如,与哥伦布和资本主义先锋的幻想形成显著反差的是,矿产缺席于贝略的自然财富目录,而且他号召开始的行动并不

包括采矿。商业也不在计划之中。撇开维吉尔不谈，这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决定。鉴于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商业、矿产在独立斗争中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利害关系，这种缺席因此显而易见。贝略坚决地从田园模式进入农业（乡村），而非工业和商业模式。资本主义先锋对品味的批评和消费主义惯例无处可见。相反，贝略劝告新共和国的居民们拒绝城市令人萎靡不振的罪恶，支持简朴的乡村生活：“哦，年轻的国家，哦，向着 / 惊异的西方举起你 / 刚加冕桂冠的头颅， / 尊敬这个国家，尊敬劳动者的 / 简陋生活及其节俭简朴。”¹⁰在为不怕辛劳的卑微农夫呼吁时，贝略和欧洲资产阶级一样，批评没能抓住其环境优化自身的传统偏狭社会。与此同时，无论雇佣劳动还是消费主义，无论洁净还是舒适，在贝略对陆地上朴素简单生活的呼吁中都没有地位。他的《森林志》所表达的非工业的田园生活观，也许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对英国工程师那商业化的、闪着贪婪之光凝视的怀旧或反动，而是对他们的一种对话式响应。

如同我下文将要考察的其他文本一样，美洲荒原在贝略的诗中，变成一种历史以及（而非代替）自然的事实。西班牙被界定为落后的力量，我们读到，其“野蛮的征服”破坏了阿塔瓦尔帕和蒙提祖马的田园和城市；美洲的儿子们现在必须为这种损失赎罪。这风景必须“忘记其西班牙母亲”。¹¹这首诗结尾的诗行将西班牙的战败与攀登安第斯山脉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而子孙后代将会因此让新美洲人名垂青史。积雪盖顶山峰的经典意象，就这样被挪用进共和国公民的想象。

解放事业的局限，出现在贝略用来想象其美洲主义农业天堂的语言中，尽管是以一种稀奇古怪的方式。关注文体的读者也许注意到，在上面引用的诗行中，句法没有涉及具体动作者。谁的手臂挥舞把树砍倒的斧头？谁将种植妆扮山坡的咖啡林？仿佛贝略自己也对这些事情感到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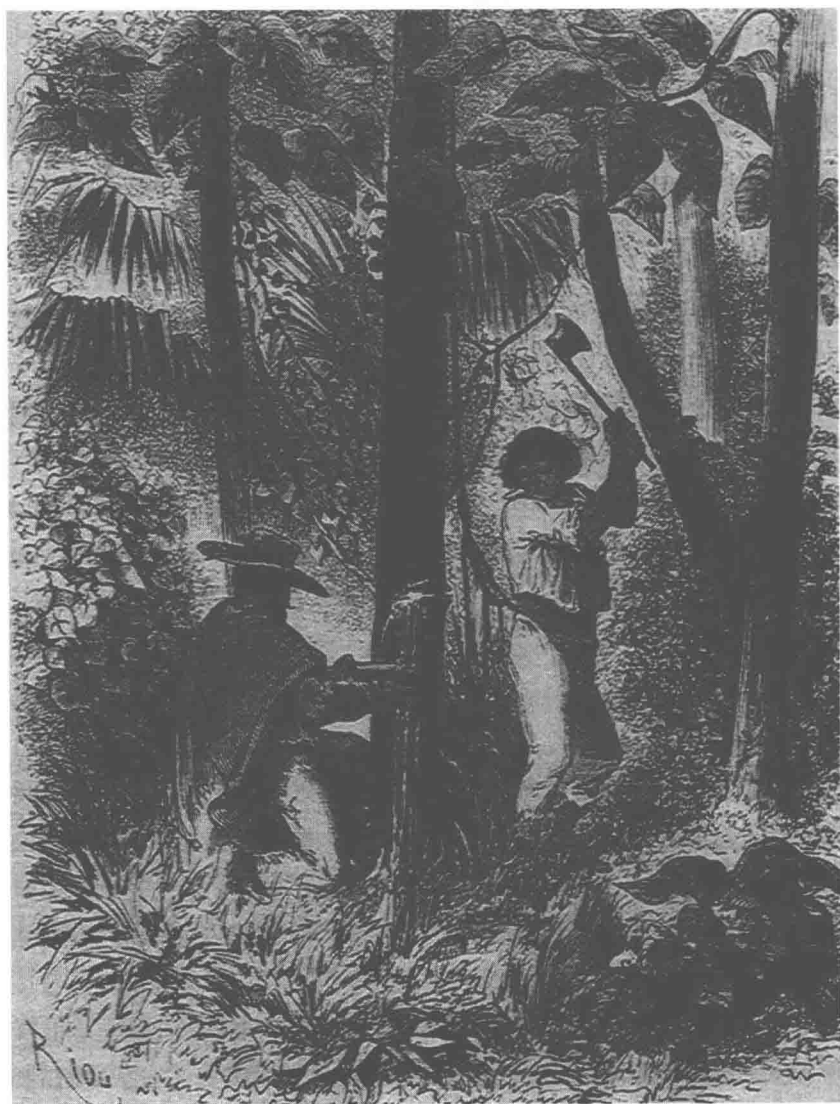


图34:《桑迪(奶牛树)的汁液》。E.里乌的版画,选自保罗·马尔科伊的《在南美旅行》(1875)。

不安(抑或仿佛他在预见解构主义批评)一般,他中断自己的描述,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重要问题。关于他描绘的景色,诗人问:“这是一个虚幻幻想盲目的错误吗?”仿佛为清楚解释这种疑问一般,看客的权威形象在诗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露面。文本写道,“我此刻凝视他们”, 176

侵入密不

透光的森林;我听见人声;

我感到混乱的噪音;铁器砍击的

声音在远处回响;古老的树干呻吟,

长久劳动的人群疲倦不堪;

经过一百次斧砍,它终于发抖,

劈裂,交出它富有的王冠。¹²

然而,疑问依然存在。这里的“他们”,依然被含糊地界定为“劳动的人群”——甚至这种朦胧的在场,也只是作为“远处回响”被发现。在涉及劳动与财产之间的具体关系时,看客的权力似乎消解成混乱的噪音、远处的声音、被看不见的手砍倒的一棵树。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在何处?”而是“谁在做这个工作?”和“为谁做?”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的抱负似乎不能表征自己。克里奥尔人的公民意识,往往甚至没有洪堡那样倾向于为自己表征何为美洲人:与西班牙的战争就是以他们的名义,并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打的;他们的劳动将会建立新的共和国;他们持续的服从形成欧裔美洲人特权的基础。在审美(如同在政治)领域,无法与不安宁的美洲大众打交道。

类似的情形在另外一次洪堡式的书页抓取中显现。那是一个出自西蒙·玻利瓦尔本人的文本,写于独立战争期间。到1821年末,玻利瓦

尔已经以南美伟大的解放者而闻名，这是他在巴黎遇见洪堡十五年之后。玻利瓦尔将刚建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交给桑坦德将军掌控，后者带着其军队和爱尔兰副手丹尼尔·欧利里一起占领厄瓜多尔的基多和瓜亚基尔。他完成了这个使命。第二年，他在厄瓜多尔度过，等待机会向秘鲁的保皇党堡垒逼近。也许是为消磨时光，玻利瓦尔组织了一次探险，攀登——当然是——钦博腊索峰。也许还是为消磨时光，他写了一本有关这次经历的个人记述，用洪堡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点。“我找出拉·孔达米纳和洪堡的足迹，”他说，“我已经访问过亚马孙河令人陶醉的源头，我希望攀登宇宙的瞭望塔。”¹³

当然，在洪堡本人1802年未完成的努力后，玻利瓦尔登山显然是攀登钦博腊索峰的第一次官方尝试。玻利瓦尔回忆洪堡生动讲述的海拔高度的物理效应，描述他如何“到达冰川地区”，在那里“乙醚让[他]窒息”。接近洪堡(如其所述)被迫返回的地方时，那位美洲人被“我浑然不知的一种精灵的暴力所控制”，使他能够继续攀登。“我将洪堡的足迹留在身后”，最终到达“那环绕钦博腊索峰的永恒的晶体”。¹⁴在峰顶，玻利瓦尔陷入一种神智昏迷的幻想之中，攀登钦博腊索峰变成作为美洲解放者的他自己史诗般的政治使命。“世纪之父”现身告诉玻利瓦尔，所有的人类成就在永恒面前都何等渺小：“你为何昏厥，孩子或老人，常人或英雄？……你以为你的行为在我眼中价值几何？”玻利瓦尔将原始高度与原始力量等同，回答说：“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什么样的血肉之躯不会昏厥？……我用我的双脚统治地球；我用双手摸到永恒……我在你脸上读到过往的历史和命运的思想。”于是那精灵命令他“观察、学习”，“为你同伴的眼睛描绘物理宇宙和道德宇宙的图画”，“把真理告诉人类”。然后，玻利瓦尔受到“哥伦比亚巨大声音的”召唤，恢复了神智。¹⁵

尽管玻利瓦尔追寻的是洪堡的宇宙足迹，但是这种神秘的精神错乱及其公开的父亲般的/政治的寓言与洪堡的想象和语言库存在的差异，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的。洪堡力图抹去他作为历史和政治主体的地位，而这正是玻利瓦尔站在钦博腊索之巅为自己索要的认可。洪堡的表征模式，依赖于知识与征服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差别；玻利瓦尔的叙述使这两者都土崩瓦解。它使得自然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寓言，将人类历史归于永恒。没有任何东西比玻利瓦尔调用的刻板象征主义，更能与洪堡审美化的科学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对洪堡来说，如他所言，将会揭示宇宙“神秘力量”的是科学——而非神秘主义、神志不清、鼓吹革命抑或剥夺氧气。

因此，在旅行和话语两个方面，玻利瓦尔都将他的欧洲前辈的足迹留在身后——只不过是在首先选择走他们的足迹之后。在克里奥尔人文学中，玻利瓦尔的短文在许多方面对洪堡的地位做了总结：作为美洲主义意识由此起步并试图超越的一个点。洪堡“对待博物学话题的审美模式”重现了一个原始状态的美洲，它现在将从那种状态上升到欧洲文明的辉煌。在由他作品而发的神话中（而且不应认为只有洪堡才要对之负责），美洲被想象为无人占领和认领的地带；殖民关系存在于幕后；欧洲旅行者自己的在场依然无可争议。我曾将这种构造称作一种反征服，它用神秘化的方式表达一种初始的扩张主义计划。正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这种神秘化本身，正是使得洪堡的作品对于试图重新想象其社会和他们的自己的克里奥尔人领袖和知识分子来说特别可用的东西。

178

等到天黑

当人们读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时期的经典文学文本时，会被震惊的

是，洪堡那么经常地被调用来作为一种开始姿态，开创（并可假定合法化）特别属于克里奥尔人的想象和智性抱负。那些抱负转而常用抽象的寓言性的措辞得到表达，正如我正在说明的一样，这些措辞使得试图通过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将等级社会合法化的某些矛盾，保持悬而未决状态。

在来自19世纪20年代的另外一个经典文本中，古巴诗人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José María Heredia）重复了《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中描述的洪堡登上墨西哥乔卢拉金字塔的情景（参见图35）。埃雷迪亚于1820年访问这个地方，当时他正因参加独立运动活动被从古巴政治流放。他的访问产生了著名的诗作《在乔卢拉神庙》。像站在钦博腊索峰的玻利瓦尔一样，而且也像埃雷迪亚仰慕的欧洲浪漫派诗人一样，诗中的“我”爬上金字塔，寻找权力和知识的方位。诗歌以一个看客的声音开始，用一个诗节赞美公认的美洲自然。“英勇的阿兹特克人生活过的土地何等美丽！”埃雷迪亚开始讲话。“在它的胸膛，在一个孤单的狭窄地带，人们敬畏地看着存在于极地到赤道的所有气候。”¹⁶这里直接或间接引用的典故，是洪堡关于赤道地带垂直生态的著名评论（第127页）。诗节通过标准的三位一体的美洲意象继续：大草原、森林、积雪盖顶的山峰：

它的平原/金黄的谷物和甜美的甘蔗/共同铺展。橘子树、菠萝、华丽的香蕉，/赤道土地的儿子们，纠缠着/叶子茂盛的葡萄，质朴的松树/和密涅瓦的高贵树[橄榄]。/永恒的雪给纯洁的/伊斯塔西瓦特尔、奥里萨巴/和波波卡特佩特加冕；可是寒冬有害的/手从未触摸/永远肥沃的田野。¹⁷

然而，当夜幕降临这景色时，一种新的美景将历史带到前台。前哥伦布的阿兹特克人社会在世人面前炫耀，展示“不人道的迷信”，金字塔正是以其名义建造的。金字塔，埃雷迪亚最后写道，是对“人类疯狂和狂热的”一种提醒，比如导致他自己流亡的疯狂和狂热。西班牙人的暴政，对埃雷迪亚来说等同于阿兹特克人的野蛮。

洪堡式的语词在此再一次充当一种美洲主义历史和政治沉思的托词，这种沉思根本不是洪堡式的，而是埃雷迪亚自己被称作的“绝对克里奥尔人的”。¹⁸例如，洪堡广泛地将古代神庙与埃及和古代地中海比较，认为古代神庙开始于“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墨西哥处于比丹麦、瑞典、俄国更高级的文明状态”。这种对待阿兹特克人遗产的态度，与绝对克里奥尔人的埃雷迪亚所表达的态度不同。在下面讨论的几个文本中，确定看客的所在并创造观者与被观者之间他者性的，是流亡而非探险。发现的动机被文化互化到怀旧和失落的框架中。五十年后，古巴小品文作家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在提到“美洲第一位诗人”埃雷迪亚时，用“像[美洲的]勇气般猛烈且像她的高度般平静”，这种与洪堡式词汇相同的词汇，描述他的诗文。他说，埃雷迪亚展示了“森林与花园之间的区别：在花园里一切都是打磨过、修剪过、用砾石铺就的……谁敢穿着围裙，带着修剪刀进入丛林？”¹⁹于是，两代人之后，被审美化的原始风景决定了一种美洲主义的批评语汇。

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Esteban Echeverría)在其长篇叙事诗《被俘者》(阿根廷, 1837)中寓言化的，是现在的而非过去的土著民族。这是从洪堡式的风景语词起步的又一部作品。到19世纪30年代写作这首诗时，与英国工程师的蜜月暂时消退，埃切维里亚笔下的土著阿根廷人卷入进步独立者、传统权力中心、新兴跨大西洋商业联盟之间的一场长期内战。在渺无人迹的美洲风景上，埃切维里亚没有像贝略那样上

演一场乌托邦的想象，而是带来了一个道德的和公民的反乌托邦。《被俘者》以传统方式，用洪堡《在大草原和沙漠之上》的风景开始：太阳给远处安第斯山脉的群峰镀上金光，而“无法丈量、开阔、神秘的沙漠”则像大海一般铺展开来。这一风景只是作为一种姿态被再一次调用。黑夜的大幕将它覆盖，并如同埃雷迪亚在乔卢拉的沉思一样，拉开美洲种族战争的序幕。成群野蛮的潘帕斯大草原印第安人涌到夜幕下的荒原，不是（如同在贝略作品中那样）被描述为一种景象，而是被描述为由空洞意象和混乱声音构成的一片混沌：

然后，如同在远方 / 那隆隆轰鸣的雷声 / 在平静的平原上只听见
一阵沉闷、混杂的喧闹 / 它消逝了……然后像众多生灵在风中 / 令人
毛骨悚然嚎叫般猛烈，它膨胀得血红 / 令那些野兽恐惧万分。²⁰

大地颤抖。一阵尘埃、马匹、长矛、头颅、鬃毛——并且（就像贝略、约翰·巴罗）陷入一串令人惊慌失措的疑问：“它是谁？什么愚蠢的一群 / 用它的嚎叫扰乱上帝寂静的孤独？……它去往何处？来自何方？为何高喊、奔跑、飞翔？”²¹除了马匹以外，埃切维里亚对潘帕斯大草原印第安人的描述，与第三章讨论的关于南部非洲的文献中对布须曼人的描述几乎难以区分。与约翰·巴罗夜间降临布须曼人当中一样，在涉及进入接触地带并面对灭绝对象时，视觉代码和看客的帝国权威便分解成声音、盲目、混乱。难以想象的是，就在大约十年前，同样这些潘帕斯大草原印第安人，还被视为争取独立的军事斗争中潜在的同盟。现在他们却变得可怕且不可知。

《被俘者》接着戏剧性地描写文明在野蛮手中的战败。由白肤色克里奥尔人夫妇玛丽亚、她丈夫以及他们小女儿组成的一个具有象征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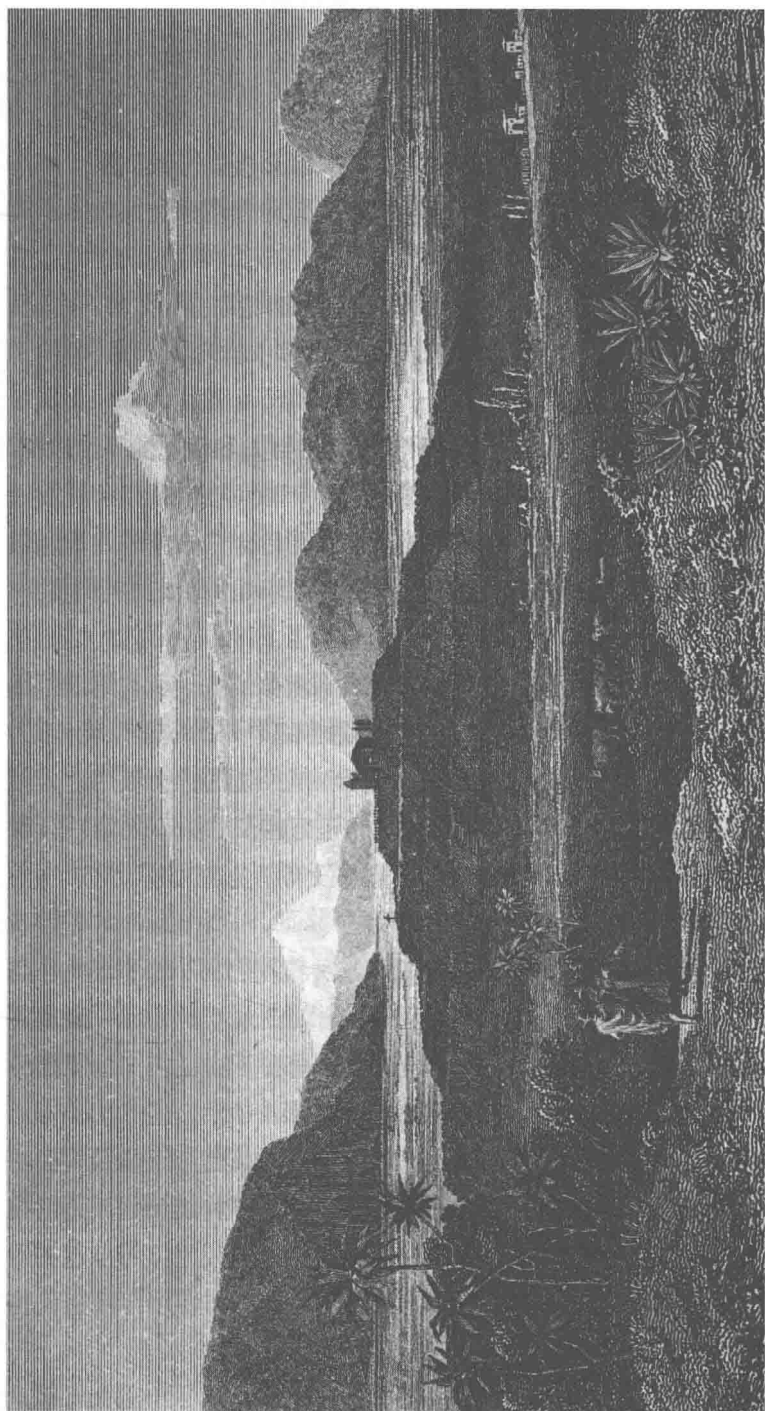


图 35: 洪堡《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中描绘的乔卢拉金字塔(1814)。

义的定居者家庭，遭到印第安人的追捕和野蛮杀害。与先前数十年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埃切维里亚的诗歌实际上生动表现原住民与欧洲人之间的交锋、接触地带的暴力和恐怖，虽然是用颇为神秘化的浪漫主义的种族和家庭寓言模式。刻板地说，寓言似乎清楚明白：文明，正如在克里奥尔人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这个三位一体中体现的那样，输掉了这场战斗——资本主义先锋的允诺，在《被俘者》中被简化成一具英国名字的死尸。人们假定，未来决定于克里奥尔男人和他们的男性后代。可是他们在哪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许（正在写长诗？），抑或如同我很快就要讨论的那样，在去巴黎的途中。在目睹三十年的内战和混乱之后，埃切维里亚似乎缺乏积极的词语来明确表达伟大的美洲实验。欧洲和美洲似乎都令他失望——或者他也令欧洲和美洲失望，因为他这位美洲克里奥尔人在其自己的叙事中没有相似的人。我在第二章提出，囚禁叙事在传统上构成一种讲述接触地带之恐怖的安全语境，因为故事由一位归来的幸存者讲述，重申欧洲和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埃切维里亚的《被俘者》，且不论其标题，做的正好相反。故事用第三人称而非第一人称，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是与没有幸免遭遇且没有成功建立白人社会秩序者有关的故事。

几年后，这个以美洲为基础的寓言，某种程度上在一部非虚构作品中被历史化，这部作品常被认为是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时期唯一最重要的作品。我指的是政治传记《文明与野蛮：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的人生》（1845），作者为阿根廷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文明与野蛮》再次证明洪堡式美洲重构为一项明显克里奥尔人的话语事业提供出发点，而这项事业“将洪堡的足迹留在身后”。如此看来，这项事业直面的不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是过去的模棱两可。萨米恩托的论著是论战性的，原因在于作者用怀疑殖民传

统遗产的方式将自由主义克里奥尔人价值观合法化；这种遗产体现在胡安·法昆多·基罗加这个人物身上，他是来自阿根廷内陆的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袖。²²《文明与野蛮》借鉴洪堡的政治论以及其美学著作，力图直面似乎妨碍“正在欧洲化的”克里奥尔人实现雄心壮志的“黑暗和伪劣的遗产”。²³他们意识到“文明”和与之抗争的“野蛮”同时构成土著社会——在许多地区依然占大多数——奴隶和前奴隶群体，专制的、保守的、宗教的传统西班牙殖民社会，以及这三者的混合。182种族混合被视为掠夺已经处于弱势的人的殖民暴力造成的结果，这些人自己的野蛮使得他们容易受到欧洲征服的影响。

萨米恩托的论著，用一种自然般的传统方式，以渺无人迹的陆地开场——关于“阿根廷共和国的外貌以及其所产生的特性、习惯和观念”的一章，和一段从洪堡的《在大草原和沙漠之上》中引用的法文题词——“潘帕斯大草原的范围如此巨大，北以棕榈树为界，南依永恒的白雪”。²⁴萨米恩托延用可自由处理的语词，称阿根廷的“无边无际的范围”是“完全无人居住的”。他看见“每个地方都无边无际：广袤的平原、广袤的森林、广袤的河流”。然而，萨米恩托拒绝洪堡式地颂扬这些渺无人迹的空间，而将它们重新象征为“阿根廷共和国罹患的疾病”。他说，它们引发“混乱”，而且，如果潘帕斯大草原的居民也被包括在这幅画里，它们还引发恐怖：

地平线永远含混不清，永远模糊在稀薄的云雾之中，那遥远的云雾让人无法确定地终天始之处。野蛮人埋伏在南北两边，等待月夜到来，便像一群土狼，扑向正在田野吃草的奶牛和毫无防备的定居者。²⁵

他们又来了，那毫无二致、昼伏夜行的土著人群。在夜幕下他们无拘无束，在空洞意象中无人的风景里蜂拥而来；那意象在整个行星上将欧洲的征服活动合法化，并同时显示出通过寻找黑暗的保护掩盖的白人的罪恶。这种极化的修辞永远是扩张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它否定土著人对土地的权利要求（他们总是来自乌有处，或某个其他看不见的地方），以及全部的接触史，就像潘帕斯大草原印第安人与西班牙殖民主义之间的接触史一样。

萨米恩托将印第安人搁置在一边，接着开始呈现接触地带及其文化混合的官方想象。欧洲的环境决定论被运用于潘帕斯大草原的混血居民，加乌乔人。萨米恩托认为，阿根廷内陆无边的平原为那里人类的生活赋予一种“亚洲的”（也就是暴君的）特性：“武力的优势、最强者的主宰、没有极限或责任的权威、没有程序或辩论的正义。”²⁶与此同时，萨米恩托像其热情阅读的弗朗西斯·邦德·黑德一样，受到加乌乔人社会 and 生活方式的迷惑和吸引。萨米恩托书的其余部分用令人惊讶的明晰表现出他矛盾和难以决断的认识：他所鄙视的“野蛮的”加乌乔人（接触）文化提供特别“阿根廷的”元素，这些元素对去殖民化的精英分子发挥巨大影响作用。新兴阿根廷大都会里的文化仲裁者，以一种在183 欧洲无法想象的方式利用加乌乔人文化，作为一种非常男性中心主义的本真性美学的来源。白人去殖民化的矛盾，就这样在这种特别的文本实验中消耗殆尽。

《文明与野蛮》的主体是地方独裁者或领袖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的历史传记。萨米恩托通过对法昆多生活和横死的讲述，探讨阿根廷作为一个国家在巩固自身方面所面临的种种苦难。根据萨米恩托的分析，法昆多的冷酷无情、其保守的独裁主义、其依赖于暴力和私人军队作为基本政治工具，以实例证明感染阿根廷社会并妨碍共和国建设进

程的“野蛮”。在谴责这种“野蛮”的同时，萨米恩托还传达出对作为一个人物的法昆多和内陆（萨米恩托本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混血儿生活方式的痴迷。内陆各省是西班牙人统治下阿根廷人的生活中心，虽然被指落后，但是同时被承认是真正美洲、真正阿根廷的文化物质的一个来源——一种（容易控制的）独立文化形态的材料。后来，萨米恩托将会在一部名为《地方回忆录》（1850）的自传作品中，重新将内陆用于新的民族想象。

总之，尽管南美洲文学精英常表现出热烈的英国崇拜心理，他们在19世纪20、30、40年代反省新兴的美洲社会时，并没有简单接受资本主义先锋的干涉主义、工业化想象。英国和法国旅行者的作品在西班牙语美洲被阅读；人们发现它们被到处引用，而且像贝略这样的记者，还翻译他们作品的选段。然而，他们面临着对他们文化的去殖民化，对多数人的征服，对与欧洲关系的重新想象，为了新共和国对自我理解模式的打造，对作为统治阶级的他们自己的合法化，对他们的霸权向未来的投射，以及对他们所从事的前无古人的历史实验可能性的想象；面临种种挑战，他们以令人注目的一致性转向洪堡编纂的乌托邦美洲主义美学，而洪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他们身上发现的这种美学。

假如人们认为克里奥尔人的美学是简单模仿或机械复制欧洲话语，就会严重误解克里奥尔人与欧洲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这些关系的新殖民主义维度）。然而，如我曾表明的那样，洪堡之被调用，主要是作为一种姿态和其他绝对克里奥尔人想象和意识形态事业的一个出发点。人们可以更准确地认为，克里奥尔人的表征是对欧洲材料进行文化互化，采取的并非是简单复制欧洲的霸权想象，抑或简单将欧洲资本的设计合法化的方式，而是挑选和配置这些材料。例如，作家们反复将洪堡的话语挪用成其自己作品通常拒绝讨论的一系列国家建

184 设问题。与欧洲科学和美学的视觉挪用形成对比的是，南美书写将道德和公民戏剧投射到风景上，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这些投射是被设计用来将克里奥尔人的霸权合法化的；而这种霸权凌驾和针对的不只是旧的西班牙统治，而且包括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到19世纪20年代，还包括从属的混血儿、非裔和土著民族的民主要求。洪堡笔下荒凉的景色，为种族战争、种族灭绝、种族文化灭绝的想象提供了舞台。

因为，南美革命当然并非如同法国或美国的革命那样，给每个人都带来解放、平等和友善。对于存在的许多劳动、财产、等级关系，解放者们并不打算或希望进行去殖民化。像玻利瓦尔的这种自由主义事业，遭到来自传统主义精英界的凶猛抵抗；激进事业毫无进展。人民起义经常发生，但遭到压制。对被征服的土著民族、奴隶、被剥夺权利的混血儿和有色人士以及所有群体的女性来说，独立战争及其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重新确认白人男性的统治地位，催生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并经常加剧剥削。对于丛林和平原衣食自给自足的民族，独立意味着商品文化、雇佣劳动、国家控制、种族灭绝进入原本保持在这些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工具之外的地区。例如，出现了内陆土地大规模变成私人财产的情况，产生了需要成群没有土地的雇佣劳工的大大小的庄园。大草原居民和加乌乔人被要求依附于各自的牧场并携带通行证——一种很可能从南部非洲输入的策略（参见第三章）。

虽然资本主义先锋可以公开热衷于此类发展，从一种美洲主义的立场这些发展却构成内在矛盾，不那么容易被那些试图维护反殖民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的人谈起。也许，这就是公民文学如此经常突出抽象道德寓言的原因。西蒙·玻利瓦尔在一封写于1826年的信中痛惜地说，他终于看到的東西乃是对南美的未来造成永久危害的一个诅咒：

我们是掠夺成性的西班牙人卑鄙的后代，他来到美洲榨干她的血汗，并与他的受害者繁殖。这些婚姻的非法后代，后来与从非洲运来的奴隶后代结合。有了这样的种族混合和道德记录，我们还能将法律凌驾于领袖之上、将原则凌驾于人之上吗？²⁷

二十年后的1847年，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表达同样带有抽象、绝望色彩的一种稍微复杂的观点。“将要付出什么样努力”，他大声说，

才能解决这战争的混乱，揭露正在煽动他们的魔鬼，在不同派别的喧闹之中，揭穿都会城市可憎的做作、省变成国的傲慢精神……勃勃野心的面具，而欧洲吹向美洲的风，给我们带来她的手工制品、她的移民，并强迫我们进入她发展和财富的天平标尺。²⁸

在这里，欧洲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

重构欧洲

上述严酷的评估是在这样一个文本中做出的，回顾起来，这个文本的出现似乎是独立之后不可避免的：一本关于欧洲的克里奥尔人旅行书。像所有的主体一样，后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主体是从关系的角度构成的，这种关系（除了别的以外）涉及西班牙人、北欧人、非白肤色的美洲人。在美洲社会内部，那种主体部分通过被构建成其野蛮他者的土著部落形象想象而成。西班牙人也是野蛮人。不可避免的是，克里奥尔人文化终将同样为自己认领和界定北欧：不可避免，抑或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大约在1850年的某个时候，一位克里奥尔人知识分子将会写一

本关于欧洲的旅行书。尽管并非不可避免,但那位知识分子居然是写《文明与野蛮》的同一个人,确实不足为怪。实际上,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45年被派到海外,并不是因为《文明与野蛮》。这本书引发的狂热,不足以鼓舞萨米恩托的雇主智利政府派他到海外,学习公共教育制度和评估其他国家的移民可能。他去了两年,访问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德国以及北非和美国。

新鲜的不是萨米恩托去了海外,抑或去了什么地方的事实。新鲜的是他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西班牙语美洲的克里奥尔人通常旅行到欧洲,经常送他们的孩子去那里学习,但是他们没有创作一种关于欧洲的文学。人们可能觉得,作为殖民地主体,他们缺乏话语权威或者合法的说话立场以表征欧洲。在殖民限制之内,也许不存在能够激发一种克里奥尔人欧洲表征的意识形态计划。(的确,西班牙语美洲人缺乏获得印刷许可证和印刷机的途径。)殖民非对称现象在书写机制中同样显现:在西班牙帝国似乎尤其擅长的冗长不堪的记录和官僚文献中,宗主国不断地,事实上也许过分地向自己表征殖民地,并且不断呼吁殖民地向宗主国表征自己。然而,殖民地向宗主国提出要求,即使是纯口头的要求,也暗示着一种与殖民等级制度不一致的互惠主义。

186 萨米恩托的《旅行》1849年以书的形式面世。全书六百多页,包括十一封寄给国内朋友和导师的公开信,加上一篇突出其在美国逗留的文章,以及提醒我们萨米恩托多么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百多页的花销流水账。如同对于本章的其他材料一样,我不会尝试对这部作品进行全面评论,而是只会指出一些相关的亮点。

毫不奇怪的是,萨米恩托在《旅行》开篇思考与他自己的话语权威有关的问题。萨米恩托在“前言”中说,对当今的任何作家来说,要创

作一本有趣的旅行书很难，因为“文明生活在到处复制相同的特征，假如旅行者来自较不发达的社会，为的是了解更发达的社会，那么困难就更大”。然后他说，“由于视野的宽度及其所包括目标的多样性，无观察能力、缺少智力准备会让人视力模糊、近视”。²⁹萨米恩托援引的一个例子，是他自己无法将工厂（在此是一个一触即发的例子）视为除莫名其妙的成堆机器以外的任何东西。他最后说，假如他认为自己的文本将会与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大仲马、雅克蒙这种伟大欧洲旅行作家的作品相比较，那么“[他]也许是第一个弃笔的”。³⁰

尽管摆出这种恭顺的姿态，萨米恩托却接着撰写其记述，他在这篇“前言”中对自己的精神的贬低在后文无迹可寻。实际上，他反倒是着手问答眼前这个问题：在独立时代，克里奥尔人公民兼作家，如何定位自己与欧洲的关系？这本书以引人注意的题外话开场，用寓言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萨米恩托的船只离开瓦尔帕莱索（智利），前往蒙得维的亚，然后到勒阿弗尔；可是仿佛表明萨米恩托开始其文本的困难似的，船刚离开智利海岸，就立即因没有风而停航四天。这件令人失望之事，明显与旅行书的标准修辞不协调。它发生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也就是鲁滨孙·克鲁索的原型亚历山大·赛尔扣克曾经流落之地。萨米恩托和他的同伴当然像玛丽亚·格雷厄姆一样记着这个先例，他们像她一样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对克鲁索神话进行修订。他们登上外海岛过了一天，惊奇地发现该岛已经居住着四个北美漂流者；用萨米恩托的话，他们过着“不操心明天，没有任何征服，超越文明生活世事变迁”³¹的生活。正如这种语言所暗示的那样，萨米恩托对外海岛上生活的叙述，保留了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某些乌托邦精神。它刻画一个男性主义的天堂，这个天堂实际上保留有贝略农业乌托邦的许多特征。这个天堂与时俱进，还实行共和政体；那里没有被奴役的星期五

187 们，而且唯一明显的等级制度是代际的。一种绅士般的精神气质在那里盛行。人们组织一天的狩猎活动自娱自乐，猎取的对象是遍布岛上的野山羊。（你会回忆起，克鲁索捕捉并饲养过这些山羊；而原型的赛尔扣克说过，他因缺少人做伴而与它们跳舞。）然而，随着记述的继续，萨米恩托逐渐解密了这种乌托邦范式。原来，这四个人并不幸福，且彼此存在分歧——这使得萨米恩托推断，“不和乃是我们存在的一种条件，即便是在那种既无政府亦无女性的地方”。³²

如同《鲁滨孙漂流记》一样，萨米恩托的外海岛片段适宜于一种寓言式解读，这暗示着萨米恩托自己与北欧、北美、传统阿根廷文化的复杂关系。在其非常重要的文明尺度上，外海岛的居民比他自己“偏远”（如岛的名字所言），但是并不比阿根廷内陆的某些居民更偏远。在注意到美洲漂流者继续使用一份准确的日历时，萨米恩托想起阿根廷一个省会的民众，他们从一个路过的旅行者那里发现，原来他们不知什么原因弄丢了一天。据说，他们一直“礼拜四斋戒，礼拜六做弥撒，礼拜日工作”，如此持续了一年。³³即使被放逐到荒岛上，英美人似乎也能比殖民地外省人更好地掌握合理化的时间。

在寓言意义上，外海岛片段使得萨米恩托能够根据影响他的多元文化指示物给自己定位。就欧洲而言，他稍微有些地处偏远。可同时，他的边缘性又具有一种积极的维度。经文化互化的那个克鲁索片段，做出当代术语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那种姿态。面对宗主国，这位魔幻现实主义倒叙一个来自边界的信息：你的虚构（《鲁滨孙漂流记》）是我的现实（外海岛）；你的过去是我的现在；你的异国情调（一个在时钟时间之外的世界）是我的寻常所见（阿根廷内陆）。只有在这样给自己定位之后，萨米恩托才能真正承担起作为文化中介者的旅行作家角色。风重又刮起，他们继续航行。

到了巴黎，萨米恩托进入他的文化圣地，不是作为一位朝圣者或征服者，而是作为一位渗透者。他没有采取看客的立场，全景式地俯视一个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巴黎。萨米恩托在巴黎介绍他自己的角色是漂流者，他认为，这一角色是享有特权的城市观察者：

在巴黎，漂流是如此神圣和受尊敬的一件事情，它是一种如此享有特权的典礼，以至于没有人敢打断它。漂流者有权探问任何地方。假如你停在墙上的一道裂缝前并全神贯注地看着它，某个热心人就会走过来，停下看你正在看什么；第三个人也加入进来，如果八个人聚集，那么路过的每个人都停下来，街道阻塞，一个人群形成了。³⁴

尽管萨米恩托本人没有进行这种类比，但是漂流者在许多方面都是内陆探险者的一个城市类似物。的确，如萨米恩托描述的那样，漂流者享受的快乐和特权，不同寻常地类似于博物学家享受的快乐和特权。像 188 探险者一样，“漂流者追求他自己不了解的某种东西；他寻找、观看、端详、接着走、轻轻地走、转弯、行走、最后到达……有时是塞纳河岸，有时是林荫大道，更经常是巴黎皇家宫殿”。³⁵巴黎给予漂流者和洪堡在赤道地区发现的类似的东西：一只凸出的羊角，一个有无尽的、奇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之地，同时在场的所有可能性。洪堡在丛林和潘帕斯大草原所见的一切，萨米恩托在维维安街的商店，植物园、博物馆、画廊、书店、饭店的收藏品中都见到了。萨米恩托对巴黎充斥着目录的描述，是对洪堡关于积累的话语以及其天真好奇姿态的复制：

你是个文人吗？那么花一年时间读一读这里每天发表的东西……你是个艺术家吗？1846年的卢浮宫展览仍在开放。两

千四百件艺术品、绘画、雕像、雕刻、花瓶、挂毯……你在意政治制度吗？哦！千万别迈进理论、原则和问题构成的迷官！³⁶

萨米恩托以一种戏仿、文化互化的姿态，将关于积累的话语重新聚焦于其自己起源的语境，资本主义的大都市。然而，这种大都市范式减去了一种维度，也就是获取之维度。作为一个被疏离的人物，漂流者没有资本且不积累什么。他不购买、搜集样品，不对他所见之物进行分类，抑或幻想对其进行改造。然而，他确实回应，而且萨米恩托这位超级漂流者回应漂流者的观点，采取的方式是提出一个非常美洲、非常共和的问题：“这真的是从事过1789和1830年革命的民族吗？不可能！”³⁷这是一位前殖民地人说出的一句大胆且傲慢的话。而且在1848年前夜，这还是一句预言性的话。

萨米恩托到了北非，世界就变得简单些，因为在那里，就文明/野蛮两分法来说，他的地位很清楚。在这里，也许只有在这里，他才真的成为一个纯粹、简单的欧洲人，一个殖民主义者。萨米恩托以惊人的图式性的方式，完全与法国人以及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业认同。贝都因人成为完全类似于阿根廷加乌乔人的人，原始且无知；世界分成文明与野蛮，比萨米恩托自己以此为标题的书中分得更清。萨米恩托本人则开始像资本主义先锋一样说话，他因不适和不洁而感到憎恶，因为人们用手吃饭。只有欧洲人才能拯救沙漠，使之摆脱弃置和“原始的寸草不生”。³⁸萨米恩托在某种程度上将阿尔及利亚当作傅立叶主义天堂，他想象到未来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

189 欧洲民众在到处忙着文明生活的多样性活动。我看见今天荒芜的平原覆盖着农舍、花园、金色原野；湖泊呈现出……规律的形

状,水流在有序的水道中得到控制。³⁹

凡此等等。假如阿尔及利亚现在属于法国,而另一方面,美洲依然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中,那么,萨米恩托断言,这个大陆忍受着一种趋势

孤独地独自漫游,逃离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接触,她不希望与他们类似。美洲主义……不过是对古老的卡斯蒂利亚传统、阿拉伯人的骄傲和不动性的复制。⁴⁰

后来,作为阿根廷总统(1868—1873),萨米恩托主持过一系列针对潘帕斯大草原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活动,以及对独立的加乌乔人社会的进一步分裂。他一生倡导公共教育和从欧洲移民,以稀释埃切维里亚、玻利瓦尔、马莫尔等人担忧的“劣等低贱的遗传”。与此同时,部分由《文明与野蛮》赋予合法地位的加乌乔人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被挪用进书面文化,旨在创造后来被认为的一种阿根廷民族传统。

野蛮的言语

通过洪堡重构的原始美洲,绝不是为独立时期新兴的文学美洲主义打基础的唯一范式,尽管它是极端突出的一种。例如,这个时期的克里奥尔女性作家绘制出极为不同的意义地图。可以理解的是,她们并没有采取以男性为中心的看客言语立场,即使作为一种姿态。毕竟,在那种范式中,女性是风景——这就是说风景范式并不是克里奥尔女性发现作为主体的她们自己,抑或使之合法化的手段。⁴¹例如,19世纪30和40年代,古巴作家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

(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 创作了与其同胞和同时代的埃雷迪亚十分不同的一种美洲主义诗歌和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不是关于文明与野蛮的, 而是与一位高尚黑白混血儿奴隶对一位白肤色克里奥尔女性的得不到回报的爱情有关。⁴² 本章题词引用的阿韦利亚内达描写的美洲旅行者, 精心调用传统美洲主义风景, 然后说寻找这些风景的旅行者, 只发现“一大片沙漠, 铺满火山岩”。乌托邦似的神话是“灵魂的视觉幻想”。⁴³ 阿韦利亚内达用一个充满干火山岩的原野象征破碎的梦, 这直接(而且戏仿地)利用洪堡式的火山迷恋和火山能量之力。

190 阿根廷散文作家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Juana Manuela Gorriti), 将克里奥尔人文化和政治困境寓言化, 她采取的方式常颠倒其男性同代人的传统。有一个故事写于19世纪40年代, 当时她正在流亡(像萨米恩托和马莫尔一样), 逃离独裁者罗萨斯。⁴⁴ 故事以戈里蒂题名的《故乡一瞥》开始。这一瞥是通过一个女流放者的眼睛进行的, 她假装成男性回到童年时的大庄园。可以说, 她的凝视记录下的是一幅超级历史化而非去历史化的美洲风景。主人公发现大庄园被人所占——实际上是被一个西班牙人所占, 他亲切地接待了她。这风景绝非是空洞无物的, 它到处都是历史: 墓园、教堂和大庄园遗址、老朋友、故事、回忆。她自己童年时代的绘画, 依然装饰着房子的墙壁。在这个故事中, 与新国家关系重新商讨的基础, 是第一人称的与地区的认同, 而非克里奥尔人与加乌乔人、克里奥尔人与印第安人、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对立。看起来, 性别异装是将女性想象成一个共和国公民主体(虽然不是想象成一个男性)的一种手段。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另外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里, 戈里蒂用一个乱伦的剧情将克里奥尔人与欧洲、克里奥尔人与土著美洲人之间的文化互化关系寓言化。在《作恶者别指望好报》中, 一个年轻的安第斯人孩子, 受一名秘鲁军官强奸

的一名土著女性所生的女儿，被一位法国博物学家发现并收养。博物学家将她带到法国，养育成为一名法国女性。多年后，一个在巴黎上学的秘鲁克里奥尔青年爱上她，与作为新娘的她一起返回秘鲁。殖民强暴和诱拐的传统返回来困扰所有的人，因为叙事展开后的结果显示，那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原来强奸年轻女子母亲的克里奥尔军官：那法国女性并不是法国人而是女混血儿，而这对原始夫妇 (founding couple) 竟然是兄妹。戈里蒂选择戏剧性地表现种族史与文化史的交织，而非它们的两极分化；不自觉的是，在她的故事里，欧洲遭到美洲的渗透，反之亦然。

如同戈里蒂的安第斯人故事暗示的那样，在后殖民地南美洲的身份、主体性、文化商讨中，欧洲和克里奥尔人的美洲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文化形态。即便安德烈斯·贝略从伦敦输送回欧洲价值观，独立战争也促成地区文化、通俗文化、土著文化之间新的内在接触。然而，人们最常观察到美洲多种族社会（和军队）日常生活中文化杂交现象，并不是在文学领域。标准文学史很少承认土著和混血儿艺术形式在克里奥尔人精英的官方文化建设活动中留下踪迹。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比如在美国）具体来自西班牙美洲军队这一多文化接触地带，其中既有保皇党人，又有分离主义者。例如，在19世纪10年代的秘鲁，一位名叫马里亚诺·梅尔加 (Mariano Melgar) 的年轻混血儿诗人兼士兵（他还喜欢翻译奥维德），将一种安第斯盖丘亚语的歌谣形式，文化互化成一种他称之为“亚拉维情歌”的书面诗歌形式。他的作品是后来秘鲁民族文学中重要的土著主义分支的一个早期例证。在阿根廷，军队使得许多文化地带产生接触，一种叫“谢利托”的即兴通俗歌谣形式通过传单和报纸进入印刷文化，并且是独立时期大量即时创作的政治诗歌之源头。因这种改编而被人铭记的主要人物巴托洛梅·伊达尔戈

(Bartolomé Hidalgo),在阿根廷文学史中常被誉为第一位民族诗人。伊达尔戈还是一位创始者,他开始普遍从加乌乔人口头文化挪用至印刷文化,特别是长篇即兴诗歌和对话体诗性决斗。阿根廷加乌乔人文学的合成体庞大而且独特,包括诸如对浮士德神话的加乌乔式改写这样的名目(1866)。

诸如此类的材料不可能轻易被吸收进本真性的意识形态和有关本源的统一叙事。像自传式人种志的表达一样,这些材料的表达力根植于接触地带的文化间机制以及殖民主从关系的历史。

附 言

现代拉丁美洲文学批评的开创性文本之一,生动地以《色彩与差异》(1967)为题。在这个文本中,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讲述的是一件关于歌德的逸事。1831年,歌德在注视着他计划在其中建造一座村舍的风景画时,愉快地写起那是一个如何合理和宁静的地方,并且表示希望那里的自然像他自己一样,也许“已经抛弃她疯狂且发烧的巨变”,接受一种“慎重和满足的美”。卡彭铁尔用美洲主义的措辞回复歌德说,“启蒙运动的建筑师”:你可以为我建造你喜欢的无论什么房子,但是“我们的大陆是一个刮飓风……龙卷风,发生地震、潮汐、洪水的大陆……一个不受拘束的自然,仍然受到其原始巨变的驱动”。⁴⁵

卡彭铁尔在这里(1967年!)画出的明确对比是地理性的,是大西洋此岸与彼岸的对比;不过它同样也是历史性的,是洪堡式分水岭的一边与另一边的对比。洪堡的语言通过卡彭铁尔的小说深刻而低沉地說出,并回响在他有关美洲之神奇现实的概念中。洪堡对美洲的重构是

产生卡彭铁尔与欧洲之比较不言而喻的源头，是通过与洪堡导师歌德相近的人物而显现出的消失的足迹。当然，洪堡正在消失，这是一个根本点：卡彭铁尔正在扮演洪堡的角色，占有他的话语，无忧无虑地宛如历史根本没有将他们分开一般。因此，《自然的风景》之后一百五十年，洪堡继续是克里奥尔人美洲主义美学的一个出发点。卡彭铁尔就这样实现作为一个跨文化欧裔美洲人主体的自我，一个克里奥尔人的十字路口，用令人炫目的自发性反射各种意象，让它们来回跨越大西洋。对某些人来说，那种跨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一种新殖民的自我疏离遗产；192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在美洲构成文化的本质。选择那种二元现象的任何一方，决定对新洪堡式文本的十分不同的解读，比如卡彭铁尔自传式旅行小说《消失的足迹》（古巴，1953）。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西班牙裔美洲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他在欧洲逗留多年后返回南美参加一次溯奥里诺科河而上的研究探险，寻找人类音乐之源头。他对亚马孙丛林的记述是对洪堡的一种反乌托邦式的重写：

我们沿河岸划行，好几棵植物的枝叶投下的阴影，给独木舟带来一丝凉爽的气息。不过几秒的停顿，就足以将这种缓解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昆虫的热情。似乎到处都有花儿，但几乎在每一种情形下，那都是不同程度成熟或衰败叶子的虚假效果。似乎有果实，但是又圆又熟的果实是由渗出液体的球茎、臭烘烘的绒毛假冒的，吃昆虫植物的雌蕊，像洒上糖浆的思想，星罗棋布的仙人掌，在离地一手处生出精液橙黄的郁金香。有时可以看到兰花，它却高高在竹林之上，高高在大果柯拉豆树之上，看起来如同最令人目眩的阿尔卑斯山雪绒花一样，不真实、不可企及。还有树，它们不是绿色的，但散布在河岸，长着成簇的不凋花，或闪着燃烧的丛林般

的黄色。就连天空有时都撒谎，在池塘的水光闪烁中颠倒其高度，将自己掩埋于神圣的深不可测的深渊。⁴⁶

自从洪堡在《自然的风景》中描述“原始森林中的夜生活”以来，这个地方依然没有大的改变，不过许多价值符号被颠倒了。美洲的丰饶角在这里不是大量的发现，而是大量的不可智性，一个宗主国意识无力解码或拥抱的世界。男性的克里奥尔人主体将自己描述为身陷后殖民意义构建的镜舞，在那里就连天空有时也撒谎。洪堡的欧洲式必然性留下的，是（当然）白色的兰花，它如同阿尔卑斯山一样，从这里无法企及。

亚历山大·冯·洪堡死于1859年，享年九十岁。在过去三十年间，他的各种百周年和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产生了有关他在西班牙语美洲的数量可观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书页几乎没有一个批评的音符。“美洲人永远不应忘记洪堡”，一位评论者说；“这位学者的著作给予他们了解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机会”。⁴⁷在官方文化中，洪堡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是某种回顾起来**不得不发生**的事情。人们一遍又一遍读到，“需要”亚历山大·冯·洪堡“为我们描述一个”有关南美洲的“美丽想象”。“我们的风景本该等到19世纪，才能被外国旅行者，然后被民族作家亲切而又广泛地描写。”⁴⁸一位当代评论者声称，当时的确“需要”洪堡，因为殖民地全体居民已经以某种方式开始具有假定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审美感之缺乏。⁴⁹1985年春，《国家地理》杂志让北美人欣赏到一场圆滑、怀旧式的洪堡复活，而这份杂志刊登的照片和地图恰恰是洪堡的观点以及他所书写的原始世界的观点中可能最实在的重建——让·鲍德里亚称之为仿真的那种全美活动的一个例证。⁵⁰人们是否应该得出结论，承认对洪堡的美洲主义著作的接受结构自1820年以来依

然没有改变？1820年赋予洪堡著作本质方面吸引力的权威、等级制度、疏离、从属、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是否仍然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看见？如其不然，也许以欠发达、第三世界工业化、第三世界债务、政治干涉主义和（最近的）生态灭绝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已经复活了对美洲伊甸园神话的需要，哪怕是一种记忆也好。假如我们重新开始，宗主国渴望地问，它们可能拯救我们吗？

194

第三部分
帝国之文体学，
1860—2007

第九章

从维多利亚湖到圣萨尔瓦多 喜来登酒店

在这个机场降落[……]是直接投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土地是坚实的,没有景深是可靠的,没有感觉如此确定以至于它不会溶入其反面。

琼·狄迪恩,《萨尔瓦多》(美国,1983)

他们把我放在一个房间,他们解开我蒙着的眼睛时,我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美国国旗和另一边的玻利维亚国旗,还有一个画着两只手的画框,上面写着“进步联盟”。[……]书桌上满是橡皮图章。

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德·琼加拉,
《让我说话》(玻利维亚,1978)

目光所及我为君

最适合出现在目光所及我为君(monarch-of-all-I-survey)这一场景的,是19世纪60年代寻找尼罗河源头的那一系列英国探险者。正如林奈学派拥有他们的分类系统,洪堡学派拥有他们的科学诗学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选择一种言语绘画,其最高的诉求是为国内受众,制造为英国“赢得”地理“发现”的巅峰时刻。他们生动的帝国雄辩虽然遭到冷嘲热讽并被现代化,可是今天继续存在于其后殖民继承者的作品中;对于这些继承者来说,这颗行星上他们可以假装要征服之地已所剩不多。

在目光所及我为君这种文类中,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的《中非湖区》。该书问世于1860年,并在那个多产且竞争激烈的旅行书写时代获得相当大声誉。在下面这段描述性力作中,伯顿描绘他发现坦噶尼喀湖的戏剧性时刻:

其实,没有任何事情堪与第一次看见坦噶尼喀湖的如画风景相比。它躺在群山环抱之中,沐浴着热带的灿烂阳光。步道沿着崎岖陡峭起伏的山地艰难地曲折延伸,那山地有一处低矮的前景,在其下方和外围,一道细长的绿宝石般的绿色,从不干枯,十分丰美,倾斜着伸向一条缎带般闪亮的黄沙滩;那翠绿时而镶嵌在莎草茂密的草丛中,时而被拍岸的微波齐刷刷地切断。再往前便是绵延的湖水,一片浩瀚的蓝色浅淡而轻柔,湖面宽度在三十到三十五英里之间不等,清新的东风裹挟着新月状细小的雪白泡沫飞洒在湖面。正面的背景是一座破墙般钢铁色的山峰,这里点缀和覆盖

着珍珠似的雾霭，那里则像削尖的铅笔直刺云天；它张着大口的峡谷，以一片更深的李子色为特征；下边是坟墓般大小的山丘，那些山丘显然将脚浸泡在水波中。马拉加拉西河在岬角后面泄出，激流中悬浮着红土；伸得又长又低的岬角南面和对面，坐落着陡峭的乌古哈岬角，睁大眼睛看去，岬角下边是点缀着水面的一群偏僻小岛。村落、耕地、时常出没于水面的渔民的独木舟、更近的通道上波浪拍打湖岸的潺潺声，给予这风景几分变化、运动、生机；宛如这些地区所有最美的景色一样，这风景，只需要些许艺术的整洁和完美——清真寺和凉亭、宫殿和别墅、花园和果园——与自然的铺张浪费和富丽堂皇形成对比，与一望无际的过度植被形成区别；那植被即使不是胜过，也堪与传统地区最受人景仰的风景媲美。¹

在各种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书写中，对岬角的描写屡见不鲜。正如本书已经讨论过的许多例子阐明的那样，在探险书写的语境下，这种手段被要求完成一种特殊的意义构建任务，而这一任务乍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言语画家必须将一件，特别是从叙事角度，实际上令人失望的东西描绘得极其重要。作为一项规则，对坦噶尼喀湖这类场所的“发现”涉及的内容有，前往那个地区，并询问当地居民是否知道这个地区有什么大湖等，然后雇佣他们把你带到那里，于是，你在他们的带领和支持下，前去发现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因此，粗略地讲，在这种语境下的发现是一种姿态，那就是将当地知识（话语）转变成与欧洲形式和权力关系有关的欧洲国家和大陆的知识。当然，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这件事情，就是颇具攻击性地将实际上构成这类发现的英雄主义维度弃之不顾，即欧洲人克服一切地理、物质、后勤、政治的障碍，在中非等地形成有形的、官方的在场的英雄主义维

度。我想强调这一英雄主义视角中的矛盾。最后，发现的举动本身，包含一种在欧洲文化中被视为完全被动经验的东西——观看的经验，可是198 无数人却为之忍受苦难乃至牺牲生命。就伯顿在坦噶尼喀湖的情形而论，发现的英雄主义性质尤其问题严重。伯顿一直重病，大部分路程都不得不由非洲助手抬着行走。他的同伴约翰·斯皮克(John Speke)虽能行走，却因发烧一直失明，因此在关键时刻不能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发现任何东西。这个发现要求的严峻考验令人难忘地具体而实在，可是在这种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范式中，甚至在关于发现的意识形态内部，“发现”本身没有属于自己的存在。只有当旅行者(或其他幸存者)回国之后，发现才被“变成”真的，并通过各种文本使之存在，包括：地图上的名字，给皇家地理学会、外交部、伦敦传道会的报告，日记，演讲，旅行书。这里的语言风格充满以最为单枪匹马的方式、高风险创造世界的意味。正如探险者们发现的那样，大量的金钱和声望取决于，你能够说服别人相信你做了什么。²

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发现的修辞，我发现识别三种传统手段十分有益，它们为探险者的成就创造质和量的价值。刚刚引述的伯顿文本很好地说明这些手段。第一也最明显的，是风景被**审美化**。景象是被当作一幅绘画观看的，而且描述是按照背景、前景、泡沫斑驳的湖水与雾霭点缀的群山之间的对称等等安排的。在伯顿的文本中，有一种完全二元的修辞在起作用，形成大与小、前与后的反差。重要的是注意到，在文本自身的措辞内，景象的**审美快感**单独构成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在上面引用段落的结尾，伯顿将这一切加以总结：“这的确是灵魂和视觉的盛宴！忘却辛劳、危险和对能否回去的怀疑，我觉得情愿双倍忍受我曾忍受的一切；而且整个探险队似乎都陪着我一起兴高采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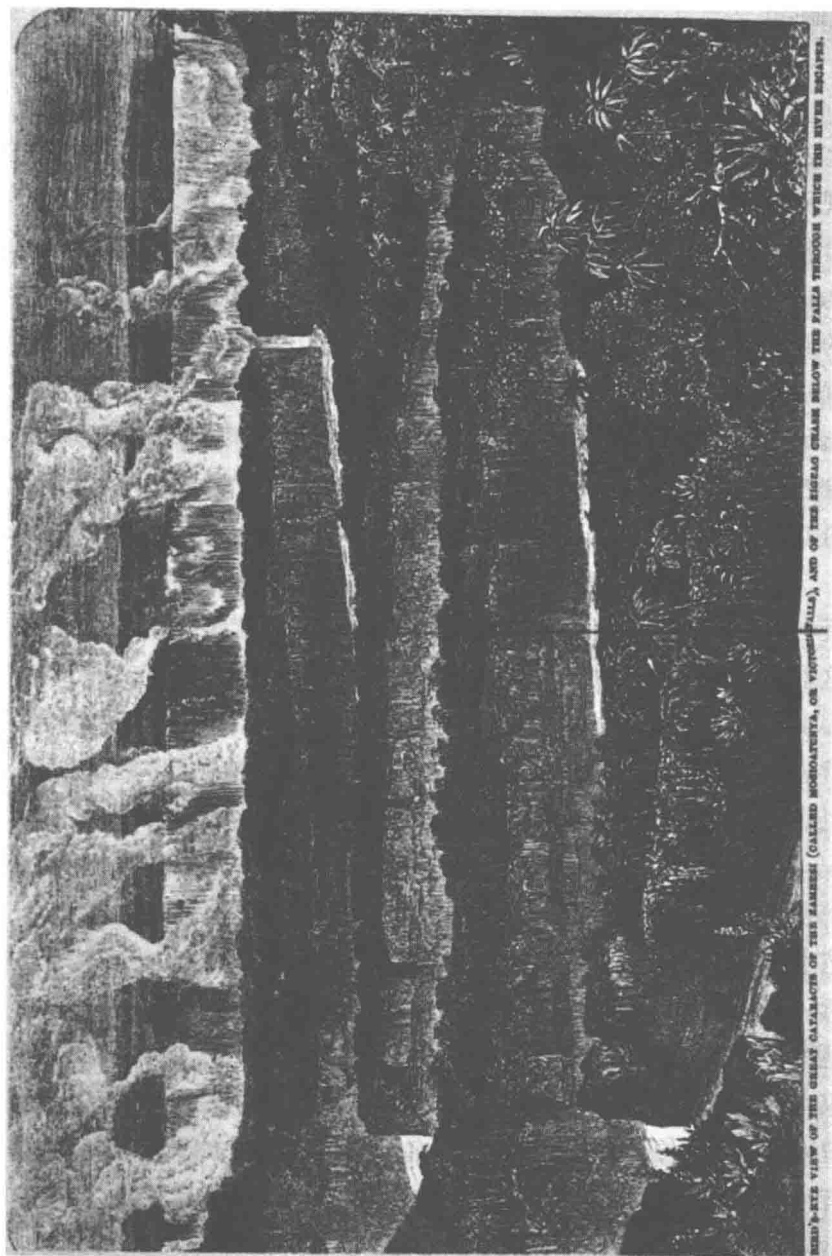


图 36: 维多利亚瀑布, 戴维·利文斯顿, 《赞比西河探险叙事》(1865) 的卷首插图。

第二,意义的稠密在这个段落中得到追求。风景被描述得极为富于物质和语义稠密。这种密度尤其通过大量形容词修饰语得到实现——文本中难得有一个名词不被修饰。还要注意,许多修饰语派生自名词(像“莎草茂密的”、“覆盖着”、“坟墓般”),因此额外的物体或物质被引入话语,增加了密度。在这方面特别有趣的是一系列名词性的颜色措辞:“绿宝石般的绿色”、“雪白泡沫”、“钢铁色的山峰”、“珍珠似的雾霭”、“李子色”。与简单的颜色形容词不同,这些措辞将物质指示物加进风景,所有这些从钢铁到白雪的指示物,明确将这风景与探险者的本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用一些英国的东西将它点缀。科学性的语汇则彻底缺席。

这里起作用的第三种策略,本书从头至尾时断时续一直在讨论:观者与被观者之间被断言的控制关系。绘画隐喻本身具有暗示性。如果这景色是一幅绘画,那么伯顿既是在那里评判和欣赏它的观赏者,又是为别人创作它的言语画家。从这个绘画类比还可以得出,伯顿之所见就是所有的一切,而且这风景旨在从他出现的地方被观看。因此,这个风景指示性地根据他的有利位置得到安排,并且是静态的。

这种观赏者—绘画的关系还暗示,伯顿即便无权拥有这景色,至少也有权对它进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缺乏的是更多的艺术,而艺术(清真寺和凉亭、宫殿、花园)等同于地中海的高雅文化和机构。显然,已经提到的非洲村庄和耕地在审美意义上还不充分。非基督教的地中海美学,在此反映非国教徒伯顿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化、其严格的家庭和阶级基础、其压抑的道德、傲慢的殖民设计的深刻矛盾心理。(他曾因假扮阿拉伯人去麦加朝圣而闻名,当时这种做法如果被发现,他就有可能丧命。)与此同时,将文明使命描述为一项审美计划,这乃是一种策略,西方常用这种策略将他人界定为宜于和需要其善意、美化的介

入。另外一位尼罗河探险者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在写于伯顿著作一两年后的记述中,实际上提供了在他的一个发现场景中缺失的元素。到达维多利亚湖时,他描述道,他受到鼓舞画了一个素描,除了他已经提及的非洲小舟之外,他还“用假想的停泊在海湾的汽船和轮船加以点缀”。在此类场景中,常要求土著劳动力储备来验证欧洲人的成就。伯顿在上文中断言,在坦噶尼喀湖“整个探险队似乎都陪着我一起兴高采烈”;格兰特评论说,“甚至冷漠的瓦尼亚缪兹人都来看一眼……西迪人欣喜若狂”。³“探险队”的非洲队员无疑确实卷入此类探险的兴奋之中。引领他们做出反应以确认欧洲人成就的书写传统,控制着他们的反应,分配他们的任务是连同他们主人的其他东西一起搬运他们主人的感情包袱。

因此,目光所及我为君这一场景,似乎特别涉及美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明确的互动。在伯顿的描述中,假如我们从字面上理解,风景的审美特性构成发现对于探险者本国文化而言的社会和物质价值,与此同时,其审美缺陷则暗示着需要本国文化的社会和物质介入。伯顿的伙伴和较年轻的竞争者约翰·斯皮克,在他的一个发现令其失望的情况下,利用相同的方式表达其失望情绪。在陪伴伯顿进行尼罗河探险的过程中,斯皮克确信尼罗河源头将会在维多利亚湖(如其后来被称呼的那样)找到。在一场著名的辩论中,他的导师伯顿断然拒绝这种说法,虽然后来证明它是正确的。斯皮克为证实自己的猜想,在詹姆斯·格兰特陪同下进行又一次探险。虽然结果十分确定,但是由于这次探险没能绘制维多利亚湖整个外围的地图,斯皮克的断言在技术上依然存在 201 在争论。许多读者可能对伯顿与斯皮克之间随后在英国的恶性争论耳熟能详,其结果是斯皮克有争议的自杀。斯皮克有关这次探险的记述(《尼罗河源头发现记》,1863)写于这场争论之时。斯皮克以一种惊人

的图式方式，把他的失望和恭敬师长的痛苦，写进将其叙事推向高潮的发现场景中。下面引用的段落展示目光所及我为君这一语词的许多要素：这个场景的价值根据审美快感得到表达；探险队自然而然地充当见证；素描簿被提及，但是场景自身被表述为一种失望（黑体为我所加）：

我们得到很好的回报：因为到目前为止，“石头”（干达人这么称呼瀑布）是**我在非洲见过的最有趣的景色**。尽管经过令人疲劳的长途行军，**每个人都立即跑去看它们**，而且就连**我的素描簿**也被调动起来发挥作用。那景色**虽然很美**，却并非**恰恰是我期待的那样**：因为宽阔的湖面被一道山坡**从视野中隔断**，而且那瀑布，大约十二英尺深、四百至五百英尺宽，**被岩石打断**。它仍然是一个吸引人流连数小时的景色——水流发出咆哮；成千上万过路的鱼儿顺着瀑布奋力跳跃；瓦索加人和干达人渔夫撑着**小舟**出现，拿着杆子和钩子在所有的岩石上就位；河马和鳄鱼懒散地躺在水面上；渡船在瀑布上游来回穿梭；牛群被赶下去在湖边饮水——总而言之，凭借这个国家的**可爱自然**——小小的山丘，山顶芳草萋萋，绿树叠嶂，还有较低的山坡上的一座座花园——一切的一切成为人们渴望看见的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

探险现在已经发挥其作用。我明白，尼罗巨人毫无疑问源于维多利亚湖；而且如我预言的那样，湖是抚育过我们宗教信仰的第一位解释者的圣河的源头。然而，当我想起旅途中的耽搁使**我多有损失时**，我哀伤不已，因为那些耽搁**剥夺了我去观看东北角的快乐**。⁴

斯皮克在审美上的失望，准确复制出其对后勤保障的失望。道道屏障

阻断视野；河水的平稳流淌，宛如探险者自己的行动一样被中断。维多利亚湖毋庸置疑地坐落在岩石、瀑布、山丘后面，如同伯顿笔下的坦噶尼喀湖一样，“沐浴着热带的灿烂阳光”，不过斯皮克却看不见它/（她）——但是只有看见和书写看见，才能完全地构成发现。斯皮克陷入这种修辞，而且同时陷入与伯顿的一场公开的俄狄浦斯战役；他即便是在声称所取得的成就时，也表现出他的失败。这种修辞利用他，他也利用这种修辞。审美化被降低到世俗范畴，成为有趣和引人入胜，而非崇高；无论隐喻、形容词还是欧洲典故，都不能提供意义的稠密。欧洲人要求控制、想要干预的情况也在此缺席。斯皮克将由鱼儿、渔夫、牲畜、渡船构成的景色书写成一个完全的整体，不以任何方式属于甚或召唤他。要是有什么的话，控制权留在瓦索加人和干达人渔夫手中，而斯皮克则是千百万过路鱼儿当中的一条，无望地向瀑布上方跳跃。的确，在最后一句中，斯皮克走出君主政体的语词，在一系列俄狄浦斯意象中发现其行为的意义：尼罗巨人、他的宗教祖先耶稣以及未曾提及的无情的父辈伯顿。

带连字符的白人与来自内部的批评

目光所及我为君这一场景的严肃性和沾沾自喜的语气，实际上是向讽刺和去神秘化发出邀请。刚果探险家保罗·杜·沙尤(Paul Du Chaillu)，一位与斯皮克和伯顿同时代的人，是接受这个邀请的探险家兼作家。他于1861年写了一本旅行书，疯狂地扰乱了艺术和帝国的审美—意识形态母体。杜·沙尤是法裔—美国人，其父亲一直在西非从事贸易。在英国人试图“赢得”尼罗河源头的时候，杜·沙尤则着手解开另外一个谜团：大猩猩。从人们能记得的时候开始，有关与人相像的



The Ripon Falls—the Nile flowing out of Victoria N'yanza.

图 37: 里彭瀑布, 选自约翰·汉宁·斯皮克, 《尼罗河源头发现记》(1863)。

大动物的报道就一直从刚果传出，但是西方对这种动物的好奇心，被整个地区有关嗜吃同类的同样活灵活现的报道所抑制。热病也是一种主要的威慑，此外还有刚果河上的内陆非洲商人，他们似乎特别善于保护其生意不受欧洲人侵犯。然而，随着进化思想和现代种族理论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存在大猩猩的可能性获得了特别的、新的意义（例如，大猩猩是非洲人也许比欧洲人更密切相关的较低级动物）。⁵证实或者忽视这种动物的存在，对于欧洲人来说已变得势在必行。大约在同时，医学的进步使得非洲旅行对欧洲人更加安全。尽管并非每个人都相信他，杜·沙尤的确“发现”了大猩猩，并且在其广受欢迎和引起轰动的《赤道非洲探险和历险》（1861）中对其进行详细记载。这是一次如此充满意识形态意义的发现，因此从那以后，西方人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对其进行再现。（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再现发生在电影《雾锁危情》中，该片依据的是灵长类动物学家戴安·福西的生活。）

杜·沙尤对大猩猩的“发现”使他闻名于世，而他高度娱乐性的旅行书则令他臭名昭著——他被称作讽刺作家、追求轰动效应者、说谎者。像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不久将在刚果露面的另外一位带连字符的（在这个例子中是英裔——）美国人一样，杜·沙尤迎头挑战英国绅士旅行者的文学礼仪以及他们合法的在场之修辞，用人们可能称作的非法在场之修辞取而代之。比如，考虑一下从杜·沙尤 204生动的探险叙事选取的这个片段中，发生在目光所及我为君这一场景上的事情。这个片段开始好像是对伯顿的模仿，然后演变为戏仿：

从这个高度——大约海拔五千英尺——我不受阻拦地欣赏到目光所及的一处景色。前一天我们翻越的那些山丘，静静躺在我们脚下，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些鼠丘。巨大的原始森林向四周延伸，

这里那里但见有水道的光亮。在遥远的东方，克里斯塔尔山系最远的山脉若隐若现，那是我向往的目标。脚下湍流的潺潺声充塞我的耳鼓，我向希望抵达的那些远方的群山注目望去，开始思考：哪怕基督教文明之光能够有一次在非洲黑人孩子中间得到公平介绍，这野茫茫一片会是何等模样。我梦见森林给咖啡、棉花、香料种植园让道；梦见平静的黑人做着他们心满意足的日常事务；梦见耕作和制造、教堂和学校；幸运的是，在我思考的这个阶段，我朝天抬起双眼，发现我坐在其下面的一棵树的树枝上悬着一条巨大的毒蛇，显然正准备吞噬它领地的这位做梦的闯入者。⁶

帝国语词的许多标准元素再一次在场：对风景的控制、审美化的形容词、根植于观者的广阔的全景图。不过一旦探险者的眼光落在他“向往的目标”上，一种干预主义的幻想就将他眼前风景的现实彻底置换成想象的内容。伯顿和格兰特的幻想是，到处添加些什么使景色臻于完美（这里一座清真寺，那里一艘汽船）；与他们不同，杜·沙尤精心编排一种具有恬不知耻殖民主义（和美国）特性的大规模的变形。然后，毒蛇出现来反讽罪恶的幻想，并且表明其罪恶。与此同时，作为梦者的复制品和他者的象征，毒蛇（注意不是一般的蛇）直接来自伊甸园，除了别的以外，它带来不受欢迎（但也受欢迎）的知识，即：舒适的田园牧歌种植园式幻想乃是禁果，有可能导致被从花园中逐出。在南北战争前夜，谁可能比一个美国人更了解这一点？

面对毒蛇的闯入，杜·沙尤，这位原始的罪人/闯入者，放弃其想象的角色，攫起从事文明使命的基本物质工具：“我的未来文明之梦瞬间烟消云散”，我们读到：“幸运的是，我的枪在手中”。这是毒蛇（他称之为“我的黑朋友”）的终结，但不是讽刺的结束，因为现在，“几分钟前，

我快乐沉思的基督教文明遭受到又一次冲击”：

205

我手下的人砍掉蛇头，把蛇身分成适当大小的块儿，当场把它吃了；而我这个贫穷、饥饿，但受过教化的凡人，站在一边，虽然渴望一餐，却吃不下这东西。原来文明不过如此，它本身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非洲森林中，在食物匮乏时，它却毫无用处。⁷

这个场景非常具有圣餐仪式或最后晚餐的意味，只不过弥赛亚是个外人，他不愿分享那顿饭，并且可能成为它的一部分。在杜·沙尤的描述中，“探险队”非但没有分享和反映这位探险者的价值和欲望范式，反而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行事，这以一种十分武断的方式与杜·沙尤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杜·沙尤在其整本书中反复告诉我们，他不吃蛇和大猩猩。为什么不？在象征意义上，似乎吃蛇（“我的黑朋友”）就是吃撒旦（即非洲人是他者），而吃大猩猩则会唤起嗜食同类的幽灵（即自我是非洲人）。

“文明的”不切实际的实践，根植于“不文明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假定——帝国的事业就这样被杜·沙尤呈现出来。因此帝国的主体在他的写作中分裂：杜·沙尤忽而是戏仿者，忽而被戏仿；忽而是梦者，忽而是他自己梦想的解密者；忽而是亚当，忽而是毒蛇；忽而是文明的提供者，忽而是其剥夺者；忽而是猎手，忽而被猎。在此，他的话语通过欧洲人在场于非洲产生的矛盾本身，实现其寓意的稠密。这种违反常理的观点非常可能与这个事实有关：杜·沙尤本人既非欧洲人，亦非非洲人，而是法裔美国人。作为在文明使命巅峰时期写作的一位带连字符的白人，杜·沙尤的确是非洲帝国花园里一条早期的毒蛇。三十年后，恰恰是在刚果，文明使命在此地橡胶繁荣时期嗜虐狂般的种族灭绝

戏剧中露出真容。当欧洲人变成，且眼看着彼此变成白肤色的野蛮人，就像他们总是想象的非洲野人一样野蛮和残忍的时候，大猩猩们也许正从山上的隐居处旁观。欧洲人在刚果的野蛮，通过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介入传播回欧洲，成为世纪之交一个重大政治丑闻。在欧洲目击者当中，有几个装备笔和纸的带连字符的白人：亨利·斯坦利，领导争夺非洲并改造英国探险书写以满足其需要的英裔—美国人；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不知疲倦地工作、揭露斯坦利开始的令人恐怖之事的英裔—爱尔兰人；约瑟夫·康拉德，将刚果灾难写入欧洲失败之寓言的波兰裔—英国人。每一位都是白人，其民族和公民认同具有多样性，且常常存在冲突；每一位都在深刻的个人和社会历史中实践欧洲扩张主义、白人至上、阶级统治、异性恋主义的原始现实。带连字符的白人，是对帝国经常进行帝国主义内在批评的主要建筑师。我在本章稍晚，将考察这种批评在法裔—阿尔及利亚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非裔—美国人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作品中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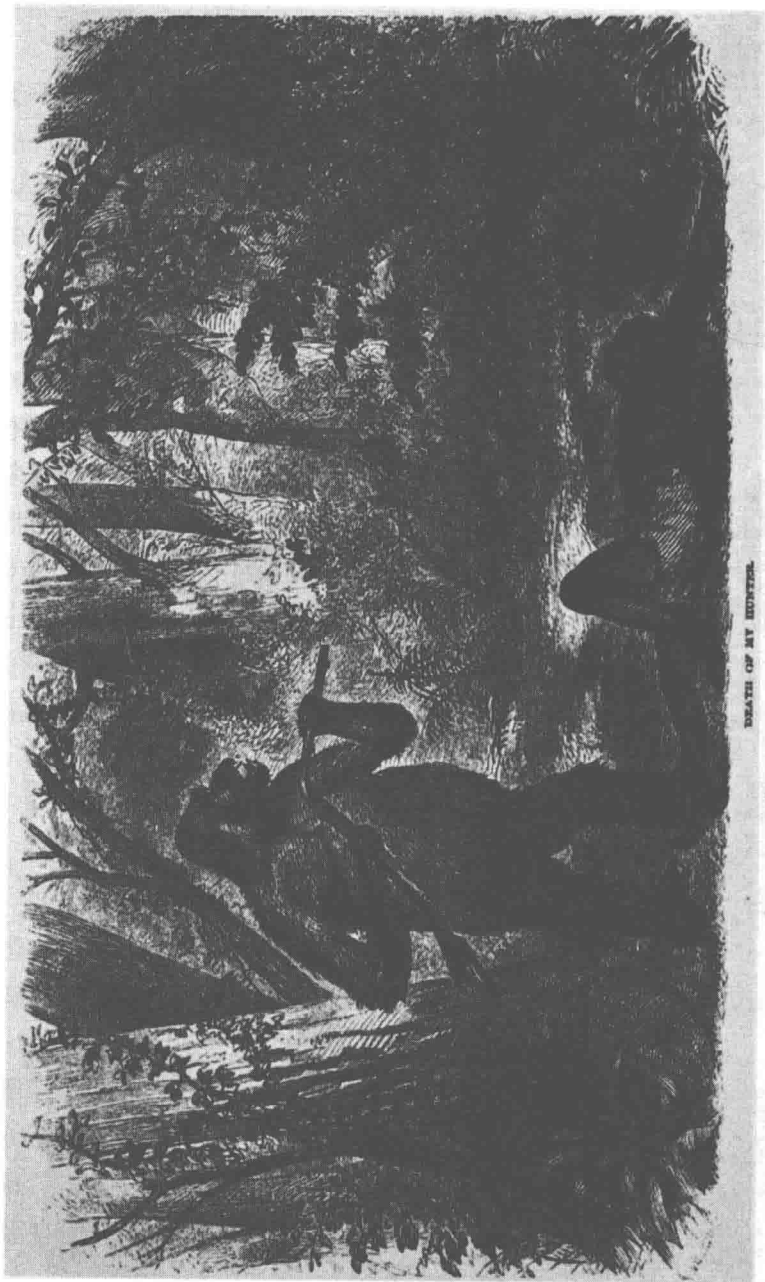
沼泽中的女士

很难想起一个语词，比目光所及我为君这一场景更明确地具有性别特征。男性探险者绘制/占有新近揭开面纱的女性风景。不过，的确有女性探险者和探险者的妻子，前者像在非洲领导探险的亚历山德拉·蒂南(Alexandra Tinné)和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后者如伴随溯尼罗河探险的弗洛伦丝·贝克(Florence Baker)。像第七章讨论过的女性社会探索者一样，这些女性在其书写中没有在岬角上花费大量时间。她们也没有被给予这样做的权利。关于发现的男性英雄话语不容易为女性所用，这也许是现存的欧洲女性探险书写居然如此之少的



CROSSING A MANGROVE SWAMP, WITH THE TIDE OUT.

图 38:《湖水离去,穿越红树林沼泽》,选自杜·沙尤,《赤道非洲探险和历险》(1861)。



DEATH OF MY HUNTER.

图 39:《我的猎手之死》,选自杜·沙尤,《赤道非洲探险和历险》(1861)。

一个原因。玛丽·金斯利非同寻常的《西非旅行》(1897),也许是现存最广为流传的例证。她通过反讽和倒置,用有关控制和干预的男性君主话语的原始材料,建立她自己的意义构建机制。我下文将会表明,其结果是出现一种女性君主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否定控制和戏仿权力的情况下,施展其自己的那种控制。

金斯利在三十岁左右作为一名昆虫学者兼鱼类学者去的西非,或者如她告诉我们的那样,她主要感兴趣于栖息在加蓬的那些广阔无垠、未曾开发的红树林沼泽中的小规模的生命形态。因此,她选择占领的领域与维多利亚时代她的同事们寻找的闪闪发光的岬角形成极为明显的反差。的确,“她的”沼泽,她就是这么叫它们的,是一种非洲人自己似乎既不使用亦不重视的风景,一个他们永远不可能对欧洲人的在场提出质疑的地方。金斯利描绘她自己发现其沼泽,采取的方法不是俯视它们甚或绕着它们行走,而是乘一叶小舟或者让水和泥没到她的脖子,她饶有兴趣地晃动着穿过沼泽,裹着厚厚的裙子且连续数周不停地穿着靴子。她滑稽好笑和自我反讽的人格,持久地打动她的任何一位读者。在下面这个著名的片段中,她刚走出内陆,搭乘一艘用毛毯做帆的小船前往海岸,如通常一样,是这队人中唯一的欧洲人和唯一的女性:

虽然我一直都很喜爱在非洲的生活,可是我认为我从未像沿蓝布韦河顺流而下的那些夜晚般,毫无保留地喜爱那里的生活。在月光照射下,那蜿蜒的黑色大河的河水泛着磨砂银的光色,一条小径贯穿其间;河道两边是墨黑的红树林形成的屏障,透过红树林,但见上方星月交辉的天空。我们船帆的轮廓向前升起,它已经从床单理想化成享有无上荣光之物;我们炊火放出微弱的红光,

为寒冷的月光平添一丝暖色。第二天晚上有三四次，我沿着南岸航行时，发现红树林屏障稀薄一些，我站起身，透过其盘根错节的根茎，朝着大片大片闪耀银光，看似平原之处望去——又是令人可怕的充满烂泥的泻湖标本，在我们到达恩多克之前，其中的一个只差一点就把我给收藏。在我们悠闲地偷偷经过之时，我带着一种痴迷看着那些泻湖……啊！给我一条西非的河流和一只独木舟，只为美好的享受。缺点，你说的吗？嗯，是的，可是哪里没有缺点呢？在蓝布韦河上的那些夜晚，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经历的那一系列可怕的惊吓。当时我们在河面的树影上航行，并认为那些树影是泥滩或者树本身，它们看起来那么黝黑和结实。幸运的是，我从未唤醒值班员，每一次都单枪匹马勇敢地让船摆脱阴影，称我自己是傻瓜，别让别人这样叫我……到天亮时，蓝布韦河的景色肯定没有这么可爱，我可以整天都在睡觉，感觉不到痛苦。⁸

还有什么世界更加女性化？明亮的月光照路；小船是卧室和厨房的组合；家庭女神金斯利在值班，并尽情享受她守夜的孤独。谢天谢地，队员们没有分享她的快乐，而是在睡觉。这地方几乎是隐蔽的——旅行者像一只鼯鼠，透过根茎窥视。美和意义的稠密，不在于根茎呈现的多样性和色彩，而在于夜幕在观者心中形成的理想化。白天，人们看见的不是多样性和密度，而是它们的反面，单调。这就是说，金斯利创造价值的方式，是果断且颇为猛烈地拒绝在其男性先驱的话语中产生价值的文本机制：关于控制和占有的幻想，同时是一种物质列表的绘画。她将其（欧洲的和女性的）主体性之作用置于前景：闪耀的银光是她自己的想象力作用于红树林沼泽的产物。她没有占有其所见，而是偷偷经过；她没有想象一种文明化或美化干预，而只是简单地设想着冲突中

“损害非洲”的可能性,而这冲突无疑将会给她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在金斯利的书中,审美化被一种应用于她及其周围人的毫不留情的喜剧性反讽所置换。快乐是不变的,但是它存在于戏剧中,而非在美中:在非洲的时光是一个激动人的快乐时光。首先,金斯利的书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这专横的喜剧性非礼。专横的:这正是她想要表现的。同时,在嘲弄其男性同行的自大和自制力时,金斯利的反讽构成她自己的控制形式,在男性探险者未曾看见和不想看见的她自己的沼泽世界得到有效利用。如果站在明亮山顶上的尼罗河探险者是国王,那么在山下面穿越黑暗和泥泞的玛丽·金斯利就是女王,尼罗河上的克娄巴特拉,也许如同她在英国的同行那样,正孤独地控制着船舵。

210

我将玛丽·金斯利想象成一个女王,是想让人们注意到以下事实:无论她多么拒绝关于帝国控制的种种语词,她确实将自己定位在帝国的事业之内。的确,正如近来的传记著作提醒我们的那样⁹,金斯利在英国非常积极地参与扩张政治,代表一种特殊的政治立场。她是帝国主义者,但充满激情地反对殖民主义;她利用其作为作家兼探险家的声誉,为自由市场观点艰苦游说,认为扩张主义和边界关系应该留给商人处理。殖民当局、传教活动、大公司全都是压制性的、毁灭性的、不切实际的(正如19世纪90年代的刚果经验正在证明的那样)。当然,19世纪60年代的尼罗河探险者是在相对和平的几十年内写作的,那是在对非洲的争夺放纵欧洲卷入一场恶性的狂热领土争夺之前。在无人赞助的情况下,金斯利得以自由旅行。这时对非洲的争夺正如火如荼,而且文明使命深受质疑。即便在她写作之时,其他作家,像约瑟夫·康拉德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正在将非洲从一个阳光普照的岬角转化成有负罪感的黑暗中心,欧洲人的统治欲,在那里与全面控制的不可能性相遇。

金斯利想在修辞中和政治上都找到恢复欧洲人天真无辜的第三种立场。在政治上，她为没有控制和剥削的经济扩张的可能性而辩。在其修辞中，她试图将统治与掌控分开，将知识与控制分开。对她来说，“不知道”并不意味着“需要知道”；“没看见”并不意味着“需要看见”；“没到达”并不意味着“需要到达”。她作品中每个人——包括她自己——装模作样、滑稽好笑的天真无辜，都提出一种在非洲做欧洲人的特殊方式。

她的建议就其本身来说是乌托邦式的，似乎专门设计出来，对从岬角跌落陷入沼泽的欧洲人的苦恼做出回应。金斯利笔下乌托邦式的蓝布韦河场景(上面引用的)，在图式上与康拉德《黑暗之心》(1900)中同样的场景形成何等的反差：

早在太阳落山之前，黄昏就溜进了[河]。河水平稳而急速地流淌，可是河岸上，却端坐着一种无声的静止。生机勃勃的树，被爬藤和每一棵活着的灌木捆绑在一起，也许已经被变成石头，甚至是最细小的树枝、最轻的树叶。这不是睡眠——这似乎反常，像是一种恍惚状态。连最微弱的声音都听不见。你惊异不已地旁观，开始怀疑你自己聋了——然后黑夜突然降临，让你猛地什么都看不见了。大约凌晨三点，几条大鱼跃出水面，溅出巨大的水声，仿佛打枪的声音，吓得我跳起来。太阳升起时，一片白色的雾霭，十分温暖和潮湿，而且比黑夜更让人看不清。¹⁰

211

这里的黑夜用毁灭和灭绝威胁欧洲人的主体性。黑暗中心围绕着一个恐惧的漩涡旋转。金斯利在河上的乌托邦时刻，用“一种痴迷”替代这种恐惧。她所经历的“可怕的惊吓”，是她在阴影上行驶并将其当作真

实的危险时强加给自己的那些。她指出,只有对确定性和控制的需要,才使得不确定性和脆弱变得可怕。这些东西可以被放弃。使得金斯利能够在其书写中放弃它们的,并不是她的性别。除了是一个女性以外,她还是一个在非洲的孩子,玩耍在斯皮克一定渴望至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非俄狄浦斯的世界。非洲是她的母亲,沿着那些微微发亮、黑暗、泥泞的路径,金斯利正在让自己诞生。

白人男性的悲叹

目光所及我为君这一场景在当代旅行记述中得到重复,只不过现在是从第三世界大城市饭店的阳台上君临一切。就像其探险家前辈一样,后殖民冒险家栖居在此,描绘他们所见场景的意义和价值。下面是从一部标题叫《你属于哪个部落?》(1972)的西非旅行书中选取的例证,该书的作者是意大利小说家和小品文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这里是书开篇的段落:

从房间的阳台上,我可以全景俯瞰加纳首都阿克拉。朦胧蓝色的天幕,满是薄雾和形状不规则的黄色、灰白色的云;在天空之下,城市看似一大锅浓稠、深色的卷心菜汤,许多块白面团正在里面沸腾。卷心菜就是热带树木,长着油腻、拖尾巴的深绿色厚叶子,上面点缀着黑色的阴影;一块块面团就是崭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其数量正在全城不断攀升。¹¹

几年后,在一个关于穿越拉丁美洲铁路旅行的受欢迎的记述中(《陈旧的巴塔哥尼亚快车》,1978),英裔美国小说家和旅行作家保罗·泰鲁

(Paul Theroux)在危地马拉城重复这种姿态：

危地马拉城，一个极其水平的地方，像是一个卧病在床的城市。它的丑陋是一种受到威胁的样子（低矮、阴郁的房屋外墙满是地震留下的裂缝，一排排明亮的建筑在你面前畏缩），最丑陋处是在那些街道上，最后那幢坍塌的房子刚过去，一座蓝色的火山锥就凸出在那里。我可以从酒店房间的窗口看见火山。我在三楼，也是顶楼上。那是些很高的火山，看起来能喷吐火山岩浆。火山的美无可争辩，但那是女巫之美。从它们的火上发出的隆隆声，曾经掀翻这座城市。¹²

212

这些奇形怪状、毫无乐趣的城市风景，与伯顿、格兰特等人描述的绚丽、熠熠生辉的全景画反差之大，简直无可比拟。虽然如此，我强调的伯顿文本中的三种策略——审美化、意义的稠密、控制——依然在此起作用，它们被转换成一个十分不同的历史时刻和一种不同的美学手段。我曾指出，伯顿的文本通过大量使用形容词，普遍增加或从字面意义、或作为隐喻引入的具体的物质指示物，创造意义的稠密。泰鲁和莫拉维亚的文本共享这些特性。尽管他们也处于不熟悉的领域，这些作家，像伯顿一样，断言他们视觉的权威性。我们之所见乃是存在之物。没有任何对他们的阐释权进行限制的意义得到暗示。也许不及在伯顿文本中明确的是，从属和占有的关系通过隐喻得到表达。对泰鲁来说，危地马拉城正卧病在床，处于面临屈服或失败的状况，而且是一种受到威胁的样子。一个受到虐待的女性形象几乎有了意识。莫拉维亚视阿克拉为加纳准备好给他吃的一盘汤、一个面团等。

我们也在这些段落中体验到审美化，只不过伯顿发现的是美、对

称、秩序、崇高，而莫拉维亚和泰鲁发现的却是审美的反面：丑陋、失调、无序、琐碎。伯顿在解读其风景中的美、秩序、庄严时，用词语将其构成一个有价值的奖品，然后将一个欧洲人指导下的更加有序、更加美丽未来的想象投射到它上面。这就是早期帝国令人飘飘然的乐观主义。但是，莫拉维亚和泰鲁说话的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深陷“欠发达”和去殖民化的后殖民时代。没有多少原始世界留着让欧洲人去发现，而且过去的原始世界早就证明文明使命神话的虚假错误。这些后殖民宗主国作家的意愿，是谴责他们之所见，使之琐碎化，使他们自己完全与之分离。就仿佛不存在任何历史，将北美的泰鲁与西班牙语美洲，抑或意大利的莫拉维亚与非洲绑在一起，尽管事实上，他们悲叹的大多是西方诱发的依存关系导致的破坏。他们的文本中也许暗指一种未来，一种由他们自己挑起和针对他们自己的暴力的未来。泰鲁受到女性的、女巫般火山的威胁，因为它们可以毁灭城市，包括他下榻的酒店（参见下文琼·狄迪恩笔下有关这种经历的叙述）；莫拉维亚笔下汤的意象，让人想起在食人者沸腾的锅里煮着的卡通传教士。

虽然城市风景围绕丑陋、怪异、衰退得以构建，可是乡村风光在泰鲁和莫拉维亚看来，却是用意义的稀缺构成。有关南美洲和非洲农村的记述，都抱怨一种审美和语义的欠发达；两位作家都用纯欧洲帝国的方式，将其与史前时代联系起来。这里是选自泰鲁的一个例子，写他接近在巴塔哥尼亚的目的地时的情景。注意这个段落中意义的缺乏和区分的缺乏如何先被断言为自然界的属性，然后扩展到人类世界：

213

那风景呈现出史前的模样，在博物馆里为恐龙化石形成着色背景的那种；结构单一、可怕的山冈和沟壑；荆棘灌木和岩石；一切都被风抚平了，看似一场大洪水使其裸露，洗去其所有的特色。

风仍然对其施加影响，不让树木生长，把土壤向西吹，裸露出更多岩石，甚至连根拔起那些丑陋的灌木。

火车上的人不朝窗外看，除非到了车站，而且只有那时，才会买些葡萄和面包。火车旅行的一种美是，看着窗外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任何标志牌。一座山冈、一条河流、一片草地——都是告诉你已行多远的路标。可是这个地方没有路标，或者说，全都是路标，彼此难以分辨——许许多多山冈和干涸的河流以及无数灌木，全都一样。我打瞌睡醒来：好几个小时已经过去；窗外的景色**没有变化**。而且车站可以互换——一座棚子、一个混凝土月台、瞪着眼的男人、提篮子的男孩、狗、旧的皮卡车。

我寻找羊驼。我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可是没有羊驼。¹³

如果说伯顿基于占有和野心构建他对维多利亚湖的描述，那么泰鲁则由于麻痹和异化构建巴塔哥尼亚。（假如他懂得西班牙语，他会不会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一切是否不那么可以互换？）这种反差很难更加显著——或更加武断。在此，标准的范畴不是美与丑，而是意义的稠密与稀缺。西方商品文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恰恰是区别、专门化、细分、品味游戏的激增。区别乃是在此被视为缺乏之物——不只是缺席，而且是缺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泰鲁的鉴赏力有用武之地。

莫拉维亚对他一般称作“非洲风景”的某种东西令人尴尬的介绍，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使用的语言再一次符合普遍的标准：风景缺乏形状、有限性、模式、历史。说话者的权威可能存在局限，但根本没有得到暗示。

因此，非洲之旅，如果不完全是一次大酒店（那些大酒店是西

方世界的居民播撒在整个黑大陆的)间单纯的远足,就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潜入史前。

不过如此令欧洲人痴迷的这个史前是何物?首先,应该指出,它是非洲风景的实际构造。这个风景的主要特征不是如欧洲那样 214 的多样性,而是其令人恐惧的单调。非洲的面孔更像婴儿的面孔,而不是成人的面孔,前者没有多少勉强认得出的特点,而生活已经在后者身上印下无数意味深长的线条;换言之,它更像史前时代地球的面孔,而不是今天地球的面孔,在史前没有季节,而且人类尚未出现,可如今岁月和人类已经带来数不清的变化。此外,这种单调呈现出两种真正史前的外貌:反复,也就是单一主题或母题的重复达到令人痴迷、令人恐惧的程度;无形,就是实际上完全缺乏对有限之物的限制,完全缺乏模式和形态。¹⁴

对于将世界其他部分表征为没有历史的这种丧失人性的西方习惯,绝对不可能原谅。一个南欧人就非洲做出此类断言(抑或一个北美人就南美洲做出此类断言),采取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否认行为。要想不受惩罚,需要某种十分有说服力的、精心设计的书写。可是泰鲁和莫拉维亚情愿陷入公开的矛盾,也要维持他们标准的、权威性的观点。一方面,断言“火车旅行的一种美是,看着窗外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另一方面,又补充说在巴塔格尼亚这不起作用,因为风景“没有变化”,这对泰鲁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泰鲁来说,这意味着巴塔格尼亚正在违反火车旅行的审美标准,没能提供适当种类的路标。不向窗外看的巴塔格尼亚人,没能做到在他们自己的列车上正确地旅行。与此类似,莫拉维亚为了构建“非洲风景”的异常,发现自己正在证明如今非洲的面孔不像当今地球的面孔。这就是未经核实之偏见的逻辑和修辞。

动,其丰富性和稠密性证实了他们的期待、成见、偏见。学生们执行第三世界论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计划,并且被这一计划所实现。他们按照被传授的样子,生产宗主国官方意识形态。我能够让他们确信,他们身在受人尊敬的行列。在一篇发表在官方图书文化喉舌《纽约时报书评》上的有关《陈旧的巴塔哥尼亚快车》的评论中,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称赞泰鲁“眼光锐利,有能力得出如此精明的看法”。比如,有关精明看法的例子包括他在秘鲁的惊鸿一瞥:“印第安人拥有棋子一样宽大的外表”;安第斯高原从火车的车窗看,像一个“猫窝般的世界”。富塞尔说,如果这本书不及泰鲁早期在亚洲的火车长途旅行那么引人入胜,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傲慢姿态,那么错的是美洲,而非泰鲁:

欧洲和亚洲在这种事情上比拉丁美洲有着更丰富的环境,因为相形之下,拉丁美洲缺乏特性、深厚的文学和历史联想、多样性。对任何有欧洲经验的人来说,拉丁美洲极度令人觉得无聊。墨西哥的卑劣与萨尔瓦多的卑劣相同[……]此处的无知,宛如彼处的无知[……]¹⁵

凡此等等。(《纽约时报书评》没有刊登所收到的反对富塞尔评论的书信。)

白人男性的悲叹,也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悲叹。可以将它部分认为是在试图压过相同的几十年里出现的另外一种喋喋不休的单一声音:大众旅游的声音。旅行作家的深度创造力必须与包括小费在内的 216
九晚十天空中酒店套餐,以及旅游宣传圆滑、空洞的幻想相竞争。20世纪60和70年代,与富足和天堂有关的异国情调的美景,被旅游产业以前无古人的规模挪用和商品化。“诚实的”作家担负起任务,提供“现实

主义”(不夸张的、反商品化的)后殖民现实。泰鲁在我教的班级所产生的“实在域效果”,无疑部分是学生们根据自己对“真实”表征的认同构建的,他们超越和反对种种商品化表征,而旅游业正是通过这些商品化表征,十分成功地把世界推销给他们。

后殖民的连字符

莫拉维亚之前十五年,另外一位外国人站在阿克拉的一个阳台上,并且在莫拉维亚很可能读过的一本书里,书写这座城市。1957年,适逢加纳独立之时,非裔—美国小说家兼小品文作家理查德·赖特第一次旅行到非洲。他在一本旅行书中讲述这次经历,书的标题是《黑人权力》,预示令白人男性悲叹的大师们如此恐惧的新兴形态的全球认同和历史主体性。像他之前那些带连字符的白人男性一样,赖特在《黑人权力》中,直接致力于戏仿继承得到的比喻用法,并对其加以修订。例如,考察一下赖特讲述在阿克拉的第一天时对阳台场景的重构:

我想再向前多看些,可是太阳实在无法忍受。我烦躁不安地度过下午;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更多看一看这个非洲。我的小屋干净、安静、防蚊,但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非洲。我心里已经在寻找其他的住处。我站在我的阳台上,看见成群的黑鹰,在蓝色朦胧的天空缓慢盘旋。远处,我瞥见阴云密布、浅灰色的大西洋。¹⁶

最后两个句子,是传统岬角风景的一个简化的残余例证。被瞥见的全景是大西洋,它不像坦噶尼喀湖,激发不了占有欲抑或传播文明的幻想。赖特将其编码为邪恶和死亡,他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在非裔—美国

人与非洲之间，大西洋是死亡之地，是中间通道。然而，赖特同时明确宣称，他不满足于阳台传统和阳台的优势地位，他觉得人们从那里不能充分地观看和判断。在其整篇叙述中，赖特惹人注目地尽力承认他作为一个看客能力的局限（比如，在这里，他被迫躲避太阳）。他的书中大概四分之一的句子是修辞性疑问句。在上面的片段中，几乎没有隐喻，且几乎没有否定词。

像玛丽·金斯利抛弃阳台一样，赖特之抛弃阳台，基于一种对替代性选择的认识——首先是可供选择的住处，还有可供选择的表征传统。217 在赖特旅行书的表征规范中，人们只能表征和判断其所在之处。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当他不能上街时，赖特描写身在其房间中的情形。和金斯利一样，他似乎正在寻找放弃假定的描述者与被描述物之间支配关系和距离的方式。

在城市之外，赖特将自己描述得几乎如同莫拉维亚一样，远离部落和乡村生活。然而，他以一种再次令人想起玛丽·金斯利的方式，发现自己在夜间的无拘无束，因为观者—被观者关系的疏远被束之高阁。在夜间，一个获得授权的主体被唤起，而不确定性、脆弱性、不可见性，则为他带来欢乐、富足、自我膨胀。下面是赖特版的丛林夜景（黑体为

黑夜**突然**降临，宛如黑色的湿天鹅绒。空气充斥过多的氧气，麻醉了血液。几只野鸟的尖叫划破黑暗并**猛然**停止，留下一片令人焦躁不安的空虚。从某个地方升起一阵恶臭。远处传来的鼓声转而消逝，仿佛害羞一般。一阵**莫名其妙的**风拂动窗帘，吹得它如巨浪翻滚而后无力地垂落。一只鸟在百无聊赖的夜晚懒散地喳喳叫。非洲人声音的**只言片语**在黑暗中响起并消失。我的蜡烛的火

焰竖直燃烧，毫不停歇，没有一丝闪烁或颤抖。卡车奋力爬坡时，马达发出嘎嘎的声响，这声音将我带回我所知的世界。¹⁷

在黑暗中，看客崇拜消失了（在提到蜡烛之前，段落中没有“我”）。观念变得支离破碎，但（西方的）意识和自我没有分裂——正如金斯利笔下蓝布韦河上子宫般的炊火一样，赖特笔下阳物般的蜡烛平稳燃烧。思想受语言影响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印象的碎片化和唐突如何遭到一种强大、连绵不断节奏的抵消，以及意象如何随着文本的进展变得更加无关紧要。赖特是在试图表现一种无知、迷惑、不解、自我分解的经历。这种经历不会产生恐怖或疯癫，但是会产生一种平静的接受能力和强烈的性欲。卡车不是来救援的；其任务不是将赖特带回他的世界，而是将他的世界归还给他：已知事物与未知事物之间的界限可以穿越。

这些界限在法裔—阿尔及利亚人阿尔贝·加缪的作品中也可以穿越，他是赖特的同时代人，又一位非凡的带连字符的帝国之主体。加缪的虚构作品，表现出对这里讨论的形式和话语的一种深度的、十分具体的参与。其大部分探讨殖民主义的各种矛盾——西方批评曾试图拒绝这种挑战，其采取的方式是将加缪的叙事固执地读作去语境化的存在主义道德寓言。¹⁸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可供选择之物。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1957）中的短篇故事《不忠的女人》，讲述一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女人的经历，她陪伴丈夫踏上深入阿尔及利亚内地的销售之旅。用她的话说，在那里她觉得“一切都出乎意料”。在故事中，她自己的存在危机，与她对欧洲殖民势力在内陆地区无效的认识不谋而合。无独有偶的是，她在故事中的两个重要的关键时刻，独自站在最南端的法属要塞顶部，越过撒哈拉沙漠向远处眺望。这两次都是对目光所及我为君这一场景极好的修订。在第一次，如下文所引，西

方霸权思想如此热忠于使用的缺乏意义的“史前”风景，被视为理所当然，然后遭到拒绝。尽管观者表现出岬角姿态，她看不见且不理解的事情却被反复提及：

实际上，她凝视的目光沿着一条完美的曲线，缓慢从东扫向西，没有遇到丝毫障碍。在她脚下，这个阿拉伯城镇蓝白相间的阳台彼此重叠，泼满斑斑点点晒在太阳下的暗红色胡椒。一个人影都见不到，不过从内院里，伴随着烘焙咖啡的芳香，传来有人大笑的声音或不可思议的踏步声。更远处，苍白的小树林被黏土墙分成不均匀的方块，上部的叶子在一阵无法在阳台上感觉到的风中沙沙作响。再远处，赭灰色的石头王国一直延伸到天际，其中见不到任何生命。可是，在离绿洲有一定距离处，比邻西边棕榈林的干谷附近，可见宽大的黑帐篷。帐篷周围有一群一动不动的单峰骆驼，远远看去很小，它们以灰色的地面为背景，形成一个陌生笔迹的黑色符号，其意义不得被解密。沙漠上方，沉默如同太空一般浩瀚。¹⁹

一个没有差别、超越时间、空空如也的风景，用类似于白人男性悲叹的词语被假定，不过其“完美的曲线”几乎马上被多色彩的、不规则的形状和不均匀的方块——阿拉伯城镇——所打断。更远处，死亡的“石头王国”由帐篷和单峰骆驼占据，那是一个用殖民地主人公不能读的语言写在那风景上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她认识到她不能读它，并且就是在此她这位欧裔—非洲人与欧洲看客分道扬镳。因为看客难得遭受这种困惑；在他的书中，他被“授权不仅要读他之所见，而且要用罗马字母改写它”。加缪笔下的殖民地主人公，就其可以信赖的范围内，在每一

个地方发现她无法破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正在发生。她一生都在这么做。

219 《不忠的女人》以在同一要塞的一个高潮性的夜间场景结束。夜阑人静之时，那女人体验了一次与“永远不可能属于她”的“沙漠王国”极度兴奋的瞬间融合，然后继续对着她沉闷的婚床哭泣。欧裔—非洲人与非洲之间殖民主义界限的这种瞬间渗透，构成小说标题所提到的不忠，这是一种文化意义的不忠。这位不忠的女人，是加缪虚构作品中唯一的女性主人公。女性主体性不固定的界限，为想象一个去殖民化的自我可能意味着什么提供了手段。加缪只是构建出对一种极度痛苦之放弃的惊鸿一瞥，然后便退却，而这种放弃也是一种解放性的释放。他笔下的殖民地女探险家从内陆返回，不是像尼罗河英雄那样带着胜利感，而是带着绝望和失败。像她一样，加缪自己属于欧裔—非洲人的“第三范畴”，这个范畴的中介可能性，将丧失在殖民战争的对立之中。

加缪《不忠的女人》和赖特《黑人权力》都写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殖民冲突在非洲许多地方正迅速走向暴力对抗。两个作品的写作都与去殖民化斗争中具体的转折点有直接联系。加缪的故事追溯到野蛮的法—阿战争之始，法农(Fanon)曾将其作为令人恐惧的现代殖民暴力的范式加以研究。在赢得独立之前，六个阿尔及利亚人中要有一个死去。赖特见证的，是英国先前的黄金海岸加纳建立的独立国家，这一事件成为和平拆解殖民机器的范式。一个带连字符的法国人和一个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两个人都早于泰鲁和莫拉维亚二十年写作，那是在白人男性的悲叹出现之前。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夜晚想象的黑人权力和文化不忠，证明宗主国内部西方控制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结构存在缝隙；20世纪60和70年代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文学和思

想就流淌在这些缝隙之中。在那激动人心的几十年，白人男性的悲叹，在与越来越理解这个词的辩论声的接触中大显身手。在20世纪70年代某些作家身上，对业已丧失的发现和支配习语痛苦的怀旧情绪，既是对那种挑战，亦是对堕落的“开发”和格调低俗的旅游业做出的回应。

机场里的女士

琼·狄迪恩的《萨尔瓦多》(1983)暗示这一切的尽头，或者至少是对结束这一切的希望。狄迪恩的书讲述一次前往萨尔瓦多的旅行，这次旅行由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政治危机激发。该书依赖的不是“欠发达”的范畴，而是恐怖，这个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母体。狄迪恩去萨尔瓦多了解官方确认形态的恐怖：国家恐怖、准军事恐怖杀人小队、恐怖主义暴动。她写了一本勉强有一百页的旅行书，读起来首先像是一次旨在最终废除这种文类的尝试，使之坍塌的是比保罗·泰鲁发现甚或期望的更严酷现实的重压。在一种既不是产生于美丽和富足，又不是产生于丑陋和匮乏的话语中，狄迪恩似乎完全拒绝旅行书写的审美化计划。她没有建造什么，没有绘制什么，没有控制什么。她大量引用。书中唯一的全景景观，是一个对发现语词进行戏仿的微型画。狄迪恩在到达时从飞机上俯瞰，回想起萨尔瓦多“小于加利福尼亚的某些县……正是这个事实支持这个地方可以被管理的幻想”。²⁰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的宏大志向，在这里缩小成对简单“管理”的官僚主义愿望。欢迎来到20世纪80年代！

在《萨尔瓦多》中，宗主国主体的声音和权威减弱到不是消解而是幻灭的程度。置身在那里，产生一种既非支配（如同在伯顿和泰鲁作品中那样）亦非自我实现（如同在金斯利和赖特作品中那样）的感觉。狄

迪恩反复将自己描述成所见不及期望多，再不就是当期待之事意外发生时转移她的目光。记述故意是多声部的。没有完整的主体性，没有稳定燃烧的自我之火焰，负责长篇引用使馆官员、人权倡导者、记者、创造性作家。他们不一致的官方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辩护，常常给人一种东拼西凑的印象。整个观看的计划遭到动摇——实际上毫不夸张。书中唯一的酒店阳台场景发生在一场地震期间：“我记得蜷缩在七楼我房间的一个门框下，”狄迪恩说，“透过窗户观望，圣萨尔瓦多火山似乎从左向右摇晃。”²¹泰鲁幻想中惧怕的来自危地马拉城火山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也许并非巧合，因为狄迪恩专门调用泰鲁作为她在萨尔瓦多的先驱。在有一处，她引用其《陈旧的巴塔哥尼亚快车》中描写的在萨尔瓦多大学演讲时一段异化的经历。我们被告知，等她到了那里，情况要更为糟糕。那所大学已关闭很久，“在圣萨尔瓦多周围的店面里开办有几个班级”。²²白人男性对一个（完全）堕落世界的悲叹，再也不能左右形势。欠发达的刻板印象彻底失败。看着一家奢华的超级市场中富有的宗主国客户，狄迪恩认识到，她（着重号为我所加）“不再十分感兴趣于这种反讽，这是一个不会被此类细节阐明的故事，这是一个也许根本无法阐明的故事，这也许甚至不怎么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 *noche obscura*（真实的黑夜）”。²³狄迪恩似乎用她的“不再”，开创（发现？）了一个新阶段，它要求西方观察者与他们精选的被观察者之间有不同的理解形式、改变的关系——而且在这个确切的点上，仿佛是服输了似的，她的语言跳回到黑暗和光明的旧词汇，那也正是构成她“不再十分感兴趣”的那种话语的词汇。

何谓“一个真正的 *noche obscura*”？它为何必须用另外一种语言命名？因为与康拉德相比，迪迪翁实际上将她的主题看成她的西方女

性自我难以企及的。以无法看见、无法言说、无法知晓为基础的恐怖，就成为参观者不会目击或创造的一种富足之源，她无法从描写的密度中调用这种资源。恐怖构建了使整个全景图产生意义的权威立场，读者却免于做出任何努力去想象抑或理解其运作。狄迪恩体验的是一种失去影响力状态的恐怖，例如该书开篇的抵达场景：“没有土地是坚实的，没有景深是可靠的，没有感觉如此确定以至于它不会溶入其反面。唯一的逻辑是默许的逻辑。”²⁴（黑体为我所加）。就像运气不好的斯皮克一样，狄迪恩没有成功占领那个立足点，但她最终让其读者相信它在那里。因此，虽然她的书具有攻击性，清晰地寻求放弃看客的权威，可是那种权威却在接受端被热情地归还给她。宗主国文化的官方喉舌，急切地将她当作从一个源头归来的发现者迎接。在一打护封广告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人物》杂志，恰恰为了《萨尔瓦多》拒绝的东西而向其致敬：生动性、真实性、洞察力、准确性，看客所掌握的一切。“萨尔瓦多真的成了黑暗中心”，《大西洋月刊》为之欢欣鼓舞。我们终于知道了！疯癫和恐怖不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在萨尔瓦多！因此，“默许的逻辑”一如既往通向一条死胡同，就这样放心地去发现自己。²⁵

这个逻辑一定非常西方。在圣萨尔瓦多，狄迪恩参观大都会教堂，那是1980年一场臭名昭著政治屠杀的所在地。她看见红漆溅洒在外面的阶梯上，而在教堂内，她“在廉价的油布上这儿那儿”发现“似乎是干了的斑斑血迹，是缓慢流血滴在上面的那种斑点，或者流血者是一位女性，并不知道或并不在意她正值月经来潮”。²⁶假想的女性永远充当民族的偶像。这一位女性，她毫不在意、没有品位、无意识地流着自己的血，似乎是狄迪恩笔下萨尔瓦多的偶像，是由一种男性主义统治的宗主国观点形成的。

不过狄迪恩笔下的流血女性是虚构的。假如有一个萨尔瓦多女性在那里，假如她说话，她也许会指出，对她来说，油漆与血液，抑或月经与缓慢流血之间的差别，根本就不是遗忘、冷漠或者默许的问题。她也许会指出，对她来说，恐怖包含的，不只是单纯的无法看见和无法言说之物。随着教堂里的女性们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政治运动和诸如口述史、证词、访谈、电影、视频这样的合作媒体打进都市交际圈，这种阐释确实一直在发生。例如，本章开头的卷首语引自玻利维亚农村劳动活动分子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德·琼加拉的证词，讲述她在政府手
222 中被实施的许多监禁和审问当中的一次。在眼罩被从她眼睛上挪去的时刻，巴里奥斯声称，她有权从一个受支配/反抗的历史主体的视角，制作一幅关于接触地带的显然政治化的图画。²⁷这样一种观点在《萨尔瓦多》中，甚至在想象的层面上似乎也无法理解。从历史上讲，狄迪恩放弃权威与巴里奥斯声称有权相近——一方是否以另一方为条件，仍
223 然有待观察。²⁸

第十章

在新殖民地： 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

1928年，乌拉圭作家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发表了著名的短篇故事集《流放者》，故事的背景设在米西奥内斯，那是阿根廷和巴西交界之处一个偏僻地区，他曾以此为家多年。故事的人物是一群混杂的行为古怪之人，主要为无依无靠的欧洲人，多年以来，他们在这最最边缘之地一个接着一个耗尽生命。有个叫里韦的法国人是工业化学家，他在阿根廷生活二十年并在工业界取得成功，他莫名其妙出现在这里，最终和朋友胡安·布朗一起喝点灯用的酒精身亡。布朗原本到米西奥内斯“只待上几个小时，看一看遗迹”，而在十五年后他却依然在那里。¹有一个名叫范·豪滕的佛兰芒爆破专家，外号是“范·豪滕还剩下什么”，因为他在事故中失去“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右手的三个指头”。²还有一个瑞典生物学家埃尔塞博士，曾经是和巴拉圭政府签约以组建医院、学校、实验室的欧洲专家队的一员，十五年后，他令人费解地出现在米西奥内斯，身着“肥胖的巴拉圭军裤，光脚穿着

懒汉鞋，脏兮兮的白色贝雷帽翘在一只眼睛上方”。³ 埃尔塞在酒精的作用下神经错乱，射中他唯一的女儿，认为她是一只硕鼠。这样的无节制，是他与一位独臂工程师卢瑟尔合作提纯实验失败的结果，卢瑟尔珍藏着两卷本的狄德罗《百科全书》。米西奥内斯是一种戏仿，其对象是处在边缘的世界主义，不过它也居于新殖民秩序的中心。

基罗加笔下的流放者，是新殖民地的反征服者——被美洲世界吞噬其意志并被困在帝国范围的终点的欧洲人。他们身上带有宗主国现代性的规范——工业化、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革新、科学、医学、理性、官僚国家——但是他们无法使这些规范在那里开始运转。基罗加的叙述者称他们是“前一人”(*ex-hombres, ex-men*)，一个连同他们的酗酒无度和受损身体一起，标志着流动性、帝国、男性、主体性、公民权关系之崩溃的术语，这些关系被假定构成现代化的国家秩序。热带打败现代性本身的目的论：其从中心向边缘的自然扩散。他们从前一人抽取“沉重的贡税，仿佛用酒精耗去如此多外国人的活力，使之陷入无法停止的衰竭”。⁴ 进入未知世界的旅行，沦落为夜间醉醺醺从当地酒吧回家的可悲（不过对于范·豪滕和里韦来说则是致命的）挑战。《流放者》的确包含一次英勇的旅行：当地一位市政职员决心按时上交他的记录，日夜兼程穿越暴雨和洪水，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马拉松赛跑。不过这首史诗也变成边缘现代性的一个寓言。虽然这位官僚英雄战胜了自然力，却因重视最后期限而被报以嘲弄。

基罗加笔下的前一人属于旅行者，他们像洪堡的同伴邦普朗一样，永远也不会靠写旅行书牟利。然而，我想在此考虑的，不是他们，而是基罗加与旅行书写的关系。《流放者》从欧洲旅行和旅行书写的接受端进行写作，从我在本书中称作“被旅行者”，也就是被旅行到的人和地点(*people and places traveled to*)的立场。基罗加的故事是从南美讲

述的，并且许多欧洲人前往那里，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意义上，就是如此。但是，在一种更加重要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欧洲旅行和旅行书写，是基罗加写作的直接语境的组成部分，是他用来进行创作的原材料的组成部分，是使得基罗加的叙述者成为他所是之人的组成部分。正如《流放者》这个标题所暗示的，米西奥内斯之被创造，不是作为一个场所，而是作为一个目的地、一个终点。它有能力打断产生旅行文学出发和返回循环的范式。它是一个流—放(ex-ile)之地，反—常(ex-centric)的前一人被扔出现代性的故事主线后，在那里耗尽生命。殖民秩序在那里是一种残余，存在于一个耶稣会传教的遗迹之中。《流放者》的叙述者，从接受端描写一种社会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由非连续性和即兴创作、不当行为和无责任感以及盲目的开放性构建而成。现代性不能在此生根，这种情况日复一日被重演。无论卢瑟尔做什么，当地的橘子都不够甜，无法生产出满足城市市场标准的利口酒。尽管那位公证人愿意为国家献身，可是雨水却使得他不可能保存文件。没有人幸存到年老；没有女性。米西奥内斯是对进步的一种戏仿，是拉丁美洲理论家称之为边缘现代性的悲喜剧版。⁵

20世纪最初几十年，常被视为现代性在拉丁美洲自身巩固之时。由于政治参与的民主化，伴随着消费市场、工业化、日常生活技术改造，以及包括工会制度、女性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运动，城市中产阶级应运而生。独立国家常常依赖可怕的战争稳固边界，并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和文化机构着手建设强大、世俗的民族文化。城市得到发展并从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夺取权力。在艺术方面，收音机、摄影、电影院、先锋派运动繁荣兴旺。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性和都市价值观的承载者。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殖民主义的。也就是说，拉丁美洲依然被固定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尽

管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其民族国家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20世纪50年代领导加纳独立斗争的加纳政治家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一本著名的书中称,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新殖民主义的本质是,”他说,“受制于它的国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拥有国际主权所有的外部标志。实际上,其经济制度以及其政治政策却得到来自外部的指导,”通常是通过经济和货币手段,比如对贸易和银行业的控制。⁶新殖民主义的状态是一种困窘。在政治上,它将一个无权决定其自己道路的民族国家需要担负的义务交给国家。尽管现代性想象一个终将使所有国家同样现代的渐进过程,可是新殖民主义所起的作用,却是限制一个国家自行发展的能力。生产力的果实向外流动,流向海外投资者的口袋。在文化上,发生了某种类似的事情。要现代化,就是同意宗主国的价值观并力图实现它们。要新殖民主义,就是不能这么做,可是又不能退出这个系统,开辟一条单独的路线。源自宗主国并登陆边缘的规范,成为巴西思想家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 Schwarz)称作“不得其所之观念”的东西。⁷因此,新殖民主义文化的困窘是:在别处产生的规范,无法在人们的所在之地得以实施,但也不能遭到拒绝。人们被迫成为一个俱乐部的二等成员,而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身份却不是随意的。“在我们当中,”智利理论家何塞·华金·布伦纳(José Joaquín Brunner)说,“文化不安不是来自现代性的枯竭,而是来自对它的恼怒。”⁸

对于作家和艺术家来说,那种不安成为创造力和实验主义以及恼怒的一个源头。我在第六、七章讨论的是那群北欧旅行者,他们的写作将独立后的西班牙语美洲文本化。第八章考察的是新共和国的文化精英如何对那些叙述进行重新加工,以形成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民族假想(national imaginaries)。本章有两部分。在第一部分,我考察

20世纪拉丁美洲书写如何通过旅行书写的代码和流动性媒介卷入新殖民主义困窘。作家运用涉及目的地(终点)和接受者的新殖民主义立场,作为身份商讨和自我表征的一个持续参照点。换言之,他们像基罗加那样,问道:“你怎样将别人的目的地变成自我的家园?”在本章第二部分,我转向当下,考察旅行叙事的老传统如何得到回收利用,以描写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移民和置换的当代经验,从而创造关于全球化的主题。

作为命运的目的地： 新殖民地的现代性，1920—1950

你怎样将别人的目的地变成自我的家园？我们可以从整个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虚构之地开始，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笔下的马孔多，《百年孤独》(1962)故事的背景。从开篇时碰到吉普赛人带来的神秘大冰块，马孔多作为一个目的地和一个接受者被创造出来。那里的历史和时间的标志，是人物、事物、制度、意义从别处无法控制、难以预测的到来。居民们吸收、考察、调整、接受、改编、虚构、欣赏、管理这些东西，却对它们来自哪里以及如何源起一无所知。马孔多是某种类于欧洲关于美洲的旅行书写全集之另一面的东西。这个全集讲述的是与派遣和带来有关的事情，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像基多加一样，对到达和接受进行描述。在马孔多，现代性如魔法般，但在新殖民主义的意义上到达，它未经同意且鸡零狗碎——钢琴手、铁路、香蕉公司。现代性变成原始材料，人物就像小说家自己一样，用它讨价还价、互相作用、进行创造。

在最近的一本叫《缺席的城市》(1997)的小说中，阿根廷作家里卡

多·皮利亚(Ricardo Piglia)介绍主人公时,说其是19世纪英国旅行者的后裔,那些旅行者“抛弃家人和朋友到工业革命尚未到达的地区旅行。他们孤独且几乎无足轻重,他们发明了现代新闻业,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个人经历留了下来。”⁹结果证明,谱系学是理解小说主题的关键:归属没有可能,且历史不能复原。在这里,拉丁美洲作为目的地和终点的身份,再一次是生活和书写的条件。新殖民主义的困窘成为自我创造的引擎。诸如皮利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基罗加这样的作家,他们利用、依靠、通过新殖民地经历的关系结构进行创作。这种过程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与众不同、尽显活力的一个方面。它常常以归属危机的形式出现,用旅行的措辞表达。例如,拉丁美洲文学的许多严肃认真的学生,读过阿莱霍·卡彭铁尔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小品文《论美洲的奇妙真实》。人们很容易忘记这篇小品文是旅游记述,这篇故意使之功能异常的文章,标志着美洲旅行者与其欧洲同行之间新殖民主义的差别。在这篇令人陶醉的文章中,新殖民主义的差异,首先表现为权威的差异,这是一种一个人被授权宣称了解别人的差异。在文章开头,卡彭铁尔描写他到中国的旅行,他列举了一个奇迹的目录,然而得出的结论是,他搞不懂这些奇迹:

我看见许多极为有趣的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我懂它们。要真正弄懂……就必须懂得那种语言,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¹⁰

他接着说,他特别缺乏的是书本知识,是“对文本的理解”。然后他说,他去中东时,最清晰感觉到的,是“希望理解却一知半解之人的巨大忧郁”。在此,卡彭铁尔再一次称书本知识乃他之所缺,也就是“一些文

学和哲学背景”。¹¹ 欧洲旅行者很少表达对其无知的这种不安（回到布伦纳的词语）。传统不要求这个。然而，对于来自新殖民地的旅行者来说，显然是不鼓励无知的。没有书本知识，他就得不到授权写作。卡彭铁尔继续道：他到俄罗斯时，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了。他发现了曾听说过（从俄罗斯小说中读到）的地名、从图画上了解的建筑、与美洲历史接触的特定时刻。当他到布拉格时，他告诉我们，他终于感到安心了。他看到了席勒、开普勒、卡夫卡的雕像。

不过，即使在这个熟悉的世界，卡彭铁尔的书写也展示出与宗主国旅行者的一种迷人的反差。卡彭铁尔记录这个已知的西欧世界，不是靠表征的行动，而是靠识别的经验。也就是说，他没有构建能唤起记忆的文字图片，或试图在读者心中再现他之所见。相反，他记录下他对景象的识别，那些他已经从先前的旅行或者文学先辈那里得知的景象。卡彭铁尔没有宣称拥有表征、描述或重塑他所见之物的欧洲人的文化权威。他宣称，他只有权对已经了解或被告知那里存在之物的识别进行表达。为什么是这样？也许是缺乏受众：在20世纪40年代，谁愿意读一个古巴人写的关于中国、波兰、中东的旅行书？在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者当中，卡彭铁尔常因欧化而受到批评。他的文本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可是欧洲的旅游描写代码并不支配它。毋庸置疑，他是以一种美洲的和（似乎）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欧化。他不安地坚持认为书本知识是一种必需；我认为，这反映边缘知识分子的文化困窘，因为对他来说，“真实的”现实和“真实的”历史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体验的。卡彭铁尔笔下的旅行者，是一幅新殖民主义自学成功者的画像，他的私人图书馆，是他声称在现代性中的归属感之基础——就像马孔多的居民们，抑或基罗加笔下的工程师和他两卷本的狄德罗著作。

228

然而，卡彭铁尔并没有完全遗漏发现的体验。他在返回古巴的途

中有过这种体验：他发现了……古巴。他留下一句著名的话：“拉丁美洲人回家，并开始明白许多事情。”¹²海外旅行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他见到新殖民主义的美洲：作为一种独特的自我创造，而非欧洲的一种蹩脚反映。他发表了一个审美的独立宣言：

拉丁美洲拖带了三十个世纪的遗产，但是……必须指出，他的风格通过他自己历史的展开成形，尽管有时那种风格能产生真正的怪物。¹³

有了这种认识，一只去殖民化的眼睛开始在文章中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依然受制于欧洲的先驱。卡彭铁尔旅行到海地，访问亨利·克里斯托夫国王的宫殿和要塞；这位国王是1803年海地奴隶大暴动推翻法国统治后确立的黑人统治者。在拿破仑的加勒比妻子约瑟芬形象的引导下，卡彭铁尔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一次顿悟。他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使其欧洲知识对其加勒比故乡产生影响：

我看到将某些欧洲真理带到我们那个地带的可能性，这不同于那些人的气质，他们朝着太阳运行轨迹相反的方向旅行，把我们的真理带到国外的地方，可就在三十年前，那些地方不可能有人理解这些真理，也没有用他们自己的措辞解读这些真理的框架。¹⁴

旅行再一次成为表达新殖民主义关系的代码。卡彭铁尔用将欧洲真理带到他那个地带的方式发现，在欧洲已不再有生命的欧洲的一部分继续存在于美洲。在美洲的通俗文化中，那些扎根于中世纪的实践和信仰，特别是对奇迹的信仰，继续繁荣兴旺；而在欧洲，它们早已被马克

斯·韦伯(Max Weber)称作祛魅的理性世俗化毁灭殆尽。卡彭铁尔认定,这种非现代化的欧洲成分,正是使得美洲(或者在这种情形下的加勒比地区)真正神奇的东西。相比之下,欧洲超现实主义是不真实的,是在神奇已经被灭绝之后想要将其“复活”的一种“消耗性尝试”。卡彭铁尔的想法令读者烦恼,因为即便是在这个去殖民化的重要时刻,美洲的文化本真性依然决定于其欧洲遗产,而不是比如其土著或以非洲为基础的民族的遗产。的确,卡彭铁尔不止一次认同于西班牙征服者。¹⁵他将自己与欧洲的关系重新想象为一种不是他者性而是本真性的关系,以此解决新殖民主义的困窘。通过这种同时既去殖民化又再殖民化的姿态,他者的目的地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白肤色克里奥尔人自我的家园。

229

卡彭铁尔的新美洲文化主体得以诞生,是通过旅行——沿着一条穿过宗主国并返回,而非环绕宗主国的线路。通往去殖民化和主体化的道路,不是环绕而是穿越现代性的代码。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不时传来回归的声明,从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返乡之路》到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跳房子》、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的《漫歌集》、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佩德罗·巴拉莫》和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的《回归》。不过在美洲之内旅行,具体说就是去海地,对于卡彭铁尔的认知顿悟同样重要。国家和地区旅行书写,在拉丁美洲现代主义的档案中起关键作用。新殖民地不得不发展和保持至少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国家资本(由局部和地区形态构成)以及世界性/普世资本(意思是西欧和古希腊、古罗马)。直到现在,拉丁美洲的书店还为“民族文学”、“拉丁美洲文学”、“世界文学”分设书架。在欧洲,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运动,绝对是世界性和大陆性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民族的。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在美洲，积聚民族文化资本是20世纪初艺术家和艺术运动，包括先锋派，共同关注的事情。受过教育的人肩负着责任，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创造将会界定公民并引起归属感的文化资本；作家当外交官、公务员、教育家或总统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种建国的责任，也许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在城市和乡村中心都发展的一个原因。在欧洲，现代主义和文学实验主义是典型属于城市的。相形之下，新殖民地的文学景观，由用非城市措辞表达启蒙和公民权方面的实验纵横交错构成。例如，20世纪30和40年代，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写了一本巨著，叫《智利诗歌》。这部包括三百多件作品的著作，是关于想象性旅行的，其中诗性的“我”在一个土著儿童的陪伴下穿越智利的风景。¹⁶像卡彭铁尔的文章一样，《智利诗歌》被呈现为一种回归和再发现，其中诗人在长期缺席后作为鬼魂回到她的祖国。除了在范围上具有国家性以外，这本著作竭力展现乡村色彩，且实际上是反城市的。米斯特拉尔作为乡村教师的背景，是她作为一个现代主体和国际名流身份的重心。

1941年，一位与米斯特拉尔和卡彭铁尔同时代的人，秘鲁作家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完成其出色的小说处女作《血祭》。阿格达斯是一位巡回律师的儿子，生长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村庄里，在那里与一个土著家庭一起生活；他掌握盖丘亚语，与安第斯山脉的地理和文化深度认同。作为一位作家和文化活动分子，他将克服殖民地的种族和文化分歧作为其使命，因为这种分歧撕裂秘鲁社会，并使土著人这一多数群体处于边缘化和从属地位。他的小说以一个抵达的场景开始，显然是用一个归来的当地人形象取代外国旅行者的形象。换言之，那位抵达的主体是一位安第斯山脉的内部人，而非访

问者：

Entre alfalfares, chacras de trigo, de habas y cebada, sobre una lomada desigual, está el pueblo.

Desde el abra de Sillanayok' se ven tres riachuelos que corren, acercándose poco a poco, a medida que van llegando a la quebrada del río grande. Los riachuelos bajan de las punas corriendo por un cauce brusco, pero se tiende después en una pampa desigual donde hay hasta una lagunita; termina la pampa y el cauce de los ríos se quiebra otra vez y el agua va saltando de catarata en catarata hasta llegar al fondo de la quebrada.

El pueblo se ve grande, sobre el cerro siguiendo la lomada...¹⁷

英文翻译没能捕捉到阿格达斯的西班牙语口语和地区特性：

Amid fields of alfalfa and patches of wheat, broad beans and barley, on a rugged hillside lies the town.

From the Sillanayok' Pass one can see three streams that flow closer and closer together as they near the valley of the great river. The streams plunge down out of the punas through steep channels, but then spread out to cross a plain uneven enough to hold a small lake; the plain ends, the river's course is broken again, and the water goes tumbling down from one waterfall to another until it reaches the bottom of the valley.

The town looks big as it follows the slope of the mountain...

在苜蓿田和小麦、蚕豆、大麦地中间，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坐落着那个城镇。

从塞拉纳约克河口，但见三条溪流在接近大河谷时逐渐流到一起。溪流从寒冷贫瘠的高地流出，穿过陡峭的河道冲下来，但随后铺展开来流经一片平原，那平原高低不平形成一座小湖；平原结束处，河道再一次中止，河水从一个瀑布跌落到又一个瀑布，一直抵达谷底。

那城镇看起来大，因为它是沿着山的斜坡建成的……

阿格达斯用一种非安第斯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介绍安第斯人的世界，这正是他的天赋；但是与此同时，他明确表示这是一个不同的宇宙。例如，在上面的段落中，这个地方不是用陆地构造而是由流水标示的。（在安第斯山脉的城镇，流水顺着建筑在街道两旁或者常常是中间的渠道流淌。）在这次安第斯人的抵达之后，阿格达斯引入外来者“旅行者”（*el viajero*）的声音，他用外来者的种族主义措辞给这个地方命名：“印第安镇”（*pueblo indio*）。叙述者告诉我们，“印第安镇”是“旅行者们”登上山口看见下面的城镇普基奥时说的。有些人语气带着轻蔑；低地人在山顶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地说：“印第安镇！”¹⁸可是，叙述者警告说，这些旅行者来自海岸；他们居住在海平面上。他们从未从远处的山口看过他们自己的城镇，他们体会不到“知道距离的人心中[产生]的快乐”。¹⁹高地人远看到山下的家乡也发出惊叹。这段复杂的、跨语言的、不同文化间的开头，发起一个大胆的书写实验，围绕镇子一年一度的斗牛组织起来。抵达的现代和民族脚本，被折叠进一个安第斯人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殖民关系和土著宇宙的纠缠抑或融合所统治的世界。

阿格达斯提出并且用当地的归来者更换非土著旅行者以及他们对

他者性的轻蔑言辞。他就这样将普基奥从目的地变成了家园。对于新殖民地的现代主义者来说，去殖民化要求人们不是绕过而是穿越宗主国生产主体的话语。

巴西现代主义的伟大实验者之一，马里奥·德·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坚持这一点。标志他转折点的文学创作喜剧旅行小说《马库纳伊玛》，被写成对卡尔·马蒂乌斯(Karl Martius)经典作品《巴西之旅：1817—1820》的戏仿。²⁰德·安德拉德在“前言”中说，他在本书中的目标之一是要

传奇性地蔑视地理和地理动物志。因此我尽可能将这部作品去地区化，与此同时，我取得的成绩，是在文学上将巴西构想为一个同质性实体、一种民族和种族的和谐，也是一个地理的和谐。(这也就是说，我不相信……我写了一部巴西作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巴西人……)²¹

德·安德拉德并不在文字意义上怀疑他是巴西人——他，像阿格达斯一样，从未去过欧洲。他是在调用新殖民主义的文化困窘。如果他必须应对的一切是继承的欧洲话语，那么他只有用故意非本真的方式使用那些话语，才能创造某种本真的巴西的东西。埃丝特·加伯勒(Esther Gabara)在对德·安德拉德的散文和摄影才气横溢的研究中表明，他如何创造“一种建立在‘错误’之中的表征和自我呈现实践”。²²她证明，德·安德拉德的去殖民化实践，是故意滥用和扰乱宗主国的旅行、地理、人种志话语，以此创造一种本真的巴西的非本真性。他根据自己在巴西内地的旅行，写过一本十分有趣的戏仿的旅行书，叫《学徒观光客》。在这本书里，他使用双重曝光的摄影图像扰

乱代码。尤其是，如加伯勒所示，他将画像（一种家和自我的艺术形式）叠加在风景（一种“在远处”和别处的艺术形式）之上。在一幅题为《1927年6月12日在特菲的可笑赌注》的滑稽照片中（图40），他拿着欧洲博物学家的手杖和帽子、非裔巴西人和土著“野人”的香蕉、种植园女主人的扇子。加伯勒评论说：“巴西的所谓‘三个种族’的象征，被诙谐地一个个分层放置，而不是描写一个单一、统一的国家团体。”²³这三者分享的唯一共同基础是殖民主义本身，这也是将他们分开的经历。

232 德·安德拉德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努力应付新殖民主义的困窘，不过他也谈到其痛苦，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描述的那样，“南美个体的痛苦”，是一种欧洲人无法想象却“令我痴迷和苦恼的”痛苦。这种苦难源自征服及其后果，包含“道德存在不能表现得行之有效”。对德·安德拉德来说，这是“人类的一种不可调和的、巨大的、神圣的痛苦；我总是想象它搭乘哥伦布的第一艘船至此，并在这里生存”。²⁴

一种类似的神圣痛苦和一种类似的叠加策略，在194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一些最有影响的诗歌中出现。在米斯特拉尔20世纪30和40年代的作品中，旅行和流动性再一次清楚表述作为新殖民地文化困窘的向往和归属危机。最吸引米斯特拉尔第一位英语译者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一首诗的标题是“La extranjera”，翻译为“外国人”或“异乡人”或“局外人”。这首美丽的诗，使用德·安德拉德笔下家和远离叠加影像的文字对等物。²⁵正如阿格达斯引用外来旅行者抱怨地说出“印第安镇”时怀有敌意的语气一样，米斯特拉尔的诗是一个无名声音说的话，这个声音将她描述成无归属的外国闯入者：“说话带着她茫茫大海的乡音/带着莫名其妙的海藻和沙砾。”像德·安德拉德的《1927年6月12日在特菲的可笑赌注》一样，米斯特拉尔的“La extranjera”是通过一位外国他者



图40:《1927年6月12日在特菲的可笑赌注》,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学徒观光客》中的照片。由埃丝特·加伯勒和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院提供。

的声音折射的一幅自画像。南美以自然的刻板形象出现，正如它们在德·安德拉德的照片中出现一样，是作为共享的文化代码。“她将果园变得令我们惊奇/种植仙人掌和刺人的杂草”（第5—6行）。这位陌生人没能找到归属，是一种永恒的状况。她可以在我们中间生活八十年，这首诗歌写道，

总像刚刚来到我们中间
说话时宛如呻吟和气喘
只有动物能听懂她的语言（第12—14行）

这种状况，像德·安德拉德的一样，令人无可救药地痛苦。“在一个最痛苦的夜里，”诗的结尾写道，“她将死在我们中间，头下只枕着她的命运。”²⁶

米斯特拉尔为“La extranjera”写了一个姊妹篇，题为《缺席的陆地》，用一种补充的方式探讨归属的困窘。《缺席的陆地》没有采用双重
234 曝光或不同元素叠加的手法，而是构建某种类似空白底片的东西，一幅精工细作的虚无图画。诗人描述一个由缺席、否认、丧失构成的归属之地。她说，她那“无名的”国家，“既不长石榴亦不生茉莉/它没有靛蓝色的天空或大海……既无桥梁又无小船我无法到此……我既未寻找亦未发现”。²⁷注意这些诗行如何调用美洲神话以将它们弃之不顾。诗人的国家是一个用“我拥有并丧失的祖国”构成的地方：

我失去了曾经
睡眠于斯的山脉
我失去了生命芬芳的

黄金果园

我失去了长满

甘蔗和木蓝的海岛（第39—44行）

她说，这些东西的阴影亲切地缠绕在她周围，把这个“无名的国家”变成“我将死[之地]”。就像第八章讨论的那首诗《美洲旅行者》中的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一样，米斯特拉尔召唤美洲的基础神话是为了抹去它们。她用虚无——缺席的在场——置换这些神话，提出一种语义真空作为一种富足形式。《缺席的陆地》用这种有独创性的方式，摆脱目的地和命运的旅行者修辞。缺席的陆地不可能是一个目的地，它是人们将别之地和故事落在身后时应运而生的一个地方。

因此，米斯特拉尔、卡彭铁尔、阿格达斯、德·安德拉德以及那么多与他们同时代的人，让艺术洞见的渗透力和无所畏惧对新殖民主义的困窘产生影响。新殖民主义强加许多无自由的形式；各种各样的发展和繁荣，是一场针对这种本质的斗争。与此同时，多元文化形态或文化资本的形式——地区的、国家的和宗主国的/普世的——正在起作用。艺术家发现，创造性的种种可能巧妙地纠缠或重叠这些形态和形式，正如在德·安德拉德双重曝光的照片中一样，通过彼此折射或强迫它们，像阿格达斯一样，进入令人苦恼和别出心裁的融合。也许这些现代主义作家正试图做后殖民批评家维奈·巴尔(Vinay Bahl)(1997)所认为的一种不可能的把戏——“反对用帝国主义势力强加给他们的他者性的构想界定他们自己，而又不让他们自己被那些范疇包括在内”。²⁸现代主义者对这种困窘的反应，是一种永久的变化过程。

米斯特拉尔“La extranjera”中动人的形象不能帮助我们，不过却能让我们想起世界另一边的另外一位局外人，他在相同的时候扰乱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沐浴着阳光的海滨。当然，我指的是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1942)，其背景为依然是一个成熟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这种对比很有意思。《局外人》里的阿尔及利亚，仍然根据殖民势力明显直接的差别，而不是新殖民地的纠缠和重叠得到图绘。加缪将他的主人公描述成“一个热爱没有阴影太阳的可怜的裸体人”，他“同意为真理而死”。²⁹ 殖民主义产生这种对绝对真理无影的反思，绝非偶然。十五年后的1957年，野蛮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如火如荼，这时加缪发表短篇小说卷《流放与王国》，本书第九章曾简单提及这本书。在这卷书里，一个十分不同的阿尔及利亚出现了，随着殖民势力的瓦解，纠缠、重叠、缺席、语义真空开始发挥作用，就像亲切地缠绕着米斯特拉尔笔下“我将死[之地]的无名国家”的诗性主体的阴影一样。³⁰ 的确，米斯特拉尔《缺席的陆地》得到上文从那些故事中的一个引用的段落(第219页)的回应。

通过流动性思考：1980—2007

耶稣，活神之子。我现在一辆大巴上，前往某个我不知道的国度。我的希望是找到有价值的工作，能够让我体面地挣得我的家人和我，作为你的孩子，生活需要的一切。你和约瑟跟马利亚一起时知道流放的辛酸，你得在异国他乡寻求庇护，你明白我的灵魂也因离开亲人而备尝撕裂的痛苦。关心他们，上帝。纵然相隔遥远，确保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且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祈祷你愿这旅行善终。愿我安全无灾，诸事顺利。圣母，耶稣之母，指引我

向前，给我克服旅途艰险的力量。上帝，我信仰你，以便在面临可能让我怀疑你的爱之危险时，永远坚强。阿门。

《移居者的祈祷书》，

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圣胡安—德洛斯拉戈斯主教区，1997

在我正工作的城镇，人们组织旅行。他们租一辆卡车装满人！他们直奔边界，并从那里去明尼阿波利斯。每隔两周，一辆小型敞篷载货车装满墨西哥巧克力辣酱、红辣椒、奶酪等等，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返回时带来服装和其他所有的一切。半个镇子的人在美國……

我最后一次看见卡车载着年轻人离开时，里面有许多我认识的女性，但我不敢和她们说话。我起鸡皮疙瘩地认为，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父母，另外一些一去就是十五年。噢，母亲和父亲们多么难过，多么坚强！

洛德斯·特鲁希略(Lourdes Trujillo)，

墨西哥霍奇米尔科都市自治大学农村研究博士生

20世纪80和90年代，帝国的一个新阶段在世界各地展开。苏联集团瓦解带来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秩序，而通信革命则改变每一种可能性的地图。大规模变迁和加速的人类流动性模式，是这种秩序关键的新元素之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从穷国向较富有国家、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以及大众旅游。在21世纪开始的今天，旅游业是世界上仅次于毒品交易的最大产业。此外，劳动力迁移导致定居者从欧洲向外殖民扩张的逆转。今天，在欧洲和北美每一座城市，都有流散社群存在，它们来自全球多个地方，通常是这个国家的前殖民地。几乎

一半的苏里南公民居住在荷兰。20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面临急剧的人口衰落,将其先前与南美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西班牙政府开始邀请阿根廷人来居住在乡村,完全改变了阿根廷19世纪邀请欧洲定居者的状况。西班牙重启这一策略,与其原初的种族和种族主义动机是一样的。19世纪最初十年末期,阿根廷试图消除土著人和黑人在人口中的存在;一个世纪后,西班牙试图阻止来自非洲的移民。

237 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2000年居住在美国的十个人中,有一个出生在另一个国家;另外百分之十的人中,父母有一方在另一个国家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入学的半数孩子说的语言不是英语。百分之十五的圭亚那人居住在纽约市。这种人口变迁影响到移民来源地和抵达地的社会、制度、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旅行者仍然旅行,而且旅行书依然有人写、有人读,但是过去三十年间的戏剧性变迁和增速要求我们学会通过流动性思考。³¹“全球化”这个词之出现,旨在为20世纪末全球关系的划时代变化命名。不过其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也许是一个关于进步的叙事之死亡,而这一叙事却为世界各地非常不同状况下的人们分享。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根据其目的论的设计,包括全人类在内,但它正慢慢失去对移民和行动的控制。到2007年的今天,有关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将在某个时刻平等“发达”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们要记得,不久之前,这还是一个全球共享的期望。³²本书结尾处不适合对全球化进行完整描述,或根据帝国设计的新自由主义对行星关系进行重构,尽管这些主题迫切需要探讨。然而,我将试图让坚持读完本书的那些人相信,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希望证明,本书考察的旅行书写的语词和惯例依然与我们同在,就像它们所编码的帝国关系一样,常常以变异的形式存在。在这个迅速变革的当下,那些惯例继续产生意义、定位主体,并对世界施魔、祛魅、再施魔。

对许多人来说，新全球秩序的帝国特征，暂时被一种有关自由贸易、人员流动、开放市场、全球合同的合法化语言所遮蔽。不过，人们从前殖民地国家向前殖民者城市的反向流散，主要是由多国资本主义的最新方案引起的，这个方案就是，通过国内外债务和低工资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随着人员流动，巨额财富以债务清算、庇护款、疯狂夸大的利润形式不断从穷国流向富国。富国联盟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新一波的掠夺，以公司利润的名义将极端严厉的社会经济条件强加给弱国的全体居民。国家被迫放弃其监护和再分配功能，不得不为商业阶层服务，满足多国投资者的利益。就像上文引用的拿着祈祷册子的那位一样，流动劳工收回部分被掠夺的财富，将其重新分配回到其源头。今天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包括中美洲、墨西哥、加勒比地区、菲律宾、印度，依赖这笔沿着家庭路线寄回的钱维持稳定。

对于这些反向流散者来说，宗主国是一个利己主义和善恶相克的主人。本书自始至终一直在思考，在早先几个世纪里，人们如何通过故事向自己描述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并用故事创造出想象他们所经历变迁的方式。现在情况依然如此。作为研究旅行文学的学者，我在20世纪90年代不由得发现，我读到的日报正在复活我在第五章谓之的生存文学。我用那个术语指称三百年前从遥远的海岸传回欧洲的有关苦难和生存、怪物和奇迹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接近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文类以一种新的伪装重现，这一次是在宗主国自己的边界。各种报纸开始刊登海难故事，例如九百名库尔德人在1999年春天不是在火地岛而是在法国南部海岸搁浅那样的故事。2007年初，在本版付印之时，这些事情依然每天都发生。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早晨，我的报纸报道称，一艘载有五十人，从突尼斯前往西西里的橡皮艇失事。幸存者说，十九人身亡，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大海。³³ 偷渡者的故事也回来了，不过

今天这些故事讲述的，不是欧洲男孩藏在甲板下前往金银岛，而是东欧家庭紧抱在英法之间隧道里的火车下面，以及非洲男孩被发现在降落欧洲机场的飞机轮子盖里冻死。³⁴1998年，偷渡者的故事在美国以一种耸人听闻的形式重现在埃利安·冈萨雷斯(Elián González)的戏剧中，这是一位被冲到佛罗里达海岸的五岁古巴孩子。在电视上播出数周后，这个例子在古巴裔美国人当中闹得满城风雨。它充满当代政治以及古老的诗学：有些佛罗里达人说，这孩子是婴儿耶稣转世并且被海豚所救。

有关死亡和拯救的故事大量流通，它们不是从撒哈拉而是从亚利桑那沙漠传出的，就像2000年夏天的那个故事，当时一位年轻的萨尔瓦多母亲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从她死去的怀抱中人们解救出一个婴儿。救助者是边境警卫队，在较老的撒哈拉故事中，这个角色是由路过的贝都因人扮演的。当然，这种对照具有反讽意义。1999年，令人窒息的奴隶船噩梦在来自旧金山港的一则生动报道中重演。十八名中国劳工因在一艘货轮深处一个集装箱中受尽折磨而发疯，而他们的七个同伴已经在那里死去。几个月后，四十三名中国人在一辆将他们从荷兰偷渡过来的卡车后面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一故事令英国举国震惊。那之后数周，在里奥格兰德河岸，一大堆人看着两个试图越界进入美国的人溺水而死。这一事件在电视上进行直播。2001年初，白人对黑人动用私刑的情况死灰复燃，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西班牙南部海岸。囚禁叙事在洛杉矶、迪拜、米兰、曼谷这样的地方重生，表现为与家政服务、血汗工厂、妓院中的卖身契、强制监禁有关的故事。当奴隶制本身被发现在西非卷土重来时，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视之为一个“来自19世纪的景观”。他报道说，在阿比让，姑娘们的价格是五个英镑。³⁵与此同时，欧洲发现自己有着成千上万被奴役的女性性奴，她们中许多是俄

罗斯人和东欧人。仿佛是一直在附近等待似的,废奴主义自动掸去灰尘重新出现,它由伦敦反奴隶制学会领导,该学会创建于1787年,现在叫反奴隶制国际。³⁶生活在1980年的任何人都想象不到,在新千禧年之交,这竟然是我们还会牵肠挂肚的事情。

17和18世纪,上演新全球秩序的故事来自遥远的海岸。在20世纪90年代巩固自己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中,故事发生在宗主国自己的边界,有时正好就在其居民的眼前。如同过去有关死亡和生存的文学一样,每天在世界报纸出现的戏剧所起的作用,是上演新的行星秩序,一种新近突变的帝国秩序,以及创造其主体、其等级制度、其关系。这些不同之处具有启发性。在17和18世纪,是幸存者讲述海难、囚禁故事偷渡



图41:《等候并观望》(2005)。一名边境警卫队特工在南亚利桑那的沙漠中监视被扣留的移民。(摄影,奥兰多·拉腊)

故事等等，他们是按照天意（一个关键词）活下来讲故事者。根据定义，这种故事总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确认一种新型宗主国全球性，并往往是帝国的主体之可行性。这些主体是他们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标题中。今天对这种档案的回收利用，主要讲述死去的无名者；叙述是第三人称。受不同欲望驱使，当代的变体表演的不是离去和归来，而是拒绝和驱逐的戏剧。旅行的劳动者死在走向新生活的途中，幸存者被送回他们来的地方。也有成功故事——许多移民的确取得成功。可是死亡戏剧才是在宗主国的公众想象中有吸引力和产生共鸣的东西。³⁷

这到底是怎么啦？在我看来，关于死亡和绝望的戏剧，并不只是反移民偏执狂的一种表达。它们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记录，一种现状核实法，针对的是欢欣鼓舞的超级利润决算和史诗般的并购交易，这些东西占据着商业版面并使那些乘商务舱者痴迷。宗主国在这些叙事中将自己预设成一个要塞，靠暴力的排除得以维持，并遭到绝望者的攻击，而这些人不该比要塞内的那些人得到的更少，只不过他们没那么幸运而已。它是否在向自己展示其愈益加剧的合法性危机？抑或其作用只是提醒在里面的那些人，他们何等幸运并受到怎样的威胁？

尽管存在有关死亡的故事，事实是前殖民地的流散者已经在宗主国落户，采取的方式与殖民主义定居者毫无可比性。今天几乎每一个美国城镇都有一个墨西哥人或中美洲人聚居地。遍布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村落，在美国都有成熟的卫星社群，人员、商品、金钱在那里不停地来回，就像上面引文中提及的明尼阿波利斯对于土著人社群一般。飞地由此诞生。在佛罗里达有讲佐齐尔族语的公寓群，在纽约有讲纳瓦特尔语的建筑群，都是根据土著人的社会关系重组的。来自瓦哈卡的米斯泰克人拥有一个跨国的网络，从埃斯孔迪多港到安克雷奇。如同启

蒙时期的旅行者满载珍品和标本回家一样，当代全球劳动力从另外一个方向归来，带着将会卖掉以支付旅费的成箱衣服、汽车零部件、盒装器具、超大捆绑的货物。正如来自印度的建筑音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回响一样，今天的墨西哥城镇和村庄遍布着两层的房子，其建筑便是钱来自国外的证明。19世纪，英国人的次子们前往印度或加勒比地区去发财；今天来自普埃布拉、圣萨尔瓦多或昆卡的年轻人，被派往洛杉矶、芝加哥或盐湖城，争取购置土地、创业、支付教育或医疗护理费的现金。最近人们专门为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萨波潘圣母像在加利福尼亚的信徒建造了一个新版圣母像。这个新的化身，被恰当地称作“旅行者”。

我们常被要求将这种运动想象为“流动”(flow)，这个隐喻暗示一个借助重力将会自动到达水平平衡的自然过程。流动是全球化首选的隐喻。流动的水平意象，使得市场表现为完美的平均主义者。像重力一样，无论它产生什么效果，都是根据定义假定要产生的效果。不容对它们有任何怀疑。可是旅行故事却揭露流动隐喻之违反常理。窒息而死的中国工人并没有在卡车后面流动；格兰德河也许一直在流动，但河里溺亡的年轻人没有流动。金钱没有流动。它是被邮寄的，而且寄钱的需要，常常将移居的工人局限在国外名副其实的束缚之中。“流动”掩盖这个事实：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是由人们做出的具有伦理维度的决定运作的。这些决定构建一个在隐喻意义上蔑视重力的世界。它的力量不是水平的，而是垂直的。这些力量将财富抽进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经济贫困和背井离乡却在蔓延。顶层和底层都在我们眼前消退。 241

正如我提及的某些例子暗示的那样，人类世界的这些大规模重新配置，产生新型的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移居者用一种往往总是“远离”

(awayness)的形式,使用他们的公民身份。家乡的社群根据其侨居国外移民的来往,对惯常生活进行重新配置。卫星社群现象往往既在字面意义上,又在存在意义上暗示双重公民身份,就是让自我变成两个,在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中拥有平行的身份。这可以既是一种碎片化的经历,又是一种给予权力的经历。它经常,尽管不是总是,发生在匮乏、不安全、受限选择的条件之下。市场的数学并不区分在出生地挣钱维持的生活与作为移民在外挣钱维持的生活,认识到这一点令人震惊。换言之,流动劳动强加给个人、家庭、社群的无法估算的费用,代际和夫妻关系的中断,导师、管理者、教师的缺席对儿童造成的损失并没有考虑在内——所有这些都统计数字所掩盖,但是会令任何访问社会结构支离破碎的农村社群的人不知所措,就像



图42:《圣母像章》(2005)。一块画有瓜达卢普圣母的像章,被穿越南亚利桑那的托赫诺·奥乌德海姆国移民落下缠在树枝上。(摄影,奥兰多·拉腊)

上面引用的农村人类学家一样。

各种新的流动性正在破坏一种最想当然的人类社会生活规范的垄断地位，也就是逗留的规范性。当萨波潘圣母像生成其旅行的新复制品“旅行者”时，原作则获得一个新的名字，“逗留者”。在那之前，逗留的状态并不需要命名。尽管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世界人口被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处于移民流之中，但是流动性（“别处和远离”）与非流动性（“家和此地”）相对应的规范性背景，不再是世界地缘社会安排的基础，也不是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的唯一标准。我们将会需要新的地理学家，图绘被技术、好奇心、必然性、帝国的巨大动员力再次重新配置的行星。

注 释

第二版序言

- 1 我在此回忆起1991年劳伦斯·萨默斯，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说过的现在看来臭名昭著的话。他推荐“将更多肮脏行业迁移到LDC[欠发达国家]”，在那里婴儿高死亡率和低预期寿命，意味着更少的人会活着遭受污染的影响：

我总是认为非洲人口密度小的国家大片都是很少污染的……对一种有百万分之一可能导致前列腺癌的制剂的担心，在一个人们能活到罹患前列腺癌的国家，比在一个五岁以下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两百的国家，显然会严重许多。(Lawrence E. Summers, internal memo, World Bank, December 12, 1991)

该备忘录的全部文本可见于www.globalpolicy.org。在其1992年公布之后，巴西时任环境大臣何塞·吕岑布格尔给萨默斯写回信称：“你的推理完全符合逻辑，但是极其愚蠢。”

- 2 关于斯坦利·莫德，参见US Library of Congress, “A Country Study of Iraq”。布什的话引自2004年1月3日在胡德堡陆军基地对军队做的一次演讲。英国广播公司关于这次演讲的报道可以在www.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找到。库尔德人第一次被施放毒气，是受到温斯顿·丘吉尔而非萨达姆·侯赛因的命令。“我不明白对使用毒气的这种审慎。我强烈支持对未开化的部落使用毒气。”丘吉尔在1919年说，他指的是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许多英国军队是从印度调来的。

第一章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 1 我第一次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的评论中听到这个术语, 为此, 也为了许多其他洞见, 我要向她表示感谢。参见她的文集 *In Other Worlds*, London, Methuen, 1989。
- 2 Guaman Poma de Ayala, *Nueva Coronica y buen gobierno*, John Murra and Rolena Adorno (eds), Mexico, Siglo XXI, 1980, manuscript p. 372.
- 3 最好的对乌阿曼·波马的英文介绍来源于: Rolena Adorno, *Guaman Poma de Ayala: Writing and Resistance in Colonial Peru*,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1986。原始手稿的一个高质量数字摹本, 2000年由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在线出版。
- 4 “文化互化”于20世纪40年代由古巴社会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 (Fernando Ortiz) 在对非—古文化的一篇开创性描述中创造 (*Contrapunteo cubano* [1947, 1963],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8)。乌拉圭批评家安吉尔·拉马 (Angel Rama) 将这个术语吸收进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研究。奥尔蒂斯提议用这个术语取代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和文化畏缩 (deculturation) 这一对概念, 这一对概念描述从宗主国利益内部用简化的方式想象的文化转移。
- 5 Ron Carter, “A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An Overview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tylistics,” in Theo D’haen (ed.),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msterdam, 1986, pp. 7—26.
- 6 我曾更详细地论述过这个论点, 参见 “Linguistic Utopias,” in Nigel Fabb, Derek Attridge, Alan Durant, and Colin McCabe (eds), *The Linguistics of Writ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8—66。
- 7 早期的奇卡诺女作家以这种方式利用民俗素描, 相关研究参见 Gloria Treviño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1)。
- 8 参见具有争议的研究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一部分 科学与情绪, 1750—1800

第二章 科学、行星意识、内陆

- 1 引自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II, The Science of Freedom*,

-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p. 126。引述的是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IV, 48—49。
- 2 Captain Betagh, *Observations on the Country of Peru and its Inhabitants During his Captivity* in John Pinkerton, ed.,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Longman et al., vol. 14, 1813, p. 1.
 - 3 M. Frézier, *A Voyage to the South Sea and along the Coasts of Chile and Peru in the Years 1712, 1713, and 1714*, 译自法语版, London, Jonah Bowyer, 1717, Preface。
 - 4 Alonso de Ovalle, *An Historical R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Chile* (1649), in Pinkerton, op. cit., vol. 14, pp. 30—210.
 - 5 Betagh, op. cit., p. 8.
 - 6 我此处的讨论使用的是 Victor Von Hagen, *South America Called Them*, New York, Knopf, 1945; Hélène Minguet, Introduction to La Condamine, *Voyage sur l'Amazone*, Paris, Maspero, 1981, pp. 5—27; Edward J. Goodman, *The Explorers of South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 7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e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1748, p. iv. 这是其 *Relation abrégée d'un voyage fait dans l'intérieur de l'Amérique méridionale* (1745) 的第一个英语译本。
 - 8 Pierre Bouguer, *An Abridged Relation of a Voyage to Peru* (1744), in Pinkerton, op. cit., vol. 14, pp. 270—312.
 - 9 La Condamine, op. cit., p. 24.
 - 10 *ibid.*, p. 51.
 - 11 当然, 它现在依然是。在此时此刻, 对亚马孙河探索最近的再现是 Joe Kane's *Running the Amaz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 12 John Adams, Preface to Ulloa's *Voyage to South America* (1747), in Pinkerton, op. cit., vol. 14, p. 313.
 - 13 Von Hagen, op. cit., p. 300.
 - 14 Louis Godin des Odonais, Letter to M. de la Condamine, July 1773, appended to La Condamine's *Abridged Narrative* in Pinkerton, op. cit., vol. 14, pp. 259—269.
 - 15 Frézier, op. cit., p. 10.
 - 16 Adams, op. cit., p. 314.
 - 17 Messrs. Saugnier and Brisson, *Voyages to the Coast of Africa* (1792), New York,

- Negro University Press, 1969. 这是1792年法语原文 *Relation de plusieurs voyages à la côte d'Afrique* 的一个英语译本。
- 18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Voyage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trans. Helen Maria Williams, London, Longman et al., 1822, vol. I, p. vii.
- 19 这里有关林奈和博物学的讨论依赖的原始资料,有以下这些: Heinz Goerke, ed., *Linnaeus*, trans. Denver Lindley, New York, Scribner's, 1973; Tore Frangsmyr, ed., *Linnaeus: The Man and his Work*,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Gunnar Broberg, ed., *Linnaeu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Linnaean Research*, Pittsburgh and Stockholm, 1980; Daniel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Empire of Reason*, New York, Doubleday, 1977; P. J. Marshall and Glyndwr Williams,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ian E. Novak (eds), *The Wild Man Within*,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2;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Pantheon, 1970; Gay, op. cit.。在1956年,大英博物馆出版了1758年版《自然系统》的一个摹本,以其拉丁文名 *Caroli Linnaei Systema Naturae* 为标题。
- 20 Foucault, op. cit., p. 136.
- 21 Boorstin, op. cit., p. 16.
- 22 引自 *ibid.*, p. 444。
- 23 Sten Lindroth, "Linnaeus in his European Context," in Broberg, op. cit., p. 14.
- 24 Gunnar Eriksson, "The Botanical Success of Linnaeus. The Aspect of Organization and Publicity," in Broberg, op. cit., p. 66.
- 25 Foucault, op. cit., p. 136.
- 26 *ibid.*, p. 132.
- 27 *ibid.*, p. 136.
- 28 *ibid.*, p. 132.
- 29 引自 Marshall and Williams, op. cit., p. 48。
- 30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女博物学家——确实有,尽管她们在专业方面的参与有限,而且她们最初并没有被计入派往海外执行任务的门徒当中。关于某些女性旅行作家与科学任务关系的讨论,参见下文第六、八章。
- 31 引自 Gay, op. cit., pp. 152—153。
- 32 引自 Foucault, op. cit., p. 148。

- 33 Barbara Stafford, *Voyage into Subst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p. 10.
- 34 La Condamine, op. cit., p. 37; 黑体为我所加。
- 35 Lindroth, op. cit., p. 25.
- 36 芭芭拉·斯塔福德在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中将天真无辜转换成一个自然的事实,认为“非虚构旅行叙述[在18世纪末]的流行,部分倚重于探险者和公众开始回归对地球的一种几乎神话般理解的欲望,那也许是地球一直的面貌,或者是人类意识在其中出现之前它所呈现的样子”(op. cit., p. 441)。
- 37 Commager, op. cit., p. 7.
- 38 John G. Burke, “The Wild Man’s Pedigree,” in Dudley and Novak, op. cit., pp. 266—267.
- 39 Adams, op. cit., p. 310.
- 246 40 引自 Stafford, op. cit., p. 22。
- 41 Review of Hasselquist’s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Levant*, in *Monthl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5, 1766, pp. 72—73.
- 42 Anders Sparrman, *A Voyag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London, G. and J. Robinson, 1785, p. xiii.
- 43 有关19世纪的详细研究,参见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4 Gay, op. cit., p. 4. 盖伊显然在启蒙运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讨论,而没有认真探究其所谓的“改善”。
- 45 Lindroth, op. cit., p. 11.
- 46 Foucault, op. cit., p. 141.
- 47 Lindroth, op. cit., p. 10.
- 48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78, p. 17.

第三章 叙述反征服

- 1 有关南非史的资料,我感谢以下来源: Chinweizu, *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Us: White Predators, Black Slavers and the African Elite*, New York, Vintage, 1975; Philip Curtin, Steven Feierman, Leonard Thompson, and Jan Vansina, *African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especially chapters 9 and 10;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2 (orig., 1965); Vernon S. Forbes, *Pioneer Travellers of South Africa: A Geographical Commentary upon Routes, Records, Observations and Opinions of Travellers at the Cape, 1750—1800*, Cape Town, A. A. Boekema, 1965; Mary Gunn and L. E. Codd,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Southern Africa*, Cape Town, A. A. Boekema, 1981; George M. Theal,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of Africa South of the Zambesi*, vols. II and III (to 1795), London, Allen & Unwin, 1897, rpt. as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before 1795*, Cape Town, Struik, 1964.
- 2 在此我拟选择遵循柯廷等人使用的命名法(参看注释1),根据土著起源而非欧洲殖民主义的命名法谈论非洲人民。因此,除了引文以外,欧洲文献中称作“霍屯督人”的人在这里叫科伊人;“布须曼人”在这里叫桑人;“卡菲尔人”在这里叫恩古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布尔人”这个术语已经被当代术语“南非白人”取代。
 - 3 Curtin et al., op. cit., p. 295.
 - 4 Theal, op. cit., vol. III, rpt. 1964, p. 68.
 - 5 莫诺莫塔帕是一个真实的地方。13和14世纪,一个巨大的金矿国家,现代史学家称之为大津巴布韦,在赞比西河谷统一;16和17世纪时,它与寻找黄金的葡萄牙人陷入长期冲突,逐渐走向衰落。幸存者在赞比西河一条支流的河谷重新组合,在那里他们还是开采黄金。他们的统治者被称为姆维尼·穆塔帕,因此就有了欧洲化的“莫诺莫塔帕”(Curtin et al., op. cit., chapter 9)。
 - 6 Peter Kolb (or Kolbe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vol. 1, trans. Mr. Medley, London, W. Innys, 1731, rpt.,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1968.
 - 7 *ibid.*, p. 56.
 - 8 *ibid.*, p. 172.
 - 9 *ibid.*, p. 37.
 - 10 J. M. Coetzee, *White Writing: 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2. 库切在此似乎也碰到他自己概念框架的局限性。他似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有关“懒惰”的另类观点,参考的是堕落之前的亚当,一种他清楚认出其理想化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式。
 - 11 正如常评论的那样,对非欧洲社会的这种解读,似乎反映欧洲人对他们自己社会迅速制度化 and 合理化的担心。西方的自我理解,再一次只有借助虚构一个

他者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个他者的他者乃是欧洲自我。

- 12 Kolb, op. cit., p. 23.
- 13 James Turner,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Rural Scenery and Society in English Poetry 1630—16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
- 14 Kolb, op. cit., pp. 362—363.
- 15 Michel Foucault, *I, Pierre Rivière, having Slaughtered my Mother, my Sister and my Brother*, New York, Pantheon, 1975.
- 16 Curtin et al., op. cit., p. 298.
- 17 Anders Sparman, *A Voyag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London, G. and J. Robinson, 1785, vol. I, rpt.,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1971.
- 18 Forbes, op. cit., p. 46.
- 19 Forbes, op. cit., p. 81.
- 20 Lt. Guillaume Paterson, *Relation de quatre voyages dans le pays des Hottentots et dans la Caffrerie*, trans. M. T. M****, Paris, Letelier, 1790. 很遗憾,我没有获得佩特森叙事的英语原文;根据法语文本进行的翻译由我提供。1980年,(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佩特森原始手稿的豪华版在约翰内斯堡出版,由 Vernon S. Forbes and John Rourke (*Paterson's Cape Travels 1777—79*, Johannesburg, Brenthurst Press, 1980)精心制作,这卷书包括一丝不苟的注解、地图、介绍和补充材料以及许多原始彩色版画。在未经编辑的情况下,手稿与发表的《关于在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土地上四次旅行的叙事》差别很大,因此我选择依据1790年的法语文本。
- 21 Paterson, op. cit., p. 5.
- 22 Sparman, op. cit., p. vi.
- 23 *ibid.*, pp. xv — xvi.
- 24 Paterson, op. cit., p. 23.
- 25 Sparman, op. cit., p. 128.
- 26 Paterson, op. cit., p. 196.
- 27 贯穿18和19世纪,并进入20世纪,“霍屯督人”的生殖器都是整个欧洲无休止且通常是色情的讨论和争论的一个话题。核心问题——和幻想——是科伊人女性是否拥有一个后来被称作“阴唇帘”的“额外的”性器官。这个问题,争论双方都有很多“证人”,而且这场争论无疑代表欧洲丧失人性的殖民想象历史上最肮脏的篇章之一。桑德尔·L.吉尔曼研究过这种性神话的某些方

面,参见 Sander L. Gilman, “Black Bodies, White Bodies: Toward an Iconography of Female Sexu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rt,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in Henry Louis Gates,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吉尔曼的文章曾遭到恰当批评,因为它再现的恰恰是他试图谴责的色情维度。比如,参见休斯敦·贝克(Houston Baker)在同一本文集中对吉尔曼等人的回应。

28 Sparman, op. cit., p. 265.

29 ibid., p. 202.

30 ibid., p. 61.

31 ibid., p. 63.

32 ibid., p. 65.

33 感谢伊丽莎白·库克让我注意到这个例子。

34 Paterson, op. cit., p. 5.

35 Curtin et al., op. cit., pp. 301ff.

36 John Barrow,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 in the Years 1797 and 1798*, London, Cadell and Davies, 1801, rpt.,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1968, pp. 190—191.《1797和1798年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的续集作为第二卷问世于1804年。除非特殊说明,所有的引文均出自第一卷。

37 即便是在叙述能够制造戏剧性高潮的伟大戏剧和个人危险的瞬间,巴罗仍保持谦逊。在讲述逃离草原大火时,他用牛车、牛、狗、地形记录危机,而人类的经验却很少提及:

我们稍微偏离通往继续冒烟地区的道路:不过,尽管是在其顺风处,而且风越刮越大,在我们看见牛车之前,它就在火的中间;烟又浓又呛人,因此不可能看见队伍的长度。牛脚部着火,已经难以驾驭,乱作一团飞奔,引起普遍的骚动。烟令人窒息;火焰在牛车两边燃烧,牛车,特别是对于那些装有大量火药的牛车来说,情形非常危险……乡间好几英里的地面一片火海,空中因烟雾一片昏暗。(Barrow, op. cit., p. 195)

人类的在场被如此压缩,以至于句法使得牛车被火焰,而非正处于被炸掉危险中的人所惊动。

38 Barrow, op. cit., p. 165.

- 39 Barrow, *Travels*, vol. II, p. 3.
- 40 Barrow, op. cit., pp. 125—126.
- 41 ibid., pp. 132—137.
- 42 ibid., p. 310.
- 43 ibid., pp. 76—77.
- 44 Coetzee, op. cit., p. 32.
- 45 Barrow, op. cit., p. 78.
- 46 cf. Coetzee, op. cit., p. 27. 巴罗的第二卷写于开普归还给荷兰控制之后,他继续用相当长的篇幅攻击南非白人。
- 47 分别见 Barrow, op. cit., p. 17 and p. 1。
- 48 ibid., pp. 283—284. 巴罗的书也包括对科伊人(霍屯督人)和恩古尼人(卡菲尔人)冗长的人种志描写。
- 49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5.
- 50 感谢哈丽雅特·里特沃的这种评论。
- 51 Barrow, op. cit., pp. 241—242.
- 52 ibid., p. 272.
- 53 ibid., p. 291.
- 54 Curtin et al., op. cit., p. 311.

第四章 反征服之二:互惠的奥秘

- 1 引自 Christopher Lloyd, *The Search for the Niger*, London, Collins, 1973, pp. 13—14。
- 2 E. W. Bovill, ed., *Missions to the Nig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II, vol. 123, p. 2.
- 3 ibid., p. 4.
- 4 法国人勒内·卡耶(René Caillié)被认为是第一个旅行前往廷巴图克并活着回来的现代欧洲人。他于1828年返回认领法国地理学会为这一壮举提供的两千法郎奖赏时,报告称那虚构的城市“初看起来不过是大量丑陋不堪的房子,用泥土建成”(引自 Lloyd, op. cit., p. 73)。
- 5 Mungo Park,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Edinburgh, Adam & Charles Black, 1860, p. 3. 以下均引自该版本。

- 6 Michel Adanson, *A Voyage to Senegal*, in John Pinkerton, ed.,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Longman et al., vol. 16, 1814, pp. 598—599. 译文(1759)出自“一个英国绅士,他在那个国家居住过一段时间”。克里斯托弗·劳埃德在 *The Search for the Niger* 中引证,在18世纪初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告诉他儿子说,“非洲人是世界上最愚昧粗鲁的人,不比那个国家大量出产的狮子、老虎、豹子和其他野生动物好到哪里”(Lloyd, op. cit., p. 17)。
- 7 Paul Erdman Isert, *Voyages en guinée et dans les îles caraïbes en Amérique*, Paris, Marandan, 1793, p. 305(我的翻译)。法文原文是:

Mais, disent les défenseurs de l'esclavage, les nègres sont naturellement paresseux, obstinés, adonnés au vol, à l'ivrognerie, à tous les vices. ...

Je n'ai autre chose à répondre à ces Messieurs, sinon que s'ils veulent sincèrement être guéris de leurs préjugés contre les Nègres, ils n'ont qu'à se donner la peine de faire un tour dans l'intérieure de l'Afrique, ils y observeront par-tout, l'innocence, la simplicité des mœurs, la bonne-foi. Là, seulement sont en vogue ces pratiques d'enfer, où leurs rudes agens, les Européens, avec leurs productions, ont introduit les appétits qui les y excitent.

作为几内亚海岸的访问者,伊泽特被一位女性邀请去内地时非常兴奋,这位女性(他将她描写成公主)是为一个亲戚寻求医疗指导。如同其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伊泽特的废奴主义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平均主义者。为了取代奴隶制,他建议将种植园迁往非洲,非洲人将在那里继续通过雇佣或卖身契为它们劳动(*ibid.*, p. 307)。

- 8 引自 Wylie Sypher, *Guinea's Captive Kings: British Anti-Slavery Literature of the XVIIIth Century*,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42, p. 152。
- 9 我对帕克探险及其非洲语境的总结依赖于以下来源: Philip Curtin, *The Image of Africa: British Ideas and Action, 1780—1850*, 2 vols.,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Lloyd, op. cit.; Kenneth Lupton, *Mungo Park, the African Trave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ter Brent, *Black Nile*, London, G. Cremonesi, 1977; Richard Owen, *Saga of the Niger*, London, R. Hale, 1961; Ronald Syme, *I, Mungo Park*, London, Burke, 1951。
- 10 Park, op. cit., p. 177. 尼日尔河向东流的言论最终被证明是欺骗性的,因为它最

后突然转向南,并折返向西,在大陆西海岸泻入贝宁湾。这个出乎意料的路线在19世纪20年代被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er)记载之前,没有被欧洲探险者记载过。

- 11 Preface to Park, op. cit., p. ix.
- 12 Bovill, op. cit., p. 48.
- 13 Park, op. cit., p. 2.
- 14 关于库克之死,参见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5; 关于加勒比人,参见 Peter 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5 关于安第斯起义最近的英文资料,参见 Steven J. Stern (ed.),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Andean Peasant World, 18th to 20th Centuries*, Madison, Wis.,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关于苏里南逃亡黑人奴隶,参见 Richard Price, *First-Time: 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an Afro-American Peopl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关于圣多明各革命,参见 C. L. R. James 的经典著作,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to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63。
- 16 Bovill, op. cit., p. 48.
- 17 Preface to Park, op. cit., pp. viii—ix.
- 18 Hulme, op. cit., p. 229.
- 19 Park, op. cit., p. 107.
- 20 *ibid.*, p. 160.
- 21 *ibid.*, p. 225.
- 22 M. L. Pratt,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Calif.,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3 Park, op. cit., pp. 104—105. 这段描写让人回想起利奥·阿弗里卡纳斯,他将廷巴克图描述为居住着“性情温和和开朗的人民,他们夜间大部分时间都在街上唱歌跳舞”。
- 24 John Barrow,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 in the Years 1797 and 1798*, London, Cadell and Davies, 1801, rpt.,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1968, p. 192.
- 25 Park, op. cit., p. 180.
- 26 *ibid.*, p. 234.

- 27 *ibid.*, p. 109.
- 28 *ibid.*, p. 49.
- 29 *ibid.*, p. 119.
- 30 这个术语,我要感谢同事马丁·埃文斯。他用这个术语谈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对话。参见其 *America: The View from Europe*, Stanford Alumni Association, 1976。
- 31 Park, *op. cit.*, p. 91.
- 32 *ibid.*, p. 291.
- 33 *ibid.*, p. 240.
- 34 *ibid.*, p. 182.
- 35 *ibid.*, p. 47.
- 36 例如,参见 Preface, *ibid.*, pp. viii—ix。
- 37 Philip Curtin, *The Image of Africa*, Madison, Wis.,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vol. II, p. 207. 克里斯托弗·劳埃德以同样的方式认为,帕克不是“那种能够为其历险覆盖一种浪漫色彩的人,因为他在气质上不能用详细的描述填充他的故事”(*op. cit.*, p. 47)。
- 38 Hulme, *op. cit.*, p. 147.
- 39 Karl Marx, *Capital* (1867),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Vintage, 1976, vol. I, p. 280. 关于这个段落的批评性讨论,参见 Donald L. Donham, *History, Power,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8ff。
- 40 除了芒戈·帕克的《非洲内陆旅行记》以外,有关尼日尔河的探险文学还包括以下这些: E. Denham, H. Clapperton, and W. Oudney, *Narrative of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1828); René Caillié, *Travels through Central Africa to Timbuctoo* (1830); H. Clapperton, *Journal of a Second Expedition into the Interior of Africa* (1829); Richard Lander, *Records of Captain Clapperton's Last Expedition in Africa* (1830); R. and J. Lander, *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to Explore the Course and Termination of the Niger* (1830); Macgregor Laird and R. A. Oldfield, *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into the Interior of Africa by the River Niger* (1837); H. D. Trotter, W. Allen, and T. R. H. Thompson,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the River Niger in 1841* (1848); Samuel Crowther, *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up the Niger and Tshadda* (1855); W. B. Baikie, *Narrative of an Exploring Voyage up the Rivers Kwora and Binue in 1854* (1856); Heinrich Barth,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1857—1858)。理查德·兰德1830年的叙述,是我所知道的流浪汉旅行书写的最好例证之一。塞缪尔·克劳瑟也许是欧洲探险任务的第一个非洲带队的。

第五章 性爱与废奴

- 1 *Monthl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1, 1759, p. 453.
- 2 当然,在欧洲内部有一大批关于欧洲的感伤旅行书写,它们循着我在此讨论的许多相同的线索起作用。
- 3 *Monthl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4, 1766, pp. 72—73.
- 4 *ibid.*, p. 74.
- 5 *Monthl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1, 1796, p. 1.
- 6 John Hawkesworth, ed., *An Account of Voyages undertaken by order of his Present Majesty for Making Discoveri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4 vols., London, W. Straham, 1773—1785, vol. I, p. v. 霍克斯沃思说,第一人称格式“将会用把历险者与读者带到一起的方式……更强烈地激发兴趣,并因此提供更多娱乐”(ibid.)。
- 7 *Monthl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4, 1771, p. 421.
- 8 François Le Vaillant, *Voyages de F. Le Vaillant dans l'intérieure de l'Afrique 1781—85*, 编辑并节选的版本见 Jacques Boulanger, 2 vols., Paris, Librairie Plon, 1931, vol. I, p. 52. 法文原文是:

Nous quittons aussitôt le bois pour aller nous établir plus haut, en rase campagne. Je voyais avec le plus amer chagrin qu'il n'était pas possible de sortir de l'endroit où nous nous trouvions circonscrits. Ces petits ruisseaux, qui auparavant nous avaient paru si agréables et si riants, s'étaient changés en torrents furieux qui charriaient les sables, les arbres, les éclats de rochers; je sentais qu'à moins de s'exposer aux plus grands dangers, il était impossible de les traverser. D'un autre côté, mes boeufs harassés, transis, avaient déserté de mon camp; je ne savais pas où et comment envoyer après eux pour les rattrapper. Ma situation n'était assurément point amusante; je passais de tristes moments. Déjà mes pauvres Hottentots, fatigués et malades, commençaient à murmurer.

- 9 瓦龙的在场时常引起含蓄的同性恋恐惧症暗指，针对的是勒瓦扬可能的同性恋倾向。后者的自恋和时髦（比如，在前往非洲途中穿着奢华的倾向）以类似的批评方式被暗指。“他在马车里珍藏一化妆盒的粉、香水、润发油”，弗农·福布斯1965年写道。无论勒瓦扬的性偏好如何，此类反应暗示科学探险者的形象与男性的异性恋范式捆绑在一起。
- 10 Le Vaillant, *op. cit.*, pp. 113—114.
- 11 勒瓦扬还不加修饰地讲述与一位白人女性的一次闲谈，她已经成为一座非洲村庄的首领，是从她嫁给的非洲人那里继承来的这个职位——其他作家只会把这当作谣传加以报道，甚至根本不报道。
- 12 可敬的弗农·福布斯虽然承认勒瓦扬的书的“浪漫情绪和绚丽用语……显然是向同时代人推荐它们”（*Pioneer Travellers of South Africa, 1750—1800*, Cape Town, A. A. Boekema, 1965, p. 117），然而觉得他“对单纯的霍屯督人的阿谀奉承令人乏味”（*ibid.*, p. 5），并得出结论称，“空虚是致命的弱点，它导致他多不胜数的奇特夸张和虚构捏造……很可惜，他没有认识到，要是他满足于记录下他所见所做的简单事实，他的名声将会如何经久不衰”（*ibid.*, p. 127）。自从1963年发现一系列由勒瓦扬创作，或在他指导下描绘其南美旅行的水彩画后，其名望多少有些恢复。除了审美贡献外，这些绘画表明勒瓦扬的确访问过某些地方，而他曾被指责虚构了对那些地方的描写（*ibid.*, p. 127）。
- 13 正如怀利·塞弗在 *Guinea's Captive Kings: British Anti-Slavery Literature of the XVIIIth Century* (Chapel Hill, N.C.,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42, chapter 1) 中指出的，那个时期的社会评论家经常记录克里奥尔人在欧洲首都精英社会的在场，通常是用一种十分轻蔑的方式；在18、19世纪的小说中，西印度女继承人是常见的角色。在这一方面，也许思想史和政治史就不那么诚实。在勒瓦扬一生中，欧洲政治领域受到美洲独立和反独立运动代表人物的鼓舞，他们游说欧洲列强以获取影响和支持。克里奥尔人的儿子如同社交圈的女继承人一样，在场于思想和教育环境中。在反奴隶制辩论的两边，大部分思想和政治领袖来自欧裔美洲人：一方面是贵格会教徒，另一方面是印第安奴隶所有者。
- 14 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旅行书受到斯特德曼的书（理应）受到的那种品质的学术和编辑关注。R. A. J. van Lier最近出版和评论了他的书（Barre, Massachusetts, Imprint Society, 1971），我在此使用的就是这一版本；并且Richard Price and Sally Price最近出版了斯特德曼原始手稿（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加上他们珍贵的历史评论, 真是十分幸运。

- 15 John Gabriel Stedman, *Narrative of a Five Year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ted Negroes of Surinam* (transcribed from the original 1790 manuscript), ed. Richard Price and Sally Pri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xxi. 为避免混淆, 我下文将这一出处称作 Price and Price。
- 16 John Gabriel Stedman, *Narrative of a Five Year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ted Negroes of Surinam*, 2 vols., ed. R. J. van Lier, Barre, Massachusetts Imprint Society, 1971, p. xvii. 为避免混淆, 我下文将这一出处称作 Stedman。
- 17 我在此依赖于 Price and Price 和 Stedman 的“引言”。
- 18 Stedman, op. cit., p. 2.
- 19 关于斯特德曼文本的许多版本、译本、改写本的概要, 参见 Price and Price, op. cit., pp. lxxiii—lxxxiii。
- 20 Stedman, p. 59. Price and Price 将这一段落与斯特德曼在其原稿中写的内容进行对比: “上帝啊; 我飞到那个地方寻找可怜的乔安娜, 并发现她在花园里和同伴沐浴”(Price and Price, op. cit., p. lx)。随后是一首窥淫癖者的诗歌, 让人想起在非洲, 勒瓦扬赞颂的是不知情的心爱人之美。
- 21 Stedman, op. cit., p. 59.
- 22 ibid., p. 62.
- 23 ibid., p. 440.
- 24 Isert, op. cit., p. 241. “Le conseil voit avec plaisir de pareilles alliances, parce qu'un Européen qui se porte à cette démarche ne sera pas probablement tourmenté bien vite de la maladie de son pays.” 说斯特德曼与乔安娜的关系属于纳妾, 并不是说斯特德曼对乔安娜的依恋, 不及他对其他任何女性的真实和深切。正如书中讲述的那样, 当他回到欧洲再婚时, 他根据她的名字给女儿起名字, 而且他们的儿子的确与他重逢了。实际上, 根据 Price and Price, 斯特德曼的编辑在书中降低了他对她表达的承诺。
- 25 参见 Price and Price, op. cit., p. xxxiii。
- 26 Stedman, op. cit., p. 426.
- 27 Hulme, op. cit., p. 249.
- 28 ibid., p. 141.
- 29 根据休姆 (op. cit., pp. 225ff), 这个故事最初于 1734 年发表在《伦敦杂志》上, 并在 1754 至 1802 年间以许多版本扩散。玛丽·沃尔斯通柯莱夫特使用它作

253

- 为叙事模式。歌德打算写一部戏剧。
- 30 这种观点的讨论,参见 Sypher, op. cit., especially chapter 3.
- 31 Stedman, op. cit., p. 52.
- 32 Hulme, op. cit., p. 253.
- 33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4 Anna Maria Falconbridge, *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Sierra Leone*, London, L. I. Higham, 1802, rpt., London, Frank Cass, 1967, p. 24.
- 35 ibid., p. 33.
- 36 ibid., p. 38.
- 37 ibid., p. 150.
- 38 ibid., p. 66.
- 39 ibid., p. 169.
- 40 ibid., p. 186. 虽然法尔康布里奇的书无疑受到英国赞成奴隶制运动的支持或激发,可是作者也在发表其书信时暴露了个人动机,一种极为非情感的私人复仇(政治再一次是个人的):公司坚持拒不付给她剩下的欠她丈夫的钱。她的深仇,就像乔安娜留在美洲的决定一样,从内部指向浪漫爱情和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局限。姑且不论其赞成奴隶制的立场,法尔康布里奇的批评授权,以及她所讲的反道德生活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将她与18世纪末的女性主义结盟。资产阶级时代的女性史学家常将法国大革命后的二十年视为一个关键节点,欧洲女性主义在此节点努力巩固性别制度中巨变的开口,而其他势力则试图通过诸如限制女性政治参与的法律等手段闭合这些开口。根据记述,18世纪的激进主义在19世纪早期几十年大多被打败,被家庭生活和共和主义母亲的意识形态所拉拢,或者被包含在像傅立叶主义这种明显对抗性的运动中。参见 Joan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I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41 *The Tour of Africa*, 节选并整理的版本见 Catherine Hutton, 3 vols., London, Baldwin, Cardock and Joy, 1819, vol. I, p. 1。
- 42 Mrs. R. Lee (formerly Mrs. T. Edward Bowdich), *Stories of Strange Lands and Fragments from the Notes of a Traveller*, London, Edward Moxon, 1835. 在开篇的话中,第一篇故事《阿杜米萨》给予李中介人的权威,根植于接触地带的那出典型家庭戏剧,即她与其非洲男仆的对话:“那是阿杜米萨的房子。”我的仆人有一天说,当时他正陪伴我步行穿过奥瓜镇。‘阿杜米萨是谁?’我问。‘怎

么,小姐,你没听说过阿杜米萨,那个超过黑人见过的所有美女的人?’”(p. 1)。

43 *ibid.*, p. xiv.

44 例如,连同注释42引用的片段出现的,是一个人种志注解,大意是“阿杜米萨是非洲西海岸通常所谓的红皮肤女性,也就是说,她的肤色是浓重而温暖的棕色,这肯定比乌黑发亮的皮肤更能使得容貌和内心体验的情感表现得一清二楚……”(*ibid.*, p.19)。这篇十九页的故事紧跟十二页的注解,涉及从花和水果,到建筑以及大象牙的用途的所有内容。

45 *ibid.*, p. xiv.

46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旅行者的材料,包括 Leo Hamalian, *Ladies on the Loose: Women Traveller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1981); Herbert M. van Thal, ed., *Victoria's Subjects Traveled*, London, A. Barker, 1951; Dea Birkett, *Victorian Women Explorer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0; Marion Tinling, *Women Into the Unknown: A Sourcebook on Women Explorers and Travelers*, New York, Greenwood, 1989。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近期开始出版一系列由女性写的旅行书,其中包括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关于现在像传奇一样的玛丽·金斯利的讨论,参见下文第九章。

第二部分 重构美洲,1800—1850

第六章 亚历山大·冯·洪堡与美洲之重构

1 Hanno Beck, “The Geography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 Wolfgang-Hagen Hein, e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Life and Work*, 译自德语版 John Cumming, Ingelheim am Rhein, C. H. Boehringer Sohn, 1987 (German original 1985), pp. 221, 227。

2 引自 Douglas Botting, *Humboldt and the Cosmos*, New York, Harper & Row, p. 213。

3 Simón Bolívar, Letter to A. von Humboldt, Nov. 10, 1821, 我的翻译。

4 梅斯蒂索(*mestizo*)这个词指父母为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人;桑伯(*zambo*)这个词指父母为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巴多(*pardo*)这个词像英语的“colored”(有色)一样,有时被用来指所有这些人群。这些词语只是触及西班牙奴隶社会种族等级的表面。

5 秘鲁起义的领导人发表一份宣言,谴责西班牙王室“令人难以忍受的税收、

- 贡税、‘狩猎税’、‘免丁税’、关税、销售税、垄断、‘地籍簿’、什一税、征兵制、总督、高等法院、最高行政官和其他大臣，在他们的暴君统治下，他们全都与法庭书记官同流合污，一起拍卖正义……虐待王国的土著人，仿佛他们是牲畜一般，将那些他们不能偷窃的人全都处死……”引自Boleslao Lewin, *Tupac Amaru*,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e, 1973, Appendix I, p. 153. Translated by Jan Mennell。
- 6 John Lynch,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2nd edition), pp. 190—191.
- 7 *ibid.*, p. 194. 我自始至终感谢林奇明晰、详细的叙述。
- 8 Simón Bolívar, “Reply of a South American to a gentleman of this island [Jamaica],” Sept. 6, 1815. 英文译文引自Harold A. Bierck, Jr., ed., and Vicente Lecuna, comp., *Selected Writings of Simón Bolívar*, 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51, vol. I, p. 110。
- 9 与本书讨论的许多其他旅行作家不同，洪堡一直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大多是推崇他的，且主要以德国为基地。德语的基本资料包括Hanno Beck两卷本的*Alexander von Humboldt*,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59; Heinrich Pfeiffer, e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Werk und Weltgeltung*, Munich, R. Piper, 1969; Kurt Schleuch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 Der Mensch, Der Forscher, Der Schriftsteller*, Berlin, Stapp, 1988。最近的一个很好的资料是，插图精美的文集*Alexander von Humboldt: Leben und Werken* (Ingleheim am Rhein, C. H. Boehringer Sohn, 1985)，由Wolfgang-Hagen Hein编辑，John Cumming翻译的英语版本问世于1987年。文章和文献目录都很精彩。在法语中，一个基本资料是Charles Minguet百科全书般、批评性的*Alexandre de Humboldt, Historien et géographe de l'Amérique espagnol, 1799—1804*, Paris, Maspero, 1969。Minguet还编辑了阿亚库乔图书馆版的洪堡的*Cartas Americanas* (Caracas, 1980)，由Marta Traba翻译。如往常一样，阿亚库乔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年表。在更流行的著作中，Douglas Botting's *Humboldt and the Cosmo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生动且有用；Pierre Gascar's *Humboldt l'explorateur* (Paris, Gallimard, 1985)除了对洪堡的同性恋态度坦率外，没有多少新贡献。关于洪堡的西班牙语美洲资料中，我特别利用了Oscar Rodríguez Ortiz, ed., *Imágenes de Humboldt*, Caracas, Monte Avila, 1983。斯坦福大学的库尔特·米勒—福尔默 (Kurt Müller-Vollmer) 教授，最近发现了洪堡的许多德语手稿和书信，将会影响

到未来讨论亚历山大对其哥哥威廉著作的影响。

- 10 Pierre Bertaux, Preface in Hein, op. cit., p. 7. 正如这段引文表明的,洪堡的同性恋继续被其评论者以一种绅士的方式加以处理。洪堡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由同事、门徒、朋友、同伴构成的男性世界,保持着一系列持久亲密关系。一个长期的同伴是年轻的厄瓜多尔贵族卡洛斯·蒙图法。他于1802年在基多遇见洪堡,并与邦普朗一起陪伴他,走完剩余的美洲旅行,并返回欧洲。在法国,蒙图法似乎在洪堡的生活中被路易·盖伊·吕萨克取代。他是有名的物理学家和气球驾驶员,洪堡与他一起旅行并生活过数年。也许最著名的,是洪堡对天文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充满热情的依恋,他们每天会面长达十五年。旅行和科学的历史意味深长地由以下事实形成:这两种活动都是同性亲密和男性伙伴的合法语境,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异性恋和婚姻结构之外。
- 11 事实上,洪堡旅行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西班牙语美洲博物学家,都会访问他们——甚至包括女性,比如曼努埃拉·圣玛丽亚·德·曼里克(Manuela Santamaria de Manrique),他在波哥大参观过她的收藏。洪堡与女性生物学家的遭遇和关系在官方欧洲文献中很少记录。比如,我在此的出处是19世纪哥伦比亚女性主义者 Soledad Acosta de Samper 的 *La mujer en la sociedad moderna* (Paris, Garnier, 1895, p. 298)。
- 12 南美洲之后,艾梅·邦普朗追寻林奈的职业道路,成为一座皇家园林的管理者:正好是克里奥尔皇后约瑟芬的花园,在巴黎附近她的休息寓所。在她离婚后,他成为她心爱的知己,并在她去世时陪伴着她。他似乎心碎了,回到南美洲定居巴拉圭,最终被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弗朗西亚博士囚禁数年。洪堡多年来一直设法让人们将邦普朗的年金转寄给他,代表邦普朗向西蒙·玻利瓦尔提出请求,帮助他获释。邦普朗于1858年死于巴拉圭。
- 13 Ortiz, op. cit., p. 10.
- 14 邦普朗的知识在植物学,而且他作为一名作者的贡献也在植物学。然而,案头工作对他没有吸引力。这些扉页承认的,主要是他的数据资料而非他的著作权。
- 15 下文中我将引用洪堡著作的标准英语译文。至于 *Ansichten der Natur*, 我将引用 E. C. Otte and Henry G. Bohn 的译文, London, Henry G. Bohn, 1850。至于 *Vues des Cordillères*, 我将引用1814年的译文 *Views of the Cordilleras and Monumen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America*, 译者是 Helen Maria Williams (著名的英国激进分子), 2 vols., London, Longman et al.。至于 *Relation historique*,

我将引用Helen Maria Williams的译文, *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London, Longman et al., 1822。

- 16 Antonello Gerbi, *La disputa del nuovo mondo: Storia di una polemica* (Milano, R. Ricciardi, 1955). 修改并扩展的版本由Jeremy Moyle译成*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 The History of a Polemic*, Pittsburgh, Pa.,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3。另参见Gerbi's *La natura delle indie nove* (Milano, R. Ricciardi, 1975), 也由Jeremy Moyle译成*Nature in the New World*, Pittsburgh, Pa.,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5。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本著作的英语译文中, 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名字在索引中被替换成他哥哥威廉的名字。这种经常发生的混淆, 证明亚历山大的名声在20世纪已经因他哥哥的名声而变得暗淡无光。杰尔比在其有关16、17世纪美洲编年史的叙述中, 广泛引用洪堡对*Examen critique de l'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u nouveau continent*中这种材料百科全书式的评论。在有关洪堡贡献的官方叙述中, 这部不同寻常的作品几乎完全没有提及。
- 17 Gerbi, *Dispute*, op. cit., pp. 411, 416.
- 18 Robert van Dusen, "The Literary Ambitions and Achievement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European University Papers*, Bern, Herbert Lang, 1971, p. 45.
- 19 Humboldt, *Views of Nature*, op. cit., p. 3.
- 20 *ibid.*, pp. 7—8.
- 21 引自Hein, op. cit., p. 56。
- 22 Humboldt, *Views of Nature*, op. cit., p. ix.
- 23 *ibid.*, p. 154.
- 24 *ibid.*, p. 16.
- 25 丛林是《自然的风景》中“奥里诺科瀑布”和“原始森林中的夜生活”的主题; 积雪盖顶的山峰是在著名的钦博腊索峰上所见的风景和《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中几篇文章的主题; 委内瑞拉的大草原是经典的《在大草原和沙漠之上》的主题。
- 26 Humboldt, *Views of Nature*, op. cit., p. ix.
- 27 Christopher Columbus, Letter of March 14, 1493, in *Four Voyages to the New World: Letters and Selecte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R. H. Major, New York, Corinth Books, 1961, pp. 4—5.
- 28 “风景”通过一个假想的“水手”的双眼展开, 他“在接近圭亚那的花岗石海滨时……看见眼前一条大河宽阔的河口, 像一片无垠的大海一样奔涌而来”。

Humboldt, *Views of Nature*, op. cit., p. 206.

29 虽然洪堡一生敬仰芒戈·帕克及其《非洲内陆旅行记》，但是他视其生动的个人书写为受人喜欢的“先前时代的遗迹”，与16世纪西班牙编年史一样 (Preface, *Personal Narrative*)。

30 Williams, Preface to Humboldt's *Personal Narrative*, op. cit., vol. I, p. viii.

31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p. cit., vol. III, pp. 73—74.

32 *ibid.*, vol. I, p. li.

33 引自Hein, op. cit., p. 74。

34 Botting, op. cit., p. 202.

35 Humboldt, *Views and Monuments*, vol. I, pp. 39—40.

36 *ibid.*, vol. II, p. 45.

37 *ibid.*, vol. I, p. 9.

38 *ibid.*, p. 44.

39 参见Michael Adas, *Prophets of Rebellion: Millenarian Protest Movements against the European Colonial Order*, Chapel Hill, N.C.,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257

40 这些人物和历史今天继续在安第斯山区具有强烈意义：一个当代秘鲁游击队运动现在就用图帕克·阿马鲁的名字，20世纪60年代的乌拉圭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也是如此；玻利维亚的相应人物图帕克·卡塔里和巴托利纳·西萨都被玻利维亚农民运动作为象征。

41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p. cit., vol. III, p. 178. 行政酋长 (*corregidor*) 是一个大致相当于政务专员的职位，其任职者通常遭到他们所控制的那些人的厌恶。

42 这个笨拙的术语是仿照“addressee”杜撰的。正如后者意指演讲者致辞的对象一样，“travelee”的意思是旅行者旅行去往的人，旅行的受体。几年前，文学理论家开始谈论“受述者”(narratees)，在叙述接受端对应于叙述者的人物。显然，对旅行的研究中，占绝对优势的是从旅行者的角度；但是，从接受端参与者的角度研究旅行，是绝对可能且极为有趣的。

43 约翰内斯·费边写过一本关于19世纪东非旅行记述中的异质话语的专著，特别考察斯瓦希里语单词在欧洲文本中出现的地点：*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 The Appropriation of Swahili in the Former Belgian Congo, 188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frican Studies Series no. 48, 1986。在西

方,正式的语言学阐释,通常采取的是当权一方的视角。

- 44 洪堡以其与墨西哥知识界的接触为基础,继续对有关美洲的欧洲书写历史进行研究,并产生五卷本的*Examen critique de l'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u nouveau continent*(《新大陆地理批判性考察》)。这是被洪堡的官方遗产忽视的又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洪堡用百科全书的方式评论大量16、17世纪关于美洲的编年史。安东内洛·杰尔比在*Nature in the New World*, op. cit., 1985中大量依赖于洪堡对这类材料的描述。
- 45 引自 John Brenkman in *Culture and Domination*, Ithaca, I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4。
- 46 Teresa de la Parra, *Memorias de Mama Blanca*, in *Obras completas*,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82, p. 329。
- 4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48 米塔(mita)是西班牙殖民时代最遭人痛恨的大规模强制劳动形式:村庄被要求在矿井和其他地方提供劳动配额。米塔工人的死亡率十分高。
- 49 Gerbi, *Dispute*, op. cit., p. 408。
- 50 Simón Bolívar, Letter to General Paez, August 8, 1826. 英文译文见 Bierck and Lecuna, op. cit., vol. II, p. 628。
- 51 Pascual Venegas Filardo, *Viajeros a Venezuela en los siglos XIX y XX*, Caracas, Monte Avila, 1973, p. 1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到洪堡的写作,称之为其“魔幻现实主义”南美观的一个来源。
- 52 在我看来,粗麻布画作为商业或出口艺术发源于秘鲁的事实,将其置于宗主国谓之的“本真性”王国之外。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土著的安第斯式表达或自我表达加以分析。在提出这种假定时,我认识到自己正在避开艺术史和艺术人类学中重要和棘手的问题。
- 53 Michael Taussig,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Il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5。

258

第七章 重构美洲之二:资本主义先锋与女性社会探索者

- 1 John Rowe, “Movimiento nacional Inca,” *Revista Universitaria de Cuzco*, no. 107, 1955, p. 12. 引自 Teresa Gisbert, *Iconografía y mitos indígenas en el arte*, La Paz,

- Gisbert and Co., 1980, p. 204。
- 2 关于这种绘画传统的详细评论,参见 Gisbert, *op. cit.*, p. 132。
 - 3 W. B. Stevenson,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Narrative of 20 Years Residence in South America*, 3 vols., London, Hurst, Robinson and Co., 1825, vol. I, p. vii。史蒂文森受指控是英国间谍,他也许就是,并且其访问中好几个月是在囚禁中度过的。
 - 4 John Mawe,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Brazil, particularly in the Gold and Diamond Districts ...*, Philadelphia, M. Carey, 1816, Introduction。马维还写过 *The Linnean System of Conchology* (1823) 和一篇关于宝石的论文。
 - 5 Stevenson, *op. cit.*, vol. I, p. viii。
 - 6 例如,参见 Jean Franco, “Un viaje poco romántico: Viajeros británicos hacia sudamérica, 1818—28,” *Escritura* no. 7, 1979 (Caracas), pp. 129—142; Noe Jitrik, *Los viajeros*, Serie “Los Argentino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Jorge Alvarez, 1969; Michael J. Taussig, “On the Indian’s Back: The Moral Topography of the Andes and its Conquest,” in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Chicago, Il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Kristine L. Jones,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Travel Accounts of Argentina,” *Ethnohistory*, special issue on travel literature, ethnography, and ethnohistory, vol. 33 no. 2, 1986, pp. 195—211。
 - 7 Jitrik, *op. cit.*, p. 13。我的翻译。
 - 8 Letter to Santander, 1826, 引自 John Lynch,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0—1826*, New York, W. W. Norton (2nd edition), p. 343。
 - 9 Captain Joseph Andrews, *Journey from Buenos Aires ... to Santiago de Chili and Coquimbo in the years 1825—26*, London, John Murray, 1827, p. i。
 - 10 Stevenson, *op. cit.*, vol. I, p. i。
 - 11 John Miers, *Travels in Chile and La Plata*, London, Baldwin, Cardock and Joy, 1826, vol. I, p. 91。迈尔斯还写过一篇植物学论文。
 - 12 Mawe, *Travels*, *op. cit.*, p. 121。
 - 13 这种消极审美并非源自资本主义先锋。例如,可以在 18 世纪西班牙评论者,尤其是殖民政策批评者的著作中发现它。这些批评家中著名的包括拉·孔达米纳昔日同伴安东尼奥·德·乌略亚和豪尔赫·胡安,他们除公共作品外,还写过一部内部批评 (*Noticias secretas de America*)。这部作品仅在 1807 年有英语本印行,当时引起了轰动。

- 14 Robert Proctor, *Narrative of a Journey across the Cordillera of the Andes and of a Residence in Lima*,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1825, p. 79.
- 15 Lieutenant Charles Brand, *Journal of a Voyage to Peru: A Passage Across the Cordillera of the Andes in the Winter of 1827 ...*,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8, p. 57.
- 16 Captain Charles Stuart Cochrane, *Journal of a Residence and Travels in Colombia during the years 1823 and 24*, 2 vols., London, Henry Colburn, vol. I, p. vii.
- 17 Gaspar Mollien, *Travels in the Republic of Colombia in the years 1822—23*, London, C. Knight, 1824, p. 57.
- 18 Stevenson, *op. cit.*, vol. I, p. i.
- 19 Joseph Andrews, 引自 Franco, *op. cit.*, p. 133。
- 20 Mawe, *Travels*, *op. cit.*, p. 32.
- 21 Mollien, *op. cit.*, p. 89.
- 22 Miers, *op. cit.*, p. 30 and *passim*.
- 23 Brand, *op. cit.*, p. 182.
- 24 Miers, *op. cit.*, p. 31.
- 25 在欧洲内部这也是一种熟悉的话语,被都市人用于农村和农民的边缘地区。
- 26 关于对这种做法以及这种文学其他方面的丰富漫骂,参见 Taussig, *op. cit.*。
- 27 Miers, *op. cit.*, p. 32.
- 28 Brand, *op. cit.*, p. 74.
- 29 Captain F. B. Head, *Rough Notes taken during Some Rapid Journeys across the Pampas and among the Andes*, London, John Murray, 1826, p. 224.
- 30 *ibid.*, p. 228.
- 31 弗洛拉·特里斯坦生长在法国,因此她的姓氏是按照法语的拼法,而不是重读的西班牙语。她的秘鲁家人使用该姓氏的西班牙语版本,在利马按照她的名字命名的中心也是如此。
- 32 艾梅·邦普朗也是这个家庭的朋友。这家人与玻利瓦尔的联系众所周知,以至于有人推测他是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父。显然,存在找到对她的革命活动进行基因学解释的需要……
- 33 这种技术是,弗洛拉的父母在西班牙结婚,但是他们的婚姻没有在法国进行法律登记。这家人长期卷入秘鲁的殖民事务。正如特里斯坦自己讲述的那样,皮奥·特里斯坦在弗洛拉祖母 1831 年去世时继承家族领导权,曾在西班牙军队长期任职,且担任过库斯科的总督。当她遇见他时,他正在考虑谋求秘鲁总

统一职。

- 34 Jean Hawke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Flora Tristan, *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 1833—34*, Boston, Beacon Press, 1986, p. xiii.
- 35 José Valenzuela D.,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Maria Graham, *Diario de mi residencia en Chile in 1822*,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1956, p. 18.
- 36 最有名的是 *Little Arthur's History of England* and *Little Mary's Ten Days*。
- 37 Maria Graham,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le during the year 1822*, London, Longman et al., and John Murray, 1824, p. 115.
- 38 Tristan, op. cit., pp. 98—99. 还参见对她“像巴黎人闺房一样的”修道院房间的描写, p. 194。这是特里斯坦著作的第一个英语译本。像大多数译本一样,这本书从原文的六百页被大幅删减。1979年Maspero的法语版砍掉了大约四分之一。我查阅的完整版本是1946年的西班牙文译本Emilia Romero, Lima, Editorial Antártica, 1946, 1971年由利马的Moncloa-Campodonico再版。
- 39 Marie-Claire Hoock-Demarle, “Le Langage littéraire des femmes enquêtrices,” in Stéphane Michaud, ed., *Un fabuleux destin: Flora Tristan*, Dijon,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85. 另参见 Magda Portal et al., *Flora Tristan: Una reserva de utopía*, Centro de la Mujer Peruana Flora Tristan, 1985; Dominique deSanti, *Flora Tristan, la femme révoltée*, Paris, Hachette, 1972; Jean Baelen, *La Vie de Flora Tristan: Socialism et féminisme au 19e siècle*, Paris, Seuil, 1972; Rosalba Campra, “La imagen de America en *Pérégrinations d'une paria* de Flora Tristan: experiencia autobiográfica y tradición cultural,” in *Amérique Latine/Europe*, special issue of *Palinure*, Paris, 1985—1986, pp. 64—74。
- 40 Tristan, op. cit., p. 121.
- 41 Graham, op. cit., p. 271.
- 42 Tristan, op. cit., pp. 122—123. 与其形成对比,格雷厄姆发现:“质量一流的土豆。各种白菜; 仅逊色于伦敦兰贝斯区的生菜……”等等 (op. cit., p. 132)。
- 260 43 Hoock-Demarle, op. cit., pp. 105—106.
- 44 Tristan, op. cit., p. 281.
- 45 ibid., pp. 282—283.
- 46 Graham, op. cit., p. 115.
- 47 Tristan, op. cit., p. 28.
- 48 Graham, op. cit., p. 141.

- 49 *ibid.*, p. 143.
- 50 *ibid.*, p. 139.
- 51 *ibid.*, pp. 153—154.
- 52 Graham, *op. cit.*, p. 301.
- 53 Tristan, *op. cit.*, p. 206.
- 54 *ibid.*, p. 180. 玛丽亚·格雷厄姆参观圣地亚哥一家收留战场上失去父母的孩子的孤儿院时,也谈到拉伯那人。除此之外,特里斯坦和格雷厄姆都没有给予秘鲁和智利的土著人和混血儿社会很多关注。
- 55 *ibid.*, p. 269.
- 56 *ibid.*, p. 270.
- 57 *ibid.*, pp. 274—275.
- 58 Lady Mary Montagu, *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 The Travels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ed. and comp. Christopher Pick, Introduction by Dervla Murphy, 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 Ltd., 1988, p. 111.
- 59 Graham, *op. cit.*, p. 158.
- 60 *ibid.*, p. 160.
- 61 *ibid.*, p. 352.
- 62 Tristan, *op. cit.*, p. 294.
- 63 *ibid.*, p. 295.
- 64 *Blackwood's Magazine*, Edinburgh, W. Blackwood, 1828, p. 621.

第八章 重构美洲/重构欧洲: 克里奥尔人的自我塑形

- 1 Andrés Bello, "Prospectus," *El Repertorio Americano*, vol. 1, October, 1826, London, Bossange, Barthes, and Lowell. 委内瑞拉政府1973年出版过一个复制版的 *El Repertorio Americano*, Caracas, Ediciones de la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2 vols.
- 2 Pedro Grases, Introductory Note, in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de Andrés Bello*, Madrid, Seix Barral, 1978, p. 48.
- 3 Andrés Bello, "Silva a la agricultura en la zona tórrida," lines 1—15. 我用过1952年版的 Bello's *Obras Completas*,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aracas, vol. 1, pp. 65—74.

- 4 Andrés Bello, "Alocución a la poesía," op. cit., p. 43. 讨论中的诗行来自开篇的诗节,内容是:

tiempo es que dejes ya la culta Europea
que tu nativa rustiquez desama,
y dirijas el vuelo adonde te abre
mundo de Colón su grande escena.

- 5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troduction, *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trans. Helen Maria Williams, London, Longman et al., 1822, vol. I, p. li.
- 6 Pedro Henríquez Ureña, *Seis ensayos en busca de nuestra expresión*, Buenos Aires, Babel, 1927, pp. 27ff. 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认为,在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中,“*afán europeizante*”(欧洲化的渴望)与 *criollista* 的势头共存。随后的文学文本讨论,并不试图对南美文学中的独立时代进行什么完全的解读,也不会卷入文学批评界目前的争论。其目的要更为狭窄,仅讨论接触欧洲旅行书写并据此进行推断的某些方面。
- 7 圣·马丁将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支持南美独立后建立一种君主制的政府。各种可能性包括学习拿破仑的样子,加冕玻利瓦尔为皇帝,或恢复印加王朝。流行神话将她母亲与印加贵族联系起来。
- 8 这种挑战和抱负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北美的白人精英共享。关于南美后殖民克里奥尔人美学和意识形态,我在此不得不说,与在美国的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美国“克里奥尔人”这个词不常用,不过也许应该常用。
- 9 Andrés Bello, "Silva," op. cit., lines 203ff.
- 10 *ibid.*, lines 351ff.
- 11 *ibid.*, lines 302ff. 阿塔瓦尔帕和蒙提祖马分别是在最初与西班牙人接触时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的统治者。
- 12 *ibid.*, lines 227—235. 西班牙语的内容是:

Mírola ya que invade la espesura
de la floresta opaca; oigo las voces,
siento el rumor confuso; el hierro suena,

los golpes el lejano
 eco redobla; gime el ceibo anciano,
 que a numerosa tropa
 largo tiempo fatiga;
 batido de cien hachas, se estremece,
 estalla al fin, y rinde el ancha copa.

- 13 Simón Bolívar, “Mi delirio en Chimborazo,” *Escritos fundamentales*, ed. German Carrera Damas, Caracas, Monte Avila, 1982, p. 235.
 14 *ibid.*, p. 236.
 15 *ibid.*, p. 237.
 16 Jose María Heredia, “En el teocalli de Cholula,” lines 1—5. 西班牙语的内容是:

Cuanto es bella la tierra que habitaban
 los aztecas valientes! En su seno
 en una estrecha zona concentrados,
 con asombro se ven todos los climas
 que hay desde el polo al ecuador.

- 17 *ibid.*, lines 5—16.

Sus llanos
 cubren a par de las doradas mieses
 las cañas deliciosas. El naranjo
 y la piña y el plátano sonante,
 hijos del suelo equinoccial, se mezclan
 a la frondosa vid, al pino agreste,
 y de Minerva al árbol majestuoso.
 Nieve eternal corona las cabezas
 de Iztaccihual purísimo, Orizaba
 y Popocatepec; sin que el invierno
 toque jamás con destructora mano

los campos fertilísimos.

- 18 José Martí, "Palabras sobre Heredia," *El Economista Americano*, New York, July 1888, in Martí, *Obras completas*,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La Habana, 1975, vol. 5, p. 136.
- 19 *ibid.*, pp. 136—137.
- 20 Esteban Echeverría, *La cautiv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Huemul, 1974, pp. 22—23. 西班牙语原文为:

Entonces como el ruido/que suele hacer el tronido cuando retumba lejano/
seoyó en el tranquilo llano sordo y confuso clamor: /se perdió ... y luego
violento, como baladro espanto/de turba inmensa, en el viento se dilató sonroso/
dando a los brutos pavor.

- 21 *ibid.*, pp. 23, 24. 这几行的西班牙语是:

¿Quién es? ¿Que insensata turba/con su alarido perturba las calladas soledades/
de Dios? ...

¿Dónde va? ¿De dónde viene?/¿De qué su gozo proviene? ¿Por qué grita, corre,
vuela ...?

- 22 法昆多这个人物1989年通过庇隆主义的总统卡洛斯·梅内姆生动复活;恰如法昆多·基罗加一样,后者来自拉里奥哈省。尽管他自己的背景是黎巴嫩移民和穆斯林,梅内姆却倚重法昆多的遗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蓄着厚厚的连鬓胡子,就像所有阿根廷教科书中的画像上法昆多的胡子一样。
- 23 这几行诗来自题词中引用的何塞·马莫尔写的那首诗:《漂流者之歌》(*Cantos del peregrino*)。这些诗行的内容是:“America no puede ser libre todavía, /porque su herencia ha sido de bastarda oscuridad.” *Cantos del peregrino*, ed. Juan Mármol, Buenos Aires, Félix Lajouane, 1889.
- 24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Facundo o civilización y barbarie*, Prólogo Noé Jitrik,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7, p. 23. 令人奇怪的是,萨米恩托也许错误地将这段题词归于弗朗西斯·邦德·黑德,不过至少有一位阿根廷批评家里卡

多·皮利亚暗示,这种错误也许是故意的和戏仿的。一个《文明与野蛮》的英语译本以《暴君时代阿根廷共和国的生活》(*Life in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n the Days of the Tyrant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为标题出现。译者是玛丽·曼,她和丈夫霍勒斯·曼与萨米恩托有一段关于教育政策的长时间对话。这里的翻译出自笔者。

25 Sarmiento, *Facundo*, op. cit., p. 23.

26 *ibid.*, p. 28.

27 Simón Bolívar, Letter to Santander, 引自 John Lynch,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p. 250.

28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Viajes*, Prólogo de Roy Bartholomew, Colección Clásicos Argentino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de Belgrano, 1981, p. 22.

29 *ibid.*, p. xiv. 我的翻译。1849年的原始标题是 *Viajes en Europa, Africa y América*。萨米恩托的同时代人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蒂,在收集于《热亚那二十日》(*Veinte dias en Genova*)的一系列短篇中,也写到他1843至1844年的欧洲之旅。像萨米恩托一样,他写到参观巴拉那和图库曼途中在南美内部的旅行。尽管相当有趣,阿尔韦蒂的旅行书写无法与萨米恩托的同日而语,我留在将来再讨论它们。参见 Juan Bautista Alberdi, *Viajes y descripciones*, Serie Grandes Escritores Argentinos, ed. Alberto Palc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Jackson, n.d. 感谢伊丽莎白·加雷尔斯为我提供阿尔韦蒂旅行书写的细节。

30 Sarmiento, *Viajes*, op. cit., p. xviii.

263

31 *ibid.*, p. 9.

32 *ibid.*, p. 22.

33 *ibid.*, p. 10.

34 *ibid.*, p. 112.

35 *ibid.*, p. 116.

36 *ibid.*, pp. 114—115.

37 *ibid.*, p. 112.

38 *ibid.*, p. 266.

39 *ibid.*, p. 270.

40 *ibid.*, p. 33.

41 由于这个原因,智利伟大女诗人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于20世纪30、40年代写的史诗规模的《智利诗歌》,构成这样一种激进的创新。参见第十章。

- 42 所讨论小说的标题是《赛布》(*Sab*, 1841)。阿韦利亚内达的诗歌中,有数首诗的标题与埃雷迪亚缩写文本相同。比如,两者都写过给大海、华盛顿、尼亚加拉、太阳的颂歌。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尼亚加拉那首诗,阿韦利亚内达明确暗指埃雷迪亚的先例。
- 43 “El viajero americano,” in 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 *Antología poética*, ed. Mary Cruz, Editorial Letras Cubanas, La Habana, 1983, pp. 156—158.
- 44 Juana Manuela Gorriti, *Sueños y realidades*. 这部著作最近的版本是 Buenos Aires, La Nación, 1907。
- 45 Alejo Carpentier, “Problemática de la actual novela latinoamericana,” *Tientos y diferencias*, Montevideo, Editorial Area, 1967, pp. 24—25.
- 46 Alejo Carpentier, *The Lost Steps (Los pasos perdidos)*, 1953), trans. Harriet de Onís, New York, Knopf, 1956, p. 129.
- 47 Humberto Toscano, ed., *El Ecuador visto por los extranjeros*, Puebla (Mexico), Ed. Cajica, 1959, p. 553.
- 48 Pascual Venegas Filardo, *Viajeros a Venezuela en los siglos XIX y XX*, Caracas, Monte Avila, 1973, p. 15.
- 49 Toscano, op. cit., p. 43.
- 50 Jean Baudrillard, *America*, London, Verso, 1988; and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第三部分 帝国之文体学, 1860—2007

第九章 从维多利亚湖到圣萨尔瓦多喜来登酒店

- 1 Richard Burton, *The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 A Picture of Exploration* (1860),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61, vol. II, p. 43.
- 2 1990年春天,发行了一个好莱坞版的夸张的伯顿和斯皮克历险,标题是《月亮山》。帝国主义怀旧践行一种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趋势(《走出非洲》、《皇冠上的珠宝》、《印度之行》等),对西方风格现代化在非洲的绝对失败做出一种文化回应。
- 3 James Augustus Grant, *A Walk Across Africa; or, Domestic Scenes from my Nile Journal*, Edinburgh, 1864, p. 196.

- 4 John Hanning Speke, *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 Edinburgh, Blackwoods, 1863, p. 466.
- 5 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对灵长类动物在西方意识形态中的多方面意义进行过不朽的研究。参见其 *Primate Vis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6 Paul Du Chaillu, *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Equatorial Africa*, New York, 1861, p. 83.
- 7 *ibid.*, p. 84.
- 8 Mary Kingsley, *Travels in West Africa*, London, Virago Press, 1982, pp. 338—339. First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 Co., 1897.
- 9 Deborah Birkett, "West Africa's Mary Kingsley," *History Today*, no. 37, May 1987, pp. 10—16. 关于金斯利的二手文献现在十分广泛。
- 10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71, p. 213.
- 11 Alberto Moravia, *Which Tribe Do You Belong To?*, trans. Angus David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2, p. 1.
- 12 Paul Theroux,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 123.
- 13 *ibid.*, p. 397.
- 14 Moravia, *op. cit.*, p. 8.
- 15 Paul Fussell, Review of Theroux,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ust 26, 1979, p. 1.
- 16 Richard Wright, *Black Power*, New York, Harper, 1954, p. 154.
- 17 *ibid.*, p. 263.
- 18 参见 M. L. Pratt, "Mapping Ideology: Gide, Camus and Algeria," *College Literature*, vol. 8, 1981, pp. 158—174。
- 19 Albert Camus, "The Adulterous Woman," in *Exile and the Kingdom* (1957), trans. Justin O'Bri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7, pp. 22—23.
- 20 Joan Didion, *Salvador*,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83, pp. 40—41.
- 21 *ibid.*, p. 60.
- 22 *ibid.*, p. 81.
- 23 *ibid.*, p. 36.
- 24 *ibid.*, p. 13.

- 25 *ibid.*, 引自书封。
- 26 *ibid.*, p. 79.
- 27 Domitila Barrios de Chungara with Moema Viezzer, *Let Me Speak*, trans. Victoria Ortiz,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西班牙语原文是 *Si me permiten hablar ... Testimonio de Domitila, una mujer de las minas de Bolivia*, Mexico, Siglo XXI, 1977。关于对“抵抗文学”这一类别的介绍, 参见 Barbara Harlow, *Resistance Literature*, New York, Methuen, 1987。
- 28 也许狄迪恩做的, 和一本旅行书能够公正地对待恐怖差不多, 而且也许这就是她对她读者的挑战: 西方人如果不试图控制, 是如何知道恐怖和接触地带的呢? 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在其非凡的书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 见证了那种挑战。陶西格分析围绕世纪之交哥伦比亚普图马约地区橡胶热的“恐怖文化”时指出, 当人们试图理解恐怖的实践和符号学时, 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是用未被人所见、所说、所知的东西构建的, 而且是由人们确实所见、所说、所知, 以及人们没看见但听别人说他们见过的东西构建的; 还有人们没听见被人说过但听见或读到别人说他们曾听见被人说过的事情, 以及人们自己没做但听别人说他们看见被人做的事情, 等等。陶西格认为, 恐怖的文化 and 意识形态引擎运转, 不仅靠各边都有对其敌人的(扭曲的)概念, 而且靠各方对其敌人持有它这种扭曲概念持有的扭曲概念。同等重要的是, 陶西格在其标题中将恐怖与治疗配对, 坚持认为这两者也许会一起被发现, 哪里有恐怖, 哪里也能发现治疗——例如, 在萨满教巫医的法力中。狄迪恩也许会同意, 一旦被输入, 恐怖的作用就要求长期留下来, 而且要求一本厚书来解释(如同陶西格的一样), 厚得超过读者在意知道的(如同陶西格的一样)。她也许还认为, 陶西格的杰作取决于一种她所拒绝的仅仅一人的无所不在。

第十章 在新殖民地: 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

- 1 Horacio Quiroga, *Los desterrados y otros textos*, ed. Jorge Lafforgue, Madrid, Clásicos Castalia, 1990, p. 231. 这一章部分内容是根据我的下文修改和重写的: “Modernity, Mobility and Excoloniality,” in *Seuils et Traverses: Actes du Colloque de Brest*, Brest, Centre du Recherche Bretonne et Celtique, 2002, pp. 13—30.
- 2 Quiroga, *op. cit.*, p. 221.

- 3 *ibid.*, p. 269.
- 4 *ibid.*, p. 270.
- 5 Beatriz Sarlo, *Una modernidad periférica: Buenos Aires 1920 y 1930*, Buenos Aires, Nueva Visión, 1988.
- 6 Kwame Nkruma,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 pp. ix — x.
- 7 Roberto Schwarz, *Misplaced Ideas*, ed. John Gledson, London, Verso 1992.
- 8 José Joaquín Brunner, *Bienvenidos a la modernidad*, Santiago, Planeta, 1994, p. 39.
- 9 Ricardo Piglia, *La ciudad ausente*,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1992, p. 9. 英语版见 *The Absent City*, Sergio Waism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He visto muchas cosas profundamente interesantes. Pero no estoy seguro de haberlas entendido. Para entenderlas realmente ... hubiese sido necesario conocer el idioma, tener nociones claras acerca de una de las culturas más antiguas del mundo.” Alejo Carpentier, *Tientos y diferencias y otros ensayos*,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87 (1966), p. 67. 文本最后一部分, 最初作为前言出现于卡彭铁尔的小说 *El reino de este mundo* (1948)。
- 11 *ibid.*, p. 68.
- 12 *ibid.*, p. 72.
- 13 “Arrastra el latinoamericano una herencia de treinta siglos, pero ... debe reconocerse que *su estilo* se va afirmando a través de *su historia*, aunque a veces ese estilo puede engendrar verdaderos monstruos” (op. cit., p. 73, 着重号原文就有)。
- 14 “Vi la posibilidad de traer ciertas verdades europeas a las latitudes que son nuestras actuando a contrapelo de quienes, viajando contra la trayectoria del sol, quisieron llevar verdades nuestras adonde, hace todavía treinta años, no había capacidad de entendimiento ni de medida para leerlas en su justa dimensión” (op. cit., p. 73)。
- 15 卡彭铁尔蔑视洛特雷阿蒙描写在强奸美丽女性尸体中发现快乐的青少年的诗行, 说 “lo maravilloso sería violarlas vivas” (op. cit., p. 75)。殖民无意识绝不遥远, 它被编码在跨越帝国分水岭的性别意识形态中。
- 16 Gabriela Mistral (pseud.), *Poesías completas*, ed. Margaret Bates, Madrid, Aguilar, 1966.
- 17 José María Arguedas, *Yawar Fiesta*, Lima, Editorial Horizonte, 1980, p.19. 英语版见 Frances Horning Barraclough,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 18 *ibid.*, p. 20.
- 19 *ibid.*, p. 22.
- 20 Mário de Andrade, *Macunaima: O héroi sem nenhum caráter*, 16a edição, São Paulo, Martins, 1978. 有关其与亚马孙旅行文学关系的详细研究, 参见 Lúcia de Sá, *Rain Forest Literatures: Amazonian Texts and Latin American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 266 21 “Um dos meus interesses foiedesrespeitar lendariamente a geografia e a fauna geográficas. Assim desregionalisava o mais possível a criação ao mesmo tempo que conseguia o mérito de conceber literariamente o Brasil como entidade homogenea, um concerto étnico nacional e geográfico. (Dizer também que não estou convencido ... de ter feito obra brasileira. *Não sei si sou brasileiro*. É uma coisa que me preocupa e em que trabalho porém não tenho convicção de ter dado um passo grande prá frente não.)” (op. cit., 1988, p. 356), 引自 Esther Gabara, “The Ethos of Modernism: Photography and Literature in Brazil and Mexico, 1920—194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 在此处和各处, 我都要感谢加伯勒的书。
- 22 Gabara, op. cit., p. 25.
- 23 Gabara, op. cit., p. 17.
- 24 “esta ‘dor’ sulamericana do indivíduo ... de incapacidade realizadora do ser moral, que me deslumbre e afete. A dor, a imensa e sagrada dor, dor irreconciliável humano, sempre imaginei que ela viajara na primeira vela de Colombo e vive aqui.” 相形之下他说, 欧洲人不忍受, 他们把受苦理论化。 *O turista aprendiz*, Mário de Andrade, *Obras Completas*, São Paulo, Martins, 1955—1966, vol. XX, p. 166, quoted in Gabara, op. cit., p. 26.
- 25 Gabriela Mistral, “La extranjera” in *Tala* (1938), collected in Gabriela Mistral *Poesias*, Mexico, Porrúa, 1986, p. 152. 译文可见 Langston Hughes, *Selected Poems of Gabriela Mistr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7. 可是这里的译文出自笔者。
- 26 “ya va a morirse en medio de nosotros/en una noche en la que más padezca/ con sólo su destino por almohada.” op. cit., ll.15—17.
- 27 Mistral, op. cit., p. 151.
- 28 Vinay Bahl,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Thinking Globally,” *Gender and History* 4 : 1 (April 1997), p. 12. 另参见她的 “On the relevance (or

- irrelevance) of subaltern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2 : 23 (June 1997) 1333—1344。
- 29 “un home pauvre et nu, amoureux du soleil qui ne laisse pas d’ombres ... qui accepte mourir pour la vérité,” Albert Camus, “Avant-propos,” *L’Étranger*. Eds Germaine Brée and Carlos Lunes,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1955, p. viii.
- 30 M. L. Pratt, “Mapping Ideology: Gide, Camus and Algeria,” 引自 chapter 9, n. 18。
- 31 关于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 参见 Mary Louise Pratt, “Why the Virgin of Zapopan Went to Los Angeles” in Jens Andermann and Wm. Rowe, eds, *Images of Power*, New York, Berhahn Books, 2005。以西班牙语出版为 “Por qué la Virgen de Zapopan fue a Los Angeles,” in *Sujetos en tránsito: (in) migracion, exilio y diáspora en la cultura latinoamericana*, Buenos Aires, Alianza。这里提供的某些材料改编自该文。
- 32 James Ferguson, *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33 Peter Kiefer, “Italy: 19 migrants dead at sea,” *New York Times*, 2/24/07, p. A6.
- 34 James Ferguson, “Of Mimicry and Membership: Africans and the New World Socie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17 : 4 (Nov. 2002), pp. 551—569.
- 35 商品价格下降、传统农业崩溃、劳动保护暂停, 增加利润的要求、农村家庭的贫穷, 造成这种丑恶、野蛮倒退的条件。
- 36 2004年8月, 当巴西媒体在新的工业规模的大豆种植园发现奴隶制时, 巴西议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 将对财产拥有者使用奴隶劳动的惩罚合法化。十八个代表不支持这项修正案。 267
- 37 例外似乎主要是孩子, 他们在当代档案中确实是作为幸存者出现。埃利安·冈萨雷斯和那位萨尔瓦多男婴是此处引用的例子。 268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插图的页码以斜体出现)

- Abridged Relations of a Voyage to Peru* (Bouguer)《一次秘鲁之航的简略关系》(布给),18,20
- Academy of Science(France)科学院(法国),17,18,20
- Account of the Slave Trade on the Coast of Africa* (Falconbridge)《非洲海岸奴隶贸易记述》(福尔肯布里奇),100
- Accra 阿克拉,212
- Across Patagonia* (Dixie)《横穿巴塔哥尼亚》(迪克西),167
- Adam in Paradise 天堂里的亚当,32, 50—51,55
- Adams, John 亚当斯,约翰,20
- Adanson, Michel 阿当松,米歇尔,28, 30,68
- “Adulterous Woman, The”(Camus)《不忠的女人》(加缪),219—220
- Aeneid*《埃涅阿斯纪》,94
-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Schiller)《审美教育书简》(席勒),134
- Africa 非洲,67—69,70,72,220; 另见 specific countries and regions 具体国家和地区
- African Association 非洲协会,67—69, 70,72,83
-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非洲人国民大会,39
- Afrikaners 南非白人,见 Boers 布尔人
- Agriculture 农业,34—35,36
- “Agriculture in the Torrid Zone”(Bello)《热带农业》(贝略),170—171,174—177
- Aguirre 阿吉雷,20
- Alberdi, Juan Batista 阿尔韦蒂,胡安·巴蒂斯塔,263(29n)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189—190,219,236
- Algoa Bay 阿尔戈阿湾,60

- Ali, Fulani ruler 阿里,富拉尼人统治者, 69, 80
- Amazon 亚马孙, 17, 20, 35
- Amer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 18, 111; 另见 Incas 印加人, Aztecs 阿兹特克人, Pampas 潘帕斯
-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 135, 137
- Andes 安第斯山脉, 70, 126, 147, 153, 175, 231—232; travelers in 在……的旅行者, 150
- Andrade, Mário de 安德拉德, 马里奥·德, 232—234
- Andrews, Joseph 安德鲁, 约瑟夫, 144—145
- anticonquerors 反征服者, 224—225
- anti-conquest 反征服, 38, 65, 78, 80, 102, 103, 178; term described 术语描述, 9
-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反奴隶制国际, 240
- “Apprentice Tourist, The” (de Andrade) 《学徒观光客》(德·安德拉德), 232
- archaeology, in South America 考古学, 在南美洲, 130—133
- Arequipa 阿雷基帕, 157—158, 160
- Argentina 阿根廷, 62, 145, 148, 183—184, 190, 192; relationship with Spain 与西班牙的关系, 237
- Arguedas, José María 阿格达斯, 何塞·马利亚, 230—232
- Arnim, Bettina von 阿尼姆, 贝蒂娜·冯, 157
- arpillera* (fabric picture) 粗麻布画(织物画), 138—140
- arrival scenes 抵达场景, 76, 78
-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222
- Atlas géographique et physique du Nouveau Continent* (Humboldt) 《地理和物理图册》(洪堡), 137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39
- autoethnography, term described 自传式人种志, 术语描述, 9; text 文本, 100
- Aztecs 阿兹特克人, 179; art 艺术, 130—132
- Bahl, Vinay 巴尔, 维奈, 235—236
- Baikie, Dr William 贝凯, 威廉, 博士, 83
- Baker, Florence 贝克, 弗洛伦丝, 209
- Bambara 班巴拉, 69, 70
- Bambouk 邦布, 69
- Banks, Joseph 班克斯, 约瑟夫, 67
- Barrios de Chungara, Domitila 巴里奥斯·德·琼加拉, 多米蒂拉, 222—223
- Barrow, John 巴罗, 约翰, 38, 67, 180;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 56—66, 74, 76, 78, 79
- Beagle* 小猎犬号, 110
- Bello, Andrés 贝略, 安德烈斯, 191; founded magazine 创办杂志, 169—170; poems 诗歌, 170—171, 174
- Betagh, a pirate 比塔夫, 海盗, 16
- Black Power* (Wright) 《黑人权力》(赖特), 217—218, 220

- Blackwood's Magazine*《布莱克伍德杂志》,167
- Blake, William 布莱克,威廉,89
- Boers (Afrikaners) 布尔人(南非白人), 39,40,52,54,58,61,66
- Bolívar, Simón 玻利瓦尔,西蒙,110, 112,138,144,152,161,185; climbs Chimborazo 攀登钦博腊索峰,177—178; as Great Liberator 作为伟大的解放者,177
- Bonpland, Aimé 邦普朗,艾梅,109,110, 111,112,115,126,135
- Boorstin, Daniel 布尔斯廷,丹尼尔,25, 31—32
- Bott River 博特河,50
- Bougainville, Louis 布干维尔,路易,38
- Bouguer, Pierre 布给,皮埃尔,7,18,20
- Bouterse, Desi 鲍特瑟,德西,105
- Bowdich, T. Edward 鲍迪奇, T. 爱德华, 104
- Brand, Charles 布兰德,查尔斯,146, 148,150
- Brazil 巴西,232
- Bride of Messina* (Schiller)《墨西拿的新娘》(席勒),134
- Brief Narrative of 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of South America* (La Condamine)《穿越南美内陆旅行简述》(拉·孔达米纳),18,20
- Britain, imperial expansion 英国,帝国扩张,57; “spirit of improvement” “改良精神”,63
- Brosse, Charles de 布罗斯,查尔斯·德, 33
- Brunner, Jose Joaquin 布伦纳,何塞·华金,226
- Brunswijk, Ronny 不伦瑞克,罗尼,105
-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145,182
- Buffon, Georges 布封,乔治,28,29,30, 34,117
- Burton, Richard 伯顿,理查德,197—198,200—202,213
- Bushmen 布须曼人,见!Kung 桑人
- Byron, Baron George Anson 拜伦,乔治·安森,男爵,154
- Caillié, René 卡耶,勒内,249(4n)
- Cairo 开罗,69
- Calderon de la Barca, Fanny 卡尔德龙·德·拉·巴尔卡,范妮,167
- Callao 卡亚俄,167
- Camus, Albert 加缪,阿尔贝,218—220, 236
- cannabis 印度大麻,51
- Cape Colony 开普殖民地,39—40,49, 56—57,61—62; described 描述,47; literature of 的文学,86—87; returned to Dutch 归还荷兰,66
- Cape Horn 合恩角,61,166
-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48,59; literature of 的文学,38—39,40—48
- Cape Town 开普敦,48
-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岛,159
- capital, cultural 资本,文化的,230

- Capital* (Marx) 《资本论》(马克思), 82—83
- capitalism, multinational 资本主义, 多国的, 238
- capitalist vanguard 资本主义先锋, 144—152, 154—156, 161, 165
- Captive, The* (Echeverria) 《被俘者》(埃切维里亚), 180, 182
- captivity narrative 囚禁叙事, 239—240
- Caracas 加拉加斯, 111, 119
- Caribbean 加勒比, 61, 70, 98—99, 135
- Carpentier, Alejo 卡彭铁尔, 阿莱霍, 192—193, 227—230
- Carter, Ron 卡特, 罗恩, 8
- Casement, Roger 凯斯门特, 罗杰, 206
- Cayenne 卡宴, 17, 21
- Centre Flora Tristán, Lima 弗洛拉·特里斯坦中心, 利马, 153
- Cerro de Potosi 波托西山, 126
- Charles IV, of Spain 查理四世, 西班牙, 114
- Chile 智利, 16, 133, 144, 161
- Chimborazo, Mount 钦博腊索峰, 115, 126, 130, 140, 177—178
- Cholula, Mexico, pyramid at 乔卢拉, 墨西哥, 金字塔, 130, 179
- Chorrillos 乔里约斯, 158
- Churchill 丘吉尔, 16
- ciudad ausente, La* (Piglia) 《缺席的城市》(皮利亚), 227
-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Life of Juan Facundo Quiroga* (Sarmiento) 《文明与野蛮: 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的人生》(萨米恩托), 182—184, 186
- civilizing mission 文明使命, 149—150, 168
- Claas, Khoikhoi entrepreneur 克拉斯, 科伊人企业家, 43
- classification, global 分类, 全球, 26, 28, 31; systems 系统, 25
- Cochrane, Charles Stuart 科克伦, 查尔斯·斯图亚特, 146
- Cochrane, Lord Thomas 科克伦, 托马斯, 勋爵, 145, 154, 161
- Coetzee, J. M. 库切, J. M., 38, 61; on Hottentots 论霍屯督人, 43—44
- Colombia 哥伦比亚, 146—147
-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 124, 171, 174—175
- commerce 商业, 34
- concessionary narrative 特许叙事, 98
- concubinage system 纳妾制, 94
- Congo 刚果, 206, 211
- conquistadors 征服者, 229, 266 (14n)
- Conrad, Joseph 康拉德, 约瑟夫, 206, 211
- Considerations on the Customs of this Century* (Duclos) 《有关本世纪习俗的思考》(杜克洛), 35
- contact zones 接触地带, 43, 48, 52, 54, 134—135, 156, 167, 183; term described 术语描述, 7
- Cook, James 库克, 詹姆斯, 25, 38—39, 49, 70
- Copacabana, Virgin of 科帕卡巴纳, 圣

- 母, 126
- creoles 克里奥尔人, 110—111, 112, 148, 152; civic consciousness 公民意识, 172; contact with Europe 与欧洲的接触, 186; esthetics 美学, 184—185; women writers 女性作家, 190—191
- Cuba 古巴, 129
- Cuenca, Ecuador 昆卡, 厄瓜多尔, 17
- culen* (a plant) 库伦(一种植物), 160—161
-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资本, 230
- curare 箭毒, 20
- Curtin *et al.* 柯廷等, 48, 66, 82
- Cuzco 库斯科, 141
-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110
- death tales 死亡故事, 239, 240—241
- Defoe, Daniel 笛福, 丹尼尔, 29—30, 187
- “De lo real maravilloso americano” (Carpentier)《论美洲的奇妙真实》(卡彭铁尔), 227—230
- demographic changes 人口变迁, 237—238
- Description de l’Egypte* (Humboldt)《描写埃及》(洪堡), 115
- Devocionario del Migrante*《移居者的祈祷书》, 236—237
- diaspora, reverse 流散, 反向, 237, 238
- Didion, Joan 狄迪恩, 琼, 220—223
- Dido and Aeneas 狄多和埃涅阿斯, 94
-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 (Gerbi)《新世界之争》(格尔比), 118
- Dixie, Lady Florence 迪克西, 弗洛伦丝, 女士, 167
- Djukas 德朱卡人, 89
- Du Chaillu, Paul 杜·沙尤, 保罗, 204—206
- Duclos 杜克洛, 35
- Dutch Reformed Church 荷兰归正教会, 39
- earth, shape of 地球的形状, 15
-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48, 64; Dutch 荷兰, 39, 57; Swedish 瑞典, 25
- Echeverria, Esteban 埃切维里亚, 埃斯特万, 180, 182
- Ecuador 厄瓜多尔, 177
- Egypt 埃及, 68, 131
- El Dorado 黄金国, 20, 40
-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 222; University of 大学, 221
-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35, 192
- Eriksson, Gunnar 埃里克松, 贡纳尔, 28
-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Plants* (Humboldt)《论植物地理》(洪堡), 117
- Étranger, L’* (Camus)《局外人》(加缪), 236
- ethnographic portraits 人种志画像, 57—63
- Euroafricans 欧非人, 61
- ex-hombres* 前一人, 224—225
- Exile and the Kingdom* (Camus)《流亡与

- 独立王国》(加缪),219
- expansionism 扩张主义,11—12
- exploration, interior 探险,内陆,3—4, 30,50; scientific 科学的,23
- 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Equatorial Africa* (Du Chaillu)《赤道非洲探险和历险》(杜·沙尤),204—205
- “extranjera, La”(Mistral)《局外人》(米斯特拉尔),234,236
- Fabian, Johannes, denial of coevalness 费边,约翰内斯,同在否定,63
- Falconbridge, Anna Maria 法尔康布里奇,安娜·玛丽亚,156,168; life and work 生平与作品,100—103
- Falconbridge, Lord Alexander 法尔康布里奇,亚历山大,勋爵,100
- Familles des plantes* (Adanson)《植物科志》(阿当松),28
- Faust myth 浮士德神话,192
- feminist movement 女性主义运动,153
- feminotopias 女性乌托邦,161,163—168
- First-Time: 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an Afro-American People* (Price)《初次:非裔美洲人的历史想象》(普赖斯),99
- Fish River 鱼河,48,56,57—58,66,74
- flow, as metaphor 流动,作为隐喻,241—242
- Forbes, Vernon 福布斯,弗农,252(12n)
- Förster, Georg 弗斯特,格奥尔格,113—114,135
- Fossey, Dian 弗塞,迪安,204
- Foucault, Michel 福柯,米歇尔,28,31,47
- Franco, Jean 弗朗哥,让,146
- Frederick II, of Prussia 腓特烈二世,普鲁士的,113
- French Guiana 法属圭亚那,89
- French and Indian Cruelty ... of Peter Williamson*《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残酷:以彼得·威廉森的生活和种种命运兴衰为例》,84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36,87
- Freyre de Jaimes, Carolina 弗雷雷·德·海梅斯,卡罗琳娜,153
- Frézier, M. 弗雷齐耶,M.,16,23
- Fussell, Paul 弗塞尔,保罗,216
- Gabara, Esther 加伯勒,埃丝特,232
- Gabon 加蓬,209
- Gamarra, Agustin 加马拉,阿古斯丁,163
- Gamarra, Doña Pencha 加马拉,彭恰,女士,163,167
- Gambia River 冈比亚河,69
- Garcilaso de la Vega, Inca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嘉,印加,141
- Garden of Eden 伊甸园,165,205—206
- gauchos 加乌乔人,183—184,185,190,192
- Gauguin, Paul 高更,保罗,152
- Geographical and Physical Atlas* (Humboldt)《地理和物理图册》(洪堡),117

- Georgics* (Virgil) 《农事诗》(维吉尔), 171, 175
- Gerbi, Antonello 杰尔比, 安东内洛, 117—118, 137
- Ghana 加纳, 212, 220
- Gide, André 纪德, 安德烈, 211
- Gift, The* (Mauss) 《礼物》(莫斯), 82
- Godin, Louis 戈丹, 路易, 16, 17, 21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 192
-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220
- Gómez de Avellaneda, Gertrudis 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 赫特鲁迪斯, 190
- gorillas 大猩猩, 204, 206
- Gorillas in the Mist* (film) 《雾锁危情》(电影), 204
- Gorriti, Juana Manuela 戈里蒂, 胡安娜·曼努埃拉, 190—191
- Gottingen, University of 哥廷根, 大学, 113
- Graham, Maria Callcott 格雷厄姆, 玛丽亚·考尔科特, 152, 153—154, 155, 156—157, 187; on political situation 论政治形势, 161, 163; as *Robinson Crusoe* 作为《鲁滨孙漂流记》, 166; as social explorer 作为社会探索者, 157; use of personal narrative 个人叙事的使用, 159—161; visit to garden retreat 参访归隐园, 165
- Graham, Thomas 格雷厄姆, 托马斯, 154
- Gran Colombia 大哥伦比亚, 172, 177
- Grant, James 格兰特, 詹姆斯, 201
- Guaman Poma de Ayala, Felipe 乌阿曼·波马·德·阿亚拉, 菲利佩, 5, 6, 7, 9
- Guatemala City 危地马拉城, 212, 213, 221
- Guayaquil 瓜亚基尔, 177
- Guide for the Walking Blind* 《盲目行走指南》, 145
- Hasselquist 哈塞尔奎斯特, 85
- Hawkesworth, John 霍克斯沃思, 约翰, 86
- Head, Francis Bond 黑德, 弗朗西斯·邦德, 144, 150—151, 183
- Heart of Darkness* (Conrad) 《黑暗之心》(康拉德), 211
- Henri Christophe, King 亨利·克里斯托夫, 国王, 229
- Heredia, José María 埃雷迪亚, 何塞·玛丽亚, 179—180, 190
- Herodotus 希罗多德, 68
- Histoire naturelle* (Buffon) 《自然史》(布封), 28
-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Africa* (Leo Africanus) 《非洲历史和描述》(利奥·阿弗里卡纳斯), 68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New Continent* (Humboldt) 《新大陆历史地理》(洪堡), 117
- History of the Pyramids of Quito* (La Condamine) 《基多金字塔史》(拉·孔达米纳), 20
- History of Spain* (Graham) 《西班牙史》

- (格雷厄姆), 154
-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252 (9n), 256 (10n)
- Hook-Demarle, Marie-Claire 霍克—德马勒, 玛丽—克莱尔, 157, 158
- Hottentots 霍屯督人, 见 Khoikhoi 科伊人
- Houghton, Daniel 霍顿, 丹尼尔, 69
- Hughes, Langston 休斯, 兰斯顿, 234
- Hulme, Peter 休姆, 彼得, 73, 82, 94, 95, 98
- humans, categorization of 人类的分类, 32, 33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洪堡, 亚历山大·冯, 24, 59, 109—110, 111, 112, 144, 147; death 死亡, 193; described 描述, 113—114; influence of 的影响, 177—180, 184—185, 189, 192—193; *querelle d'Amérique* 美洲之争, 137; as transculturator 作为文化互化者, 132—134; travels 旅行, 113—115; writings 作品, 115—132, 147, 172
- Hutton, Catherine 赫顿, 凯瑟琳, 103
- hyphenated white men 带连字符的白人, 204—206, 209
- I, Pierre Rivière ...* (Foucault) 《我, 皮埃尔·里维埃……》(福柯), 47
- Incas 印加人, 17, 132, 141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35
- Inkle and Yarico, story of 尹克尔与雅丽可的故事, 95, 98
-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The 《奥拉达·艾奎亚诺生活趣事》, 100
- “Invocation to Poetry” (Bello) 《调用诗歌》(贝略), 171
- Isert, Paul Erdman 伊泽特, 保罗·厄尔德曼, 68, 93—94
- Jardin des Plantes 植物园, 115, 189
-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托马斯, 115
- Jitrik, Noé 基特里克, 诺埃, 143
- Joanna, story of 乔安娜的故事, 90, 93—95, 98—99, 159
- Jordan, West Bank 约旦河, 西岸, 35
- Journey from Buenos Ayres to Chile* (Andrews)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智利之旅》(安德鲁斯), 144
- 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 (Speke) 《尼罗河源头发现记》(斯皮克), 202
-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le* (Graham) 《智利居留日记》(格雷厄姆), 153—154
-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India* (Graham) 《印度居留日记》(格雷厄姆), 154
- Juan Fernandez islands 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 166, 187
- Juan, Jorge 胡安, 豪尔赫, 16, 18, 20—21, 112, 114
- Juana, island of 胡安娜, 岛, 124
- Jussieu, Joseph de 朱西厄, 约瑟夫·德, 17, 21

- Kaffirs 卡菲尔人, 见 Nguni 恩古尼人
- Kalahari desert 卡拉哈里沙漠, 64
- Khoikhoi (Hottentots) 科伊人(霍屯督人), 39, 40, 66; genitalia 生殖器, 51; how viewed 如何看待, 42—44, 48, 51; uprising 起义, 57
- Kingsley, Mary 金斯利, 玛丽, 209—212, 217—218
- Kolb, Peter 科尔布, 彼得, 38, 51, 52;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 40—48
- !Kung (Bushmen) 桑人(布须曼人), 42, 43, 48, 54, 60, 180; attack on 攻击, 65; described 描述, 62—64; uprising 起义, 57
- labor, division of 劳动, 分工, 102, 104
- laborers, migrant 劳工, 流动, 237—238, 242—243
- La Condamine, Charles-Marie de 拉·孔达米纳, 夏尔—马里·德, 16, 17, 18, 31; writings of 作品, 18, 20
- La Condamine expedition 拉·孔达米纳探险, 16—17, 18, 21, 23, 24
- La Coruña 拉科鲁尼亚, 110
- Lady's Travels Round the World, A (Pfeiffer) 《一位女士的环球之旅》(法伊弗), 167
- La Figure de la terre (Bouguer) 《地球的形状》(布给), 18
-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 (Burton) 《中非湖区》(伯顿), 197—198
- "Land of absence" (Mistral) 《缺席的陆地》(米斯特拉尔), 234—235
- landscape, according to Moravia and Theroux 风景, 根据莫拉维亚和泰鲁, 213—214; in Victorian writing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书写中, 198—199
- Lapland 拉普兰, 16
-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 62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226
- Latin American writing 拉丁美洲书写, 226—237
- Le Vaillant, François 勒瓦扬, 弗朗索瓦, 86—87, 93
- Ledyard, John 莱迪亚德, 约翰, 69
- Lee, Sarah 李, 萨拉, 104—105
- Leo Africanus 利奥·阿弗里卡纳斯, 67, 68
- "Letter on the Popular Uprising at Cuenca" (La Condamine) 《关于昆卡人民起义的信件》(拉·孔达米纳), 20
- Letters from India (Graham) 《印度来信》(格雷厄姆), 154
- Life in Mexico (de la Barca) 《生活在墨西哥》(德·拉·巴卡), 167
- Lima 利马, 117, 145; women in 在……的女士, 163—164
- Lindroth, Sten 林德罗特, 斯滕, 35
- Linnaeus (Carl Linné) 林奈(卡尔·林奈), 15; pupils of 的学生, 25—26, 55;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 24—35
- Listowel, Dame Judith 利斯托尔, 朱迪斯, 女士, 1
- Livingstone, Dr 利文斯通, 医生, 1

- London Antislavery Society 伦敦反奴隶制学会, 240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传道会, 39, 66
- Los desterrados* (Quiroga) 《流放者》(基罗加), 224—225
- Lost Steps, The* (Carpentier) 《消失的足迹》(卡彭铁尔), 193
- Louis XIV, of France 路易十四, 法国的, 16
- Louis XV, of France 路易十五, 法国的, 7—18
- Lucas, Simon 卢卡斯, 西蒙, 69
- Macondo, García Márquez 马孔多, 加西亚·马尔克斯, 227
- Macunaima* (de Andrade) 《马库纳伊玛》(德·安德拉德), 232
- Magellan, Ferdinand 麦哲伦, 斐迪南, 29
- Mandela, Nelson 曼德拉, 纳尔逊, 39
- Mandingos 曼丁果人, 69
- Mariquita 马里基塔, 147
- Marín del Solar, Mercedes 马林·德·索拉尔, 梅塞德丝, 157
- Martí, José 马蒂, 何塞, 180
- Martius, Karl 马蒂乌斯, 卡尔, 232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82—83
- Mas-a-fuera 外海, 187—188
- Maupertuis, Pierre 莫佩尔蒂, 皮埃尔, 16
- Mauss, Marcel 莫斯, 马塞尔, 82
- Mawe, John 马维, 约翰, 143, 146, 147, 148
- McCartney, Lord George 麦卡特尼, 乔治, 勋爵, 57
- Measurement of the First Three Degrees of the Meridian* (La Condamine) 《测量子午线的前三度》(拉·孔达米纳), 20
- Melgar, Mariano 梅尔加, 马里亚诺, 191
- Memoirs of Mama Blanca* (Parra) 《布兰卡妈妈回忆录》(帕拉), 135
- Memoirs of a Solitary Walker* (Rousseau)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卢梭), 55
- Menem, Carlos 梅内姆, 卡洛斯, 263 (22n)
- Mephis the Proletarian* (Tristan) 《无产者墨菲》(特里斯坦), 153
- metropolitan modernity 宗主国现代性, 224—226
- Mexico 墨西哥, 115 129, 133
- Miers, John 迈尔斯, 约翰, 144, 148, 150, 169; timetabling of 时间表, 145—146
- migrant laborers 流动劳工, 237—238, 242—243
- “Migrant’s Prayerbook, The” 《移居者祈祷书》, 236—237
- military organization 军事组织, 35
- mines/mining 矿山/采矿业, 18, 20, 144, 147, 150
- Miranda, Francisco 米兰达, 弗朗西斯科, 11, 111
- Misiones 米西奥内斯, 224, 225
- Mistral, Gabriela 米斯特拉尔, 加夫列拉, 230, 234—235, 236

- mobility 流动性, 236—243
- modernity 现代性, 224—226, 230, 232, 235—236
- Mollien, Gaspar 莫利安, 加斯珀, 147, 148
- monarch-of-all-I-survey 目光所及我为君, 197, 201—202, 204, 205, 212, 219
- Montagu, Lady Mary 蒙塔古, 玛丽, 女士, 164, 168
- 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 84, 85, 86
- Moravia, Alberto 莫拉维亚, 阿尔贝托, 217, 220;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 212, 213—216;
-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多国资本主义, 238
- Mutis, José 穆蒂斯, 何塞, 115, 133
- Napoleon Bu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114, 135, 154
- Narina, story of 纳丽娜的故事, 87—88
- Narrative of a Five Year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ted Negroes of Surinam* (Stedman)《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斯特德曼), 88—100
- Narrative of Four Voyages in the Land of the Hottentots and the Kaffirs* (Paterson)《关于在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土地上四次旅行的叙事》(佩特森), 38, 50—56
- 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Falconbridge)《关于两次塞拉利昂河之旅的叙事》(法尔康布里奇), 100—103
-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学, 25—28, 30—33, 37
- naturalist figure 博物学家的形象, 33—34, 56
- nature, systematizing of 自然的系统化, 34—36
- neocolonial modernity 新殖民地的现代性, 227—236
-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226—236
- New Chronicle and Good Government and Justice* (Guaman Poma)《新编年史和好政府及正义》(乌阿曼·波马), 5, 6
-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222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纽约时报书评》, 216
- Newton, Isaac 牛顿, 艾萨克, 16, 17
- Nguni (Kaffirs) 恩古尼人(卡菲尔人), 48, 56—57, 60, 62, 66
- Nkrumah, Kwame 恩克鲁玛, 克瓦米, 226
- Niger River 尼日尔河, 68, 69, 83
- Nile River 尼罗河, 68, 70, 114, 201, 202, 204, 210
- nomenclature 命名法, 247(2n)
- Odonais, Godin des 奥多奈, 戈丹·德, 21
- Odonais, Isabela Godin des 奥多奈, 伊莎贝拉·戈丹·德, 21, 23

- Odyssey*《奥德赛》,94
- Old Patagonian Express, The* (Theroux)
《陈旧的巴塔哥尼亚快车》(泰鲁),
216,221
- O'Leary, Daniel 欧利里,丹尼尔,144,
177
-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Márquez)
《百年孤独》(马尔克斯),227
- "On the American marvelous real"
(Carpentier)《论美洲的奇妙真实》
(卡彭铁尔),227—230
- On the Need to Welcome Foreign Women*
(Tristan)《论欢迎外国女性的必要
性》(特里斯坦),168
- "On Steppes and Deserts" (Humboldt)
《在大草原和沙漠之上》(洪堡),119,
122—123
- Order of Things, The* (Foucault)《词与物》
(福柯),28
- Orellana 奥雷亚纳,20
- Orinoco 奥里诺科河,20,114
- O turista aprendiz* (de Andrade)《学徒观
光客》(德·安德拉德),232
- Ovalle, Alonso de 奥瓦列,阿隆索·德,
16
- Owen, John 欧文,约翰,86
- "Pais de la ausencia" (Mistral)《缺席的
陆地》(米斯特拉尔),234—235
- Pampas Indians 潘帕斯大草原印第安
人,180,182,190
- Paris 巴黎,188—189
- Park, Mungo 帕克,芒戈,67,68,87,95;
travels 旅行,69—70;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72—83
- Parra, Teresa de la 帕拉,特雷莎·德·
拉,135
- 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214,215
- Paterson, William 佩特森,威廉,38;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49—56
- people, "filthy habits" 人,“肮脏习惯”,
148; indigenous 土著的,48,52;
settlers and travelers 定居者和旅行
者,52,54; stereotypes 刻板印象,
62—63; where are they? 他们在何
处? 50—51,58—59,249(37n)
- People magazine*《人物》杂志,222
- 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 (Tristan)《一
个流浪者的漫游》(特里斯坦),152,
168
- Personal Narrative* (Humboldt)《个人叙
事》(洪堡),110,117,132—133,169;
discussed 讨论,126—129
- Peru 秘鲁,16,115,126,133,144,152,
153; political situation 政治形势,
161,163
- Pfeiffer, Ida 法伊弗,伊达,167
- Philip III, of Spain 菲利普三世,西班牙
的,5
- Philip V, of Spain 菲利普五世,西班牙
的,16
- Philosophia Botanica* (Linnaeus)《植物
哲学》(林奈),25
- photography, portraiture onto landscape

- 叠加在风景照片上的人像, 232, 233
- Pietschmann, Richard 皮奇曼, 理查德, 5, 7
- Piglia, Ricardo 皮利亚, 里卡多, 227
- Pisania 皮萨尼亚, 67, 69
- Pizarro 皮萨罗号, 114
- planetary consciousness, circumnavigation 行星意识, 环球航行, 29, 30, 37; emergence 出现, 15; mapmaking 地图绘制, 29—30; term described 术语描述, 11
- Pocahontas 波卡洪塔斯, 99
- Poema de Chile* 《智利诗歌》, 230
- Political Essay on the Island of Cuba* (Humboldt) 《古巴岛政治论》(洪堡), 128, 182
-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Humboldt) 《新西班牙王国政治论》(洪堡), 117, 128, 129, 182
- Polo, Marco 波罗, 马可, 124
- Portal, Magda 波塔尔, 玛格达, 153
- portraiture onto landscape photography 叠加在风景照片上的人像, 232, 233
- Poulantzas, Nicos 普兰查斯, 尼科斯, 36
- Pratt, Mary Louise 普拉特, 玛丽·路易斯, 267(27n)
- Present State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 (Kolb) 《好望角现状》(科尔布), 38; discussed 讨论, 40—48
- Price, Richard and Sally 普赖斯, 理查德和萨莉, 94, 99
- primal nature 原始自然, 126, 146, 147
- primordial innocence 原始天真, 32
- Proctor, Robert 普洛克特, 罗伯特, 146, 150
- Promenade in London* (Tristan) 《伦敦漫步》(特里斯坦), 153
- Provincial Memoirs* (Sarmiento) 《外省回忆录》(萨米恩托), 184
- pyramids 金字塔, 31
- Quechua 盖丘亚语, 5, 7; song 歌谣, 191
- Quiroga, Horacio 基罗加, 奥拉西奥, 224—225
- Quito 基多, 16, 17, 21, 115, 177
- Raleigh, Sir Walter 雷利, 沃尔特, 爵士, 20, 141
- Ramadan 斋月, 74
- reciprocal vision 互惠想象, 79—83
- Rembwe 蓝布韦河, 209—210, 211, 218
- Repertoria Americano*, magazine 《美洲目录》, 杂志, 169—170, 173
- rescue tales 拯救故事, 239, 240
- reverse diaspora 反向流散, 237, 238
- “Ridiculous bet in Teffé, June 12, 1927” (de Andrade) 《1927年6月12日在特菲的可笑赌注》(德·安德拉德), 232, 233
- Ri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 143, 146
- Rio Juagua 胡阿瓜河, 126—127
- Rio Negro 里奥内格罗河, 20
- Robben Island 罗本岛, 39
- Robertson, John 罗伯逊, 约翰, 144

- Robinson Crusoe*《鲁滨孙漂流记》, 166, 187, 188
-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121, 134—135
- Rough Notes of some Journeys across the Pampas and in the Andes* (Head)《数次穿越南美大草原和安第斯山区之旅略记》(黑德), 144, 150
-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55
- 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Incas* (de la Vega)《印加人皇家评论》(德·拉·维加), 141
-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皇家地理学会, 83
-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18
- rubber 橡胶, 20
- Salvador* (Didion)《萨尔瓦多》(狄迪恩), 220—223
- San Martín, general 圣·马丁, 将军, 141, 161
-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221
- Sancho, Ignatius 桑乔, 伊格内修斯, 68—69, 100
- Santander, General Antonio 桑坦德, 安东尼奥, 将军, 144, 177
-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36, 135; slave revolt 奴隶暴动, 70, 95, 111
- Saramakas 萨拉马卡人, 89—90
- Sarmiento, Domingo Faustino 萨米恩托, 多明戈·福斯蒂诺, 185; as *flaneur* 作为漂流者, 188—189; travels abroad 国外旅行, 186—190;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 182—184, 185—190
- Saugnier, French traveler 索格尼耶, 法国旅行者, 23—24
- Schiller, Johann von 席勒, 约翰·冯, 134
- Schwarz, Roberto 施瓦兹, 罗伯托, 226
- science, authority of 科学的权威, 29, 34
- Secret News of America* (Ulloa and Juan)《美洲秘闻》(乌略亚和胡安), 20—21
- Segu 塞古, 69
- self-portraits 自画像, 232, 233
- Selkirk, Alexander 赛尔扣克, 亚历山大, 166, 187—188
- Senegambia 塞内冈比亚, 69
- sentimental mode 感伤模式, 72—73, 84, 94, 100; in Park's writings 在帕克的作品中, 73—83; sex and slavery 性与奴隶制, 84—86; seraglio scenes 后宫场景, 80
-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 (Taussig)《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陶西格), 265 (28n)
- Shipwreck and Adventures of Mons. Pierre Viaud, The*《皮埃尔·维奥先生遭遇的海难和历险》, 86
-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72
- Sierra Leone Company 塞拉利昂公司, 100—101
- “Silva” (Bello)《森林志》(贝略), 170—171
- slaves, Dutch cruelty 奴隶, 荷兰人残酷,

- 90; murder of 谋杀, 47; and poisoning 和毒害, 99, 159; rebellions 叛乱, 35
-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16, 35—36, 68, 69, 70, 72, 79, 111; abolition 废除, 69, 70, 72, 85, 95, 128, 240; attacked 攻击, 158—159; in Cuba 在古巴, 129;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在21世纪, 239—240
- Snowy Mountains 雪山, 58
- social exploratress 女性社会探索者, 157—168
- 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废除奴隶贸易学会, 69
- South Africa, travel literature 南非, 旅行文学, 38
- South America 南美, 109, 129, 141, 193;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172—173; overland trek 陆路跋涉, 145; reinvented 重构, 118, 123; revolutions in 在……的革命, 143—144, 161, 163, 185
- Soweto 索韦托, 35
- space/time 空间/时间, 73—74
- Spain 西班牙, 175; American colonies 美洲殖民地, 16, 112; relationship with Argentina 与阿根廷的关系, 237
- Spanish America 西班牙语美洲, 110—113; investment in 在……的投资, 144—145; literature of 文学, 172; protectionism in 在……的保护主义, 16; society 社会, 147—148, 150
- Sparman, Anders 斯帕尔曼, 安德斯, 25, 34, 38, 64; bug-festooned hat 满是虫子的帽子, 54—55; and the widow 和寡妇, 55; work discussed 作品讨论, 49—56
- Species Plantarum* (Linnaeus) 《植物种志》(林奈), 25
- Speke, John Hanning 斯皮克, 约翰·翰宁, 200, 201—204, 212
- Spivak, Gayatri 斯皮瓦克, 佳亚特里, 244 (1n)
- Staaten island 斯塔滕岛, 61
- Stafford, Barbara 斯塔福德, 芭芭拉, 31, 246 (36n)
- Stanley, Henry Morton 斯坦利, 亨利·莫顿, 204, 206
- Stedman, John 斯特德曼, 约翰, 61; life and work 生平与作品, 88—100
- Sterne, Laurence 斯特恩, 劳伦斯, 89
- Stevenson, W. B. 史蒂文森, W. B., 143, 145, 147
- Stories of Strange Lands and Fragments from the Notes of a Traveller* (Lee) 《异乡故事和一位旅行者笔记的片段》(李), 104
- St Pierre, Bernardin de 圣皮埃尔, 伯纳丁·德, 135
- “Stranger, The” (Camus) 《局外人》(加缪), 236
- St Vincent 圣文森特, 111
- sugar refinery 制糖厂, 158
- Surinam 苏里南, 70, 88, 99, 105, 111; and slaves 与奴隶, 89—90

- surrealism, European 超现实主义, 欧洲的, 229
- Survey of Grasses* (Humboldt) 《草本植物调查》(洪堡), 117
- survival literature 生存文学, 84—85, 239
- System of Nature, The* (Linnaeus) 《自然系统》(林奈), 15; discussed 讨论, 24—35
- Tacarigua, Lake 塔卡里瓜湖, 119
- Tanganyika, Lake 坦噶尼喀湖, 197—198, 201
- Taussig, Michael 陶西格, 迈克尔, 140, 265 (28n)
- Tenochtitlan 特诺奇提特兰, 131
- Teocalli of Cholula 乔卢拉神庙, 179
- Theroux, Paul, work discussed 泰鲁, 保罗, 作品讨论, 212—217, 220—221
- Three Months in the Hills of Rome* (Graham) 《罗马山中三月》(格雷厄姆), 154
- Timbuktu 廷巴克图, 69
- Tinné, Alexandra 蒂南, 亚历山德拉, 209
- Tints and Differences* (Carpentier) 《色彩与差异》(卡彭铁尔), 192—193
- Tiradentes' rebellion 蒂拉登特斯人叛乱, 135
- Tour of Africa, The* (Hutton) 《非洲之旅》(赫顿), 103—104
- Tour of France, A* (Tristan) 《法兰西之旅》(特里斯坦), 153
- transculturation, term described 文化互化, 术语描述, 7—8
- transracial love stories 跨种族爱情故事, 94—95, 98—99
- travel, changing nature of 旅行, 变化的性质, 145—147; for curiosity 出于好奇, 81—82
- Travels* (Sarmiento) 《旅行》(萨米恩托), 186—190
- travel writing, as autobiography 旅行书写, 作为自传, 168; domestic settings 家庭环境, 156—157; estheticization 审美化, 213; styles 风格, 84—87
- Travels into Different Parts of Europe* (Owen) 《深入欧洲各地的旅行》(欧文), 86
-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 (Humboldt) 《……新大陆赤道地区旅行记》(洪堡), 115, 117
- Travels in Guinea and the Caribbean Islands of America* (Isert) 《几内亚和美洲加勒比群岛旅行记》(伊泽特), 68
-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Districts of Africa* (Park), discussed 《非洲内陆旅行记》(帕克), 讨论, 72—83
- Travels in the Republic of Colombia* (Mollien) 《哥伦比亚共和国旅行记》(莫利安), 147
-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 ...* (Barrow) 《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巴罗), 38; discussed 讨论, 56—66

- Travels in West Africa* (Kingsley) 《西非旅行》(金斯利), 209—212
- Tripoli 的黎波里, 69
- Tristan, Flora 特里斯坦, 弗洛拉, 154, 163—164, 168; critique of taste 对品味的批评, 156—158; on her departure 关于她的离去, 167; life and travels 生平与旅行, 152—153; on political situation 论政治形势, 163; on slavery 论奴隶制, 158—159; use of personal narrative 个人叙事的使用, 159
- Tristán, Pío 特里斯坦, 皮奥, 153
- Trujillo, Lourdes 特鲁希略, 洛德斯, 237
- Tupac Amaru 图帕克·阿马鲁, 132
- Turner, James 特纳, 詹姆斯, 44
- Ulloa, Antonio de 乌略亚, 安东尼奥·德, 16, 18, 20—21, 23, 112, 114
- Ureña, Pedro Henríquez 乌雷尼亚, 佩德罗·恩里克斯, 172
- Urquijo, Mariano de 乌尔基霍, 马里亚诺·德, 114
- USA Today* 《今日美国》, 222
- U.S., demographics 美国, 人口统计, 237—238
- Valparaiso 瓦尔帕来索, 165
- Varon, Casimir 瓦龙, 卡西米尔, 87
- Venezuela 委内瑞拉, 111—112, 112, 114; gold mine 金矿, 126—127
- Venus 金星, 38
- verbal painter 言语画家, 198, 201—202
- Victorian writing 维多利亚时代的书写, 198, 200—201
- Victoria N'yanza, Lake 维多利亚湖, 201, 202
-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 女王, 168
- Views and Monuments ...* (Humboldt) 《风景和遗迹》(洪堡), 130—131
- Views of the Cordilleras ...* (Humboldt) 《科迪勒拉山的风景……》(洪堡), 117, 118, 120, 123, 129, 130, 179, 181
- Views of Nature* (Humboldt) 《自然的风景》(洪堡), 117, 118, 119, 120—124, 134, 171, 193
- Vña a la Mar 海滨葡萄园, 161
- Virgil 维吉尔, 170, 171
- Virgin of Zapopan 萨波潘圣母, 241, 243
- Von Plattenburg 冯·普拉滕伯格, 40
- Voyage of HMS Blonde to the Sandwich Islands* (Graham) 《皇家海军舰艇布朗德号桑威奇群岛之航》(格雷厄姆), 154
- Voyages dans l'intérieur de l'Afrique* (Le Vaillant) 《非洲内陆旅行记》(勒瓦扬), 87—88
- Voyage to Brazil* (Graham) 《巴西之旅》(格雷厄姆), 152
- Voyage to Brazil 1817—1820* (Martius) 《巴西之旅: 1817—1820》(马蒂乌斯), 232
- Voyag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Sparman) 《好望角之航》(斯帕尔曼), 38, 49—56

- Voyage to Senegal* (Adanson) 《塞内加尔之航》(阿当松), 68
- Voyage to South America* (Ulloa and Juan) 《南美洲之航》(乌略亚和胡安), 20
- Wanyamuezi 瓦尼亚缪兹人, 201
-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222
-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114
- Wheatley, Phyllis 惠特利, 菲莉丝, 99, 100
- Which Tribe Do You Belong To?* (Moravia) 《你属于哪个部落?》(莫拉维亚), 212
- White Writing: 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 (Coetzee) 《白人书写: 论南非的文学文化》(库切), 38
- Wilberforce, William 威尔伯福斯, 威廉, 69
- Williamson, Peter, story of 威廉森, 彼得, 的故事, 84
- Witte, Samuel 维特, 塞缪尔, 31
- Wollstonecraft, Mary 沃尔斯通柯莱夫特, 玛丽, 168
- women, street dress 女性, 户外便装, 164—165; as travelers 作为旅行者, 152—168
- Workers' Union, France 工会, 法国, 152
- Workers' Union* (Tristan) 《工会》(特里斯坦), 153
- Wright, Richard 莱特, 理查德, 217—218, 220
- Xeriff of Edrissi 埃德里希的谢利夫, 67
- Yawar Fiesta* (Arguedas) 《血祭》(阿尔格达斯), 230—232
- Zuure Veldt 祖尔草原, 74

一部深刻敏锐、意义深远的著作……普拉特行文思路清晰而富于激情，且充满了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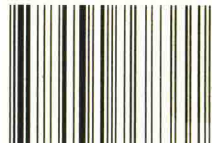
——詹姆斯·克利福德，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

……这本书不仅是一个里程碑，它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批判工具。

——彼得·休姆，埃塞克斯大学



ISBN 978-7-5447-6833-7



9 787544 768337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 68.00 元